

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

附東亞研究資訊服務報導

第十一期 二〇〇〇年八月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台北・南港

目 錄



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第十一期

主持人的話／蕭新煌.....	1
----------------	---

研究員通訊

婆羅洲行腳／蕭新煌.....	2
IAHA 與會學者與重要學術演說／朱宏源.....	5
2000 年 IAHA 年會會議報告：後現代宗教的考察／朱榮勳.....	14
關於沙巴、沙勞越華人的筆記／許立堂.....	16
國際會議歸來／麥留芳.....	19
出席第十六屆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報告／陳何玉.....	23
出席第十六屆亞洲歷史學家學會會議略述／陳國棟.....	27
IAHA 第十六屆年會側寫／黃登興.....	29
亞需建立臺灣觀點的東南亞華人歷史城市的研究／黃蘭翔.....	33
從「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IAHA) 第十六屆大會 觀察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政治」／蔡源林.....	42
「婆羅洲行腳」補遺／蔡慧玉.....	45
東協區域論壇與台海安全／林正義.....	48
泰國田野調查紀行／嚴智宏.....	51

特別研究

東南亞人名與稱謂／麥留芳著 王國璋譯.....	58
-------------------------	----

會議論述

The Search for Asian National Histories／王慶武.....	124
--	-----

新生代東南亞研究

印度尼西亞新秩序後期暴動的當代史：

研究構想與暴動事件分類的提出／楊聰榮.....139

觀摩第十六屆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會議心得報告／林淑慧.....169

東南亞與亞太研究機構簡介

英國・漢爾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174

泰國・清邁大學社會科學與永續發展區域中心.....176

國內東南亞研究機構動態報導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178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179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辦公室報導.....180



東亞研究資訊服務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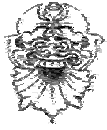
主持人的話／蕭新煌.....185

東亞區域研究成果發表研討會.....186

會議報導

2000年9~12月東亞研究相關會議時間表.....188

Contents



Newsletter of the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o.11



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By Hsin-Huang Michael Hsiao.....1



News from PROSEA Researchers

<i>From PROSEA to Borneo</i> By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2
<i>IAHA Participants and Special Lectures</i> By Hong-Yuan Chu.....	5
<i>IAHA Conference Report: Religious Revivals in Southeast Asia, Postmodern Studies</i> By Ron-Guey Chu.....	14
<i>Note on the Chinese of Sabah and Sarawak</i> By Wen-Tang Shiu.....	16
<i>Back from IAHA Conference</i> By Lau-Fong Mak.....	19
<i>Notes on the 16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i> By Chung-Yu Chen.....	23
<i>Short Note on the 16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i> By Kuo-Tung Chen.....	27
<i>Short Note on the 16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i> By Deng-Shing Huang.....	29
<i>How to Study the Urban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from Taiwan's Viewpoint?</i> By Lan-Shiang Huang.....	33
<i>Malaysia's "Islamic Politics" in IAHA-16th</i> By Yuan-Lin Tsai.....	42
<i>From PROSEA to Borneo: An Addendum</i> By Hui-Yu Tsai.....	45
<i>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nd the Security of Taiwan Strait</i> By Cheng-Yi Lin.....	48
<i>Notes from My Fieldwork in Thailand</i> By Chih-Hung Yen.....	51



Special Research Report

<i>The Rules of the Name Game</i> By Lau-Fong Mak & Kok-Chung Ong.....	58
---	----



Conference Paper

The Search for Asian National Histories

By Gungwu Wang.....124



Research of the New Generation Researchers

Indonesian Unrest in the Late Period of New Order:

A Research Approach and Classification of Riots in the 1990s

By Tsung-Rong Yang.....139

Notes on the 16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By Shu-Hui Lin.....169



Introduction to Institutes of Southeast Asian and Asia Pacific Studies

Centr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ull, U.K......174

Regional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CSD,

Chiang Mai University, Thailand......176



News from the Institutes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of this Country

Graduate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178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179



News from PROSEA Office.....180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By Hsin-Huang Michael Hsiao.....185



Conference of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East Asian Research...186



Sept. ~ Dec. 2000 Calendar of Conferences and Meetings on East Asia.....188

主持人的話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主持人

入夏以來，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的腳步未曾稍停，依然積極辦理各項學術活動。首先，我們主辦了「馬來世界伊斯蘭政教運動國際研討會」，與淡江大學、暨南大學合辦「2000年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並辦理「越南經濟改革與台越未來學術合作的方向學術研究座談會」。我們也舉辦一場專題演講、三次午餐研討會，又為「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添加四篇新作。

最特別的，應該是組團參加七月底在馬來西亞沙巴（Sabah）舉辦的「第十六屆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IAHA）研討會」。在會議中，我們一行十二人總共發表十篇論文。我們的參與和積極表現，應該已在兩百多位各國學者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對我們能在過去短短幾年中開始並拓展東南亞研究，而且獲致具體的成果，更是刮目相看。這是本計畫成立以來首度到國外的啼聲初試。能得到國際學界的肯定，我們感到欣慰。不過，這只是一個起步而已；未來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近期內，我們將與本院台史所籌備處共同舉辦「被殖民都市建築國際研討會」，與本院近史所合辦「中國與越南關係研討會」，與本院經濟所合辦「東亞與東南亞經濟發展的經驗與挑戰研討會」，並主辦「國際資本、勞動與族群：台商在東南亞研討會」。我們相信，這些學術活動都能開拓本院的東南亞研究領域和提高其品質。

盼望在不久的將來，本院組織法修正案能在立法院通過。相信屆時以研究中心的力量和資源去推展東南亞研究，一定能獲得更好的成績。

婆羅洲行腳^{*}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主持人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一行十二人，在過去九天（七月二十六日到八月三日）前往馬來西亞的沙巴（亞庇）和砂勞越（古晉）參加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研討會和參訪相關學術機構。從東到西，我們跨越婆羅洲的兩端，這應該也是來自台灣，為數最多的東南亞研究學者同時出現在馬國。

在國際亞洲歷史學家會議中，我們一共發表了十篇文章，主題從二十世紀前南海的華人漁民，到開放改革後越南的台灣投資；從二次大戰期間台灣、印尼和日本的鄰里組織到當前東南亞的貿易發展和模式；從鄭和與麻六甲，到越南的高台教；從新加坡的伊斯蘭化，到台灣與馬來西亞宗教復振的比較；再從河內、台北和泗水的都市違章建築，到東南亞四國的中產階級。據我觀察，台灣學者在會議中的參與和積極表現，應留給其他來自三十國共二百五十餘位與會學者不錯的印象。尤其是東南亞諸國學者對於中研院在過去幾年內能夠開啟和擴展東南亞研究，而且還已經有一些成績，更是另眼看待。相信一旦通過中研院組織法的修改立法過程之後，以研究中心的力量和資源去推展東南亞研究，只要能假以時日，一定會有更好的成果。此行是本計畫組成以來，第一次到國外初試啼音，在國際東南亞學術圈子裡受到正面的矚目，應是可以感到欣慰。不過，以嚴格的學術水準和建立某種研究地位的標準來看，中研院甚至是整個台灣的東南亞學界，都只是起步而已，還有一大段的路子要迎頭趕上。

在會中，王賡武院士發表了專題講演，從二十世紀的人類社會特色談到東亞史學界應如何在下一個世紀建構合乎學術客觀視野的「國家歷史」。王院士在過去幾年一直對中研院的東南亞研究給予肯定支持和鼓勵，還對該學會的幾位東南

^{*} 本文原刊載於 2000 年 8 月 4 日自立晚報，已獲得作者及自立晚報同意轉載。

亞國家學術機構負責人，讚譽本計畫已有的成績。這一點，對我們來說，不但是鼓勵，更是壓力。

在古晉，我們一行則訪問了馬來西亞砂勞越大學，古晉中華第一中學和砂勞越發展研究中心。砂大和中心的教授和研究員對本計畫的研究重點都感到很大的興趣，也都表示願意建立進一步的合作關係，諸如相互交換出版品，學者互訪，或是合辦研討會。在兩地的訪問座談裡都出現一個共通話題，那就是砂勞越原住民族的土地權和文化認同問題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原住民社會運動。在獨立華文中學的座談裡，我得到的印象是校董和校長相當在意他們為下一代華人所擔負的華語和華人文化傳承責任，這在馬來西亞當前的政治社會情境之下，或許不是容易的目標，但如果他們能更清楚地認識到國家（政治）認同應該可以與族群（文化）認同加以區隔，那麼馬華的政治地位與經濟文化力量或許會有更均衡的發展。

此行，我們也與古晉的「留台同學會」幾位學長有深入的討論，我也了解到過去二十年來「留台人」已在馬國扮演了不容小看的經濟角色，如果有適當的管道，透過他們在地的表現或許也可以改變和增進馬來族群對台灣的印象。

總之，這一趟婆羅洲之行，是豐富的學術之旅，也是有意義的文化社會接觸之行，我相信同行的同仁也會有所同感。



第十六屆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與會代表團一行

IAHA 與會學者與重要學術演說

朱淦源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

前言

第一次參加這個大會，感觸相當之多，惟以時間較緊迫之故，本文僅能就大會參與學者的概況、貴賓演說、特殊題演講三方面，加以簡單敘述。

參與國家、機構及學者簡介

第十六屆亞洲歷史學家學會雙年會是在今年（西元 2000 年）7 月 27 日至 31 日，在馬來西亞沙巴州的首府 Kota Kinabalu 舉辦，這是一個大型的國際會議，參加的成員非常的多，至少有三、四百人以上，來自三十個國家與地區，發表文章超過兩百篇。以下，依照英文字母的順序，簡單的加以介紹（請看所附「參與國家、機構及學者專家人數一覽表」）：

第十六屆亞洲歷史學家學會研討會參與國家、機構及學者專家人數一覽表

國家(地區)	機 構 (與受邀演說之學者)	學者人數
澳洲	Adelaide(Peter Burns), Griffith, Northern Territory, Murdoch(Robert Reece), South Australia 五個大學	6
孟加拉	Rajshahi, Jahangirnagar, Dhaka 三個大學	10
比利時	Ricci 中國研究所等	2
汶萊	Brunei Darusslam 大學及歷史研究中心 (Pehim Awang Jamil)	3
中國大陸	北京、南京、復旦三大學及廣西東南亞研究中心等	6
捷克		1
法國		1
德國	Duisburg, Cologne 兩大學等(Bernhard Dahm 和 Dietmar Rothermund)	6
印度	尼赫魯, Annamalai, Madras 三大學。Nataji 亞洲研究中心等	10
印尼	Gadjah Mada, Padjadjaran, Indonesia 三大學及教育部 (Departemen Pendidikan Nasional) 等	10
義大利	Ruth McVey	1
日本	東京、京都(Kunio Yoshihara)、靜岡及法政四大學, 五教授及七個研究生	12
香港	港大等	2
馬來西亞	馬大(Jomo K.S 和 Khoo Kay Kim), 科技大, Mara 科技大, Kebangsaan, Putra, 北方(Utara), 沙巴大, 砂勞越大, Tenaga 大及國際伊斯蘭十一大學及三家博物館, 兩家檔案館, 各地之歷史學會 (Persatuan Sejarah) 還有其他研究機構與政府有關部門	135
緬甸	仰光大學及國家歷史研究中心	4
尼泊爾	Tribhuvan 大學	1
荷蘭	萊頓大學	3
紐西蘭	奧克蘭大學(N.Tarling)	1
巴基斯坦	Sindh, Quaid-e-Azam, Balochistan 三大學	3
菲律賓	菲大, Ateneo, Mindanao, Holy Spirit 四大學	9
葡萄牙	Nova de Lisba 大學	1
俄羅斯	聖彼德堡大學	1
新加坡	國立大學(王賡武), 南洋理工大學	7
南非	Stellenbosch 大學	1
錫蘭	Peradeniya, 及 Rajarata 兩大學	4
瑞典	斯德哥爾摩大學	1
台灣	中央研究院 (8 人)及成功、政治、中山、南華、淡江五大學	14
泰國	Chulalongkorn, Ubonratchathanee, Chiang Mai 及 Stanford International 四大學	5
英國	大英圖書館, Durham 大學等	3
美國	夏威夷大學(Barbara Andaya),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亞力桑那大學	4

澳洲有 5 個大學，6 個學者參與。再來是孟加拉，有 3 個大學，10 個學者參加。比利時有 1 位來自 Ricci 中國研究所，另 1 位沒有註明是從那個學術機構來。汶萊是由汶萊大學及國家歷史研究中心 3 位學者參加。中國大陸來自北京、南京、復旦三大學及廣西區政府的東南亞研究中心，一共 6 個人。捷克、法國都是一個人。德國 2 個大學，有 6 位學者。印度有 3 個大學，1 個亞洲研究中心，一共 10 個人。印尼有 3 個大學及教育部（Departemen Pendidikan Nasional），一共 10 個人。義大利來了 1 位。日本東京、京都、靜岡及法政 4 個大學，5 位教授帶了 7 個研究生。香港由港大 2 位學者。

馬來西亞是最龐大的代表團，一共有 11 所大學、3 家博物館、2 家檔案館、還有各地的研究機構、政府部門，有紀錄的資料是 135 位學者參加。事實上的人數則遠遠超過；還有許多研究生、大學生參與，尤其地主沙巴大學、一些中學的負責人，校長、副校長等等都有參與。砂勞越來的人也不少。緬甸一共有 4 位參加，來自仰光大學及國家歷史研究中心。尼泊爾有一位。荷蘭來自萊頓大學有 3 位。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有 1 位。巴基斯坦有來自 3 所大學 3 位學者。菲律賓有菲大、Ateneo、Mindanao、Holy Spirit 四所大學，9 個人。葡萄牙、俄羅斯各來了 1 位。新加坡是 2 個大學，7 位教授，其中包括原來香港大學校長，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擔任所長的王賡武教授。南非有 1 位，錫蘭有 2 個大學共 4 位，瑞典也來了 1 位。

台灣是僅次於馬來西亞的一個代表團，中央研究院來了 8 位，另外成大、政大、中山、南華、淡江分別有 1、2 位參加，總共 14 位。泰國有 Chulalongkorn，還有其他三所大學，一共來了 5 位。英國有大英圖書館及 Durham 大學，一共 3 位。美國是夏威夷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及亞力桑那大學，一共 4 位。

參加者總數有數百人，相當熱鬧，分為 6 個場地。除了貴賓演說及專題討論外，另有論文發表，為數高達 221 篇，分為 11 個子題，同時在 6 個場地舉辦，篇數多，再加上場地多，使參與者都昏頭轉向，每個人都像瞎子摸象，無法清楚了解整個運作。而且學者的英語也是南腔北調，聽起來本已十分不容易，再加上講的是亞洲各國非常複雜的歷史，因此更不容易掌握。雖然這個大會參與的人數多，內容非常豐富，是其優點，但也令人覺得額外的複雜、混亂，算是美中不足之處。

這次的討論，就學術的演講和報告，主要可以分為三大階段：一、特別貴賓演講，二、特定主題演講，三、一般的討論。茲就前面兩階段的內容介紹如下。當然，由於初次參與開會，人面生疏，對以下學者的認識尚淺，對他們的大作也所知有限，如有遺漏、偏頗或誤解之處，尚請讀者不吝賜教指教。

一、特別貴賓的演講

除了政治性的馬哈迪總理，和聯合國前任大會主席，現任秘書長駐緬甸特派員的職業外交官 Tan Sri Razali bin Ismail，兩位政治人物的演講之外，有兩位學界的重要人士，一位是王賡武教授，另一位是德國來的 Prof. Bernhard Dahm。

（一）王賡武院士主講「尋找亞洲各國的歷史」

王賡武教授主講“The Search for Asian National Histories”，意思是希望建構出亞洲各國家或民族自己的歷史。他認為在 1961 年以前，亞洲其實沒有甚麼特別的歷史，都是由英國學者所包辦、編寫的三大部歷史，就是劍橋大學的亞洲史。這裏面所提的，不外乎中國、日本、韓國、越南都是帝國、專制主義，需要現代化。1961 年以後就不一樣，各地區在爭取自主性過程中，引起相當激烈的變遷，在史觀上變得多姿多彩。

王教授認為這其中有三個大的分支：一、中國、日本要走出自己的路。二、東南亞國協(ASEAN)，這些國家有日益增高的區域主義(regionalism)，在這區域內，有想要聯合的現象，可是內容如何，要進一步深入探討。三、南亞，特別是以印度為核心的發展。王賡武教授認為這三大方向是值得探討的。

他的演講文除了檢視二十世紀的亞洲史學外，也試著提出一些趨勢，認為是未來十年、廿年內所即將演變的方向。以下分三點介紹他的演說文：

1. 二十世紀的世界與亞洲歷史

他認為二十世紀的亞洲史有十個特色：一、暴亂最多，二、自由度最高，三、勞工與婦女權利的提昇，四、民主政治，五、下半世紀亞洲經濟復甦，六、下半世紀仍有若干地區獨立與復甦的心願未了，七、下半世紀由美國主導，八、蘇聯的興起與衰亡，九、長距離廣人口的移民，十、環保的問題。

2. 史學家的回應

對於這十大特色，生活在亞洲的歷史學家，在上半世紀，主要是跟隨著英國人的詮釋，沒有自己的格調，不一定真確地反映被殖民的情況。但是，到了下半世紀就不同了。

在下半世紀，亞洲的歷史學家在經濟史、社會文化史有了新的創作，再加上族國的出現，使修正主義抬頭，但接踵而至的，則是各種意識形態如（民族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混入論述之中，創造了各式各樣的史學理論與史觀，但彼此又相互爭辯。因此，亞洲歷史學者在二十世紀下半頁的特色，是繼

續學習西方，但在西方各種學說相互抗衡的矛盾中，正在逐漸走出自己的路子。

3. 未來的方向

未來亞洲歷史學家最需要的，是走出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的詮釋，進入民族（或國族）歷史的建構。民族（或國族）歷史，不等於以國家為核心的歷史。歷史不必為政治服務。

歷史教科書的撰寫，不止遭逢上述的問題，而且還要教育年輕學子如何重視過去，以及具體敘述過去的主要內容。注意的範圍也不再僅限於本國之內，跨國之間的歷史也開始受到重視。論述的原則也從共產或反共的完全對立與互相抗辯的傳統，進入修正式的：對共產主義，具有若干批判性（同時夾帶某些肯定）的論述方式。男女平權的考量與重視婦女史，以及環境演化的歷史，都是未來亞洲歷史學者必須重視的方向與主題。

（二）Prof. Bernhard Dahm 主講「亞洲文化傳統與爭取建國」

德國的貴賓 Prof. Bernhard Dahm 的演講題目是“Cultural Traditions and the Struggle for Nationhood in Asia”。亞洲文化的傳統，以及亞洲為其民族而奮鬥的觀念，也是以宏觀的角度來看。這篇文章主要分三個部分：

1. 肯定民族主義的影響

民族主義的各種現象，裏面包括語言的重新抬頭、國家的「民族的空間」概念的警覺，也就是對“national space”印象的新掌握，以及更多受高等教育的精英份子的出現。民族主義在語言、觀念及人材上都賦予了新的價值與氣象。

2. 肯定文化傳統的重振

他提到文化的傳統，或者說文化的傳承，在亞洲建國的過程也被重視，特別是從印度、印尼、緬甸、菲律賓、越南各地的歷史來看，都有這個現象，使文化傳承的重新振作愈發重要。

3. 理論架構與實際政治仍有差距

理論的層次，傳統的價值復興後，是不是以目前的國家格局而獲得政局的穩定？他覺得不然。

他也指出一個重要的現象，也就是「國家」與「民族」的整合與反整合：在大的國家內，又有一股力量，民族主義未必以國為範圍，民族主義的本質還是以民族的範圍，所以最近在印尼內會發生一些獨立的現象，國家之內的部分地區，多有爭取獨立建國者，如東帝汶反對印尼當局的印度尼西亞化國族建構—以國家

作為建構新的一個大民族的範圍。這種作法多次遭遇抗拒，而在若干地區，出現獨立的呼聲及重新建立自己的國家或政府的要求，所以，在大國之內的區域性反國族建構，變成新的趨勢與問題。

二、特定主題演講

特定主題的報告，裏面又分作幾個子題：一、亞洲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二、歐洲人在亞洲的情形，三、婆羅洲地區的情形，四、馬來西亞過去一百年的歷史。

環繞著這四個子題，分別有幾篇文章：

（一）亞洲與資本主義的關係

有關亞洲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由日本、義大利及馬來西亞的三位學者所寫。

第一篇由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的吉原久仁夫教授（Kunio Yoshihara）主講。他提出一個替代說，就是東南亞的資本主義，以當代來說，有個「替代品」的「相關」理論。「替代品的相關」到底是甚麼呢？他用的字是 Relevance of the Ersatzness，很特別的一個詞。主要的意思是亞洲雖然有資本的累積，造成收入的增加，生活的改善，不過因為未能體會 know-how 的重要，所以 know-how 的整體知識建構做得不好，以致於在 1997、1998 這兩年，深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困擾。在日益增加的供應，還有 know-how 的需要的的前提下，他們還需要進一步的確實把握有無競爭力。Know-how 再加上競爭力，是一種比較上更複雜的工作，所以吉原教授認為必需推動制度與文化的變革。在經過整體的改造之後，才能提昇 know-how 的積累程度，並且互相全球化，以便一方面站穩自己的腳跟，二方面順應世界的潮流。

義大利的 Ruth McVey 提出的觀念是資本主義與社會的結構。她的看法也是在檢討亞洲的資本主義，認為亞洲的資本主義，對於群眾組織的重要性，比較不重視，層級性也不夠，而在一些公會的組織上，力量也不夠。另外，非政府組織 (NGO) 有抬頭的傾向。而公司行號運作的系絡，從早期國內的單打獨鬥，到互相關形成國際連結網，這也是一個新的現象。此外，各國社會的一些問題，也不僅止於各國國內，已經轉變成國際化的問題。最後，提到過去國家之內，政府中央化的傳統，也日益式微，換句話，地方自治與地方力量的強化，使國家的集權能力有降低的現象。

馬大經濟行政學院的教授 Jomo K. S. 的文章，討論東南亞的資本主義，重點在找尋東南亞的資本主義與其他地區的差異。他認為東南亞的資本主義有一窩蜂的現象，基本上是追隨日本，像一群飛雁，由一隻日本雁帶領，有亦步亦趨的特

色，換句話說，是以日本馬首是瞻。這篇文章也肯定吉原和 Ruth McVey 兩位的發現，對世界銀行提出若干的批判，希望能進一步建構東南亞的特色。但是，東南亞的特色是甚麼呢？一時間似乎未能明白指出重點在哪。所以一方面也是在找尋，希望亞洲的資本主義能夠找出一條新路。這點跟王賡武院士一樣，王希望在亞洲各民族間找到自己，建構自己的歷史。這篇文章，則是要建構自己的資本主義。

（二）歐洲人在亞洲的情形

德國教授 Dietmar Rothermund 的題目是〈歐洲人在亞洲〉，從歐洲人形象的變化及其遭遇加以探討。簡單的說，二十世紀以來，歐洲人在亞洲的地位每下愈況。這種現象是很明顯，特別是 1905 年日俄戰爭，日本擊敗俄國之後，歐洲的迷思就日漸式微，亞洲也進入反殖民的時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冷戰，歐洲聲望的進一步瓦解就更清楚。最後，他提到雖然近年有歐盟產生，不過歐盟的產生並不是一種力量的凝結，所以它不再是個霸權。這是 Dietmar Rothermund 的看法。

（三）婆羅洲地區的情形

第一篇文章，是由澳洲 Murdoch 大學歷史學程的副教授 Robert Reece 提出。他的題目是有關日本佔領時期婆羅洲的研究，他特別注意在北婆羅洲日本的帝國主義運作，指出當時日本在北婆羅洲曾經嘗試做個長程的規劃，目的是以軍事來主導。要點有二：一是石油的增產，二是把中國削弱。由這兩點來看，他們的確是有長遠的構想。

第二篇是有關婆羅洲領地的問題。由紐西蘭奧克蘭大學亞洲研究所，一位研究這類問題相當有名的教授 Nicholas Tarling 所撰寫的，題目是“The Borneo Territories: An Imperial Legacy”他指出這個地方有很多的殖民，特別是英國的殖民，可說是核心。英國殖民在近幾年來有日益式微的現象，有關帝國的擴張，與當地人的國家與民族建構，可以從婆羅洲的這些領地，作一個探討，來了解帝國的遺產剩下些甚麼。

另外一篇文章是有關馬來西亞的建構，還有在汶萊歷史中，有關拒絕加入馬來西亞聯邦的問題。這問題其實是：汶萊在馬來西亞聯邦正當建立的時候，北婆羅洲的沙巴、砂勞越答應參加，汶萊沒有參加。這篇文章由汶萊的國家歷史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所寫，內容是汶萊不參加馬來西亞聯邦的故事。過去，對於為何不參加，大家常提出三大理由：一、對馬來西亞蘇丹的任命制度不以為然，二、石油的考量，三、貨幣系統的問題。他認為這些都不是核心問題，核心問題是在汶萊的蘇丹上面。他指出 Omar Au Saifuddin 極有智慧、有遠見，認為獨立出來，比較有利。所以經過兩年的運作，保持本身是一個馬來專制的伊斯蘭王朝的政治

體制。

（四）馬來西亞過去一百年的歷史

馬來西亞過去一百年的歷史有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澳洲 Adelaide 大學歷史系教授 Peter Burns。他討論馬來西亞各州，與馬來半島外沿的島嶼，相互之間，在整個較長的廿世紀（1873-1997）的故事。換言之，主要探討殖民地時代與後殖民地時代，介於婆羅洲、檳城、新加坡三個島嶼和馬來半島之間的關係，在當地人民國際化與地方化上的現象。

另一位是夏威夷大學的教授 Barbara Andaya，指出馬來西亞在 19 世紀以前的歷史，研究的較少，而且也有逐漸式微的現象。她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並以「超越國族（Beyond the Negeri）」為題，強烈質疑自一九七〇年代至目前，關於馬來西亞史的寫作方式。Negeri 在建國之前，原來指的是各蘇丹國。建國之後，改成一個聯邦國家，Negeri 變為一個固定的單元，史家們受到意識形態限制，不敢逾越，因此造成由政治主導的以馬來人為主的馬來西亞史，同時又忽略建國以前漫長時間的歷史。

第三篇 Khoo Kay Kim 是馬大人文社會科學院歷史系教授，題目是「廿世紀馬來西亞史」。他提出突破性的看法，但是對於在台灣的歷史學者來說，這也是我們心裡的話，卻由 Khoo Kay Kim 提出來：

第一、寫史的基礎：他直接批評當前史學界，說目前很多學者太重視方法論，這種作法，他認為是不對的。因為研究歷史，最重要的不是方法論，而是原始材料。當然，根據一些不同學門的特殊的觀點與研究方法，可以對原始材料作特殊面向的觀察。不過，重點不在理論，而在材料。他講得很明白，最近幾年，很多歷史學者，都是先有結論，再找證據來發揮，使他們的作品變成充滿各種偏見。這種是不可取的。

第二、他指出目前馬國史學界所作 1900 到 1941 的歷史實在太少，有待開發。

第三、寫史的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 55 年，越來越大的挑戰已經產生，是對原來傳統史學的挑戰。學者們往往會利用一些物理科學、應用科學，這一類的方法和技巧來描述歷史。這種描述法，一般人也看不懂，這些學者本身也不很懂，而且這種作法根本也無法從事準確的預測，所以不是太好的方法，不過目前還很走紅。

總之，他覺得這種傾向是不理想的，要重新走出來，不要受社會科學重視方法學的影響，迷失了自己的路線，而應該讓學者利用更深入的方法來了解歷史，而不是延用各種不同的學科，來主宰歷史研究。因此，他認為（馬來西亞）歷史

研究的最終目標，在引導人們對馬來西亞社會的了解，光用理論是無法達到這一點的。

結論

以上是對各國出席情形，大會所安排貴賓及特定學者演講內容的簡介。由於是在二十世紀最後一年舉辦，因此本次大會的主題具有相當高度的回顧性。特別是回顧剛剛過去的一百年。在各研討會場舉行，分作 11 主題，為數 221 篇的論文之中，也多有佳作，值得將來另找機會，做進一步介紹。

吾人回顧這一次大會，可以發現最大的特色應該是：

首先是亞洲人在國際史學界地位的提昇。亞洲人在世界歷史學界的地位，正快速提昇。以前開年會，普遍聽到的是歐美的觀點，看到的是歐美學者為主的場面，而今在會場中，放眼望去，絕對大多數學者都是黃皮膚的亞洲人。雖然亞洲學者，心中多少還有崇洋的心態，使今年的大會中，有洋人發表文章的會場人數，遠多於祇有亞洲人的會場。但亞洲學者自己要站起來的現象，也十分清楚。我們期待，亞洲的歷史學者，不再以洋人為馬首，用自己的材料，描述自己的國家與民族，才能建構出自己的真歷史，而為世界所重，包括洋人在內。

其次是對廿世紀亞洲歷史，從史觀、史識、甚至史德上加以誠懇檢討。在各篇文章中，不難感覺到一股反對意識形態主導，反對政治操控，以及反對西方觀念詮釋的氣息，自己正是在反對之深層，國家與民族，從文化傳統開始復振的願望與意識。他們開始從遠眺歐美，進入近觀與靜觀自我，肯定自我，找尋自我，並建構自我過去的新時代。當然，這是一條漫漫長路，但其新方向，已由新加坡國立大學王賡武院士、夏威夷大學 Barbara Andaya（按：Barbara 是白種人，但其夫婿 Prof. Leonard Andaya 名氣更大，是馬來人）、京都大學吉原久仁夫、以及馬大的 Khoo Kay Kim 的文章所明白指陳。似乎即將到臨的 E 世紀，對亞洲歷史學家而言，真的是一個嶄新的世紀。

2000 年 IAHA 年會會議報告： 後現代宗教的考察

朱榮貴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

我參加的幾場研討會都和東南亞區域的宗教復興有關。宗教復興是這次年會的主題之一，可見近年來宗教在東南亞各地的復興已經獲得學界的重視。至於研究現代宗教復興的方法及議題，由在這次年會所提出的論文來看，現代化和宗教復興的關連似乎已經不是主要的研究課題。學者主要關心的議題是新產生出來的宗教組織和活動如何和舊有的傳統宗教關連起來。現代化促成宗教興起似乎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比較少學者去探討現代化與宗教的問題。此外，宗教復興在東南亞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所有的教派和宗教近二十年來都急遽發展，其中以伊斯蘭教和佛教最為明顯，基督教在印度也相當興盛，可惜這次年會中沒有論文特別討論這個議題。很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位印度學者討論佛教最近在孟加拉發展的情況。孟加拉成為伊斯蘭的國家至少有五百多年了，一般學者都認為佛教在這個國家早就絕種了，僅成為少數人個人的宗教信仰及習俗。但是有組織的佛教團體最近在孟加拉發展得很快。佛教會不會再度引發和伊斯蘭教的衝突也是很令人關切的研究議題。

有一位學者討論伊斯蘭教在馬來西亞的都市快速發展的情形。這是一個新的伊斯蘭教的教派，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他在許多社區建立聚會的中心，很注重社區服務，比較忽略教義及儀式。在研討會的討論中，有聽眾提出的問題，質疑這個教派是否是伊斯蘭教的正統教派，即所謂“muni”的爭議。何謂「正統」是一個爭議性很高的問題。至少從研討會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宗教復興所引發出來的正統與非正統的爭議，不僅伊斯蘭教必須面對這個難題，幾乎所有的宗教受到現代化的衝擊之後所引發出來的宗教復興都必須面臨教派分裂的問題。

我的論文探討越南高臺教的復興，尤其是 1975 年越南統一以後高臺教的發展。我也依據我於 1995 年前往西貢、順化等地做田野調查所獲得的資料來討論 1980 年代越南實施經濟開放政策以來，宗教復興的情況。我的觀察是，越南宗教是全面的復興，而且深度很廣，甚至被指為資本主義的宗教的基督教也公開活動，而且很活躍。雖然在研討會有一位學者質疑我的報告像是一位觀光客的旅遊報告。我的回答是，田野調查是收集第一手資料，是基於我個人的觀察面做的報告。至於我的報告是否很表面，只是我個人主觀的印象，那就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了。不過我去越南做田野調查的地方大都不是一般觀光客去遊玩的地點，所以越南的觀光客大概寫不出像我這樣的報告。

總之，我以為這次 IAHA 年會很成功的一點就是試圖用亞洲人的視角來看亞洲的社會及歷史。在有關宗教復興的三、四個研討會上，學者關心的是所謂後現代的宗教問題。

在參加年會的研討會之外，我也抽空去考察 Kota Kinabalu 的廟宇。Kota Kinabalu 有一所很大的印度教的廟宇，雖然目前在 Kota Kinabalu 的印度人很少，但這個印度廟顯示 Kota Kinabalu 以及整個馬來西亞的歷史上印度教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Kota Kinabalu 有兩個官方的伊斯蘭教堂，都很大，雖然教堂內部的裝飾非常簡樸，可是教堂的建築都很雄壯，充分顯示出伊斯蘭教在馬來西亞的崇高地位。

Kota Kinabalu 的華人不多，有一個大伯公（即土地公）廟和一個拜廣澤尊王的廟。廣澤尊王是泉州人的守護神，可見 Kota Kinabalu 的華人有很多是從泉州來的。

會後我們到古晉訪問。古晉的華人廟宇很多，古蹟也比較多。古晉最著名的是大伯公廟，有將近二百年的歷史。大伯公廟附近有鳳山寺，拜廣澤尊王，也有上帝廟，拜玄天上帝。另外古晉有天后宮以及一座拜觀音的廟宇。比較有特色的是古晉有一間很壯觀的錫克教的教堂。錫克教是伊斯蘭教及印度教的混和宗教，是錫克人所崇拜的宗教。古晉顯然有很多錫克人。從宗教的分佈狀況我們可以看出各個種族在一個社會的分佈及地位。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文化、多種族的國家，從宗教信仰上我們可以很具體地看出各個種族在那個社會的分佈及地位。

古晉有一個天主教堂及一個英國國教的教堂。天主教堂的建築是採取馬來式的風格。雖然基督教在馬來西亞是少數人的宗教，但是由於馬來西亞曾經是英國人的殖民地，因此，基督教在古晉也有相當高的地位。

關於沙巴、沙勞越華人的筆記

許文堂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

第十六屆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IAHA）於今年七月 27-31 日在馬來西亞東部的沙巴州（Sabah）亞庇市，即哥打京那峇魯（Kota Kinabalu）召開。本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同仁一行與會。會議期間餘暇至市區發現有不少華人所開商鋪，會議結束後同仁轉往沙勞越州（Sarawak）訪問時也見到華人在古晉市（Kuching）蓬勃發展的情況，因此激起我對於兩地華人的遷移歷史作簡略的考察的念頭，爰就查閱文獻所得提供同仁參考。

沙巴位於婆羅洲（Borneo）最北與汶萊（Brunei）、沙勞越相鄰，舊稱北婆羅洲，華人極早已與此地往來，唐、宋、元、明歷代均有商貿往來。1840 年，英人 James Brooke 東抵婆羅洲，恃其船堅炮利掃蕩橫行南中國海之海盜及占據河口的土著，遂於 1842 年自蘇丹手中取得沙勞越，受封為「拉者」（Rajah，王）。並在 1847 年割 Labuan 島，日後於 1881 年發展擴張成為英屬北婆羅洲渣打公司（British North Borneo Chartered Company）領地，即今之沙巴州。

由於華人勤苦耐勞的特質使得英人自清末即自廣東招募一批華人前來沙巴從事墾殖，其中以客家人為主要組成部分，起先以煙草，之後以橡膠為主要作物。廿世紀初，因修築西海岸鐵路——自亞庇至丹南（Tenom）段，又引進二千名華工，仍以廣東人、客家人為主。估計至第一次大戰前，此地約有二萬名華人。第一次大戰後，英政府鼓勵華人移入，估計至第二次大戰爆發期間約有四萬名華籍移民入墾。據 1960 年的統計，華人有 104,855 人，占全沙巴 454,328 人口的 23%，僅次於土著杜順族（Dusuns）的 145,650 人，為本地第二大族群。主要集中在山打根（Sandakan）、亞庇（Kota Kinabalu）、斗湖（Tawau）等地。約有半數人口從事農業生產，其餘一半則以商業經營為主。

沙巴華人在脫離英殖民地的過程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61 年組織沙巴民族

黨、沙巴聯合黨、沙巴華人公會，後來於 1964 年合併在華人公會內。主要宗旨為維護沙巴華人權益，要求華語成為官方語言之一。1976 年華人公會加入馬來西亞國民陣線。目前沙巴州約有華人三十萬人，分布在各行各業，已非昔日面貌。亞庇的崇正中學是最大的華文獨立中學，學生人數約有二千人，也反映本地人口主要以客屬居多的現象。

在談沙撈越華人之前應先說西婆羅洲的華人史片斷。十八世紀四十年代在曼巴哇（Mampawa）的蘇丹首先招來一批華工開採金礦，由於成效卓然，附近各蘇丹紛紛效尤，此後二、三十年間湧入大批來自潮州、惠州的華工，他們不許從事農墾及商業活動，受限制經營礦區生產。因此，在人多勢眾之後，嘉應州人羅芳伯聯合坤甸（Pontianak）、打勞鹿（Montrado）、拉臘（Lara）等地各大小「公司」，在曼多爾（Mandor，舊名東萬律）地區形成「蘭芳公司」。實質統治當地，羅芳伯並出任「大唐總長」，成為海外華人「共和國」的領導人。據荷蘭人的估計，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約有五萬華人之眾。

1850 年荷蘭特遣軍二千人自爪哇東征，打勞鹿地區的公司聯盟礦工起而反抗，歷經四年殘酷慘烈的「公司戰爭」，打勞鹿、拉臘等地的華人公司均被剿平，華人住地化為廢墟，只有東萬律的蘭芳公司殘存至 1884 年終為荷蘭人解散。

沙撈越最早期的移民就是由劉善初率十二分公司，黃際率十五分公司的礦工遷到古晉附近石隆門（Bau）採金。因為不滿當局諸多法律規範，1857 年沙撈越華人礦工四千人起而暴動，攻占古晉，「拉者」James Brooke 僅以身免出逃。隨後 James Brooke 之姪 Charles 率兵平亂，華人軍民亦退回上游森林，但為土著達雅克人（Dayaks）追殺，死傷慘重。此次騷亂月餘，據說死亡華人超過千人，另兩千多人逃往荷蘭治下之三發（Sambas），使沙撈越之華人大減。但是「拉者」Brooke 深知華人勤勞，仍大力鼓勵華人入墾以利沙撈越的開發。除廣東客家、潮汕地區移民之外，福建也是移民主要來源。

1877 年沙撈越華人數約為 7,000 人，至 1909 年已暴增至 45,000 人。福建移民除由新加坡閩僑王友海、王長水父子大量引進之外，劉建發率領大批潮州人至古晉屯植，田考引進詔安鄉親，黃乃裳則號召大批福州人往墾詩巫（Sibu），將詩巫建設為小福州，目前已是沙撈越華人中最大語言族群。此外尚有興化、海南、雷州、及其他較小族群。據 1990 年中的沙撈越華人口統計如下：

語言地區	人 數	百 分 比
福 州	158,532	32.8%
客 家	156,590	32.4%
詔 安	64,762	13.4%
潮 州	41,564	8.6%
廣 東	29,965	6.2%
興 化	16,432	3.4%
海 南	9,666	2.0%
其 他	5,799	1.2%
總 計	483,310	100%

同時，如果與其他民族相較，華人是僅次於土著伊班族（Ibans）成為第二大族群，占全沙勞越總人口 1,666,000 人的 28.9%，分布在全州各大城鎮。

伊班人	492,000	29.6%
華 人	483,000	28.9%
馬來人	348,000	20.7%

如同沙巴華人在第二次大戰後的政治參與熱烈狀況，沙勞越華人在 1959 年成立人民聯合黨，1962 年成立沙勞越華人協會。但 1947 年後人民聯合黨加入聯合政府，而華人協會遂自動解散，直到 80 年代始有華人聯合總會接續成立。

沙勞越的華文教育共有十四家獨立中學，大學教育除馬來西亞大學之外，尚有出國留學之路，其中，留學前新加坡南洋大學及留學台灣的「留台人」是兩大派，是目前華人社會的中堅力量。

古晉河畔有一座莊嚴典雅的華族博物館，內部陳列若干照片和昔日器物以說明沙勞越華人拓殖的歷史，本建築原為 1912 年華人裁判庭所在，至 1921 年華人裁判庭解散，1930 年由中華總商會接管。華族博物館門楹的一幅對聯很可說明南洋華人的歷史，茲錄於後：

華族萬里投荒事 今口豐衣足食安衽席
歷此百年作證訖 當年斬荆披棘啟山林

國際會議歸來

麥留芳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訪問教授

大會議題介紹

第十六屆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IAHA）的國際會議在馬來西亞的亞庇（Kota Kinabalu）舉行，會期由七月廿七日舉行至七月三十一日，正確的開會地點為亞庇埠的絲綢港消閒勝地的麥哲倫酒店。列名與會者多達兩百七十多名；來自世界各地。

大會會議展開十一大議題及小組：一、廿世紀的歷史教學；二、亞洲的土著或原住民社會；三、亞洲歷史誌；四、新興國家與新興民族；五、亞洲婦女；六、宗教復興、亞洲價值、與現代性；七、亞洲在科技上的發展；八、亞洲歷史中的文學與藝術；九、考古學視野下的亞洲歷史；十、亞洲傳媒的歷史回顧；十一、區域主義在亞洲。此次中研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贊助了十多位研究人員前往提出論文，本人除了宣讀一篇有關新加坡伊斯蘭化的論文與主持一場會議外，原則上只參預上述十一議題中的第六組；其中亦抽空參加有關新、馬歷史與宗教的會議。如蔡慧玉主持的「二次大戰中的亞洲」小組，檳城大學的 Abu Talib Ahmad 所提出的「馬來亞淪陷期日本軍政府對伊斯蘭教的政策」，就是心儀研究之一。該作者的研究是根據柔佛新山檔案局的檔案寫成的，文中他揭發了日軍如何通過主教（Imam）利用伊斯蘭教堂作為日本皇軍發號施令及宣揚天皇意識型態的場所。其訪談資料亦發現，主教們每周周日都被迫參加洗腦的政治活動。

第六組共列出 25 篇論文，有討論印度「陪葬」（Sati）制度的文章，有檢討伊斯蘭「聖戰」概念的佳作；大部分的論文似乎都集中於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始末及其對東南亞伊斯蘭馬來社會的影響，如 Rahimin Affandi 及 M. L. Calimba 就分

別提出了馬來西亞及菲律賓方面所承受到的衝擊。更具體地去分析伊斯蘭教復興運動的文章有 Zaleha 的「伊斯蘭化與市民社會」與本人的「新加坡的伊斯蘭化模式」。另外 Che Zarina 和 Budihisham 則著重於該運動對吉蘭丹州的影響。同仁林長寬及蔡源林亦在會上提出了有關伊斯蘭教的論文。前者討論伊斯蘭在國民政府時代，其在大陸復興的活動。後者之論文則著重於比較馬來西亞與台灣社會的現代化及世俗化的過程。

包含於此小組的另外兩篇有關伊斯蘭教復興運動的文章為 Joni Tamkin 的伊斯蘭朝聖者的歷史研究，以及 Ahmad Faiz 所介紹的東南亞與太平洋的伊斯蘭教復興運動，這兩類活動的確對該教的復興具有不少的貢獻。

其實，有關伊斯蘭教的文章尚有不少，由於它們被列入別的小組，以致「衝堂」而無法分身聆聽。如有關伊斯蘭歷史教學方法及砂勞越的馬來伊斯蘭領袖接棒方面的危機，皆是值得一聽卻又不得不割愛的研究。

交流落差

與會者多少對某些問題有些涉及而選擇了某些議題小組，以增廣見識。當然基於時間的緊湊，不是所有講者與聽眾的對話都有圓滿結果，茲就本人所涉及者，提出數則如下：本人曾就摩洛伊斯蘭教徒的姓氏問題就教於菲律賓學者 Calimba，詢及 1980 年菲政府頒佈的菲律賓伊斯蘭教徒姓氏名冊，是否通用於全菲各民族。摩洛伊斯蘭教徒多屬馬來人種，本應是親子連名，無姓。但該名冊姓和名分別列出，意即摩洛伊斯蘭教徒一直都冠父「姓」。回答曰：菲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人民有冠姓或不冠姓，或有選取命名制度的自由；而他本身就有姓卻也是伊斯蘭教徒。會後再向他詢及摩洛陣線領袖 Selamat Hasyim，他仍然說 Hasyim 是姓；之後又說是 Selamat。

另一是關於伊斯蘭教朝聖的資料及詮釋的問題。Joni Tamkin 的朝聖者統計數字只提到 1990 年。其實，McDonnell 的研究已涵蓋至 1982 年，作者為何不找尋 1990 末期之資料呢？此文的另一缺失就是他所作的詮釋（如朝聖者越來越年輕，多中產階級及智識分子）幾乎來自 McDonnell 的。由於時間倉促，無法在會議詢問時段請教。會後就教，卻不得要領。可是作者卻透露出一個間接答案：每年報名的馬來西亞穆斯林朝聖者遠遠超出沙烏地阿拉伯政府所給予馬來西亞的配額。其實，作者身為一名就任於馬來亞大學伊斯蘭研究學院的講師，兼之本身是馬來穆斯林，應該可獲得更多的統計資料的。

再一則卻是有關發問者的行為，在發言人當中有位宣讀有關某些伊斯蘭教義

的正統性的論文。之後，第一位發問者，想是非常虔誠的穆斯林，便（相當溫和地）一本正經的說古蘭經的經文是上蒼給予的，人類不應加以詮釋。隨後便滔滔不絕地駁斥那些伊斯蘭學者的解讀為瀆神之言。主持人乃馬來亞大學的一位印籍教授，她多次叫停都不得要領。雖多次聲明這是學術集會不是佈道會，亦不奏效。僵持了廿多分鐘，才由一名聽眾強力把那名發問者推到後座。主持人的堅守原則態度，值得著一筆。

感想與學習

國際性或大拜拜式的大型會議，很少能做到兩全（賓主）其美，更遑論十全十美，這次會議也不例外。茲摘數則，以為借鏡。

馬來西亞首相及聲相應氣相求的其他長官的致詞都相當政治化，他們的演講詞中多譴責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及霸權主義。可想像到的是，座上的數十名老外，聽來全不是味道。在過去，台灣的某些會議，也曾是統戰工具一種。其實，「盡在不言中」，才是獲得人心的法寶。

這次大會的一個嚴重缺失是沒提供擴音器（麥克風）。雖言小組討論場地不過十多坪，第三排以後的卻不易聽到主講人的聲音。當發言者面向主講人發言時，連坐在他背後的人就不知所云了，圓桌式的排位也許可以補救這一缺失。

在分發論文給聽眾方面，也有待改進。大會的操作方式原則上每篇論文僅印約 35 份，在小组會場上會議開始前幾分鐘才帶入。在個人經驗上，有兩場根本拿不到論文，主要原因是論文一到，聽眾爭先恐後，紛紛搶拿一空；更妙的是大半拿到論文的聽眾都一哄而散。這就造成座上有好些沒論文的。在國際會議上，官方語言雖然是英語，但各地學者常有荒腔走調的，手上若無論文參閱，常有鴨子聽雷的感覺。在台舉辦的類似會議，一般上無此弊病；只是過量印刷，除未能環保外，更是勞民傷財。若能在兩者之間取一平衡，不愧一箭雙鵰。建議之一是事先登記索取論文者名單，開會時，按紀錄發放論文。沒事先要求者得繳適量費用。

不過，大會有一動作值得大家學習的就是，只提供空白名牌，而由持牌者填寫自己的名字。這個好處除了省卻專人負責看守名牌外，還可以免卻打錯姓名的尷尬。尚可改進的是，在空白名牌設計時，不妨也留些空間給那些只有名而無姓的族群，寫出名來別人馬上就可直稱「某某教授」、或「某某先生」、或「某某女士」，避免張冠李戴，致貽笑大方。

大會落幕後，中研院同仁乃南下古晉繼續田野觀察及學術交流的活動。由於各同仁的學科背景不盡相同，其觀察及交流的心得當然亦不一樣，筆者茲就亞庇、詩巫、及古晉所見所聞，補綴幾筆，以供研究生參考。

一般而言，亞庇是一個遊樂、觀光及消閒的好去處，街道上所見，比較現代化，尚稱整潔。華人宗鄉會館還不算少。文化氣息，需要細酌，始有感覺。

在南下數百公里素有「小福州」之稱的詩巫，比較上，或從華人視野來看，顯得濃厚的原鄉味，該小鎮傳為福州人黃乃裳所闢，一個世紀以來，仍為福州人所聚居之地。大姓如陳及林，音譯後變為 Ting 和 Ling。市區中心仍見宗鄉會館（尤其是縣、村及宗姓）林立；在都市化起步中仍見不少舊日華人聚落的樓厝。市中心如公車總站及菜市場，甚至政府部門，包頭的男女穆斯林並不顯目。一般而言，在市區活動者，多是華人及砂勞越原住民，如「水達雅族」、「旱達雅族」等，市中許多以華人命名的街道，至今仍保留原名。

更南的古晉，冠華人姓名的街道多得不勝枚舉，「鄭和海軍統帥路」的設置，其意義的涵蓋面既深且廣，這與葉亞來墓碑受遷移的困擾，就不可同日而言了。「華人歷史博物館」之座落於市中心，多少暗喻著古晉在文化多元的包涵量。伊斯蘭化在古晉仍未至潮湧的趨勢。其市容之整潔，環顧亞洲，屈指可數。

出席第十六屆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報告

陳仲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

一、前言

「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與我國有很深的淵源。此學會原名「亞洲各國學者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cholars, Focus on Asia)，嗣後經菲律賓學者的建議改為今名。第一屆大會於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時，我國即派代表出席。並且是次會議中即決定下屆在台北舉行。一九六二年十月六日至九日即由我國舉辦第二屆大會。其時有一百五十位學者參加。第三屆大會於一九六四年在香港舉行，我國亦派十位史學家出席。今年已第十六屆，七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在馬來西亞沙巴亞庇市麥哲倫渡假酒店舉行。大會有三位副主席，本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主持人蕭新煌教授即是其中之一。並且預定二〇〇四年的第十八屆大會將在台北舉行。由於我國將主辦二〇〇四年的大會，為了要加深認識這學會的性質，以便著手籌備會議，今年由本院社會所研究員，也是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主持人蕭新煌教授帶領的代表團成員有十二人之多；其中十人發表論文，另有兩位觀察員。

二、會議主題與分支主題

在邁入二十一世紀之前的最後一年，今年大會所訂的主題：「一百年來亞洲的歷史：二十世紀歷史的發展」。在這主題之下，各分成七十三場分支主題，列如下表一：

表一：亞洲史分支主題及其場次

一.歷史（共 22 場）	
1.亞洲正史(1)	7.亞洲史文獻(6)
2.世界史中的亞洲(1)	8.亞洲檔案(1)
3.海洋史(1)	9.東西方的遭遇(1)
4.亞洲史的考古學觀察(1)	10.馬來亞史(2)
5.歐洲人在亞洲(2)	11.婆羅洲研究(4)
6.二次大戰中的亞洲(2)	
二.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共 23 場）	
1.亞洲國家的形成(6)	5.亞洲經濟史(6)
2.新國家與新民族(4)	6.亞洲與資本主義(1)
3.亞洲政治史(2)	7.亞洲的本土社會(2)
4.政治論述與 NGO(1)	8.種族與文化認同(1)
三.宗教（共 13 場）	
1.亞洲與宗教(5)	
2.宗教復古主義、亞洲的評價與現代化之挑戰(8)	
四.其它（共 15 場）	
1.歷史教學	5.文學藝術
2.亞洲婦女	
3.亞洲媒體	
4.科技發展	

由上表所列的分支主題和其各自的場次數，可以看出亞洲歷史學家學會的重心偏重在東南亞和南亞地區。東亞和東北亞不但出席的代表甚少，甚至不能分配到一個分支主題，反而不如區域性的歷史研究，馬來西亞有 2 場，婆羅洲研究有 4 場。再從分支主題的分析，也可以大致看出現今出席此學會的代表的研究內容的趨勢。每場的論文平均 3 至 4 篇，所以場數也可以代表論文的多寡。如果由本人所分成的 4 大類分支主題的分析，則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主題，有 23 場，是 4 大類中最多的一類。23 場之中，與新國家民族的形成即佔了 10 場，其次是

亞洲經濟史有 6 場，很明顯地看出亞洲政治與經濟被重視的研究趨勢。次多的歷史類共有 22 場，但有 11 個主題。可見東南亞的研究主題多與複雜。其中的亞洲史文獻檔案約佔去三分之一，其次就是馬來亞與婆羅洲有關的區域性研究。關於東南亞和南亞的宗教問題也是這次會議的重點，雖然它僅有 2 個主題，但卻有 13 場。其中「宗教復古主義在亞洲的評價與現代化之挑戰」共舉行了 8 場 25 篇論文是分支主題的場數與論文篇數最高的一項。特別凸顯出宗教問題在東南亞與南亞地區受到歷史學家的重視。

三、會議心得

大會訂下本次會議的主題在二十一世紀（一百年內）的歷史發展，因而對於考古學者可談的課題就受到很大的限制，雖然也有一場「亞洲史的考古學觀察」，原報名者有 5 個人，出席者僅 3 人。本人所提繳的論文「二十世紀南中國海的中國漁夫」，被分配在「亞洲的海洋史」那一場。「亞洲史的考古學觀察」這一場僅有二篇論文宣讀。第一篇是新加坡大學的 Michael Flecker 報導一艘十世紀印尼的沉船在爪哇西北方海域發掘的成果。第二篇是馬來西亞博物館與古物部的 Kamaruddin Zakaris 宣讀的論文：「近年在吉隆坡的考古發現」。僅是些在吉隆坡的考古學調查工作。從這場非常冷清而論文又少的場景，可以看出東南亞和南亞的考古學者對於這學會參與的消極情形。也許是因為在這區域另有一個「印度太平洋史前學協會」（Indo-Pacific Prehistorical Association）組織的緣故。

此外，又聽了幾場有關東南亞歷史文獻檔案的論文，大致可以看出當代東南亞史學研究的基本文獻和學者們所重視的方向。文獻中重視區域單位，例如：馬來亞、印尼、印度、孟加拉等，常為學者檢視的地區。今年大會訂主題的時間因素為二十一世紀，當然是因為正好是這世紀的結束而要迎向新世紀的時候，大有回顧與前瞻的意義。二十世紀在東南亞歷史上的大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其後所發展的各民族國家的獨立興起。因而西方人在亞洲的殖民地之失落，其所作所為逐漸為本土化史學家作為檢討的對象是難免的。分支主題中「東西方的遭遇」、「歐洲人在亞洲」和「世界史中的亞洲」，多是亞洲本土史學家對這方面的思考。當代東南亞與南亞的史學界，顯然充滿著一股本土化研究的風氣，想著脫離受西方殖民主義者束縛的企圖心是很強的。

四、感想與建議

這次會議，由中央研究院組成的十二人代表團主要是「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的成員，各人均盡力做好論文宣讀的工作，是一次展現實力的表現；也是該計畫執行五年多以來，走上國際舞台表現不弱的一次集體行動。依據個人的觀察，有二點重要的因素：其一是指導「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政策方針的正確，使這項跨所際的研究計畫能在短短的五年內，就有了走進國際舞台的成效。其二，計畫主持人領導有方，照顧面廣，多學科而有計劃地推廣各項研究，自然就會有成績。展望未來應該要往各學科之間的科際整合發展。

這次在會議期間，有些國家代表對於下屆大會預訂要在孟加拉召開持懷疑的態度，一直想暗中操作讓我國取而代之。幸好本院社會所蕭新煌教授已是現任大會副主席，他的態度堅定，不受離間運作。因而仍維持下屆在孟加拉舉辦的決定，如此則二〇〇四年我國要舉辦的情勢似乎也成定局。這是一項在亞洲國際學術界的大型會議，需要充分準備的時間。不論是組織、會務推展和經費的籌劃，均非易事。我們不但期望到時舉辦的更成功，並且在四年後本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的研究工作推展更深入，使研究的成績更可觀。

出席第十六屆亞洲歷史學家學會會議略述

陳國棟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

此次參加第十六屆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會議，我出席了相當多的場次。特別在此簡介其中兩場的三篇文章，希望能對有興趣的朋友有益。

第五場（七月 27 日下午 2:00-3:45），有兩位報告者到場。

第一篇為有關中國與斯里蘭卡的通商貿易，集中討論第十四世紀。文中提到兩國交往的最早紀錄出現在李肇的《(唐)國史補》，可留意。報告人 W. I. Siriweera，題目為“Chinese Ceramics in Sri Lanka”。

第二篇由新加坡國立大學的 Michael Flecker 報告，題為“Excavation of a 10th Century Indonesian Shipwreck”。此為印尼海域之沉船發掘報告，該船應屬第十世紀，時當 Srivijaya 時期。由該船尺寸與商品推測，該船當為爪哇與巴鄰龐間島際貿易(nusantara trade)商船。這方面文獻極少，因此這篇論文參考價值很大，應繼續追蹤這個發掘工作的收穫。

第二十一場(七月 28 日上午 10:00-11:45)。第二篇論文，為 Dr. Christine Doran 所講的“Gender Matters in the 1915 Singapore Mutiny”。作者從 revisionist (非殖民主的立場)出發，講新加坡兵變中婦女的角色。有一節講到 1857 年沙勞越華人反亂(Chinese Rebellion in Sarawak)的問題。作者認為 1857 年的反亂發生於 Brooke 治理沙勞越之時，從修正主義的觀點而言，不應稱之為「中國人的叛亂」，應可稱為「『公司』與 Brooke 之間的戰爭」。作者也提到同一年稍後印度兵變(Sepoy Mutiny)，可能受到「『公司』與 Brooke 之間的戰爭」的影響。

1857 年的「『公司』與 Brooke 之間的戰爭」發生於 Sambas 以北，今屬沙勞

越的境內，向北延伸至古晉。事變之時，Brooke 還被迫從其官邸(Astanta)泗水到對岸，托庇於一馬來人官員家中。我於八月 1 日湊巧在下榻之 Holiday Inn 對面商場地下室印度人的店裏，買到一期舊的 Sarawak Gazette，正巧是 Bau(沙勞越之一省)的地方首長寫的有關此一事件的研究調查，該文第一次揭露此一事件之華人領袖名叫劉善邦。

因為還有其他人的介紹，便不多寫。相關的文章應可在計畫辦公室看到。以下說一些感想。

我個人認為馬來西亞政府相當重視這次會議，將之當作是國際宣傳的大好機會。其缺點是政治色彩濃厚，但優點也有，那就是場面壯觀，各方面的支援頗多。

多年來，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多以東南亞研究為重點。每次都可以在會議中看到一些饒有新意的研究，同時也可以接觸到許多傳統的議題。我們本地的東南亞研究起步不久，歷史研究尤其有待開發。但是在過去的基礎有限的情形下如何快速建立起入門的準備工作呢？個人覺得如果能定期出席會議，詳細聆聽、閱讀其間發表的作品，則能掌握相關議題的必要資訊。隨著報告人所提供的參考文獻，進一步追索，其實不難掌握極有價值的資料來源。因此，以後應鼓勵同仁積極參與，並作事後的進一步研究。

IAHA 第十六屆年會側寫

黃登興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

有幸與本院東南亞研究計畫的同仁，參加在馬來西亞的沙巴舉行的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第十六屆的年會，並宣讀論文。整個會議有七十多個場次，平均每場次 3~4 篇論文，涵括歷史、社會、經濟、政治及人類各個領域的議題。與會學者來自世界各地及各個不同學門。以下就本人經濟學背景報告關於「亞洲經濟史」(Asia Economic History)及「亞洲與資本主義」(Asia and Capitalism)兩類議題的一些觀察。

亞洲經濟史

我在會中宣讀的論文是：“Development and Trade Pattern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Post-war Era”，探討戰後東亞以及東南亞貿易和經濟發展的關係；被大會歸於亞洲經濟史的類別，同一個場次發表者有：同行蕭新煌教授的 “The Middle Classes of Southeast Asia in Formation: A Preliminary Analysis”；荷蘭 Leiden 大學 Dr. Joren Touwen 的 “Patterns of Change: Foreign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1914-1942”。雖然大會沒有安排討論人 (discussant)，然而會場的討論卻是非常熱絡。值得一記的是，與會者在同時有五個左右的場次可以選擇之前提下，出席同一場次學者之研究興趣比較接近，討論的焦點較為清晰，這或許是討論如此熱絡之因。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與會學者的背景也頗具多樣性，除了當然包括的歷史學家外，有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政治經濟學家等等。不同學門的學者，對於同一個問題的研究切入點與關心的面向與

重點，自然有相異之處；也因為這個差異性，成就研究觀點之互補作用，除了導致熱絡的討論之外，也使得討論本身充滿啟發性。

以亞洲經濟史為主題的場次還有其他三場，大抵可以看出分別涵蓋以下三個大類：勞工移動與勞工問題、行商貿易、經濟發展中的政府角色。各場涵蓋的論文題目如下：

（一）戰後的勞工移動與勞工問題：包括四篇論文（1）Dr. Virgel c. Bingha (University of Philippines)，"The Philippine Labor Movement: A Review of Literature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2）Dr. Moha Asri Abdullah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Cross Borders' Migration in Asia: Between Theories and Realities"；（3）Prof. P. Ramasamy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Post-Modernist Perspective of Labour Resistance: A Political Economy Critique"；（4）Balakrishnan Parasuraman (University Malaysia Sabah)，"Labor Relations in East Asia from 1960 to 1990: Some Preliminary Issues"。

（二）行商貿易：有（1）Dr. Loh Wei Leng (Universiti Malaya)，"Changing Trends of Merchant Shipping in Malaysia"；（2）Dr. Michael M. Charne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Migrants, Merchants and Paddy: A New Look at the Burmese Rice Trade Prior to World War II"；（3）Tsuruyo Funatsu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apan)，"Creation of the 'New Thai Merchants in Siam in The 1930s"。

（三）經濟發展中的政府角色：（1）Prof. G. Venkataraman (University of Madras, India)，"Central-State Relations in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India from 1858-1990"；（2）Rosazman Hussin (Universiti Malaysia Sabah)，"The Role of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Industrialisation in Malaysia"；（3）Michael J. Montesan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State-Sponsored Capitalism in Provincial Thailand"。整體而言，關於亞洲經濟史的論文範圍相當廣泛。

亞洲和資本主義

除了一般的歷史相關議題外，今年的大會安排了四個特別場次（special panels），包括「亞洲和資本主義」（Asia and Capitalism）、「歐洲人在亞洲」（Europeans in Asia）、「婆羅區域」（Bornean Region）、「百年來的馬來西亞歷史」（One Hundred Years of Malaysian History）。後兩個主題（Bornean Region 以及 One Hundred Years of Malaysian History）充分反映主辦國馬來西亞的主導性以及

其區域性，從地主國的角度來看自有其重要意義。相對而言，前兩者「亞洲和資本主義」與「歐洲人在亞洲」就比較屬於「國際性」的主題，對於地主國以外的與會者而言也比較有吸引力。

關於「亞洲和資本主義」議題的納入，更是意義非凡。自從一九九七年七月金融風暴肆虐亞洲以來，七〇年代下半以來以經濟成長傲視全球的東亞地區——尤其是東南亞諸國，經歷了相當程度的經濟衰退與政治動亂。經濟成長的果實幾乎毀於一旦，而二十多年來所遵循的經濟發展模式，尤其是依賴外來資本來發展經濟，甚至其所建構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否得當，乃受到質疑。

針對「亞洲與資本主義」的議題，受邀提出報告的三位學者都是一時之選；有來自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 Kunio Yoshihara 教授，英國倫敦大學 Ruth McVey 教授，以及馬來西亞大學（Universiti Malaya）經濟與企管系的 Jomo K. S. 教授。

Ruth McVey 的“Capitalism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Southeast Asia”指出目前為止的亞洲資本主義相關研究（含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政治、經濟學家等）落於兩端；不是著眼於上階層的統治階級及其所在之首府區域的經濟社會活動，要不然就著眼於極端原始族群或低下階層，探討傳統文化如何流失的現象。因此，她呼籲對於中階層社會結構如何與資本主義互動及受到衝擊的研究，應該予以重視並加強；如地方鄉紳面對外來城市資本主義的「入侵」或另謀生路或與官方結合的現象，及促成地方政治團體的意識；又如政府與社會間的互動中資本主義之作用力等課題。Jomo K. S. 的“What’s Different About 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m?”則對族閥關係在東南亞，尤其是馬來西亞資本主義發展中的角色，作了相當深入的報告。

Kunio Yoshihara 長期投入東南亞的經濟發展研究已經有三十多年，著作等身，其中有“The Rise of Ersatz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1988)，“Building a Prosperous Southeast Asia: from Ersatz to Echt Capitalism” (1999)，便是與這個主題相關的重要著作，直接對戰後東南亞資本主義的發展，提出針砭。

Yoshihara 的論文，重申其在前述著作中的看法，直接指出東南亞資本主義之「虛假」本質——只有外來投資所塑造的大規模生產表象，沒有真正的技術與人力資本的累積。此現象迥異於七〇年代台灣與南韓的經驗，兩國在引進日本與歐美之外資時，也一面提升自己的技術水準與累積人力資本。在東南亞，（1）政府不當的保護措施導致欠缺外來競爭的激勵，加上（2）東南亞的文化特質，使得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未能提升。因此，他提出若要改變東南亞資本主義的虛假本質，就要一方面解除政府管制，積極地進行經濟國際化與自由化，另一方面也得對傳統文化做適當的改變，甚至由政府以必要的措施來進行。「傳統文化應

該做適當改變」以跳脫虛假資本主義的建議，馬上引起當地學者之反彈與質問，討論與答辯之熱烈頗讓人印象深刻。當地學者臆測 Yoshihara 所指的文化特質是文獻中所常見的「馬來民族懶惰」，並企圖予以反駁。Yoshihara 立刻予以糾正，並指出馬來文化中不利於資本形成之處，特別是不重視教育的文化傾向。姑且不論 Yoshihara 所建議的政府的措施能否發揮鼓勵人民受教育的作用，東南亞各國人民的受教育水準偏低則是不爭的事實，外資在當地投資最頭痛的技術工人不足也是不爭的事實；因為人力資本的缺乏，導致外來投資絕大多數集中於非技術性的、勞力密集的生產階段，如電子業中的組裝，與紡織業下游的成衣縫製。無怪乎發展相對更落後、勞工相對更便宜的中國大陸的開放，與越南走向市場經濟的經濟改革，立刻使東南亞各國的出口大幅衰退、外資流入停滯甚至減少，間接助漲九七金融風暴的形成。

亟需建立臺灣觀點的 東南亞華人歷史城市的研究

黃蘭翔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

一、沙巴行程所感

趁著這一次參加在沙巴所舉行的第十六屆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之便，我順道前往麻六甲、檳城作調查。而且在 7 月 31 日會議結束之後，由蕭新煌教授帶隊，透過蔣斌教授的安排，我也隨隊前往古晉參訪。從這幾個重要的東南亞華人歷史城市，讓我聯想起臺灣普遍存在的鹿港、三峽、迪化街、湖口老街等等的店屋，與這些城市的形成時間、居民的祖籍移民背景之類似性，這種條件或許是未來臺灣的學者可以開拓的研究領域。

這次的參訪雖然只是作初略的觀察，就可以發現上述這些東南亞都市都是多民族「雜居」的都市，非但華人住在店屋裡，即使馬來人、印度人，或是穆斯林也都住進具有強烈華人文化影子的店屋之中。所以店屋非但是成熟的「都市類型」之住宅，也說明了店屋住宅不只是華人的居家生活形式，也是華人與其它族群的共有的生活經驗。另外，東南亞的華人會館在華人的生活之中仍佔有重要的地位，而這些會館、家祠的建築形式都與臺灣或是閩粵地區有極類似的建築型態(仔細分析之後，當然會發現其融合東南亞文化的性格)，所以以中國東南沿海的福建廣東，以及東南亞華人街和臺灣為田野，從事華人集居的都市住宅(店屋)之調查與研究，想必是未來學界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在第十六屆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所發表的文章中，也可以發現東南亞華人文化特質背景的蹤影。就舉與我同台發表，由 Posman Ma Yusoff 所寫的‘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Market: A Historial Perspective' 文章，就是一例。或許 Posman Ma Yusoff 本身並沒有意識到，而我卻認為這篇文章所處理的馬來人的農人自興市場，產地直接販賣的方式，其實是因為馬來西亞國家中，華人經濟生活方式與馬來人經濟生活方式的不同所產生的國家政策。華人對於自由市場的運作方式，可以說是與生具有的本能，但是逐漸處於經濟弱勢的馬來人，卻對於市場自由買賣並不熟練，所以才會由國家以政策來推動。就如同臺灣的社區鄰里關係不密切，所以才需由國家去推動所謂的「社區總體營造」。當然該文對國家的推動政策採取肯定的結論，但是作這種討論，似乎需要對馬來西亞國家的種族社會文化之背景有進一步的闡述才可以作完整的解析。

二、麻六甲的介紹

就在上述的旅行背景下我去了檳城與麻六甲，對麻六甲的城市歷史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我也剛好在“Pengajian Malayu Bersumberkan Belanda” (Malay Studies from Dutch Sources)¹ 中發現有一篇由 Rosli Nor 所寫的‘The Historical Dutch Cities outside Europe: A Family of Cities’。對我而言，這篇文章可作為今後思考麻六甲的城市史的基礎入門資料，所以利用《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之出刊，在此將其作一翻譯介紹，以享同好；另一方面用以補足我貧乏的旅行感想之不足。

17、18 世紀正當荷蘭崛起擴張的時代，在世界各地海岸地區出現了荷蘭的聚落城市的網絡。亞洲與南非為東印度公司(VOC)所管理統治，而美洲與西非則由西印度公司(WIC)所管理統治。

今天，當都市設計與規劃被重視以後，對很多國家而言是具有重要性，在荷蘭發展擴張的兩世紀中所興建的建築與都市規劃，至今仍然存在。在馬來群島，特別是現代的印尼與麻六甲的城市，與同樣受荷蘭統治的亞洲其它地區，特別是印度與斯里蘭卡的沿海岸地區，或是其他世界各地的姊妹城市，彼此之間在城市與建築上擁有共通的面貌。

在許多國家裡，因為荷蘭的統治而造成建築與都市計畫的大量發展，就以斯里蘭卡來說，就有 30 處的城堡或城市，其中有荷蘭時期的建築物，甚至到了今天，仍保存得完好如初。其中有稱為 Galle 的城堡，它是唯一被列入 UNESCO 的世界遺產名單中的亞洲殖民城堡。在馬來群島上的大部分重要城堡，如麻六甲、巴達維亞、Semarang、泗水等地甚至城牆已經不復存在。但是仍有許多制度性或公共住宅的紀念性建築，仍被保留得還不錯，有些建築也未受到損傷。這些是屬於不動產的文化寶物，其完整性即使是宗主國的建築與都市都難與爭峰。

¹ Abu Hassan Sham, Martin't Hart, Wong Khok Seng (ed.). Pengajian Malayu Bersumberkan Belanda (Malay Studies from Dutch Sources), 1998.

雖然規劃準則支配了這些城市，其防衛策略也純粹地取自於中世紀的歐洲，但使用當地的勞動力，舉建造麻六甲的 Famosa 而言，在 Albuquerque 打敗蘇丹王(Sultan)時，徵用了當地 1,500 人的 bamba raja 或是皇家的奴隸從事這個建設工程。所以有不少的建築物雖然屬於殖民地時期，但是由當地的工匠，而這些工匠又常常調整他們的技術以符合殖民主人的需要。

殖民主的建造者使用當地的泥塑工匠的專門技術，並組織他們用於他們的建造計畫之中。因為這種衝擊影響之下，如麻六甲的 Heeren Street 與 Jonker Street 上的店屋群立面，產生了新的建築形態，自荷蘭建築中摘用了大型的窗與門。(圖-1) 於荷蘭統治時期，也導入了山牆與扇形窗，也因為要承受較重的屋頂，所以建造了厚牆，而原來的木柱體被改成泥塑、磚、石柱。今天，有不少這類的紀念建築物被許多國家定為國家文化資產，所以從事這些紀念物建築的研究被認為是相關國家其整體性的考古、歷史學之一部分。

以麻六甲為例說明，其興建於荷蘭時代的大部分紀念性建築物，都已由 1976 年的聯邦「古物法」(Antiquities Act)，或是 1988 年的麻六甲州的文化資產保護保存法(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Culture Heritage Enactments)保護著；在印尼對於這類的歷史性建築物的保存工作，甚至可上溯到 1931 年。

大部分這些前荷蘭時期的海外城市，如今已轉變成大的都會城市。這種發展對當地的政府、學者已經形成一種挑戰，其社會大眾關心如何經營這些文化資產，以一正面取向的觀點，如何評價、使用這些歷史性建築物，成為重要的課題。

一個城市若沒有了文化資產，就如同是一個城市失去了靈魂一般。去搜尋城市的靈魂必須是優先處理的工作，後來再去評估、評價其本身的存在之意義。我們必須要探究這一有如的城市，並作一個比較，以幫助我們更能瞭解這些城市的發展歷史。在這些城市之中，麻六甲與這些城市共同擁有雙重的系統，有一些城市已成長為主要的城市，如 Batavia (Jakarta)、New Amsterdam (New York)、Kaapstad (Cape Town)、Deshima (Nagasaki)、Fort (Colombo)。其它的城市則較為質樸地有如麻六甲的尺度規模，但是卻因為有優秀的歷史文化的價值以及比較上其歷史都市與建築未受到嚴重的損毀，而在歷史文化上聲名大噪。這些城市有斯里蘭卡(Sri Lanka)的 Galle，印度(India)的 Cochin，於 Netherlands Antilles Curacao 的 Willemstad，以及於 Surinam 的 Paramaribo。

更有甚者，於 1987 年，城塞化的 Galle 獲得登記為世界文化遺產 (World Heritage List)，Willemstad 與麻六甲也花了很多力氣要名列名單之中。而馬來西亞政府於 1989 年，宣布麻六甲為馬來西亞唯一的歷史城市。這些歷史建築物與古蹟，被認識而被賦予意義，對於今後的新規劃與發展都應有一定的影響。

從歷史文獻、古地圖、或是素描文章，以及現有的遺物狀況，來研究其城市

的形態，有兩種荷蘭海外的城市模式可以被確認：亦即有堡壘、稜堡的城牆保護的城市與開放的城市。

麻六甲、雅加達(Batavia)、Semarang、泗水(Surabaya)被分為城塞化的城市，其共有源頭的姊妹城市，斯里蘭卡的 Galle 與 Colombo，於 Netherlands Antilles Curacao 的 Willemstad 等都是。縱然除了 Galle 的城牆之外，他們的城牆都已經不存，但是仍然擁有先前城牆都市所有的建築物與街郭之緊湊感。

麻六甲是馬來西亞本地人（包括馬來人與華人的 tukang 與泥塑、石造匠人）與歐洲人最早有真實接觸的城市。

荷蘭東印度公司所支配的城市，經常都是從葡萄牙人手上所奪取的。這些聚落如麻六甲、斯里蘭卡的 Galle 與 Colombo、印度的 Cochin 都是 17 世紀中葉為荷蘭人搶自葡萄牙人的城塞城市。這些城市自從被 VOC 佔領之後，快速的被整修轉化。除了雅加達與開普敦(Cape Town)外，這些大部分的城市都經歷了相同的命運，被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各別統治了約一個半世紀的時間。

於 1641 年，麻六甲的城牆都市被荷蘭人所佔據，它也是今天可以發現的城市當中，保存得最好的荷蘭城市。在兩國征戰之後，葡萄牙人留下的大部分城塞都被荷蘭人所破壞或重建，重要的公共建築、醫院、教堂也遭破壞。然而有些許的建築與道路網被留下來，經過改良之後被再利用。英國人接收麻六甲之後，也破壞了一些建築物，也對一些建築物實施了整修、改變。因此經過這三個殖民力量影響的建築物，形塑了麻六甲的都市風貌，使這些獨特的遺產成為世界上文化之一部份。即使在今天，麻六甲的古城區仍然非常類似在英人統治時期第三次都市化後的麻六甲。

歐洲建築對麻六甲的影響，E.J.Seow 描述得好：

「葡萄牙對麻六甲建築的影響已被擦除，於 1641 年荷蘭發動攻擊，完全摧毀這個城市裡的葡萄牙建築。

所發展的街道模式，從萌芽期狹窄的街道，以及類似青瓷裂痕般的畸形零星空間，那是由各種力量作用的結果，而非有意的設計。街道被導向自然的目的地，如由各種環境的指引，當他們相遇，提供有禮貌的驚奇，如由默默的述說必須繼續延伸下去。這種不確定的元素使得原來的城市之平凡核心部分具有非常大的魅力」。(MacDonald 1934:2)

從古地圖與一些圖畫，知道麻六甲的都市結構與配置，指出了在周遭環境的城市規劃、開發與排水系統上的一些企圖。這是荷蘭海外城市的典型，具有一個通常採用的方向性，有非正式的開放空間與廣場，以及一個跟隨地形變化的不規則形街道模式，一筆狹窄的土地。

因為 Stadthuys 建築物的保存工作，作了考古挖掘的調查，發現荷蘭人在麻六甲建造了一個錯綜複雜的地下污水系統。其清除污水溝的污物是用灌注海水的清除系統（假如這個辦法被用於城塞城市的 Galle 的話，或有可能是一指導性原則），用那被置於稜堡處的風車裝置，汲取海水灌入污水溝，清除污物排放於河川或是海洋。

荷蘭人所建構的聚落可分為兩部分，一是位於城牆內的行政管理區，另一是在城牆外的聚落，這是只給荷蘭人以及他們的當地的跟隨者所居的地方。在殖民宗主國之中，荷蘭是第一次於麻六甲的城外寬廣地設置他們自己的永久居住地。相較於葡萄牙，基於安全上的理由，葡萄牙還是將他們自己圍於城牆之內。（圖-2）

於城牆外，麻六甲河的對岸處，建了兩條荷蘭人居住的街道，其一是為了較富有者，另一是給較不富裕的人居住。各別稱為 Heeren Street（First-Class Gentlemen Street）與 Jonker Street（Second-Class Gentlemen Street）。當地稱這區域為 Kampung Belanda 或是荷蘭村。此區用吊橋與城牆城市區相連。當荷蘭人離去之後，這區域被出生於麻六甲的華人或是 Peranakan 華人所佔。

大型的舊有聚落也成長成為整體殖民地聚落的一部份，它是荷蘭人按照種族傳統所設立的聚落。印度人與阿拉伯人住在 Kampung Kling，而爪哇人與馬來人住在 Kampung Jawa，Kampung China 是華人的居住區。所以重要的建築位於這些聚落之中反映了荷蘭殖民地的典範。今天，這些村落的名稱雖仍然存在，但是已經不能反映民眾種族的組成了。於英國殖民地時期，為了興建磚造的店屋建築，使得 Kampung Jawa 的馬來住宅已經消失。在英人的種族傳統區域集中的重建政策下，Kampung Jawa 區域已為華人所佔據。馬來住宅已被遷移至現在稱為 Kampung Mortem 的地方，它是今天的麻六甲成市中心區中唯一的馬來住宅區。

在荷蘭人統治期間，允許當地居民自由地興建住宅與商店建築，但是每一棟建築的地方稅必須按其街道的寬度來繳交予荷蘭的管理機構。而不是類似今天按每一棟建築的面積來計算。居民們就興建面寬狹窄，進身很長的建築。即使在今天，我們都還可以在 Jalan Tun Tan Cheng Lock（過去的 Heeren Street）看到這些荷蘭政策的影響，即使是進身 120 英呎長的店屋建築也是平常的事。

像葡萄牙人那樣，荷蘭人也帶來了他們自己的技術，他們在麻六甲開始使用赤褐色的屋瓦，與地磚及紅磚建材。因為要標準規格化，荷蘭機構控制與設定所有的尺寸，所有的建材都需要官方的印信以證明其遵守相關法令。

他們雖也使用當地的紅土，當地稱其為紅石（red stone），作為建築的材料，特別用為建築的基礎。但是當地的地方政府保障了專賣制度，只將建材供給特定的荷蘭商人集團，建材也由此一特定價格供給了 VOC。

荷蘭人也在城牆內的都市區域，導入了廣範圍的地下污水系統，但是這個系統在英人從事都市建設時，導入地上的排水系統而遭到覆蓋，但也因此而留存到今天。於 1989 年，在麻六甲公共工程部（Malacca Public Works Department）從事 Stadthuys 建築保存修護時，部分的荷蘭地下污水系統被發現。

如今，麻六甲已經發展為一個現代的重要都市。幸運地那過熱的建築行為沒有造成無差別性的破壞，或忽視具有價值的建築物或是歷史遺跡之文化價值。（圖-3）有為數不少的歷史性建物，已被聯邦政府或是州政府列入保護的紀念物的地名詞典中，在不久的將來有可能進一步進行保護與再生的工作。那從前的麻六甲的城牆都市，如今被冠以麻六甲文化複合體，作為馬來西亞第七個馬來計畫（1996-2000）來推行，已經開始在進行保存一些荷蘭時期的紀念性建築物的工作，將其視為今後歷史名城之一部份，以恢復該建築的往日光輝。

然而，因為麻六甲是古代城市，文化資產受到現代性開發的壓力所苦，特別是公告範圍的邊界地區遭受的壓力尤大。麻六甲也同樣依賴那些會威脅其文化資產的發展，一方面要保存城市的文化遺產，另一方面又要允許自由地緩慢開發之利潤，到底該怎麼作呢？近來「永續發展」這個詞或已經界定現代環境的經營可在文化與商業需求之間的互動而獲得。在考慮過去與未來平衡點時，今天的城市常會碰到的進退維谷的兩難，如何將歷史建築與遺跡，在「發展」上被視為一種資產，而非一種負擔或是障礙是重要的課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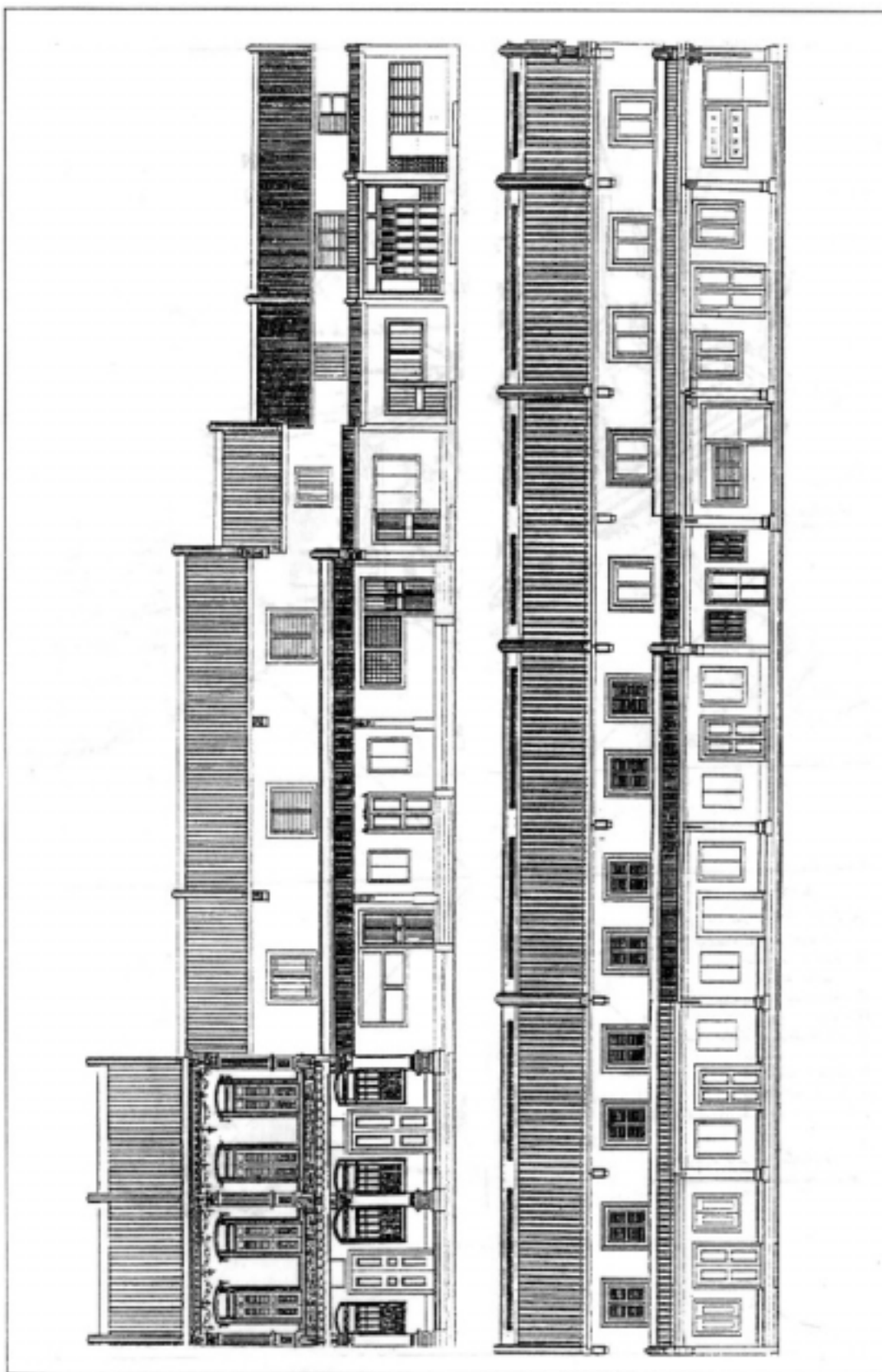


圖-1 荷蘭統治時期麻六甲荷蘭街（Heeren Street）上店屋立面圖

資料來源：Rosli Nor, *The Historical Dutch Cities outside Europe: A Family of Ci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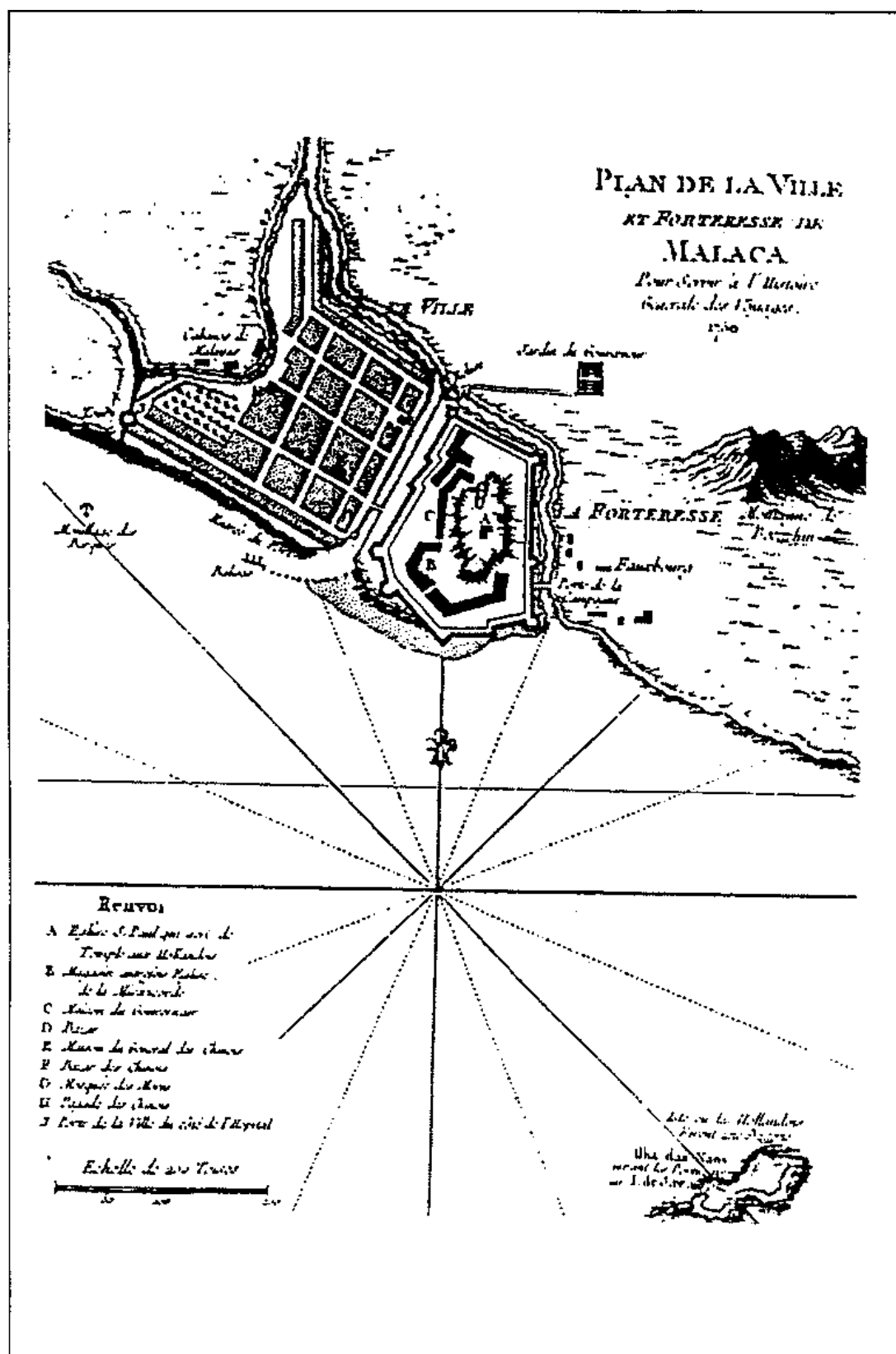


圖-2 1790 年荷蘭統治時期的麻六甲。
(圖中顯示麻六甲城牆位置與城外居住區域)

資料來源：Rosli Nor, *The Historical Dutch Cities outside Europe: A Family of Cities*.

從「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IAHA) 第十六屆大會觀察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政治」

蔡源林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副教授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合作計畫主持人

本次到馬來西亞沙巴參加 IAHA 大會，最重要的目的除個人發表論文之外，尚可和相關領域的學者交流。因為馬來西亞聯邦政府全力動員官方和學界力量支援此次大會，故來此發表論文的馬來西亞學者佔最大比例，其中又因為伊斯蘭教為其官方信仰，故馬國學者發表這方面的論文相當多，再加上馬哈迪總理本人親臨致詞，這一切都促使本次學術會議的政治色彩甚濃，藉此可以對個人所進行之馬來西亞國教化與其政治發展的計劃獲得不少一手和二手資料，並藉此驗證了個人先前研究所形成的一些初步假設。

首先，馬哈迪總理本人的開幕演說雖不改其輕鬆自如、幽默風趣的特色，及一貫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但由於他剛經歷過去年年底空前激烈的國會大選中反對黨的挑戰，以及之後以迄今年前半年為止黨內暗潮洶湧的政爭，馬哈迪在馬來人之間的權力基礎和聲望正在消退中，故在演說時雖然強調自己還沒有成為過去的歷史，仍然繼續領導整個國家邁向二十一世紀，但顯然這番說辭多少隱含了他有意識到合法性危機的問題。稍後，他也再一次的譴責少數反動的宗教狂熱分子正在將國家導入錯誤方向，希望人民追隨他的更能帶來國家進步繁榮的大政方針，並強調自己的伊斯蘭政策是更符合現代需求的。顯然他再一次的拿自己和最大反對黨「泛伊斯蘭黨」(PAS) 相比，並以一貫的貶抑說法來指責後者為保守反動的宗教激進團體，自己領導的國陣才是改革主流，符合國家利益。

但是一些馬來學者顯然不甚苟同馬哈迪的說法，因為大選後一連串鎮壓反對黨領袖的行動，已經引起知識分子的不滿，個人幾次赴西馬和當地馬來知識青年訪談時，都可感受到此一不滿氣氛，而這次研討會幾位學者的論文再次證實此一

反抗情緒的存在，並在醞釀發展中。也難怪許多知識青年熱烈支持安華，而 PAS 不但在國會選舉中在馬來選民的部份幾乎和 UMNO 得到相同比例的選票，且一舉拿下兩個州的政權，PAS 可一點也不是少數宗教激進份子了。

由於伊斯蘭復振運動是目前馬國政治的重大議題，也是執政黨與反對黨兩大陣營積極爭取馬來選民的主要訴求，故這次的大會有一個主題：“Religious Revivalism, Asian Values, and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有不少馬來學者以馬國的伊斯蘭復振運動為題，分別從不同角度來發表其高見。國立馬來西亞大學的 Dr. Budlihisham Mohd. Nasir’s “The Politico-Dakwah Approaches of PAS: A Historical Review,”從反對黨 PAS 的角度來談；同校的 Prof. Sharifah Zaleha Syed Hassan’s “Islamization & Civil Society – Malaysia: A Case Study,”從一個社區的個案來談；馬來亞大學的 Dr. Rahimin Affandi Abdul Rahim’s “Islamic Resurgence and Reformism in Malaysia: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則從政府的法制和教育改革層面來談；同校的 Dr. Che Zarina Sa’ari’s “The Resurgence of Sufism in the State of Kelanta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和馬來西亞科技大學的 Dr. Ahmad Fauzi Abdul Hamid’s “Sufi Undercurrents in Religious Revivalism: Tradition, Post-Traditional and Modern Images of Malaysian Islam,”則從蘇菲主義的角度來探討；伊斯蘭國際大學的 Dr. Ghulam Nabi Saqeb’s “The Muslim Quest for Integration of the Secular and Spiritual Visions towards the Revival of the Universalistic Post-Modernity World Order,”更從哲學的角度來探索。其中，Dr. Budlihisham 和 Dr. Rahimin 的兩篇可以說分別代表反對派和官方的正反兩個陣營如何看待伊斯蘭復振運動的角度。

雖然近來執政黨有不少鎮壓反對黨和異議份子的舉動，但是在這個國際研討會上彷彿有機會可以讓異議學者大鳴大放一樣，故前述之幾場與伊斯蘭復振運動有關的研討會中，時有同情反對黨或譴責政府不當鎮壓異議團體或蘇菲修行團體的言論出現，似乎馬哈迪總理也難以樹立一言堂的權威了。馬來知識份子的反對勢力正在學術界擴大，且在伊斯蘭的認同下凝聚力量，如何處理這股伊斯蘭反對派，是馬哈迪政權最大的難題。因為如果採取完全世俗化和反伊斯蘭的政策，肯定要流失掉大量馬來伊斯蘭選民；反過來說，若要提倡伊斯蘭，則其合法性不見得敵得過由伊斯蘭神職人員所領導的 PAS，故可說動輒得咎。馬哈迪目前的策略是強調自己推動的是進步和溫和的伊斯蘭化政策，而將 PAS 抹黑為保守反動的，且妄想將馬來西亞變成伊斯蘭國。如此，一方面可強調以現代化和經濟繁榮來爭取馬來選民；另一方面又可誘使華人和印度人等非馬來族群對 PAS 形成恐懼心理，削弱其反對勢力的膨脹。

伊斯蘭復振運動其實已不只是馬來西亞個別的問題而已，整個亞洲地區凡是有穆斯林的國家，其復振運動幾乎都已成為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因此，這次的 IAHA 除了談馬國的部份有上列多篇文章外，麥留芳教授的”Islamization: The

Singapore Model，”談新加坡的伊斯蘭化；林長寬教授的”Islamic Renaissance in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1911-1949,”談中國的部份；尚有來自印尼、菲律賓、孟加拉的學者談其國家的同樣議題。事實上，伊斯蘭復振運動已是國際化運動了。因為，伊斯蘭國際組織的聯繫、各國之間經貿學術的交流、穆斯林知識青年到海外伊斯蘭研究著名學府求學、以及最重要的一年一度麥加朝聖，聯絡全球各地穆斯林情感，使得在一地出現的新思潮和運動立刻傳遍整個伊斯蘭世界，這也就是為什麼西方政治學家會認為西方世界所主導的全球化運動面臨的最大敵人便是伊斯蘭運動的全球化了，也難怪馬哈迪雖早年接受世俗化的教育，卻在內外情勢的逼迫之下，也要推動伊斯蘭化政策，這樣他可在伊斯蘭國際組織上展現出開明、進步且虔誠的穆斯林領袖形象，這不只有象徵利益，恐怕還有實質利益，因若取得篤信伊斯蘭教的阿拉伯石油國家的經濟援助和合作，則不但可帶動馬來西亞的現代化，還可擺脫馬國經濟被華人資本掌控的不平狀況，豈不一舉數得！

「婆羅洲行腳」補遺

蔡慧玉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第十六屆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The 16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或 IAHA）於 2000 年 7 月底（27-31 日）在馬來西亞沙巴州的都會 Kota Kinabaru（舊稱 Api）舉行。會場所在是一個民營的渡假村，濱南中國海，景觀十分幽麗，附近有許多景點，吸引了不少臺灣觀光客前來旅遊。由於議程緊密，我們一行人在近一週的會期內可以說都只待在這個人口只有三十萬的小鎮內。

如果說「歷史脫離不了政治」，那麼這個會議可以說充分映實了這一點。IAHA 成立於一九六〇年，第一屆時分別以東北亞、東南亞的地域研究在馬尼拉和新加坡舉行，到了第二屆（1962）在臺北舉辦時開始合二為一，自第三屆在香港（1964）舉辦後，開始轉型成為以東南亞研究為重點的地域性會議，而會場也逐漸成為各個地主國角力並展示國情的場所，幾乎每個餐會都是地主國趁機宣揚國情的集會。

尤有甚者，與會的旅費補助標準並不以學術為主要考量，而以各國的經濟能力為主要考量，因此開發中國家代表就成為主要補助對象。過去幾次大會所提供的一般補助名額大約是三十名左右（一九九四年在東京舉辦時則僅補助十名），但此次馬國的補助名額高達六十餘名，可以說是大做「學術外交」。至於與會代表的素質，說好聽一點就是「良莠不齊」，不少論文濫竽充數；會場中還有很多人到處攀緣附會，以便爭取人脈，為未來的出席補助鋪路——我後來才知道這就是「邀請與會」的真諦。

雖說每個大型會議到頭來都是一場「大拜拜」，而且「愈落後的國家招待愈加熱情」，但是像「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這般赤裸裸地把政治搬上學術殿堂者恐怕不多，而該會歷屆大會中像馬來西亞這樣賣情演出、把學術會議當外交舞

台來主辦者，恐怕也絕無僅有。就會議籌備的細節和協調而言，由於沙巴大學是一所創校只有六、七年的新大學，從來沒有舉辦大規模會議的經驗，因此從議程的擬訂、大綱和論文的印製、會內外的協調工作，不少地方顯得很生澀混亂。不過，這些技術性問題將來由臺灣舉辦時，對接手的中研院絕對不是問題。

其實，馬國這種學術會議泛政治化的情形臺灣早期也很嚴重，但近年來已有大幅度改善。冷眼觀看馬國的主辦情形，我個人的心得是：2004 年如果由臺灣主辦，我們一定要儘量讓學術回歸學術。不少與會者在論及臺灣可能是未來的主辦單位時，其支持的理由都是因為臺灣有「big money」，我認為這是對臺灣的一大侮辱，但也覺得相當無奈，因為這多少是戰後臺灣長期「金錢外交」的一種投射。因此，未來如果由臺灣舉辦這個會議，我偏向採用日本的高標篩選論文和與會者。要辦就要辦得有尊嚴，有一定水準，否則寧可不辦。

另外，行中蕭新煌先生曾經不只一次提及，將來如果臺灣主辦，「南島語系」的研究將是可以貫聯臺灣與東南亞的主題。我個人也贊成這個想法，而且我認為還有三個主題也不妨列入考量：（1）西方的殖民通商；（2）日本的佔領統治；（3）戰後的民主獨裁。像本次沙巴會議這樣以二十世紀的回顧為主題，事實上等於沒有主題，因此臺北在未來的籌備上確實有必要提出一個明確的大會主題，並清楚勾勒出可以凸顯臺灣研究特色的子題，以期凝聚議題，也可藉此形塑議程。

會期中也有輕鬆的一面。抵沙巴的那個下午，我們一行人說好結伴去逛小鎮，晚上並上街去吃晚餐並稍作夜遊。那個晚上剛好也是會場「絲綢」（Sutera）碼頭啟用的開幕之夜，由馬國總理馬哈地親自蒞臨主持，碼頭上有大型餐會，並有自南澳洲專程前來的職人演放煙火。該晚由於入夜時分略有小雨，煙火一直到十點半過後才開始點放，前後大約半小時。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這麼近距離觀看煙火，漫天星花往頭上罩下，只覺得一切都美得很不真實。

會期中有兩個晚上我們約好餐後聚會，就在我和林淑慧共用的大套房客廳內，一邊淺酌小啖，一邊檢討會情。另外，有幾天在傍晚時分會議結束後，我、陳仲玉、黃登興和蕭新煌等幾位先生也會結伴到下榻旅館的海濱游泳池游泳。池內國、臺語雜陳，望眼看去都是臺灣來的遊客，使人一時產生人在臺北的錯覺。

二十九日上午，我們一行人也曾忙抽空搭所謂「殖民時代」的火車（North Borneo Railway），往南經 Kinarut 到附近 Papar 一窺當地村落的究竟。三十日並由大會招待前往神山（Mt. Kinabaru，比玉山還高，是東南亞第一高峰）附近的市集和沙巴市內的沙巴博物館一遊。當天傍晚，我們幾個人在泳後一加上陳國棟——一起在濱岸觀賞夕陽，我和陳國棟一直滯留到天色黑暗許久才各自返房休息。對林淑慧而言，這許多經驗都是她「生平第一次」，興奮之情不在言下。

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三日，中研院一行人在會後連袂飛往砂勞越的古晉，在

兩天內先後拜訪古晉中華第一中學、砂勞越發展協會、砂勞越的博物館和文化村等，行程由民族所的蔣斌負責規劃，並由他與馬僑周方正先生（畫家）全程作陪，因此行程緊湊。古晉的馬來文意思是「貓城」，城內有一所相當有獨特的「貓兒博物館」，但我們因為時間有限，無法一睹為快。倒是我們下榻的「假日」旅館就在砂勞越河邊，因此岸邊散步就成為同仁公事之餘的功課。砂勞越河對岸屬馬來社區，岸的這邊屬華人（以客家為主）社區，沿著岸邊立著一排排二、三層樓的中華街，這是古晉最古老的街道，「華族歷史博物館」就設立在附近。

古晉的人口大約五十萬，其中華人約佔百分之八十，分南、北兩市，華人集中在南市。有意探訪砂勞越的森林公園和長屋文化者，古晉是門戶。這是一個非常有風情的城市，難怪蔣斌會愛上古晉。研究院的同仁平日各自行事，難得聚頭，像這樣組團赴會並一起出訪的情形，實在極為難得。此情此景，將來恐怕只能成為追憶。點滴在心頭，令人懷念。

如果還有進一步建議，我認為東南亞研究未來應該加強年輕學者的語文培訓，並且積極參與地域性的學術大會。IAHA 的參與只是開始，雖然不少同仁對於 IAHA 的泛政治化相當失望，但不可否認地該會確實是東南亞研究的一個重要指標和重鎮，其中也不乏好的論文，而且從事東南亞研究計畫者早晚都要和這些學者接觸，自不能自立於該會之外。

此外，比較學術性的區域大會在歐洲有 EUROSEAS（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成立在一九九二年，為時甚短，但成長甚速，明年的九月十三至十五日將在倫敦舉辦大會。在北美洲有 AAS（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東南亞研究是其下三大區域研究之一，明年三月二十二至二十五日在芝加哥舉辦。我個人的建議是：東南亞研究計劃不妨考慮組團參加明年九月在歐洲的 EUROSEAS 會議；至於 AAS，是年會，組織嚴密，本年的截稿日期（八月三日）已過，不妨考慮後年參與（地點未定）。

總之，對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例如東南亞而言，單打獨鬥不如組團參加。對於提高臺灣或中研院知名度或 visibility，組團參與確實是一個相當有效的辦法。不過，大前提是我們要有好的研究成果，因此在此建議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未來在組團之前，對論文的提報也應該加以審查。

東協區域論壇與台海安全*

林正義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1994年7月首度於泰國曼谷舉行的「東協區域論壇」會議有18國參加；2000年7月再度於曼谷舉行的第七屆年會，在北韓加入之後，已有23個成員。環顧東亞地區，只有台灣被排除在外。在所有新成員必須是主權國家，且需有舊成員共識決的雙重限制下，台灣幾無可能進入這個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多邊官方安全論壇。「東協區域論壇」除東協十國成員之外，加上東協的對話伙伴及觀察員，關注的地區安全包括東北亞、東南亞、大洋洲，但既無秘書長，亦無衝突解決的機制，23國的外長年度會議性質是對話重於協商，且經常是各說各話。備受爭議的「戰區飛彈防禦」(TMD)在「上海五國」、「『中』俄聯合聲明」均表反對之後，在今年的論壇會議成為權力較量的焦點，台灣也被捲入其中。

若依「東協區域論壇」成員的政治體制，經濟發展程度的巨大歧異，且不乏有長期敵對者關係，能夠齊聚一堂各表立場，已屬不易。雖有評論家認為「東協區域論壇」華而不實，無法規範或譴責中共、法國、印度、巴基斯坦在過去幾年的核武試爆，在亞太金融危機、東帝汶獨立事件亦無扮演重要角色，但不能否認此一論壇在「信心建立措施」領域已有一些初步的成果。此一論壇成員大都參與聯合國傳統武器登記制度、出版國防政策白皮書，國防院校的校長會議先後在馬尼拉、漢城兩度召開，各國國防當局也多次參與災難救助的協調會議。而此一論壇既由中小國家組成的東協加以主導，東協的強弱、榮枯，是否被邊緣化或被擠出局，關涉到東協與此一論壇的前景。今年東協外長會議同意設立「三方調解機制」(Troika)的原則、目的及程序，納入上任、現任及下代輪值主席(外長)，對緊急突發事件採取「預防外交」的行動。東協內部決定設置十國之間的熱線，並在去年、今年先後首度與東北亞三國(中共、南韓、日本)召開貿易部長與外交部長

*本文原刊載於2000年7月30日中國時報15版時論廣場，已獲得作者及中國時報同意轉載。

會議，均旨在強化集體力量，提高在區域性安全議題的發言權。

中共反對「東協區域論壇」討論台海及南海爭議，而是將它們放置在雙邊協商的架構上。「東協區域論壇」每年的主席聲明均有關切朝鮮半島、南海情勢的文字，唯獨對台海緊張噤聲不語。東協外長會議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台北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之後，表達關切並認為此舉會嚴重影響區域和平穩定及經濟復甦前景，故重申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承諾，盼望台海早日和平恢復正常情勢。今年的東協外長會議再度重申「一個中國」政策，盼見台海兩岸關係有積極性發展。東協沒有在台灣是否被納入 TMD 及美國本土的「國家飛彈防禦(NMD)計畫」發表集體立場，顯示內部各有不同的態度。

在 NMD、TMD 部署與否的攻防戰，中共努力加速建立反對的聯合陣線。在七月五日於塔吉克首都屠桑貝的五國聯合聲明，指出美國部署 TMD 會破壞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安全，導致軍備競賽升級，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等四國「支持中國關於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形式將台灣納入戰區導彈防禦系統計畫的立場」。七月十八日，俄羅斯總統普丁與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簽署「關於反導彈問題的聯合聲明」，兩人堅決反對美國建立 NMD 及破壞一九七二年的反彈道飛彈條約；在 NMD 的立場上，則指出「以任何形式將台灣納入外國導彈防禦系統都是不可接受的，都將嚴重破壞地區穩定」。七月二十七日，中共將戰線拉到「東協區域論壇」會議，並找到北韓、越南、印度等新戰友。依會議主席、泰國外長蘇林的轉述，除美國之外，沒有一個國家對 NMD、TMD 公開表示支持。

中共要建立反制美國研發 NMD、TMD 的國際統一陣線，但俄羅斯、德國、法國、印度質疑或反對的是 NMD，在 TMD 的立場上，不見得與北京一致。以俄羅斯為例，柯林頓與普丁在六月的莫斯科高峰會、七月琉球高峰會上，均表明雙方在反彈道飛彈的早期預警系統，可加以合作。俄羅斯甚至建議美國應致力於研發在敵方飛彈爬升過程，就及早予以擊落，而這與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小布希州長的想法十分接近。然而，在此次「東協區域論壇」會議，俄羅斯外長伊凡諾夫透露美國欲將 TMD 的範圍自東北亞擴至東南亞，使得此一問題更具爭議性。美國部署 TMD 或決定進行 NMD 的建造工程，極可能使中共調整其核武戰略，重新考慮其擁有的核武器規模。這也將使中共核武「長拳」嚇阻美國介入台海、M 族飛彈「短拳」瞄準台灣的精確度，可信度更加提升。

「東協區域論壇」在北韓加入之後，短期內不會再有新成員加入。北韓自今年起先後與汶萊、澳洲、義大利、菲律賓、加拿大建交，並與美國、歐洲聯盟代表共聚一堂，一起致力於亞太的和平。秘密發展核武器、彈道飛彈、經濟困頓、飢荒不斷的北韓，受歡迎加入「東協區域論壇」。台灣對東南亞投資的挹注、外勞的吸納，加上經貿的熱絡與地理的鄰近，卻無法成為東協的對話伙伴或觀察員，而與東協戰略暨國防研究機制的對話亦受到中共的干擾。中共與東協研商的

「南海區域行為準則」亦將台灣排除在外。台灣無法參與及被排除，究竟是受到限制，或相對而言，有較大的裁量空間可採取片面、果敢的作為，以實力加上精心設計的戰略，贏得周邊國家的尊重？「東協區域論壇」正處於「信心建立措施」與「預防外交」交叉重疊的階段，但沒有一個成員完全將安全仰賴此一機制。它鼓吹概念有餘，但真正維繫亞太和平的仍是以美國為主導的多組雙邊安保條約。在台海危機，美國在過去、現在及未來均扮演「預防外交」的唯一角色，「東協區域論壇」不可能有具體的干預行動。

泰國田野調查紀行^{*}

嚴智宏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博士後研究學者

一、前言

由於我的研究計畫是「泰國的佛教藝術與社會——以釋迦牟尼像為例」，因此，平日都特別留意泰國藝術與社會的相關資料。但是，閱讀時往往會碰到一些問題。例如，一、書刊裡面經常提到雕像，但是其中若不是沒有照片，就是照片不夠清楚，無法仔細比較。即使照片清楚，但是它們和真的雕像之間，還是存在著差距。¹二、照片都只照出雕像的一面；不知道由另一面/角度看起來會怎樣？雕像側面、或背面，有文字或圖案嗎？三、不同年代、不同地區的雕像，有何不同？為何不同？四、翻閱資料時，每每覺得國內有關泰國的資料不足；同時，在有限的資料中，又以西方人的英文著作為主。如果能夠到泰國去找資料，應該會有較豐富的成果。而且，如果可以直接向泰國學界請教，當面和他們談論相關議題，應該會比光在國內閱讀資料（如同隔靴搔癢）更好。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必須實地到泰國去。

基於上述考量，因此，這一趟田野調查之目的，在觀看泰國藝術史上各朝代（或單元）的雕像，並蒐集資料、進行訪談。

此行所到的地方，包括素可泰古城（Sukhothai）、彭世洛（Phitsanulok）、阿瑜陀耶古城（Ayutthaya）、曼谷以及曼谷國立博物館。這幾個城市，是泰國獨立建國以來各朝的首都，²也是我研究計畫的重點地區。

^{*} 感謝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和計畫主持人蕭新煌教授的幫忙，我才能有這趟四月十三至二十一日的田野調查之行。

¹ 畢竟，平面的紙張，無法如實呈現立體的物體。照片與實體之間，永遠有差距。

² 泰國正式建國前，也有幾個時期/單元（墮羅鉢底、高棉-華富里、室利佛逝等），各有重要城市。此行雖然沒去這些地方，但這些單元的重要雕像，大都可在曼谷國立博物館裡看到。

二、詳情

田野調查的詳情，敘述如後。

第一天，四月十三日，由台北搭機到曼谷後，直奔著名的大理石寺（Marble Temple）。那是去年九月到泰國時，想去而沒有時間去的地方。當時心想，「下次到泰國，一定要去。」今天終於到訪。

該寺的本名是 Wat Benchamabophit，意謂「第五位國王的寺」。因為，它是國王拉瑪五世（1868-1910 在位）下令建造的。它之所以有「大理石寺」的稱呼，是因為主殿用灰色大理石砌成，殿外兩隻巨大的鎮寺之獸（獅子）也是。寺中還有歐洲彩色鑲嵌玻璃，構圖巧妙，嵌工細緻。殿裡著名的佛坐像，有火焰狀的佛光、細小的螺髮；觸地的手指平齊。它和我四月十八日在彭世洛所見的大佛 Phra Buddha Chinraj 幾乎一模一樣。因為，大理石寺內的，是仿自彭世洛的雕像 - 那是泰國人引以為榮的時代裡（素可泰時期，13-15 世紀）最有名的佛坐像之一。今天，兩尊大佛前的香火都非常興盛。

第二天，四月十四日，到曼谷的大寺院參觀。其中比較重要的，是皇宮旁邊的涅槃寺（Wat Pho）。³它是曼谷最古老的寺廟，也是全泰國最大的寺廟；該寺的另一特點是保存了前朝（阿瑜陀耶，14 世紀-1767）廢墟裡救出的雕像之半數（約一千兩百多件中的六百多件）。

我在寺裡細看它的雕像，覺得它們的風格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繼承前朝（阿瑜陀耶）後期的作品；那時的作品金碧輝煌，材料貴重。這種特質，在寺裡最享盛名的臥佛身上就可看到。臥佛高 15 公尺，長 46 公尺；全身覆蓋金箔，裝飾華麗。

該寺另一類的雕像，則頗有寫實的味道。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帝國主義正盛、進軍東方時，泰國採取因應之道，敞開門戶，擁抱西方文明。這時，不少泰國雕刻家也改以寫實主義手法來從事創作。因此，佛像不再鑲金嵌玉、高高在上，而是接近真實人物。例如，本寺好幾尊佛坐像就相當逼真，栩栩如生。

下午在寺裡的圖書部買得不少好書。

第三天，四月十五日，到阿瑜陀耶古城（曼谷以北約八十公里）。這是前朝古都，⁴但它已經沒落了。據傳，它極盛之時，有東方威尼斯（Venice of the East）之稱，因為島上水道縱橫密佈；這些水道防止了水患，便利了運輸與貿易，也大有助於經濟的繁榮。當時，由於社會富裕，而且王室護持佛教，因此寺院林立，

³ 它之所以叫做涅槃寺，是因為寺裡最主要的佛像再現（represent）了佛陀涅槃的模樣。它是曼谷王朝（1782—至今）的主要雕像之一。

⁴ 前朝的首都、朝代名稱，都叫做阿瑜陀耶。

香火鼎盛。但是，城裡的寺廟、建築、雕像，大都在 1767 年緬甸入侵時夷為平地。因為，緬甸能帶走的，就帶走；不能帶走的，就予以摧毀。留下來的，只佔全盛時期的一小部份。⁵

今天親眼目睹水道淤積、寺廟頹圯、雕像零落的狀況，真有蕭條荒涼、滄海桑田之感。除了一些寺院遺址成為觀光點以外，很難想像當初興隆的樣子。雖然它曾經是東南亞最熱鬧的都會之一（人口百萬）；但現在只是一個小城，所剩的雕像也只有有一些。

縱然雕像為數很少，但它們仍透露出前一個朝代（素可泰）的味道。例如，它們有蛋形臉、修長的身軀，和左肩上鋸齒狀的衣帶。不過，仔細比較之下，仍可發現兩種雕像的相異之處。例如，阿瑜陀耶初期的雕像，在頭髮以下、額頭以上有一條細紋；臉上較少笑容，表情也比較嚴肅；蓮臺裝飾得很複雜（如細緻的花紋、或佛傳故事中的某些情景等）。但是，晚期（約 18 世紀）的雕像較注重細部裝飾（如頭冠、胸部、手肘、蓮座等嵌飾許多黃金、珠寶），較不注意雕像的整體美感。

另外，阿瑜陀耶佛寺造型的特色之一，是「通善包」（Thongsampao）；亦即寺塔的四個角落略微翹起，像船一樣。據傳，它的象徵意義是把寺廟當作法船，讓法船載著信徒，一起通向拯救、為善之境。

第四天，四月十六日，到曼谷國立博物館看文物雕像。我想拍照，但是館方主管相關事務的人不在。因此，我轉而仔細端詳雕像，並一一記下它們旁邊的圖說。

這天的觀察重點在「墮羅鉢底文化」（Dvaravati，7-11 世紀）的雕像。⁶細看雕像之後，印證書上所讀到的論述——這時的雕像肉髻較大，頭髮卷曲，又彎又長的雙眉在鼻根相連；同時，袈裟看來薄如蟬翼。其次，這時的法輪雕像上，經常刻著細小的文字；那是照片上難以見到的。現在貼近法輪像搜尋，總算在背面的輪輻上見到幾行小字。再次，我終於看清一種特別的雕像——「佛陀與奇獸」。幾個月來，常在書上讀到這種雕像，但是看不到照片；或者有照片但很不清楚。這一趟是近距離看到它們了，心裡覺得很高興。這種雕像表現佛陀站（或坐）在一隻奇特的動物身上。牠是一種混合體，結合印度教三位主要神明⁷的坐騎而成。這個圖像，可能意味著造像功德主相信，佛陀能力超越了印度教的神明。

第五天，四月十七日，到素可泰古城（曼谷以北約四百卅公里）。那是泰國

⁵ 傳說，1760 年緬甸攻打阿瑜陀耶時，把大砲架在 Wat Na Phramen 寺前，以砲擊位在寺院對面的皇宮；但緬甸王親自操作大砲時不慎受傷，不久便去世。或許由於這個緣故，1767 年阿瑜陀耶遭緬甸摧毀時，此寺倖存。

⁶ 通常，泰國史都由這個單元開始談起，因為，之前的歷史尚未明朗。

⁷ 三位神明是濕婆（Siva）、梵天（Brahma）、毘濕奴（Vishnu）。

獨立建國時的首都。⁸當時，不只在政治上獨立建國，在文化上也建立了他們普遍認同的基礎。這種認同，一直延續到現代。今天，泰人大都認為，素可泰是他們正朔的開端、他們真正獨立自主的起點（包括他們的文字，因為泰文就是這個時候創造的）。

素可泰遺址保存的情況，比阿瑜陀耶的好。一則因為它並沒有被敵人摧毀；二則因為十多年前政府在此成立歷史公園，而且聯合國予以協助；三則因為泰人（尤其附近居民）也用心保存。畢竟，這是泰國的文化瑰寶之一，也是他們覺得光榮的歷史遺址。

在這個遺址中，有特立獨行的佛行像（walking Buddha，或說行走佛，亦即表現佛陀行走姿勢的雕像）。佛行像不只是這時的特色之一，今天依然是泰國雕像與眾不同的地方之一。它有流暢的線條、優雅的氣質、微笑的表情，並且有動感，好像是往前行走，迎向信徒或觀者。

看到這種雕像，心裡覺得很高興；因為，從前只能由照片上看到，現在是一睹廬山真面目了。同時，環繞一圈之後，才了解一件事 - 為什麼照片都由雕像「手下垂」那一側（前方約45度角）來拍攝，⁹因為這個角度最能看出它行走的模樣。反之，若從側面拍，則看不到它的表情；若由正面拍，則行走的姿勢就看不清楚；若從舉起手來的那一側拍，則舉起的手會擋到觀者的（部份）視線。

無論佛行像、坐像或立像，這時的雕像大都有以下特徵：頭上有火焰狀的佛光、細小的螺旋卷髮，肉髻隆起，上面呈蓮苞狀。蛋形臉上則有彎曲的眉毛、略鉤的鼻子、略小的嘴、慈祥平和的表情，尤其是溫和的微笑。

雕像溫和的微笑，映照著素可泰的青山綠水，看起來很令人舒服。這裡名為歷史公園；它名副其實，就是一個大公園。裡面處處有六、七百年歷史的古寺；牆上灰泥剝落，紅磚外露，頗有歷盡滄桑的感覺。傍晚時分，古寺、石佛與紅磚映照著夕陽，古色古香，非常美麗。

我租了腳踏車，依照手上的地圖，按圖索驥，在素可泰古城（約四平方公里）裡來來去去，從早到晚，待了整整一天。我一一記下每個寺院的名稱，閱讀它們的告示、簡史，記下所拍的建築物的位置、所拍的雕像的方位等。每拍一張，就記一張的資料，並予編號，以免日後張冠李戴、搞不清楚。天快黑時，搭雙條車¹⁰回旅館。晚上去買書。

第六天，四月十八日，到彭世洛（曼谷以北約三百八十公里）。彭世洛是素可泰時期的大城市之一，也曾經是它的首都之一。我在這裡參觀佛寺。裡面最著名的是 Wat Phra Si Rattana Mahathat，也就是有一尊大型佛坐像的寺院；這尊像

⁸ 它的朝代名稱、首都名稱，都叫做素可泰。

⁹ 這種雕像，都有一隻手舉起、結手印，另一隻手下垂。

¹⁰ 這是一種改裝過的客貨兩用卡車，上面左右兩側各有一條木板，乘客坐在板條上。在泰國鄉間，因為公車不多，所以，這種車是很普遍的交通工具。

鑄造於 1357 年。上文（四月十三日）提及的曼谷大理石寺主佛，就是仿自這尊。

之後，我到當地的博物館參觀並買書。由於此地靠近泰北，所以，博物館裡有很多泰北地區的藝品、資料。下午在館裡認識一位該地的大學（Naresuan University）的學生，叫做 Sakworaman Phokrai。和他討論泰國的歷史，也問了他一些泰國的風俗民情，包括「潑水節」。他說，他很訝異於我知道泰國歷史的細節，例如泰北的「蘭那文化」（Lanna 11/13-18 世紀）。他也問我關於台灣的情況。

傍晚，搭直達巴士回曼谷，深夜返抵旅館。

第七天，四月十九日，再到曼谷國立博物館。今天得到拍照許可，因此，花了一段時間在拍照上。¹¹

照相之餘，今天把觀察的重點放在「高棉-華富里文化」（Khmer-Lopburi，7-14 世紀）的雕像。這個文化主要是在泰國東北部、中部一帶。由於它的大部份區域曾受過高棉統治（13 世紀前），因此，其藝術頗受高棉影響。例如，它的雕像兼具大乘、小乘的人物。其次，高棉當時所盛行的大乘佛教具有濃厚的密宗色彩，因此，在「高棉-華富里文化」的雕像中，密宗人物頗多，如八臂觀音像。另外，晚期（約 12 世紀起）的雕像大都雍容華貴，頂戴寶冠，穿著皇家服飾。這可能源自於皇室的影响，因為許多雕像是由高棉皇族委託製作的。

今天的另一個觀察重點，是「室利佛逝文化」（Srivijaya，8-13 世紀）的雕像。這些雕像的密宗色彩很濃。其原因可能是：一，當時，印度商人的活動力強，活躍於各地，而室利佛逝便是他們的主要市場之一；那時印度帕拉王朝（Pala，8-12 世紀）的文化興盛，其佛教有濃厚的密宗色彩。活躍的印度商人，把這種文化帶到此地。二，當時亞洲不少佛教僧侶經常往來於印度、馬來半島、印尼西部間；室利佛逝位居中樞，為東南亞區域交通必經之處，因此也吸收到帕拉文化。也許職是之故，不少室利佛逝的雕像就有了密宗的色彩 - 菩薩像多，而且裝飾多。

其次，這些雕像大都很小，約二十公分以下，有的甚至不到十公分。這或許和輕巧、便於攜帶有關？其確切成因，待日後深入研究。

第八天，四月二十日，到「東南亞區域考古藝術中心」(SPAFA, The SEAMEO Regional Centre for Archaeology and Fine Arts)。¹²然後再度造訪泰國公主詩琳通 (Chakri Sirindhorn) 所設立的人類學中心 (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 Anthropology Centre)。¹³秘書 Tippawan Matharat 小姐帶我到各樓層參觀，並回答

¹¹ 拍照時經常會拍到櫥窗上、由玻璃映照出來的反光。館方說，「能否移動玻璃門」這種事情不是他們所能決定的；必須在幾個星期前寫信向美術部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申請許可。所以，我學到一課，就是以後必須更早聯絡對方。

¹² 本院史語所陳仲玉教授有文〈泰國・東南亞區域考古藝術中心〉介紹這個機構。見本刊第五期，1998 年 9 月，頁 108-110。

¹³ 關於該中心的介紹，請參閱拙作〈泰國公主的理想與實踐 - 詩琳通公主與摩訶・恰克利・詩

我的各種問題。她無法回答的，就請一位年輕的研究人員 Tromgjai Hutangoon 來解答。我們談了許多關於泰國藝術、歷史的問題。

之後，再到藝術大學（Silpakorn University）的考古系見幾位老師。其中一位是 Surapol Natapintu 教授；我就泰國的考古藝術請教他一些問題。

晚上去逛古董市場並買書。

第九天，四月二十一日，這是此行最後一天。我決定再到曼谷國立博物館仔細看雕像，尤其是前幾天沒有看清楚的地方（如「蘭那文化」）。因為，此行主要目的在看雕像。

幾個月來，在書上讀到一些資料，指「蘭那文化」在 14 世紀前不少雕像的風格近於印度帕拉王朝。這一點，我還不很確定。因此，今天再到博物館的相關展示室，再次注意觀看雕像，然後回到「蘭那文化」部門再做比較。看來確有帕拉的影子在。例如，兩者的胸膛都寬闊，腰部都細。但是，蘭那雕像頭部的螺旋卷髮較大，肉髻頂端類似蓮苞，臉龐豐腴，身材略豐厚。它的蓮座較有特色的地方，是雙層的蓮瓣中間，清楚地刻畫出雄蕊。

但蘭那後期（14-18 世紀）的則略有不同。由於受到素可泰文化的影響，蘭那雕像的臉變得較長，呈蛋形，肉髻與頂上佛光（和素可泰的一樣）作火焰形，螺旋卷髮則變小些。這時，帕拉的影響就小了。

時間在觀看雕像中飛逝。下午，又買了一堆書，然後收拾行李，前往機場。晚上九點回到台灣。

三、結語

整個來說，這次田野調查頗有收穫。收穫大致可分兩類：一，在泰國時，去了幾個主要的遺址，也到了幾個主要的博物館，看到想看的雕像；原本在書上（照片）看不清楚的地方，藉這次機會把它們看清楚，並拍了照。其次，還蒐集資料、買了三十多本書（這些書在平常的網站上查不到）。另外，也認識新朋友，並做了些相關訪談。

二，田野調查回來後，依照在泰國的所見所聞所思，把論文稿修正了，參加五月十一、十二日由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本計畫與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協辦的「2000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會中，得到主持人兼回應人林保堯教授（國立藝術學院美術史研究所）的好評。會後，該論文也被列入論文集。

附帶一提，我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體會到泰國人體貼的一面。以我投宿的旅館（Suan Dusit）來說，雖然它不是一流的，但工作人員認真在經營，待客頗用心。以下舉例說明：一，泰國菜以甜辣馳名。我怕辣。第一天在旅館的餐廳用餐，辣得受不了，於是把辣椒逐一挑出。隔天，我的飯菜就比較不辣了。大概是因為第一天服務生收拾碗盤時，發現那一堆挑出來的辣椒吧？二，我不能喝冰水。第一次，餐廳給我一杯水，裡面加了冰塊；我把冰塊取出。隔天，服務生問我要點什麼飲料？我點水。他問：「不加冰塊？」他們發覺我不喝冰水，而且記住了。三，由於有收據才便於報帳，因此，飯後我向餐廳索取收據。後來，只要我在那裡用餐，他們就自動附上收據。四，為了減輕行李體積與重量，所以我沒帶衣架；在旅館發覺衣架不夠用，所以有時把衣服披在椅背上。回旅館時，看到衣服掛在窗邊，而且多了衣架。那是清潔工、服務生幫我掛的。

從這裡可以知道，他們認真在做事，不因事情微小而疏忽。其實，正由這種細微處，特別能讓人感受到他們的用心。

東南亞人名與稱謂^{*}

麥留芳 著^{**}

王國璋 譯^{***}

第一章 問題與宗旨

1999 年 11 月 12 日，新加坡的一家英文報刊在其頭版報導著「夏里夫總理已遭軟禁」的消息。這則新聞裡的主角，指的正是巴基斯坦的現任總理 Nawaz Sharif。然而到底這是 Nawaz 此人遭到軟禁，還是他的父親 Sharif（夏里夫）呢？巴基斯坦是個穆斯林的國度，如果依照伊斯蘭命名系統的傳統來看，總理之名其實應是 Nawaz。瞭解情況的人應該都會知道，新加坡擁有頗具規模的巴基斯坦裔閱讀人口，報社因此理當在這類相關報導上，採取更審慎的態度。「夏里夫先生」結果就這樣被硬派當成了總理。事實上，鬧笑話的可不單只是這份報章，因為直到今日，幾乎所有其他的報刊與新聞雜誌，依然採用夏里夫之名來稱謂那位被罷黜的總理。但我們不久就會從內文的討論裡發現，關於島嶼東南亞地區命名規範上的辨識及整理，卻遠要比這一切都還來得複雜與叫人迷惑。它之所以複雜，是因為其中同時存在著太多命名系統與系統上的變型；而它之所以叫人感到困惑，則是由於「特例」之充斥，竟與各類系統上的變型等量齊觀。

^{*} 這本手冊的完成，實有賴於各書作者及諸多友朋的鼎力相助。數月以來，廖建裕博士（Dr. Leo Suryadinata）、廖裕芳博士、Abdul Rahman Embong 博士、Sumedi P. Nugraha 博士、I Nyoman Gunawan、I Wayan Ekaputra、Ismett Lubis、Azhar、Azizah、Ian 和 Grace 等，都對我伸出援手。而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黃宣衛博士，也曾與我就此題目進行過充分的討論，若無其觀念上的激盪及所曾建議與我的參考書目，這個研究恐仍將如有畫無框之作，無法真正成形。此外，嚴智宏博士對原稿提出不少意見，合當致謝。話雖如此，本書內文如有任何謬誤，仍應由我一人獨自承擔。最後，若無蕭新煌教授的不斷鼓勵，以及當初我在初稿發表的那場午餐研討會上自與會者口中獲得的建設性迴響，這項寫作計畫或許早就已落個胎死腹中、不了了之。這中文版的譯文歸功於王國璋同學；另外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辦公室六名同仁，林淑慧、許慧莉、梁開賢、陳明秀、簡心怡、羅惠馨各校閱一章，應合併感謝。本文英文版本為“The Rules of the Name Game In Insular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東南亞研究系列論文，No.35，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出版，2000。

^{**} 本文作者。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訪問教授。

^{***} 本文譯者。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促使我開始意識到「公眾人物之稱謂」也會構成大問題的機緣，說起來相當偶然。這事肇端於 1990 年代初期，台灣方面關於伊拉克與科威特及其盟邦之間，波斯灣戰爭的新聞報導。就在戰爭爆發的頭一天，一家當地的電視台就報導說，伊拉克總統沙達姆（Saddam）正呼籲其人民團結起來作其後盾，以對抗美國。至晚間新聞時，另一家電視頻道重覆播報了這則新聞，但內中主角卻已由沙達姆搖身一變為海珊或侯賽因總統（President Husain or Hussein）。在兩家電視台螢幕上出現的，無疑都是同一張面孔與同一個人。另一方面，布希總統又稱伊拉克領導人為 Saddam，明顯也與大多數西方媒體報導中的 Husain 不同。

這一切都使伊拉克看來彷彿如存在兩名總統，但事實上大家曉得也就只有那麼一位。兩個交疊出現的名字，指的其實都是 Saddam Husain 這同一個人。伊拉克與巴基斯坦一樣同為穆斯林之國度，因此理當也適用於傳統的伊斯蘭命名系統。

「沙達姆事件」使我稍後繼續警覺到了其他許多有關文化與姓名稱謂上的類似案例。打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才發覺媒體在有關東南亞人姓名的報導上，竟是如此的不一致與令人混淆。這不僅僅是發生在兩個不同的新聞單位之間，即便是來自於同一新聞單位或同一電視台的兩名記者，也都可能對此意見相左。現在，就讓我們來進一步探究這方面的矛盾情境：

（一）同一份報刊裡的「新聞特寫」與一般報導之間的不一致性。舉例來說，路透社曾稱巴基斯坦那位已遭廢黜的元首為夏里夫總理，然而就在這同一則外電報導裡，當引用到來自當地英文報《民族報》（The Nation）裡一名地方員警的評論時，巴基斯坦總理又成了 Nawaz 而非 Sharif。不過在報導中的其他各處，路透社仍然偏好使用 Sharif（ST 21.10.99）。Nawaz Sharif 共有三位兄弟，而他們都被各以自己的「本名」（given name）——即 Abbas、Hussain 及 Shabbaz 來加以稱呼。另一方面，雖然總理親生兒子之名被報導為 Hassan Sharif，姪兒是 Hamza Sharif，但其女卻被稱作 Mariam Nawaz。更好玩的是總理的太太冠夫名而非夫「姓」曰：Begum Kulsum Nawaz（NST 4.4.00）。

在英文《亞洲週刊》（Asiaweek）11 月 5 日的詳細報導裡，當時印尼「專業集團」（Golkar）主席 Akbar Tandjung 在與「瓦希德總統」（President Wahid〔原文如此〕）於國賓館會晤前被敬稱為 Mr. Tandjung，但甫踏出國賓館，卻已又成了 Mr. Akbar。

（二）在追溯新當選的阿都拉曼總統（President Abdurrahman）家系淵源至其父 Wahid Hasyim，其祖 Hasyim Asyari 後，記者竟還昧於眼前這個典型的馬來—穆斯林式的命名規範，繼續稱呼這名印尼總統為 Wahid（ST 21.10.99；FEER 4.11.99）。而總統的醫生弟弟 Umar Wahid，也還是被喚作 Dr Wahid（AW 5.11.99）。至於總統另一位已被提名成為「伊斯蘭聯盟」（NU）候選主席之兄弟，以及總統的女兒‘Yenny’，則是被人依從傳統的命名規範來加以稱謂。

《時代週刊》亞洲版的 Don Morrison 先生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訪

談時 (CNN 25.10.99)，以瓦希德及阿都拉曼二名交互地稱呼這名印尼總統。然而另一方面，CNN 本身的商務新聞記者 Farland Chang，卻是將這名總統的新政府喚作阿都拉曼政府 (CNN 27.10.99)。

就姓名稱謂而言，本區域中文報刊在這方面的表現也是半斤八兩，絲毫未見高明。馬來西亞的中文報《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台灣的《自由時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以及新加坡的《聯合早報》，都一致地採用 Wahid，並依據英語發音之慣例，將該名裡的最後一個 d 字母音譯成瓦希「德」。不過在《聯合早報》新聞報導裡出現的雖是瓦希德，但令人訝異的是，它那位冠有一個華裔姓名的駐印尼通訊員，卻另在其報導裡，通篇地以「阿都拉曼」指涉同一個人。

(三) 在阿都拉曼總統甫當選即收到的賀詞中，澳洲與日本方面都稱呼他為瓦希德總統。而出於不同的觀點，泰國和馬來西亞政府則是以阿都拉曼總統稱之。至於新加坡，用的卻是「閣下」(Your Excellency) 這樣一個中性的稱謂。日本政府於此的用法與《朝日新聞》一致，即以 Mr. Wahid 來稱呼這位印尼新總統。

(四) 菲律賓政府曾製作過一份關於摩洛回教徒命名系統的詳細名冊 (Edding 1980)。這份前些年時才從民答那義島 (Mindanao) 四個行政區域的學童名字裡選摘出來之名冊，所提供者不僅僅是學童們的本名，還包括了他們的「姓氏」(surname)。因此從這份名冊透露出來的訊息，無疑就是摩洛回教徒們自學童時代起即已使用姓氏。關於這一點路透社似乎也是同意的，因為它就曾報導過阿都拉曼總統計畫在其訪菲期間，與「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ILF) 的領導人 'Mr. Salamat' 會晤 (ST 18.11.99)。這位領導人的全名，其實是 Hashim Salamat。

然而數天之後，法新社的一則外電報導 (ST 21.11.99)，卻說阿都拉曼總統要見的這同一位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領導人，是 Mr. Hashim。這項報導於姓名稱謂上無疑依循了傳統馬來—穆斯林式的命名規範，但卻因此有別於路透社的報導，以及官方所製作過的那份摩洛人姓氏名冊。

我在【表一】裡更詳盡地列出媒體於姓名稱謂處理上的紊亂矛盾，這些案例本身，其實就足以說明一切。

東南亞人的姓名稱謂於媒體報導上所呈現出來的不一致，並不僅僅令人莞爾，它也可能導致一般民眾對於媒體本身某種程度上的不信賴感。一個極可能被質疑的相關問題就是：「如果這些媒體連當地人的姓名稱謂都搞不清楚，那麼其新聞分析，究竟還存在多少可信度？」這個問題當然是會有個答案，只不過答案一點也不簡單；而且即便現在就給了你答案，讀者諸君也未必就會對此摸得著頭緒。所以現在，還是讓我們繼續往下探究吧。

在嘗試正確的去區辨各項命名元素之過程中，我開始對於東南亞人氏——尤其是東南亞穆斯林中譯名字的發音，產生興趣。台灣中文媒體對於外國人名字的

音譯縱使五花八門，各報之間縱然各彈各的調，但新聞界在這方面似乎仍有一些基本默契。其中的一項默契，就是應儘量使這個音譯名字看起來像個「中文名字」，並不宜採用諸如動物等等具貶抑性的字詞。然而我們更關切的，卻是將有著 t、d 與 k 等子音作尾的外文名字，在音譯時「特予強調」的另一項不成文規則。譬如埃及總統 Mubarak 的中譯名字就成了穆巴拉「克」，而馬來西亞 1970 年代初期的首相 Tun (Abdul) Razak，在台灣則是以拉薩「克」之名為人所知。

在探索的進程中，我對於與東南亞相關的研究報告及學術論文是如何列舉其參考文獻，也萌發了興趣。顯然，只有極少數的非馬來裔作者，在文獻的參考上正確地引用了馬來裔著者的名字。他們大多只是簡單依循西方「名前姓後」的命名規範處理，所以對於那些同樣構成名字一部分的榮譽與世襲尊銜往往一概予以漠視，也就不難叫人理解。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判讀馬來人與印度人的姓氏名字，就彷彿闖入了一座字母森林。曾經就有人抱怨過，某些西方的學術人員與出版商會任意地將印度教徒的長串名字一截為二，並取其一作為姓氏(IFLA 1980: 4)。我想學術人員、新聞從業者、記者以及外交界之人員，毫無疑問會比誰都還要急切地希望趕在夜幕降臨前，走出這座擾人的字母森林。

無法正確判讀一位關鍵人物的姓氏名字，有時候不僅讓人感覺十分受挫，還是件極讓面子掛不住的事。就被稱呼者而言，當僅被人以自己的教名 (religious name) 來加以稱謂時，或許還可基於對方文化上的無知而不予計較；但若是反覆不斷地被冠以父名來加以稱謂，那就不免要叫人喟嘆姓名何用了。而對任何一位華人來說，遭人誤喚為自己其他的兄弟姐妹並無大礙，但倘是被誤以其父之名呼之，可就是十足的冒犯了。因此，我們實在有必要探索並釐清各命名系統的相關規範。

我們當前的探究工作，乃植基於以下的數項前提：

1. 比鄰的族群對於彼此的命名規範，當知之較詳；這一點就馬來西亞（沙巴和砂勞越）、新加坡、汶萊與印尼諸地的情形來說，尤其如此。我們當可從這些地區的大眾傳播媒體與學術界之專業作品中，得到良好印證。

2. 撇開地理上比鄰的族群不談，在文化、族裔以及／或宗教信仰上相近之人們，也可以假設他們對於彼此間的命名規範，知之較詳。

3. 隨著全球化效應的擴散，那些在過去早已和西方傳媒及學術界有過接觸，且／或目前還與後者維繫著廣泛交流的地區人民，對於其個人名字遭致錯誤解讀，往往也都比較能夠釋懷。

4. 已上軌道的國際性新聞機構，相較於那些後進，應更能掌握人名稱謂。

我原初的目的本在探尋命名系統之規範，只不過這條路才走了一半，一項縈繞不去的問題就開始浮現：「這裡頭果真存在一套整齊的命名規範嗎？」在尋覓的盡頭，我終於隱約覺得，尋找命名規律等同走進一條死胡同。我遂開始轉問自

己一個較不具誤導性的問題，那就是：「這是哪個群體的命名規範？」所以手冊到了最後，已從原初的目標，轉化而為去梳理各類相異之命名規範。我已經不再汲汲於建構一個一統的命名秩序，畢竟這類一統秩序的存在，其正當性就甚值得我們懷疑。

這本手冊其實也不敢在「教人如何區辨頭銜與個人名字」一事上居功，因為這方面早已經有一些更詳盡的著作問世，其中少部分更是早在 1950 與 1960 年代就已撰述完成 (Zainal 1957, Chaplin 1967, Rony 1969)。若說它仍有些貢獻的話，那就是這本手冊凸顯及探溯了島嶼東南亞地區命名系統上的紊亂根源，尤其是馬來—穆斯林世界裡的情形。

我們不久即會看到，造成這類命名與稱謂上紊亂場景的一項最主要因素，正是來自於大眾傳播媒體。而被稱呼者本身的個人偏好，對此也不無影響。命名與稱謂上的混亂指的不僅僅是偏離標準，更包括了這些偏離標準的異型之間，彼此的矛盾不諧。不過非正式的稱謂或暱稱之使用，如 Bung Karno (Sukarno)、Ku Li (Tengku Razaleigh) 或 Gus Dur (Abdurrahman)，倒不被視同為這一類的矛盾不諧。無論如何，抽絲剝繭地來釐清這場姓名遊戲的規則，乃當務之急。

我們需要兩種不同類型的資料，來爬梳東南亞地區依習俗建立的命名系統與當代一般稱謂方法之間，所存在的糾纏。就宗教與族裔淵源的角度觀之，島嶼東南亞的歷史傳統，大可溯源至阿拉伯半島一帶及中國與印度大陸。移民遷徙時，自然也會把本身的命名系統一併移植過來。為檢驗一個人的名字於生活實踐裡的實際稱謂，我們除透過與個體之間進行的溝通外，實在也有必要埋首於媒體的浩瀚素材裡，探個明白。

所謂媒體的素材，指的就是媒體事業所生產的那些口語會談與文字撰述之文本 (text)。這些新聞的提供者，包括了「國家廣播公司商業台」(CNBC)、「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News)、「亞洲新聞台」(NewsAsia)，台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三地的本土電視台，《時代週刊》(Time Magazine)、《新聞週刊》(Newsweek)、《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亞洲週刊》(Asiaweek)，以及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當地，任何我們可以取得的中文、英文、馬來文與印尼文報章。此外，在大多數情況下，地方與本土語言報章上所刊載的國外新聞，其實主要還是來自於路透社 (Reuters)、法新社 (AFP)、美聯社 (AP)、布隆博 (Bloomberg)、馬新社 (Bernama) 或步橋新聞社 (Bridge News) 等通訊社 (完整的新聞單位名單，請見附錄)。

為檢視個人名字於正式場合裡的呈現方式，我們也翻讀了當地的電話簿、已出版之法庭案例彙編，以及那些偶爾可讓我們一窺整個家族兄弟姐妹名字的計聞。

這本手冊乃為切合各類不同階段的需求而作。若只求快速瞭解如何「引用」參考材料，讀者或可直接翻看【附錄三】及【附錄四】即可。而同樣為求參考上

的方便，但針對的對象卻是些部長級人物與權力菁英的話，那【附錄五】至【附錄七】就很有用了。至於【表八】至【表十二】或手冊裡的第六章，則是提供了讀者有關汶萊、印尼、馬來西亞及新加坡一帶，各項涵蓋甚廣之頭銜與稱謂方式的姓名摘錄。

手冊共計七章，而本章則為〈緒論〉。在接下來的第二章裡，我們將會就主要的命名系統作一簡單描繪，最終並將集中鎖定於以下三型：也就是「本名—本名系統」(Given-name and Given-name, Gn-Gn)、「本名—姓氏系統」(Given-name and Surname, Gn-Sn)以及「純粹本名系統」(Given-name only, Gno)。一般來說，這三套的命名系統，就已足夠涵括島嶼東南亞諸社會裡，人們所使用的各類名字。而除此之外，第二章也將提供讀者有關於馬來語彙在發音及拼寫上的一些基本規則。

在某些東南亞社會裡，人們所採行的名字，正同時經歷著結構與素質上的雙重變遷。由於東南亞人氏與其移民發祥地之間有著文化及宗教上的關連，我們如今若回過頭檢視這些地區命名系統的發展現況，應該也很有趣。第三章將就此命名方面的文化淵源，追本溯源至阿拉伯半島一帶和印度次大陸，甚至中國。

而接續著第三章的脈絡，第四章將開始詳盡呈現各類馬來裔穆斯林與其他東南亞人氏——如印度裔、華裔及少數具份量的印尼次族群群體所使用的姓氏名字。大致說來，馬來裔穆斯林及南印度人於命名上採行「本名—本名」(子名—父名)系統，華人及北印度人乃「本名—姓氏」系統，而錫克人、爪哇人、巽他群島及峇里島人所依循的，則是「純粹本名」系統。

除個別體系本身自我衍生之內部變型外，各類頭銜與榮銜的存在，也同樣複雜化了它的命名——或者更貼切地說——稱謂的方式。有些頭銜其實構成了命名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某些則否。所以若想瞭解一位島嶼東南亞人的真正名字，我們就必須懂得區辨出來什麼是其名字的主體，而什麼又只是些附加其上的尊銜。在這方面，第五章將針對馬來西亞、汶萊與印尼三地的頭銜體制，提供讀者一個大致的鳥瞰。當然，我們於此亦將說明哪些頭銜是個人名字裡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哪些則否。

其實有時候（或有些人）可能會發現，鮮活的具體案例，往往較理論上的分析來得更易讓人理解。基於這樣的考量，我們在第六章裡蒐羅了更多名士的名字，來藉以說明人們於日常生活裡，對於頭銜與其他命名元素的實際安置。這方面可舉的例子實在很多，惟本章中所用者，則應已將各類代表性的範例都涵括在內了。

在結論的最後一章，我們會以闡述幾個模式已經穩定之命名與稱謂體系，來作為本次探索工作的結束。而另一方面，我們其實仍留下了相當多於命名及稱謂上猶待決奪與具爭議的案例，這些案例則多來自於印尼。本研究不僅只是在指出命名結構與稱謂上的不一致，手冊的最後一章，更要為那些無助的讀者們，提供

一些指引的方向。

第二章 命名系統、發音規則及拼寫上的變異

姓名的結構及其素質 (quality)，是一套命名系統裡的關鍵構成部分。它無疑是一種文化的產物，因為個人姓名作為象徵性符號，其意義必源自於群體本身的信仰與習俗。因此名字裡所蘊含的象徵意義，自然只對同一文化體的成員來說才會顯得獨特。這一點就與那些為求行政上的便利而賦予的數字化「名字」——如國民身分證號或更廣為人知的 R2D2 碼號，形成鮮明的對比。

一個人的名字在任何文化底下，都足以讓我們窺曉以下問題裡的部分或全部之訊息，那就是：這個人的家庭關係（性別、兄弟姐妹裡的出生排行、親子淵源及其他），父母對他／她的期望（希望自己的孩子長得優雅、可愛、忠誠，或甚至是為他們的下一胎帶來所期待的特定性別），人們對已逝者的祝願（就諡名的情況而言），或者這個人在其社群裡的社會地位（是否為皇族、貴族或名門望族之成員）。這些個人名字裡所承載的象徵意義，或許僅僅就以一詞呈現，但也可能是透過一長串的字詞來加以表達。若是後者，一旦為求使用上的方便加以重組，則該名所蘊含的象徵意義，可能就此蕩然無存。換句話說，如果像“God have mercy on Jones”這種長句式的個人名字被重組成“Jones mercy on God have”，那這個名字自然就無以解讀了。

回顧有關於命名系統方面的人類學研究，Yang (1966) 首先揭示了各命名系統的複雜與分化情形。然而就我們當前所欲探究的範圍來說，討論三個主要而相異的命名模式，就已足夠。這些模式，首先就是與父祖姓氏一脈相承的「本名—姓氏」傳統 (gn-sn or the Patronymic convention)。這項傳承下的個人名字，不論是名前姓後還是姓前名後，都仍可以被清楚地區辨為「名」與「姓」，而大部分歐洲人的名字，皆從屬於此。

其次，某些文化裡的群體，則選擇只取一「名」或一「姓」，而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純粹本名」(gno) 系統。印尼歷史上第一位同時也是唯一一位的總理哈達 (Hatta) 其名，就是一個範例。哈達的全名雖是 Mohammed Hatta，但 Mohammed 在這裡其實只是一個宗教意涵的前置詞 (religious prefix)，並非其個人名字裡的一環。

至於第三套命名系統，則是一個人的本名與其父之本名相聯 (gn-gn)，但與此同時卻不置姓氏。以 Marina Mahathir 這個名字為例，Marina 是其本人的名字，而 Mahathir 則為其父之名。而若三代相聯，那她的名字就會是 Marina binte Mahathir bin Mohamad。

在某些文化裡，那些足以顯示一個人社經地位的榮譽頭銜、誕生地以及部族

或宗族上之認同，也都可能成為名字的一部分。儘管人們大可提出許多理由，來合理化自己將一個與地位相關之稱號融入本身名字裡的行為，但嚴格說來，這些轉化後的稱號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個「家族姓氏」(family name)，而非絕對的「姓氏」(surname)。一個家族姓氏往往只能廣續一至數代，且常只限於當前直系的家族成員。另一方面，一個絕對的姓氏則可依子孫之繁衍，由所有的相關家族代代廣續下去。換句話說，在一段長僅數代的時間架構裡，姓氏與家族姓氏的概念，往往是可以被交替使用的。在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那三套命名系統中，單名（純粹本名）與「本名—本名」系統的使用成員，其實是比較熱衷於將其地位稱號轉化為名字之一環。造成這類現象的部分原因是，隨著族群人口的增加，可用以為名的「字庫」往往也會因此顯得寒慙不足。這些由地位稱號轉化而來的名字，將有助於為個別的成員建立其新認同。

在傳承父祖姓氏的「本名—姓氏」系統裡，最簡單的一種呈現方式，就是將一個人的本名與其姓氏相聯。也就是說，一個完整的名字要由至少兩項命名元素所組成，其中本名(given or first name)置於左側，而其姓氏(surname or last name)則擱在右邊。舉例來說，William 是莎士比亞的本名，而 Shakespeare 才是他的姓氏。莎士比亞理當被正式與正確地稱呼為 Mr. Shakespeare，而不是 Mr. William。至於在私底下，他則會是別人口中的 darling William，而非 darling Shakespeare。

中華文化採用同樣的「本名—姓氏」系統，只不過名與姓的位置恰好就與前述情形顛倒罷了。在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越南人以及其他許多同受中華文化薰陶的群體內，一個人的姓氏會被擺在本名之前，且姓氏後面所銜接的，大多就是由兩個單字所構成的本名(Zhang 1987)。當一位日本人的名字是以本身的日本語文來呈現時，「姓氏在前」已是他們的一項慣例。而同樣的這個名字若改以羅馬字母之形式出現，則姓氏就會被移置到後方，以避免引起外人（尤其是西方人）稱謂時，不必要的尷尬。至於華人方面，倒是對於他們羅馬化姓名的寫法沒有一個正式規範，比較例外的只是那些受過西方教育者，會傾向以連字號(-)將他們那兩個字的本名串連起來。

就馬來—伊斯蘭文化而言，子名就須與其父名相聯。至於其中本名與家族姓氏相聯的組合，與其說也是一項傳統規範，倒不如視其為特例來得貼切；且這類命名型態於一般平民百姓裡的風行程度，遠不及貴族家庭。以 Ibrahim Hitam 這個名字為例，此人既是 darling Ibrahim，同時也是 Mr. Ibrahim。但若稱呼他為 Mr. Hitam，習俗上即等如是在呼喚其父，對他來說也是一種冒犯。而當我們碰上太多的人都在使用這同一個名字時，為了區辨兩位 Mr. Ibrahim，我們才需進一步將他們的本名與其各別父親的本名——如 Hitam（黑）或 Puteh（白）相聯，即可了然。

東南亞諸社會裡少數於人口數量上亦不容小覷的族群，採用的則是只有一個或兩個本名的「純粹本名系統」。在印尼，許多爪哇人、巽他群島及峇里島人都

是僅有一名，蘇哈托（Suharto）就是一例。他既可以是 darling Suharto，當然也是 President Suharto。不過在這個體系底下，一個人倒是可以於原名之外，再自擇喜好的名字附加其上。

在「純粹本名」與「本名—本名」的命名系統之下，一個人的身份，有時候不免會因同名者眾而令人感到混淆，此時對於原名之外所另作的添前補後，就應當很有幫助。這就是為什麼一個普普通通的名字如 Ibrahim，一旦附加其頭銜，那人物辨識上的獨特性馬上就能獲得提高。所以 Tengku Ibrahim 與 Datuk Ibrahim 可以讓我們一看就知道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遑論無頭銜的普通人 Mr. Ibrahim。所以附加的頭銜愈多，自然有助於我們更輕易的去區辨那些擁有簡單而又大眾化名字的人。以下所舉二例就是旨在說明這一點，我們當可從中看出，兩個人的全名若要完全一致，那還真是頗不容易。這兩個具學習效果的例子是：

a) YB Pehin Orang Kaya Datu Imam Dato' Paduka Seri Setia Ustaz Haji Ahmad bin Prof. Dr. Tan Sri Datuk Patingi Mohamed Ramli

b) Kebawah Duli Yang Maha Mulia Sultan Pahang Sultan Tuanku Haji Ahmad Syah Al Musta'in Billah Ibni Almarhum Sultan Abu Bakar Ri'ayatuddin Al Mu'adzam Syah

「純粹本名」及「本名—本名」系統於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維繫得相當穩定。但如今它們卻都已顯露出躁動的跡象，以致情勢逐漸變得紊亂。這當中最糟糕的一種情況，莫過於親子兩代間的子名、父名，竟都已經聯不起來。此類混亂情勢下的一位著名受害者，就是印尼總統阿都拉曼（Abdurrahman Wahid）。阿都拉曼的大名，對其所領導的「伊斯蘭聯盟」（Nahdlatul Ulama）組織裡那約三千萬名追隨者來說，早已十分親切熟悉，但如今他卻是同時以好幾個名字而為世人所知。有時候他被稱作 Mr. Abdurrahman，但有時候，他卻又被喚作 Mr. Wahid（也就是 Mr. Abdurrahman 的父親），但他也更常被直呼為 Abdurrahman 或 Gus Dur。同樣地，印尼「穆罕默底亞」（Muhammadiyah）的那位前領導人，以往總是以 Dr. Amien 之名為其逾兩千萬的穆斯林會員所熟知，但如今他也已在世界多處，被人以其父之名——Mr. Rais（芮斯、萊益士、拉耶士）來加以稱呼。這就如前述 Nawaz Sharif 家庭成員裡的情況一樣，已經不單只是一項稱謂上的問題，而是進一步演變成命名上的問題了。

我們在處理某些東南亞人物的姓名時，一廂情願的英語化作法及中譯過程裡可能出現的某些毛病，確實都已經造成了命名系統辨別上的混淆。這裡遂有必要先向讀者簡述馬來語文於發音及拼寫上的一些基本規則。

就基本的文法及發音而言，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國語（Bahasa [language] Malaysia and Indonesia）本系出同門，都是植根於所謂馬來語（Bahasa Melayu）的文化傳統，而馬來語同時也是新加坡與汶萊兩國馬來族群的通用語言。

已經羅馬化的馬來語就和英語一樣擁有 26 個字母，其中也同樣存在 5 個母音。以下所列，就是與這些母音相關的發音規則：

母音	發音說明	舉例
A	音 ah，或說同於英文 Eva 而非 table 一字中所發之音。	Ma-ha-thir
E	音 ay 或 er，同於 age 或 ago 兩字中所發之音。	Megawati, Orang Besar
I	音 yi，同於 employee 及 river 兩字中所發之音。	Ali, Marzuki
O	音 ore，同於 bore 而非 old 一字中所發之音。	Suharto
U	音 woo 或 wu，同於 bull 而非 music 一字中所發之音。	Harun, Tanjung

除發音上的差異外，馬來語在發音時於聲音的控制上也和英語不同。這方面典型的情況即送氣音與喉塞音之部分，尤其是那些最後一個字母為 b, p, d, t, g 或 k 的語彙。我們在英語中讀 pub 和 tip 這兩個字時，總是要先緊抵雙唇，再啟口驟發輕聲。所以 pub、tip 兩字一旦經過中文音譯，往往就會唸來像 pub-ber 和 tip-pu，而且因為中文是單音節，pub-ber 和 tip-pu 都會被各以兩個字詞來代表。然而在馬來語中，發音者對同樣的這兩個子音卻只需緊抵雙唇，不必再啟口驟發輕聲。譬如說 Wahab 這個馬來字其實應該唸作 wa-harb 而非 wa-harb-ber；同樣的 sedap 就應唸作 sir-darb 而不是 sir-darb-pu。

在英語中若碰到以 d, t, g, k 為最後一個字母的語彙時，發音者就必須先拉開他們的那兩排牙齒，並依各子音的不同性質送氣。這種送氣音在中文音譯裡，一般早有約定俗成的字詞來加以表達。譬如 Clark 這個字就會被譯作「克拉克」(ke-la-ke)，而 Fullbright 則會被譯成「傅爾布萊特」(fu-er-bu-lai-te)。ke 與 te 這兩個送氣音，就如「傅爾布萊特」一詞中由 fu 至 lai 之間所填的兩個字一樣，也會各由一個完整的字來加以代表。反觀在馬來語中，以這些同樣子音作尾的語彙，在發音時就無須送氣，而且相反地，這些子音還會因其抑音作用造成一種喉塞音的效果。因此這類具抑音作用的字尾子音的存在與否，就會造成唸法上的不同。譬如 kaka 一字唸作 ka-ka，當中的那兩個音節發音輕重一致，音長也一致。然而 kakak 一字，就應該被唸成 ka-kark。由於 kark 音節為一喉塞音，所以這個音節的音長，就不免會因我們喉部（而非嘴部）陡然打住的動作而變短了。依循這類發音的規則來看，Mubarak 這個人名其實應該是被譯作 mu-bar-rug（其中‘g’的尾音也應內斂不吐）而非 mu-bar-la-ke（穆巴拉克）。同樣地，Razak 此人其實應被喚作 rar-zuck（原名裡的那個‘k’並不送氣），而 Saddam (Husain) 則是 sar-daum（原名裡的那個‘m’也不送氣）。其他同類型的例子，還有如 Sarawak 不應被唸作 Sa-ra-wa-ke，而 Perak 也不該是 Pee-li-ke。

除此之外，馬來語當中還有另一項與含有‘ny’及‘ng’之語彙相關的基本發音

規則。雖說當代以來，許多馬來人和印尼人本身，或許也已不再嚴格遵循這項規則，但作為這方面的學習者，我們當務求精確理解。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有著那麼一群被喚作 Baba(峇峇)的社會群體，這個群體裡的女性成員，就是 Nyonya (或 Nonya, 亦即中文裡的「娘惹」)。如今人們大多雖已將 Nyonya 唸成了 Nona, 但娘惹一詞的正確讀法，其實是帶有濃重鼻音的 Nion-nia。事實上，Nyonya 指的是「婦女」，而那些仍未婚的女孩子們，才是 Nona。換句話說，對此若發音不正，恐就不無冒犯。這裡尚可舉的例子還有新加坡的原名 Singapura，該地名其實應該被唸作 Sing-nga-pu-ra 而不是 Sing-ga-pu-ra。

最後一項值得我們一提的發音規則，則是與 ber、per、ker 這三個音節有關。ber 與 per 都是現代馬來語文裡常用的字首，而 ker 則是出現在某些名詞與名字當中。這三個音節都不能像英語中的 ber、per、ker 一樣發音，譬如馬來語裡的 per 就和英語 *percent* 或 *perfect* 中的 per 發音不同，而是應唸作如 *prospect* 中捲舌的 pr-er 音。在這裡 Peranakan、Keramat、berumur 等等，都是馬來社會及文化生活裡常常出現的字眼。

至於談到馬來人與穆斯林名字上的拼寫，內行人其實都很清楚，一個已經伊斯蘭化的名字，其實是可以依據每個國家語文裡的不同需求，而有稍微相異之拼寫與讀法的。譬如伊朗人、土耳其人與巴基斯坦人雖也冠用伊斯蘭名字，但卻沒有百分百完全按照阿拉伯文裡同樣名字的拼寫或讀法。同樣的道理，一個同樣的名字擺在印尼語和馬來西亞語的不同脈絡裡，雖仍保有其阿拉伯原義裡的特定內涵，但還是可能出現於拼寫及讀法上的些微差異。一個我們熟悉的例子就是：Abdul Rahman 其實也可以被拼寫成 Abdurrahman，且如此一來，它在讀法上就會出現些許差異。至於 Hussein 這個名字的變體則有 Husain、Husin、Hoseyn，而 Syed 這個尊銜也與 Syyed、Sayid 的讀法相近。印度一個著名的種姓 (caste) 或家族姓氏 Chaudhri 也是不乏其他版本，那就是 Choudhry 與 Chowdhury。至於他如 Mohammed 等在拼寫上的變異，我們還會於下文的相關敘述裡提到。

華人的姓名於拼寫及讀法上，也是不無歧異。大陸上的中國人以漢語拼音系統來處理他們的羅馬化名字，而台灣方面的中國人或台灣人，使用的則是威妥瑪式的注音方法 (Wade-Giles system)。對華人來說，他們的一個主要關切便是：中文名字一旦經過羅馬化，其原所蘊含的真實意義，就會無法得到彰顯。然而即便如此，我們於中文名字的羅馬化方面，還是連一個公認適當與權威性的體制都找不到。東南亞華人的羅馬化名字尤其沒有一個固定章法，既表現得高度的個人化，也深受當地地方語言之影響。這裡頭的每一個名字，除姓氏及足以彰顯手足關係的輩名外，都是依據父親本身的方言——如廣東或福建方言——來直接加以音譯的。在這方面，香港和澳門兩地的華人居民倒顯得非常一致，因為他們的規則幾乎只有一個：那就是以廣東方言的發音，拼寫他們的羅馬化名字。

除此之外，荷蘭語就如同殖民時代裡的另一種強勢語文——英語一樣，對其

所曾殖民過的印尼人與印尼華人名字上的拼寫與讀法，也留下了顯著影響。舉例來說，Jakarta、Sukarno 與 Lin Shao-liang（林紹良）三字，在荷印時代，就是被分別拼寫成為 Djakarta、Soekarno 與 Liem Sioe Liong。

第三章 文化遺緒的源頭

由於在方法學上，我們無可避免地會需要到一個能夠辨別命名系統變異與否的判準（criterion），所以讓我們現在就先從這裡著手。取得一項判準的方法當然很多，而其中一途，就是直接採納現有的既成判準。我們在本章裡，將把關於這項判準的探尋之旅，對準那兩個文化擴散的源頭——阿拉伯人的世居地及南亞。所以換句話說，本章討論所涵蓋的，不僅僅是島嶼東南亞地區的馬來—穆斯林人口，也包括了印度人及某些重要的土著族群。至於一般東南亞華人的命名系統，除已皈依回教者及所謂的「土生華人」（Peranakan Chinese）群體外，將不在此多作討論。之所以作這樣的排除，主要是考量到漢民族「姓前名後」的歷史傳承早已悠遠得不可考，而其海外移民，似乎也未大幅偏離祖宗所留下來的這套體制。

（一）阿拉伯名字與阿拉伯化之名字

一如印度的宗教與文明對東南亞諸社會所造成的顯著影響，伊斯蘭這個隨後才經由阿拉伯人與印度穆斯林散播至此的宗教文明，於十五世紀之際，席捲了整個島嶼東南亞地區。所謂馬來—穆斯林式的姓名結構與內涵，說起來其實就與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土耳其人的命名系統十分近似（Schimmel 1989: ix-xii, Ahmed 1999: ix-xvi）。

回顧廿世紀以前的阿拉伯地區，曾經散佈著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葉門、波斯、土耳其、伊拉克、巴勒斯坦與大約旦（Transjordan）諸國，當時大多數的阿拉伯人，都未擁有永久性質的姓氏或家族姓氏。他們沿襲的是「本名—本名—本名」的命名傳統，也就是先將個人名字擺在前頭，次將父名置放中間，最後才排放祖父之名。而某些出身貴族世家者，甚至還將其曾祖父之名也一併列在名字當中。然而自廿世紀伊始，這些阿拉伯國家裡部分就已開始在其憲法中，明定人民採行內含家族姓氏的「本名—姓氏」系統。這些國家包括土耳其（自 1926 年始）、伊朗（自 1932 年始）、黎巴嫩、約旦與埃及（自 1970 年始）。然而我們其實仍不十分清楚約旦與埃及兩國在這方面的進展如何，因為有關其命名系統方面的報導，依然存在不少矛盾衝突。穆斯林大多仍繼續採用伊斯蘭名字作為本名，並將它置放在那些衍自個人的居留地名、部族名號或宗族名號等等的家族姓氏之前。

至於那些仍舊採行「本名—本名」系統的阿拉伯國家，則有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亞、阿曼（Oman）、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及葉門諸國。名字變換的遊戲已

經在某些阿拉伯國家當中展開，但把原初的「本名—本名」系統先提出來作為一個參照架構，無疑將更有助於我們的理解。

在「本名—本名」系統之下，最簡易的三代聯名結構，可以【表二】中的 Saud ibn Mohammed ibn Mukrin 這個名字為例。而就在這同一個表裡，我們還可以找到另一個四代聯名的案例：Prince Al-Waleed ibn Tallal ibn Abdul Aziz (ibn) al-Saud。其中 ibn（或 ibni、ibn，或僅簡單地以‘b.’表示）意味著「某某人之子」，而 binti（或 binte、bint、ibnat）則表示「某某人之女」。相當明顯的是，一旦前例裡提到的那個皇室家族決定將目前所行之「本名—本名」系統轉換為「本名—姓氏」系統，則‘al-Saud’一詞，就勢將演化成為其家族姓氏。

除沙烏地阿拉伯的皇室家族外，我們其實也可以在阿曼人那裡，找到這類傳統命名習慣下的代表性案例。譬如阿曼駐荷蘭的那位女性大使，名字就叫作 Khadija binte Hassan bin Salman al-Luweti，也就是說在其正式全名裡，父親、祖父與曾祖父之名皆列其中。

阿拉伯人大多都使用伊斯蘭名字，但這些伊斯蘭名字，也有單一或複合形式之別。【表二】裡所列出來的少數名字中，Faisal ibn Fahd 和 Abdallah ibn Fahd 就是典型而單一形式的伊斯蘭名字，但其祖父之名 Abd al-Aziz，卻是複合形式的伊斯蘭名字。‘Abd’或‘Abdul’或特別是‘Abd-ul’，在這裡意味著乃 Aziz 之「僕人」（the Servant of Aziz），而 Aziz 則是全能阿拉（Allah）的九十九個化名之一。至於其他構成複合式伊斯蘭名字的一般接語，還有 Abu（如 Abu-Bakar）和 Mohammed（如 Mohammed Ali）等。此外，Abdul-Rahman 也是個非常普遍的伊斯蘭名字；而一個更常見並富宗教意涵的字尾，則是 Syamsudin 和 Baharuddin 等名字裡的‘din’。

當然，我們於傳統風格的本名（ism）之內，也不難找到各類變型。這些變型有的涉及實質內容上之更易，有的則與名字的結構相關。至於變化之起，主要則與個人所選用的假名（kunya）、綽號（laqab）、關係名號（nisba，如出生地名、居留地名、社會階級或甚至對德高望重者的讚頌之詞）等附加名字有關。某些假名及關係名號時間一久，已經演化成為一個家族姓氏，也因此部分阿拉伯人——尤其是貴族群體內之成員，確實已經擁有其本身的家族姓氏（Schimmel 1989: 11-13）。除此之外，與伊斯蘭直接相關的頭銜，往往也會構成阿拉伯人名字裡的一環。這裡頭常見的一個，就是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 Ali）之後裔所使用的‘Syed’。另外一個字首‘Sheikh’則意味著此人乃阿拉伯人後裔，也因此對於本土阿拉伯人來說，較無意義。

在早期，某些阿拉伯名士是以其家系（nasab）上的親子關係標示詞‘Ibn’（或對波斯人來說，persar/pur）及與父親名字的結合，如 Ibn Rshd 及 Ibn Khaldun 等而為人所知。伊朗的現任總統就是以 Ayatullah Khatami（Ayatullah 乃是一種宗教尊銜）之名為人所知，但他的全名其實是 Ayatullah Mohammed Khatami。至於伊

朗的首任總統也普遍是被外界喚作 Ayatullah Khomeini（科梅尼，見【表三】），而其全名則是 Ayatullah Rahollah Khomeini。以上兩人之名，看來都是依循著「本名—姓氏」系統。伊朗常見的部分姓氏有 Sharifi、Daryush、Jamalzadeh，以及複姓 Kuni-Kermani（Khumayni）等等。

利比亞總統卡達菲（Muammar Gadhafi）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的領導人阿拉法（Yasser Arafat）等首腦人物，似乎也各有其家族姓氏。關於這類姓名結構上的轉化之所以發生，事實上存在不少解釋，惟不論我們樂見與否，「受到西方文化影響」仍是其中較令人信服的一項理由。許多阿拉伯領導人似乎正經歷一場姓名蛻化的過程，當然如此一來，勢將讓人更難以區辨姓、名之間的分野。

伊斯蘭於許多阿拉伯人社會裡都具有「國教」之地位，同時也在印度、孟加拉、土耳其、摩洛哥與巴基斯坦等國的特定區域裡扮演主導角色。而由「本名—本名」至「本名—姓氏」系統的轉換，在這些區域裡似已漸成風潮。所以我們當可合理預期，那些源自於阿拉伯文化傳統的東南亞人名字，也將於某種程度上隨著發生類似演化。

（二）南亞人的名字

想要深究南亞人姓名上之種種，並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所以為簡略快速地作一參照，我想只提供讀者們如何區辨一項命名結構裡名／姓分際的必要資訊，應該就已足夠。一般用以區辨命名結構的各項方式往往過於理論，以致於實際的應用上並無大用。然而前文所提到的三項命名系統——即「本名—本名」、「本名—姓氏」及「純粹本名」系統，看來就已能夠充分涵括南亞人姓名上的諸般情形。

所謂南亞地區，包括了孟加拉、喀什米爾、巴基斯坦、印度及斯里蘭卡等地。在前述之每一個國家裡，我們不僅可以找到分佈不一的印度教徒、佛教徒與穆斯林人口，亦不乏差異極大的各語言及族群群體。當然，並非所有主要宗教群體之成員都共同享有一個通用的命名系統，這對所有語言群體而言亦然。一般說來，印度教徒與佛教徒都擁有本身的姓氏，而穆斯林方面卻只有少數採行「本名—姓氏」系統。前者於斯里蘭卡、印度及喀什米爾據有主導地位；而後者的勢力範圍，則是落在巴基斯坦、孟加拉與印度的許多地域。

整體而論，印度教徒與佛教徒都傾向於將他們的名字與其信仰文化裡的眾神相聯，而穆斯林方面則滿足全能阿拉的那九十九個化名。當宗教方面之影響落於姓名的結構上時，它往往經由允許額外命名元素的融入，讓一個單名演變成複名（compound name）。而另一方面，宗教也為印度教徒將其種姓階級之名銜與頭銜轉化成為姓氏之舉，提供了正當性。

對於那些擁有姓氏的穆斯林而言，其姓氏若非衍自次族群層次的家族姓氏，如 Chowdhuri、Siddiqi、Bacha、Malik、Pala、Rafiqi 和 Sofi，就是來自於頭銜如 Khan、Shaikh，或居留地名如（巴基斯坦的）Islamabadi。由於這些伊斯蘭姓氏

都是經由衍化而來，所以關於其名字裡 Darling 某某與 Mr.某某的稱呼取捨，遂總是因此變動不居。另外，如何稱呼那許多未曾擁有次族群姓氏的穆斯林，事實上也還是比處理擁有複名者來得簡單。以下將繼續談到關於複名的一些情形。

我們這裡所謂的「複名」(compound name)，指的是兩個本名經由關係標示詞 (relational indicator) 連結起來之情形。這方面較常見的標示詞有 *al*、*e*、*I*、*ud*、*ul*、*ur*、*us* 及 *uz*，功能意義上則近似於阿拉伯文裡的 *al*，即從屬於「某某家族」(the house of the family of) 之意。孟加拉人一般即傾向於將前述之關係標示詞，與排在其前而非其後的名字相聯。舉例來說，Habibur Rahman 這個名字若拆解開來，其實是 Habib-ur-Rahman，Narzul Islam 是 Narz-ul-Islam，Sayful Islam 是 Sayf-ul-Islam，Ziaul Haque 是 Zia-ul-Haque，而 Fazal Elahi 則是 Faz-al-Elahi。

北印度的某些特定語族與斯里蘭卡的僧迦羅人 (Sinhalese) 主要奉行「本名—姓氏」傳統，所以 Darling 某某與 Mr.某某的稱呼取捨，可以一點都不出錯含糊。其姓氏部分源出於各該族群之文化傳統，餘則與宗教、職業及個人的種姓階級有關。那些主要是由操阿薩姆語 (Assamese)、孟加拉語 (Bengali)、古嘉拉蒂語 (Gujarati) 及北印度語 (Hindi) 者所組成的北印度人，確實擁有本身的姓氏。這些姓氏當中較普及者，則有 Adhya、Badakar、Barua、Bhatia、Bose、Chatterji、Chopra、Chowdhuri、Datt、Ghose (Ghosh)、Kapur、Mitra、Sengupta、Sinha 與 Uppal。

就北印度人群體裡的那些印度教徒而言，其所採用之姓氏，必須相稱於本身從屬的種姓階級。與三個社會最高階級相關之姓氏包括：Sharma、Devi、Trivedi、Mahapatra (主要為婆羅門或僧侶階級所用)；Varna、Sinha、Roychodhri (或 Roy 與 Chodhuri)、Ray (主要為刹帝利或戰士階級所用)；Sengupta (或 Sen 與 Gupta)、Shirisastva 和 Nigm (吠舍或商人階級所用)。所以若依循印度人之傳統，Raj Gupta 此人就應被稱呼為 Mr. Gupta 或 darling Raj。

出身首陀羅階級的人，一般而言倒沒有專屬於自身階級所用的名字，但其個別成員之名，卻可能是與實際從事的職業有關。這方面的例子有 Munshi、Nehru、Thukar (Tagor) 或 Wazir，指的都是某一種職業。

印度教徒裡其實也不乏擁有複名者，而雖然這些名字裡的某些構成部分可以被拆解分割，但其原初的排列順序卻是不容更易，更重要的是全名裡沒有一個部分可以被拿來視為姓氏 (IFLA 1980: 4-7)。以下就是這類複名的一些例子：Ram-Das、Rajedran-Prasad、Bharat-Chandra、Hira-Lal、Annada-Mohan、Chandra-Sekhara 及 Anil-Kumar。

至於佛教徒人口——尤其是僧迦羅人，自英殖民時代起就已追隨英國人「本名—姓氏」系統之傳承。這當中部分著名的姓氏有：Bandaranaike、Chandananda、Coomaraswamy、Jayewardene、Kumaratunge 與 Premadasa。

在南印度人方面，包括口操坎納語（Kannada）、馬拉耶拉語（Malayalam）之群體及特別是在印度與斯里蘭卡兩地的淡米爾人（Tamils），使用的都是「本名—本名」系統。而與阿拉伯人於同類系統下子名、父名相聯之情況類似的是，淡米爾名字在這方面的表現形式，若不是 X-s/o-Y（X 為 Y 之子），就是 X-d/o-Y（X 為 Y 之女）。因此一位叫作 Balakrishnan s/o Nathan 的淡米爾人，既應被敬稱為 Mr. Balakrishnan，當然同時也是 darling Balakrishnan。至於其女 Kamalan 的全名，就會是 Kamalan d/o Balakrishnan。

此外，淡米爾人是以相當多元的方式呈現其名字。這當中一種常見的形式，就是將父名置於左側（大多僅是以第一個字母簡示），然後才接續本人之名。至於那些希望藉由名字彰顯其先人之職業、誕生地或居留地者，也可能會將這類相關的名號（大多也只是以第一個字母簡示）先置於父名的左側，然後才同樣接續本人之名。譬如 Nehru Antal Pillai（或 N. A. Pillai）這個名字，Pillai 乃 Antal 之子，而 Antal 先人的主要職業，就是所謂的 Nehru 或「運河督察員」（Canal Inspector）。無論如何，南印度人並未將職銜轉化為本身的姓氏，所以 Nehru Antal Pillai 同樣既是 Mr. Pillai，也是 darling Pillai。

口操旁遮普語（Punjabi）並信仰錫克教的錫克人（Sikhs），於本名之外，男性方面常見擁有一個喚作‘Singh’（獅子之意）的部族尾名，女性方面則是‘Kaur’（公主之意）。這類部族尾名並不相當於一個人的姓氏或其家族姓氏（Ingraham 1997: 224-225），它其實更像是如峇里島人名字裡 Bagus / Ayu 或 I / Ni 這類的性別標示詞。所以當我們稱呼 Kirpal Singh 此人為 Mr. Singh 時，事實上即等如稱呼他為 Mr. Sikh，或更嚴格地說乃‘Mr. Sikh Man’（男錫克人先生）。然而如果改稱他為 Mr. Kirpal Singh，卻可以讓他感覺到「人類社會果然是越來越知書達禮了」。他所親愛之人，毫無疑問就可以直呼他為 darling Kirpal。不過如今，許多錫克人也開始將其職銜或所尊敬的長者名字接續於本名之後，以藉此追尋更清晰的自我個體認同。

（三）中國境內的穆斯林與華人

波斯及阿拉伯地區的貿易商人，早自公元 651 年就已經由絲路將伊斯蘭傳入中國。雖然他們早期主要多集中在中國的西域——如當今的甘肅及新疆省一帶，但其中也有不少經由船運，航抵廣州、漳州及杭州諸地之港口。這些人往往將其原名型態保留下來，本身亦不擁有一個姓氏或家族姓氏，一直要到很久以後，當他們之中的某些後人基於各類不同機緣，獲致一個中國漢人的姓氏為止。其中姓「馬」的穆斯林，據說即是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後裔。至於其他擁有如「丁」、「沙」與「布」等姓氏的穆斯林，也是源出於阿拉伯地區。而即便直到今日，單從這些人的本名來看，我們仍可以輕易地溯尋至阿拉伯或伊斯蘭文化的影響源頭。由於這類移民已完整地留用了他們的漢名漢姓，所以這些名字，並無法作為與東南亞華裔穆斯林相較時的良好參照。

中國穆斯林或所謂的「回族」，說來不過只是中國境內其中一支較具份量的少數群體，而與其他族群如漢、滿、蒙、藏族一樣，擁有本身獨特的命名系統。由於有關中國少數民族命名系統的總括性研究已經有人觸及（如 Zhang 1987），以下我們將聚焦於在東南亞地區也具舉足輕重地位的漢人之情形。

中國人（或謂中國漢人）的命名系統，許多世紀以來，就已是沿襲著「姓前名後」之傳承。其姓名結構不論是原初的或音譯後之形式，看來都算簡單俐落。不過對於那些只能閱讀或接觸到漢人譯名者而言，就會被迫面對幾個棘手問題。首先，同樣一個中文的方塊字經羅馬化音譯後，就可能會出現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拼寫方式；而這也意味著中文名字裡原所蘊含的、與特定事物相關之意義情感，將蕩然無存。其次，如果一項中文名字裡共有三字，經羅馬化音譯後，卻幾乎可能出現任何順序的排列組合。舉例而言，假設我們還不知道「毛澤東」究為何方神聖，則其音譯名經判讀後，至少就可能出現以下三類情形：Mr. Mao, Tse-Tung（姓氏—本名）；Mr. Tung, Mao Tse（本名—姓氏）；以及 Mr. Mao T. Tung。「澤東」是個複名，他或被喚作「親愛的澤東」（darling Tse Tung），或被他人敬稱為「毛先生」（Mr. Mao），但「親愛的澤」或「親愛的東」，卻可能是另有其人。

如果毛澤東這個名字是以有連字號的 Mao Tse-tung 形式出現，那他就極有可能會被「本名—姓氏」系統以外之成員，正確地稱呼為 Mr. Mao。但它若進一步以 Tse-tung Mao 的形式出現，那想來就很少會有外人再對該名作出錯誤的稱謂了。而毛澤東倘再取了個 John Mao 的洋名，則西方媒體無疑將更具十足的信心來對其加以正確稱謂。

以上的檢視，說明了一般阿拉伯人於命名上仍遵循著「本名—本名」傳統，而其中只有少數以誕生地名或父名兼附親子關係標示詞作為姓氏的例外。然而從「本名—本名」至「本名—姓氏」系統的轉換，如今卻似已在阿拉伯地區的領導人圈子內蔚為風潮。至於南亞的穆斯林則主要依循「本名—本名」及「純粹本名」系統，但其中也有少數已經建立起本身的家族姓氏。

僧迦羅人、北印度人與印度教徒皆採行「本名—姓氏」系統，而南印度人則許多世紀以來，就早已奉行著「本名—本名」系統。至於錫克人則直到今日，依然忠情於他們的「純粹本名」系統。

當源頭之地的命名系統都已經顯示出蠢蠢蛻變的跡象時，我們自然也會預期在東南亞人世界裡，類似的變化也將隨之發生。然而一旦事實外於預期，往往更易撩撥起我們於理論層面的探討興致。一句中國的俗諺是這麼說的：「禮失求諸野」。這裡的「野」，如果擺在本文的脈絡裡，就可以是東南亞。不過我願再次強調，將這類現象之探討提升至理論層次並非我們當下要辦的事，如何學會區辨東南亞人名字裡的 darling / Mr. 構成部分，才是眼前亟待努力之方向。

第四章 東南亞穆斯林的命名系統與其他

在馬來西亞、汶萊、新加坡甚至於印尼、菲律賓南部與泰國南部的馬來人，從呱呱墜地的那一刻起，就已正式或非正式地成為穆斯林。依循著傳統的阿拉伯與伊斯蘭之命名系統，東南亞的馬來人或許除開菲律賓者外，都實踐著「本名—本名」的命名傳承。而在這樣一個傳承裡，姓氏原本就是不存在的。簡單的說，一個人的首名就是其本名，而他／她的次名則為其父之本名（the father's given name or the patronym）。

整體而論，馬來人名字上的本質，繫乎兩大類因素之影響：一為宗教，另一則是其世俗層面的習俗（adat，見 Yusuf 1996: 74-83）。源出於 adat 的馬來名字較不常見，且往往是與自然界（如 Osman, Jaafar）、曆法（如 Isnin, Khamis, Jumaat, Ahad）、色彩（如 Puteh, Hitam）及其他諸事物（如 Bujang, Lihat）等相關。馬來人在皈依伊斯蘭以前原信奉印度教，並具泛靈信仰與泛神崇拜的宗教實踐，因此他們的名字裡發現這類源自 adat 及印度教信仰者，並不令人感到訝異。而擁有這類名字，也並不意味著此人在其伊斯蘭信仰上較不虔誠。

源自伊斯蘭信仰的馬來名字，主要則是取材自與其信仰裡的上蒼、穆罕默德先知、先知的同輩夥伴及備受尊崇的宗教菁英們相關之「名字庫」——一個開放予世界各地穆斯林共享的名字庫。此外，由於不少阿拉伯商人早年也已在東南亞落地生根，因此其穆斯林後人若仍保有阿拉伯名字，也是件稀鬆平常的事。這類阿拉伯名字裡較引人注目的，則有 Al-Atas、Alsagoff 與 Aljunied 等。

以上有關馬來穆斯林名字上的基本結構，可作為我們進一步理解更複雜情況時的參照對象。這裡所謂「複雜」，指的不僅僅是附加名字（如假名與暱稱）所引起的問題，也包括所有已正式構成名字的一部分、經由先天之繼承或後天之頒授而來的各式頭銜。而使情況愈趨複雜的則是：名字結構也可隨族群的不同而異、社會的不同而異，或甚至國家的不同而異。回顧我們先前所作過的分類，三類命名系統（「本名—本名」、「本名—姓氏」與「純粹本名」系統）在東南亞地區都很普及，而人們往往也可以在同一個社會裡，發現它們的並存不悖。

在馬來西亞半島、汶萊與新加坡，馬來—穆斯林式的「本名—本名」系統依然佔據強勢地位，而與一小撮阿拉伯裔望族及那些更微不足道的華裔與印度裔皈依者採行之「本名—姓氏」系統並行。不過在菲律賓南部，當地穆斯林所遵循的，卻是菲國以「本名—姓氏」為基礎的命名系統（Edding 1980）。「本名—本名」系統的一項關鍵特質，就是將一個人的本名與其父之名相聯的「親子關係標示詞」（filial indicator），與此同時卻不置姓氏或家族姓氏。這類親子關係標示詞於東南亞諸社會裡，會以幾種不同的形式出現。如果當事人是男性，那麼在馬來西亞半島、汶萊與印尼地區的馬來人會使用‘bin’。不過在砂勞越，人們通行的則是‘anak’（「孩子」之意），而這個‘anak’，早年在汶萊也很普及。‘anak’適用於男女

雙性，至於‘binte’或簡寫的‘bte’，則是‘bin’的女性表現形式。至於南印度人方面，‘s/o’（son of）或‘d/o’（daughter of）就是其親子關係標示詞。

東馬來西亞（沙巴與砂勞越）眾多的土著人口當中，已經皈依伊斯蘭者也跟隨採行了「本名—本名」系統，但其餘信奉基督／天主教的教徒，卻另行「本名—姓氏」系統（Perpustakaan 1997）。至於印尼方面，統計上雖擁有高達九成的穆斯林人口，但紛歧的族群和語族團體卻多逾三百，也因此我們在其穆斯林人口內，仍可以同時找到前述那三類命名系統（當然不只三類，肯定還有更多）。在進入頭銜體制（titling system）的討論以前，讓我們就先進一步的來瞧瞧那些層次較複雜的穆斯林名字結構。

以 Ibrahim Salleh 這個名字為例，其正式之全稱 Ibrahim bin Salleh 意味著 Mr. Ibrahim 乃 Mr. Salleh 之子。而 Mr. Ibrahim 的兄弟 Rahmat 也應與這同一名 Mr. Salleh 相關，並被稱呼為 Rahmat bin Salleh。然而‘Salleh’並不能算是這兩兄弟的姓氏，它不過是兩人的父名罷了。如果 Mr. Salleh 的全名是 Salleh bin Abdul Rahman，那麼 Ibrahim 的全名為便於說明，就應是 Ibrahim bin Salleh (bin) Abdul Rahman。當然，Abdul Rahman 在這裡也非 Mr. Salleh 的姓氏，它同樣不過只是另一項「本名」罷了。

假設 Mr. Abdul Rahman 乃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的後人，則可以在名字的前頭加上‘Syed’的尊銜。由於 Syed 乃世襲之尊銜，所以其子 Salleh 及前述的那兩名孫子，也都可以冠用此銜。換句話說，Ibrahim 的全名，如今就成了 Syed Ibrahim bin Syed Salleh bin Syed Abdul Rahman。

當 Ibrahim 往後經由對國家的服務貢獻，獲頒授一項稱為 Datuk 的榮譽尊銜時，他遂又應被改稱為 Datuk Syed Ibrahim。而當 Ibrahim 完成其麥加（Mecca）的朝聖之旅後，他甚至還可以再為自己添上一項名為‘Haji’的宗教頭銜。於是現在的他，又成了 Datuk Hj. Ibrahim。然後隨著他取得博士學位並受聘任教於一家學術機構，他就可以再將本身所有的頭銜匯集而成 Professor Dr. Datuk Hj. Syed Ibrahim。

必須注意的是，Datuk 用於兩性，但 Hajjah 與 Sharifah 其實就是 Haji 與 Syed 的女性表現方式。如果 Ibrahim 有一名喚作 Hamidah 的姐妹同樣擁有上述頭銜及教育經歷，那她的全名就會是 Prof. Dr. Datuk Hajjah Sharifah Hamidah binte Syed Salleh bin Syed Abdul Rahman。

在良好地掌握馬來穆斯林名字結構上的要領後，現在就讓我們回到第二章裡所提到的，那兩個拖著一長串頭銜與名號的名字。第一個案例就是：

YB Pehin Orang Kaya Datu Imam Dato' Paduka Seri Setia Ustaz

Haji Ahmad bin Prof. Dr. Tan Sri Datuk Patingi Mohamed Ramli

以上這位先生的本名其實是 Ahmad，而 Ahmad 在馬來穆斯林社群裡，不過

是個尋常名字。就非正式的稱謂言，我們其實是可以直呼他為 Ahmad。至於其他的頭銜與名號，則可以闡述如下：

YB：這是套用於部長諸公頭上的尊銜，即「我們所尊敬的」(*Yang Berhormat*)之意。

Pehin：這是專屬於汶萊所用的一項頭銜，乃為非貴族出身的高階官員而設。

Orang Kaya：字義上即「有錢人」，或指尊貴之人。與 *Pehin* 一銜聯用。

Datu Imam：乃對汶萊地區專研伊斯蘭法的宗教與清真寺官員所作的尊稱。這裡所謂 *Datu*，作為 *Dato* 與 *Datuk* 之變形，並非一項經由頒授得來的頭銜，而只不過是相當於「先生」或非正式的「叔叔伯伯」稱謂之敬稱。

Dato' Paduka Seri Setia：這是與馬來西亞的 *Datuk* 類似之尊銜。

Ustaz：擁有這項頭銜者表示此人傳授回教知識，是個宗教導師。

Haji：已經至參加履行過朝聖義務 (*Haj*) 者。

Ahmad 的父親 Ramli 擁有一個叫作 Mohamed (或簡寫成 Mohd.) 的宗教名字；而由他名字裡的 *Haji* 頭銜來看，他一定也已到過參加朝聖。此外，Ramli 是位醫生，並於某大學任教。他也曾自砂勞越形式上的統治者 (*the Yang Di-Pertua*) 處獲頒 *Datu Patinggi* 的榮銜。這意味著他可能曾是位砂勞越居民，或是位曾造訪過砂勞越的貴賓。

我們接下來所要討論的第二個案例，主角是位皇室成員，而他的本名其實也是 Ahmad。這位主角的全名如下：

Kebawah Duli Yang Maha Mulia Sultan Pahang

Sultan Tuanku Haji Ahmad Syah Al Musta'in Billah

Ibni Almarhum Sultan Abu Bakar Ri'ayatuddin Al Mu'adzam Syah

Kebawah：即「殿下」、「閣下」(*Your Highness*) 之意。

Duli Yang Maha Mulia 或 *DYM*：這是對皇室成員的最高讚頌之詞，相當於英文中的 *His Royal Highness*，乃專屬於蘇丹本人所用之頌詞。

Tuanku：與前述頌詞相稱之頭銜，這是個可經由繼承得來的皇室尊銜。

Haji：已經至參加履行過朝聖義務者。

Syah：或 *Shah*，是一項表示「國王」(*Rajah*、*King*) 或統治者身份の後置詞。有時候 (或在別處)，它也可能會以前置詞的形式出現。

Al Musta'in Billah：一句可蘭經 (*Quran*) 經文裡的祈願語。

Ibni：即阿拉伯語中的 *bin*，但此處的 *ibni*，卻是專屬於馬來皇室所用的親子

關係標示詞。

Almarhum (Almarhom)：表示「已故的」或「過去的」。

Abu Bakar：Tuanku Ahmad 的父名。

Ri'ayatuddin Al Mu'adzam：一句祈願語。

「本名—本名」系統下的基本名字結構，並不僅僅是在馬來西亞、汶萊與新加坡一帶的馬來穆斯林人口中較為普及，砂勞越伊班 (Iban) 及卡達山 (Kadazan) 土著裡的伊斯蘭皈依者，在命名上也都是採行此項系統。

砂勞越與沙巴兩地的作者群裡，就頗多採行「本名—本名」系統者 (Perpustakaan 1997)。這當中某些人依舊使用 'ak' (即 anak) 的親子關係標示詞，如 Berayun ak Bungin、Jantan ak Umbat、Hamid ak Bugo 及 Haji Mohd. Razalee ak Goroh。與此同時，我們從少數砂勞越著名的政治與社會菁英的名字裡 (Yusuf 1996: 74-81)，也可以窺見該州內部各式命名上的變型。這些名字包括 Datuk Harris Salleh、Datu Penghulu Tawi Sli、Penghulu Abok anak Jalin、Tun Mustapha Harun、Datuk Patinggi Abdul Rahman Yakub 及 Tan Sri Datuk Patinggi Taib Mahmud Al Haj。

伊班與卡達山土著裡的基督/天主教徒並不使用「本名—本名」系統，他們遵循的是「本名—姓氏」系統。由於宗教上伊班人與卡達山人並非天生即穆斯林，所以這兩個族群裡的許多基督信仰者，至今仍是以基督教名字 (Christian name) 為名，並將他們文化習俗裡的名字 (adat name) 轉化成為家族姓氏。砂勞越的 Datu Stephen Kalong Ningkan，沙巴的 Datuk Jeffrey G. Kitingan、Datuk Seri Joseph Pairin Kitingan、Puan Mary Kinti 及 Datuk James Peter Ongkili 等人名，皆屬此類。

在印尼，我們當可發現不少命名系統的共存。該國於人名稱謂上主要由於族群、文化與宗教方面的眾多紛歧，情況可謂超乎想像的複雜。所以讀者們得以從這本手冊裡汲取的不過是些有限的概論，甚至只是侷限於某些特定的命名系統。一般而言，印尼地區的命名規範，乃是於宗教上的規定與各族群本身的風俗習慣之間擺盪。馬來西亞的馬來社會與伊斯蘭文化，在「本名—本名」的命名系統上，就有著相當良好的調和。但在印尼，其命名系統卻是隨地域與各族群的習俗而異。某些穆斯林固然採行「本名—本名」系統，但他族的另一些穆斯林群體，如巴達人 (Bataks)、武吉斯人 (Bugis) 及峇里島人，卻更傾向於使用本身的宗族名稱，來作為一個相對穩定的家族姓氏。峇里島民的許多名字都顯示出印度教與佛教文化的強大影響；而巴達人裡的基督教信仰者，卻喜好將他們的基督教名字，置放在宗族姓氏的前頭。

「本名—本名」的命名系統，於印尼亞齊省 (Aceh Province)、蘇拉威西 (Sulawesi) 北部及中部、馬鹿古 (Maluku) 和日惹 (Jogjakarta) 等地的穆斯林圈子內相當普及，而這些地區都曾是伊斯蘭蘇丹體制運作下的轄區 (Lee 1995)。

以下所舉的一些印尼菁英 (Sung 1981)，如 Dr. Abdul Gafur、Prof. Dr. Sutan Takdir Alisyahbana 及 Drs. Harun Al Rasyid Zain 諸人，大概都具有穆斯林之身份，而他們的名字就是依循著「本名—本名」系統。但另一方面，許多爪哇島及巽他群島上的穆斯林，卻是採行「純粹本名」系統。

爪哇人的命名自成一個獨特體系。在這個體系之下，一個人可以只擁有「單名」(mono name)，或是由兩個單名所共同組成的「雙名」(duplex name)。在雙名的傳承上，尤其是於貴族階級 (Priyayi) 社會裡，第一個名字乃承自本人誕生之時，而其次名或「成人之名」(adult name)，則有待將來此人在社會上已經取得某種社會地位後，才有自取之需要 (Koentjaraningrat 1985: 236-237)。所以換句話說，要不要為自己取個次名，完全取決於個人。某些人終其一生，就以一個單名為滿足。採行這類單名系統的印尼菁英，包括以下諸人 (Sung 1981)：Prime Minister (Mohammad) Hatta、President Suharto、President (Achmed) Sukarno、Dr. Sumarlin、Lt. General Sudharmono、Prof. Dr. Subroto、General Sapardjo 及 Mj. General Mudjono。在這類單名系統之下，darling 某某與 Mr.某某的稱呼取捨，自然就不構成問題。

至於像 Bambang Subiarto 這一類的雙名究該如何稱謂，則直到目前為止於相關學者之間，對此仍未達致一定共識。雙名裡的其中一名承自誕生之時；另一名則是由個人於生命歷程裡的稍後階段，為自己所擇取。在受過教育的群體當中，取個次名可說是相當的稀鬆平常。以前例的 Bambang Subiarto 來說，新聞報導裡都稱他為 Mr. Bambang，而 Mr. Bambang 自己也會告訴你他比較喜歡用 Bambang 之名，但外國人卻總還是要喚他作 Mr. Subiarto。如果你跑到街上去隨意問問那些爪哇人，他們中的大多數將會告訴你，喚他們作雙名裡的哪一個名字，其實都沒什麼不可以。但這兩個名都僅僅是「本名」而非姓氏或家族姓氏，並終其一生不會改變。而如果前例裡的那位先生選擇 Henry 而不是 Bambang 作為其成年後的個人名字，那我們就應稱他作 Mr. Subiarto 而不是 Mr. Henry。不過除娛樂界及演藝圈人士外，選用一個如假包換的西式名字作為自己的「成人之名」，在此倒還沒有蔚為風潮。

Megawati Sukarnoputri 這個名字，可以為我們在兩方面提供一個大致的理解。首先，Sukarnoputri 很可能就是此人承自襁褓時期的名字，而 Megawati 則是迨其成年後才自取之名。其次，就結構而言，依據西方由左至右的閱讀習慣，Megawati 之名總是會排在 Sukarnoputri 之前。所以她既是 Ms. Megawati，也是 Wakil President Megawati (梅嘉瓦蒂副總統)。印尼人私下則稱她作 Mbak (Embak) Mega，亦即 Madame Megawati 的意思。

除了本身數逾三百的族群及語族群體外，來自其他偉大宗教如佛教、泛基督教、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影響，也都共同造就了印尼命名系統上的紛歧。舉例來說，Bima、Karna、Matswapat 及 Nakula，就都是印尼境內相當普遍的印度教名

字。穆斯林的名字一般而言遵循著伊斯蘭方面的相關規定，但在拼寫上卻是隨不同的穆斯林社會而異。而源自部族與宗族的名字，在那些世居於蘇門答臘（Sumatra）北部、巽他島、馬鹿古、西伊利安（West Irian）和蘇拉威西北部及中部的印尼人社會裡，則依然普及。

聚居在蘇門答臘北部的巴達人部落，乃是由不少「宗族」（clan）所共同組成，而每一宗族皆各擁有其本身的宗族姓氏。在巴達人的基督徒社會裡，非常普遍的宗族姓氏包括 Lingga、Manalu、Manik、Sihotang 及 Udjung，而巴達穆斯林方面則有 Batubara、Lubis、Nasution 及 Tandjung。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到底所謂的「宗族姓氏」（clan name），算不算得上是個具有永久性質的「姓氏」（surname）？而我們到底又是否可以稱呼 Syamsuddin Lubis 此人為 Mr. Lubis？這些問題，經過我們與宗族成員的私下面談以及宗族以外成員的討論後，卻得出不同答案：簡言之，尊稱 Syamsuddin Lubis 為 Mr. Syamsuddin 或 Mr. Lubis 都沒有問題，但宗族成員本身，卻稍微更喜好被人以其宗族姓氏來加以敬稱。不過由於印尼人普遍上更傾向以較不正式的 Pak、Bung 和 Gus 來代替正式的 Mister 敬稱，所以這方面的問題也變得較不顯著。Mister 一詞，即便是在頻密接觸得到西方人的峇里島民裡，都不風行。某些人甚至不明白 Mr. 指的到底是什麼，或誤以為它所代表的是 Meester，即荷蘭語意中的「大學文學士」（a B.A. degree holder）一詞。

如果一位印尼人名叫 Samuel Lubis 而不是 Hussein Lubis，那稱謂上的問題就簡單多了。在這類情況下，Mr. Lubis 本人就應當瞭解，既然擁有的是一個基督教或西方的名，倘被他人以這個名字來加以敬稱（Mr. Samuel），那可就不是件恰當的事了。

對一名巴達穆斯林來說，究竟是要由誰來決定他到底該採行馬來—穆斯林式的「本名—本名」系統，還是依循本身的巴達人傳統？所以到底是 Mr. Akbar 還是 Mr. Tandjung？對於那些希望保留並突出其本身貴族背景的人而言，所有置於本名之後的其他名字部分，都可能會被視為其家族姓氏，譬如 Abas Kartadinata 這個人，就應被分別喚作 darling Abas 與 Mr. Kartadinata。

雖然身在印度本土的印度人都已開始嘗試揚棄本身傳統的種姓階級制度，但印尼境內的印度文化繼承者（主要即峇里島人），卻至少仍在他們的命名系統當中，堅持這項文化遺緒。峇里島民的印度教文化傳承裡，存在四個界域分明之階級，即在拼寫上與印度本土稍微有異的 Brahmana、Ksatria、Waisya 與 Sudra 四階級。這些階級皆各擁有其常用的宗族姓氏，且為標示本身的階級屬性，每一階級成員都會各別冠上相適之「名銜」（title cum name）。這些世襲性質的名銜，我們將在下一章再予詳論，但作為名字結構之一部分者，則包括分別專屬於前三個階級所用的 Ida、Anak Agung 與 Gusti Ngurah（見【表十一】）。

基本而論，峇里島民採行的是單名系統，雖然其中也有不少人會為自己添上綽號、暱稱等以成為一個雙名。一般上，他們大多自誕生之日起即擁有一名，但

其名銜與性別標記，則拖長了他的個人全名。一位名叫 Oka 的婆羅門階級男性成員，其全名可能是 Professor Dr. Ida Bagus Oka，而另一位喚作 Nindata 的剎帝利階級女性成員，也可能是以 Anak Agung Ayu Nindata 的全名示人。而女性吠舍階級的成員 Ulyani，其全名則可能是 Gusti Ayu Ulyani。以上三個案例裡都還沒有呈現出來的，則是他們於兄弟姐妹之間的出生排行（birth order）。

首陀羅階級的成員，一般則並未擁有一個特定的名銜。他們的名字，傳統上是以一個性別標記（gender marker）為首，再伴隨其出生時的排行。四個最基本的排行都各有其代表字詞，但孩子如超過四個，則會重覆這項循環。在這裡 Wayan 表示老大，Made 排行老二，Nyoman 排行老三，Ketut 則是老四。自第五個孩子始，Wayan 至 Ketut 的排行標記會再被使用，所以第五及第九個孩子會同被標記為 Wayan，第二及第六個孩子也都會同是 Made，餘類推。這類排行標記無分男女，且四個種姓階級都有使用，只是相應的標記詞彙互存差異罷了（見【表十一】）。

峇里島人不論是何種姓階級也都使用性別標記，只是每一階級所使用的相應字詞仍不相同。以首陀羅階級成員的情形來說，男性所使用者為‘I’，女性則是‘Ni’。所以家庭裡的長子喚作 I Wayan，長女則是 Ni Wayan。而 I Wayan Budiarta 這項全名裡的「本名」，其實只是 Budiarta（見【表十二】）。此外，Budiarta 就和其他許多擁有暱稱的峇里島民一樣，也有一個喚作 Doblet 的暱名。這些本名與暱名，事實上都無法在名字的本質上，顯示孩子與父親之間的親子關係。Budiarta 的父親名叫 I Ketut Bawa，所以 Bawa 毫無疑問既是男性，也在家中排行老四。峇里島人大多信仰其本身發展得獨樹一幟的印度教，而這一點，也在他們的名字裡得到反映。幾個常見的這類名字有：Gurpanakla、Ratna、Bangkal、Shiva、Gadjah、Lemboe 與 Singa。

有些女孩子們也會喜歡在其名字前頭，添上一些諸如 Endang、Sri、Dwi (Dewi) 或 Tri 等等的漂亮名銜 (Ingraham 1997: 241-246)。這方面的例子有 ICMI 的 Ms. Tri Sutrisno 與 Dr. Dewi Fortuna Anwar。以嚴格的命名原則來看，這些裝飾性的字首，其實並不應算作是正式全名裡的一環。

對菲律賓南部的穆斯林或摩洛人 (Moros) 而言，已經有一份現成的姓氏名冊供其選擇 (Edding 1980)，所以他們採行的顯然是「本名—姓氏」的命名系統。這份名冊含有自民答那莪島西南部與蘇祿 (Sulu) 群島各省的學校孩童裡，隨機取樣整理而來的諸多人名。摩洛穆斯林中以伊斯蘭名字轉作為其姓氏者，包括 Ibrahim、Karim、Mustapha、Sulaiman 及 Yahya 諸名。至於一些常見的本名，則有 Abdurahman、Siddique、Daud、Jamil、Harun、Farida 及 Fatima 等等。

不過關於摩洛人的正確命名系統，其實仍存在一些衝突矛盾之報導。舉例來說，「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ILF) 的領導人，就曾一度被敬稱為 Mr. Salamat，但稍後卻又改稱 Mr. Hashim。而他的副手 Ghazali Jaafar 則告訴各新聞媒體，印尼總統阿都拉曼就摩洛問題即將要晤談的對手，是 Mr. Hashim（而不是 Mr.

Salamat) (ST 18 & 21.11.99)。

源於以上之討論，我們在【表五】中將把一些「非主流的」、或與島嶼東南亞諸社會裡主要的土著群體相異之命名系統，一併摘要整理進來。

為更好地理解【表五】，我們就務必要對各類型的名姓多作說明。這裡所謂的「姓氏」(surname)，既具總稱性質，也含有特定的指涉意義。作為總稱性之概念時，它與一個命名系統的大類相關；而用以指涉特定意義時，它則只與某類名姓相關。就後一意義言，「姓氏」乃是個代代相承的家系名字，而「家族姓氏」(family name)相較之下就不穩定得多，或許只能廣續一至數代。至於「部族名號」(tribal name)則屬族群—地域性質，而僅由源出於同一地域的整個次族群群體所採行，不再內分「宗族姓氏」(clan name)。錫克人在這方面，就是個極佳例子。反過來說，一個部族的內部當然也可能擁有一些個別使用的家系名姓(如印尼巴達人的宗族姓氏)，但這些次群體卻未再如錫克人一樣，共享有一個部族名號。

大多數盎格魯—薩克遜人(Anglo-Saxon)與中國人的家族姓氏，都具恆久不變的特質，也因此符合我們將其定位為「姓氏」的資格。另一方面，部族名號與種姓階級名號，相對地則顯得較不穩定。譬如由於遷徙、人口比例下降或社會流動所造成的部族規模減縮，就可能導致人們揚棄原有的這些名號。某些家族姓氏基本上只及於當前的家族成員，雖在同輩的兄弟姐妹裡一體冠用，但卻沒有傳承至他們的下一代。而下一代成員也可能另擇一項與上代並無明顯扣連的家族姓氏，再予其當下的家族成員共享。

不過讓我們得藉以區辨東南亞各類穆斯林群體的因素，並不單取決於他們所使用的名字本質，那些非關宗教的各式頭銜，一樣具有相同功能。而談到這類經頒授得來的榮譽頭銜，則直到目前為止，馬來西亞穆斯林社會裡的相關名目無疑最多。這一點，讀者們很快就將於接下來的章節裡發現到。

第五章 頭銜與稱謂

東南亞的穆斯林世界，其實是高度階層化的。尤其在馬來西亞，我們竟可以找到高達318項的各式頭銜與榮銜，包括那些性質相應的女性頭銜及各州所專屬之勳銜(Abdullah 1997, Brown 1970, Gullick 1987, IFLA 1980, Horton 1996, Perpustakaan 1980, Yusuf 1996)。這些攸關階層地位的象徵符號共可以被歸納為五大類別，其中包括經由個人成就或世襲過程得來的「他授」與「自許」(self-conferred)榮銜。以下所列，就是為快速參照這類頭銜而整理的簡易一覽表。我們的主要關切仍在姓名上之辨識，所以這個一覽表將盡量減少跨國通用的某些頭銜——如Haji、Sheikh與Syed等的重覆出現。

在馬來西亞半島

統治者頭銜：Sultan、Raja、Yang di-Pertuan Besar、Tuanku 等。

皇室世襲頭銜：Tengku、Raja、Che、Wan、Engku、Megat、Meor、Nik。

宗教頭銜：Haji、Lebai、Mufti 等。

宗教世襲頭銜：Syed (Sharifah)。

族群世襲頭銜：Sheikh (Siti)。

頒授的傑出服務頭銜：Tun、Tan Sri、Datuk、Dato' 等。

在東馬來西亞，或於該地的土著社群內部

皇室世襲頭銜：Abang、Awang、Datu、Gusti、Pengiran、Radin、Shariff、Tuanku、Wan 等。

宗教頭銜：Lemambang (Kepala / Saut)、Menang Bali、Manang (Mansau / Mata / Mengeris)。

職務頭銜：Pengkulu、Pengkulu Dalam、Mandal、Tuai Rumah。

頒授的傑出服務頭銜：Datu Patinggi、Kepala (Manok Sabong / Pugu Menoa)、Orang Kaya (Panglima / Temenggong)、Pateh、Radin、Tuai (Menoa / Serang / Kayao)。

在印尼

穆斯林皇室頭銜：Sultan、Teuku (Tengku, Teungku, Tuanku)、Pangeran、Raden、Raden Mas、Orang Kaya。

宗族世襲頭銜：Andi、Huta、Sutan、Ida、Dewa、Anak Agung、Gusti、Tubagus、Daud。

如同在大多數農業社會與原初社會裡的情形一般，前殖民時代的島嶼東南亞地區於蘇丹王朝治下，其社會階級結構可說相當的簡單，主要乃是由統治者（raja, sultan）、一般平民百姓（orang biasa, orang kebanyakan）及奴隸（hamba）所組成。高踞於這類傳統階級制度的最上層者，是冠有蘇丹名號的國王。蘇丹有權委任平民出掌那些高度受到尊崇的行政職務，如 Bendahara（相當於首相之職務）、Temenggong（警察首長）、Pengkulu Bendahari（財政大臣、幕僚長）、Laksamana（海軍大臣）及 Syahbandar（港埠主管大臣）等。這些職務的名稱，就構成了今日社會裡部分非世襲的榮譽頭銜。

馬來西亞可說是東南亞各國裡孕生最多頭銜與榮銜的國家，其中某些頭銜，甚至還是移用自鄰近的社會或族群。所以關於馬來西亞各式頭銜的清單（Abdullah 1997, IFLA 1980, Noor Aini 1995, Perpustakaan 1980），往往若不是

與他國者並列，就是會伴隨著他國相關資料的出現。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除各類透過他人頒授獲取之頭銜外，還有不少經由自授或自許而來的宗教與世俗領域之頭銜，不過這方面的情形，我們稍後再予討論。

(一) 政治與行政領域之頭銜

在馬來西亞，蘇丹們或各州的統治者們，是頒授政治與行政領域頭銜的首要權威來源。這些蘇丹們包括「最高元首」(the King of the nation，譯註：由各州蘇丹輪任)、七個各別州屬裡的蘇丹，以及另六州內的所謂「統治者」(ruler)。這些統治者是：玻璃市州的「拉惹」(the Raja of Perlis)、森美蘭州的「嚴端」(the Yamtuan [or Yang di-Pertuan Besar] of Negeri Sembilan)，以及檳城、馬六甲、砂勞越及沙巴四州裡的馬來人州元首 (the Yang di-Pertua of Penang, Malacca, Sarawak and Sabah)。某些頒授性質的最高層級勳銜、勳綬及勳章，如 D.K.M.勳銜，由於頒授的對象太過特定，已不在我們的興趣範圍之內，因此將略去不予討論。

D.K.M.勳級以下的勳銜及勳綬，乃由前述的九州蘇丹所頒授，而授勳大典的舉行，則總是擇在每年各州蘇丹歡慶其壽誕之時。在一般平民也有資格獲頒的榮譽勳銜中，比較著名的有 (依勳銜的「份量」排列，愈往後者份量愈輕)：Tun (女性受勳者或受勳者之妻則是 Toh Puan)、Tan Seri (受勳者之妻則是 Puan Seri)、Datuk Seri (受勳者之妻則是 Datin Seri) 及 Datuk (受勳者之妻則是 Datin)。不過女性受勳者的配偶卻不能連帶分享相關榮耀，所以一名女性「拿督」(a lady Datuk) 並不能為其夫帶來 Datin 或其他相應之頭銜。

Dato'頭銜是由一州的皇室首長 (即蘇丹) 所頒授，而 Datuk 則是出自於聯邦政府或那四個只擁有州長 (Governor) / 州元首而無蘇丹的州屬。這兩個詞的另一項差異是，Dato'是個舊式拼法，而 Datuk 則是新的標準拼法下之產物。

聯邦政府所頒授的勳銜中，K.M.與 D.M.N.是最高的兩個層級 (Abdullah 1997)。然而同樣的，由於其頒授對象過於狹窄，這裡也將不予討論。而在這類勳銜的排序裡再往下探尋，我們將發現許多主要是頒授予平民的頭銜。D.M.N.以下即為 M.N. (Seri Maharaja Mangku Negara) 和 S.S.M. (Seri Setia Mahkota)，獲這兩勳者皆冠用 Tun 之頭銜。再往下則是 P.M.N. (Panglima Mangku Negara) 和 P.S.M. (Panglima Setia Mahkota)，受勳者則冠用 Tan Sri 之頭銜。至於可讓人晉身拿督級人物之勳銜，則是 P.S.D. (Panglima Setia Di-Raja)。Datuk Seri 的勳級較 Datuk 來得高，該銜一般即是頒授予內閣的部長們。

對於非馬來人或那些於命名上奉行「本名—姓氏」傳統的人而言，所有這類頭銜都是擺放在男性受勳者的姓氏前頭，如 Datuk Lee。然而其配偶的情形就不太一樣，譬如其妻若名叫 Choo Mei Ling，Datin 的這個頭銜就只能與她的本名相聯，亦即喚作 Datin Mei Ling。至於馬來人方面，因為採行「本名—本名」系統，

所以並不會出現這類複雜情形。

(二) 皇室頭銜

這個類別的榮銜，基本上即具有自我歸納的特質。蘇丹本身被尊稱為 *Tuanku*，而其兄弟及甥姪兒的稱號，則是依據各州本身的稱謂傳統。在霹靂 (Perak)、雪蘭莪 (Selangor) 與吉打 (Kedah) 三州，這些稱號有 *Tunku* 或 *Tengku* (王子/公主)、*Wan*、*Megat* 及性質仍未十分確定的 *Ngah*；在柔佛州 (Johore) 有 *Ungku*；在吉蘭丹 (Kelantan) 與丁加奴 (Trengganu) 二州則有 *Nik* 和 *Wan* (這方面的例子有：*Megat Junid Megat Ayob*)。此外，在皇室與貴族家庭裡，表示父親與孩子 (不論男女) 之間親子關係的標示詞是 *ibni*，而有別於平民百姓所使用的 *bin* 和 *binte*，或阿拉伯人的 *ibn*。

表示皇室地位的頭銜，除了前置，也找得到後置的版本，那就是如 *Tengku Abdul Rahman Putera* 這個名字裡的 *Putera* (王子) 一詞。另外一例則是統治者所使用的 *Syah* 或 *Shah*，如彭亨蘇丹的名號 *Tuanku Hj. Ahmad Syah*。

在印尼，*Tengku* 這個頭銜，可能會隨地方方言的讀法而拼寫成 *Teuku*、*Tuanku* 或 *Teungku*。皇室的後裔子孫直到共和國誕生後都還不乏存活者，其中三位名重一時的人物即 *Sri Sultan Hamengku Buwono IX* (印尼的前第二副總統)、*Tengku Hassan di-Tiro* (流亡海外的亞齊省獨立領袖) 及 *Drs. Hj. Teuku Zagloel* (著名商人)。而作為歷史上曾經歷諸王朝與蘇丹制度統轄過之疆域，亞齊省還真是擁有不少其他這類的 *Tengku* 人物 (Lee 1995)。

在汶萊，*Pengiran* (或 *Pg.*) 一詞曾被用來冠用於任何蘇丹們或其他非皇室貴族 (如宰相與海軍大臣) 的男性後裔，這方面的例子有 *Pengiran Salleh*。這項頭銜也同時適用於已經嫁給這號人物的女士們 (Brown 1970)。在過去，*Awangku* 是個適用於未婚的皇室與貴族男性後裔之頭銜，而未婚女孩們所用的，則是 *Dayangku* 這個頭銜。不過現在 *Awang* (*Awg*) 與 *Dayang* (*Dyg*) 兩詞，不論族群背景，都已經成為那些擁有高級官職的平民名字裡的性別標記。它相當於馬來西亞所通行的 *Encik* 和 *Cik*，而在這裡 *Awang* 與 *Dayang* 反而只是人們的一些尋常名字。同樣的在過去，*Yang Mulia Awang* (尊貴的閣下) 之敬稱只能歸蘇丹一人所用 (如 *Y.M.A. Saifuddin*)，然而現在 *Y.M.A.* 的使用也已經延伸至高階官員，並只是用以表示「尊敬的」之意。

(三) 貴族後裔之頭銜

這方面比較著名並具世襲性質的頭銜，包括自我標榜為先知穆罕默德後人的 *Syed* 及女性所冠用之 *Sharifah*，以及標示為阿拉伯後裔但與先知家系無關的 *Sheikh* 及女性之 *Siti*。擁有 *Syed* 與 *Sheikh* 兩銜者，在社會裡都會普遍獲得敬重，因為這意味著他們從屬於有教養及富學識之階級 (Roff 1967: 39-43)。

在砂勞越以及尤其是在汶萊，*Orang Kaya* (O.K.) 及有時候可能被拿來交替使用甚至聯用的 *Pehin* 一詞（如 *Pehin Orang Kaya Awang Haji Kamarudin*），是為那些擁有非皇室但仍屬貴族性質的官職者而設之頭銜。它相當於馬來西亞半島上的「拿督」或更高級之頭銜。

砂勞越州裡的馬來人也同時使用不少自外移入的頭銜。其中 *Abang*、*Radin* 及 *Gusti* 源自印尼，*Pengiran* 和 *Awangku* 源自汶萊，*Syed* 和 *Sheikh* 源自阿拉伯與印度，而 *Tuanku*、*Paduka* 和 *Wan* 則是移用自馬來西亞半島。不過事情並沒有如我們表面上看來那麼簡單，因為這些「舶來品」頭銜的適用對象，與其在原使用地區裡所承載的意義，往往極不相同。舉例來說，在砂勞越，用以標示為先知後裔的，是 *Tuanku* 而非 *Syed*，但與 *Tuanku* 相應的女性稱謂則又是 *Sharifah*。如果一名男性自出人世即擁有 *Wan* 的頭銜，那至其長大成婚時，他將成為一位 *Tuanku*。而同樣的這個人，在其第一名孫兒呱呱墜地的那一刻起，就又被允許冠用 *Syed* 之頭銜（Yusuf 1996: 103-118）。然而另一方面，*Sharifah* 終其一生，卻不會經歷任何地位上的改變。此外，*Paduka* 這個頭銜在汶萊及馬來西亞半島都是為貴族家系者所冠用，但在砂勞越，它卻不過只是尋常百姓裡對於他人之父的一種敬稱，如表現於 *Paduka ayahanda* 或 *Paduka datuk* 等之情形（Yusuf 1996: 111）。

在汶萊，*Pengiran* 這個頭銜原是用以顯示一個人與汶萊皇室或貴族間的血緣關係，但在砂勞越，它卻是隨著銜主個人的生命歷程而更迭。如果一名男孩自出娘胎即頂著 *Wan* 之頭銜，那至其長大成婚時，他將獲晉級為 *Syed*。或者如果那名男孩出娘胎時頂著的是 *Awang* 之頭銜，那他就將於長大成人之時，成為一名 *Pengiran*。無論如何，這類案例是既不尋常也十分罕見，大多數人終其一生，就僅一貫地使用 *Awang* 之頭銜。整體而言，砂勞越人至今仍纏繞於他們那已經顯得有些怪異落伍的貴族社會結合。

Radin 及 *Gusti* 兩銜，在爪哇與峇里島民社會裡原意味著崇高之社會地位；它們皆可世襲，此外男女一體適用並可與配偶共享。但在砂勞越，這兩個頭銜似乎也已逐漸普及，而不再具有如此崇高之地位。

（四）宗教頭銜

Haji 是個由已完成至參加朝聖義務者所自許的頭銜。他如 *Ustaz*、*Lebai* (*Lebby*)、*Mullah*、*Munshi* 及 *Guru*，則是宗教職務上的頭銜。*Haji* 於女性方面的相應稱謂是 *Hajjah*。對一名傑出人物來說，他的 *Haji* 頭銜在馬來西亞就會進一步成為 *Al-Haj*，而在印尼則是 *Kyai* (*Kiai*) *Haji*。印尼現任總統之被尊稱為 K.H. Abdurrahman Wahid，即是一例。

（五）自冠 / 自許頭銜

Shaikh 或 *Sheh*：乃 *Sheikh* 頭銜在印度社會裡的變型。銜主同樣自許為阿拉

伯後裔，但僅在男性一脈的家族成員裡世襲。馬來人往往嘲諷這些人為 *Sheikh Jumaat*，即不過只是些「星期五（譯註：穆斯林的每週聖禱日）誕生的印度人」（Nagata 1979: 150）。

Sheikh Haji (Siti)：那些協助安排人們至聖域（Holy Land）朝聖的印度或印尼旅途仲介者所自許的頭銜。惟這些人本身，卻可能從未到過參加朝聖。

Sayid 或 *Syed*：為口操烏都語（Urdu）及孟加拉語之巴基斯坦穆斯林所使用的頭銜。冠此銜者自我標榜他們與聖域之淵源，但卻非先知穆罕默德的後人。

Khan (Begum) 及 *Shah*：冠用於巴基斯坦或印度西北一帶望族之頭銜。應該注意的是 *Shah*（或拼寫為 *Syah*）在當代馬來西亞可是專屬於馬來統治者的尊銜，而印尼與蘇祿群島於早期各蘇丹王朝的時代裡，亦復如此。

（六）個人成就與專業頭銜

與宗教上的專業相關之頭銜，包括 *Mufti*、*Lebai*、*Kadhi*、*Imam* 及 *Ustaz*，通常總在其前面先冠有 *Tuan* 或 *Datu* 而不是 *Mr.* 或 *Encik* 的敬稱。這方面的例子有 *Tuan Mufti Salim Hamid*。而高階專業人士所冠用的一些普世通行之頭銜，如 *Dr.*（醫生或博士）、「教授」、「警官」及武裝部隊裡的「上尉」、「少校」和「將軍」等銜，在島嶼東南亞地區也都構成為一項重要的命名元素。

印尼雖擁有悠久的歷史（有文字記載之歷史，可直溯至 1205 年時的亞齊王國），但其共和國卻似乎沒有為人民提供一長串可供冠用的世襲或宗教頭銜。自十三世紀以降，印尼境內除亞齊王國外，在日惹、梭羅（Solo）、廖內群島（Riau Archipelago）及爪哇與蘇門答臘的其他各地，也都曾出現過其他強盛的王國。而在這些王國裡，不乏提供世襲頭銜予其皇室與貴族成員的蘇丹王朝。這類頭銜包括 *Paku*、*Pengeran*、*Raden*、*Raden Mas*、*Rakai*、*Shah*、*Sultan*、*Tengku* 和 *Temenggung*。共和國成立後，前述裡的某些頭銜依然為人所冠用，但也就僅止於其歷史意義了。舉例來說，1755 年登基為日惹蘇丹王朝統治者的 *Sultan Hamengku Buwono I*（該王朝隨後並曾擴展至梭羅蘇丹王朝），就將其世襲的蘇丹王銜，代代傳到了名為 *Sri Sultan Hamengku Buwono X* 的第十代傳人。而偏好使用 *Shah* 作尾名以彰顯王者地位的亞齊王國，也孕生過不少冠有 *Tengku* 頭銜的皇室成員。

另一方面，印尼人在某些「成就類型」的頭銜上（achievable titles），卻顯得相當獨特。以下所列，就是這一類型的頭銜與榮銜：*Mr.*（*Meester*，即荷蘭語意裡的大學文學士）、*Drs.*（*Doktorandus*，指文學士和理學士。但早期在荷蘭人體制下，它卻是博士候選人所冠用之頭銜）、*Dra*（即女性的 *Drs.*）、*S.H.*（*Sarjana Hukum*，即法律碩士，通常以後置詞的形式出現）、*Ir.*（*Insingur*，在印尼與荷蘭兩地指的都是工程學士）。一般而言，一名已經擁有博士學位的教授將被敬稱為 *Professor Dr.* 某某，而無博士學位者，就僅被稱作 *Professor* 某某。

觀察爪哇人與巽他人的傳統名字，有時候還可讓我們從中辨識出一個人的社會階級或其家系淵源（Koentjaraningrat 1985: 104-105, 236-237）。某些貴族階級（priyayi class）成員所使用的名字，會掛上一些像 *kusuma*、*tanaya*、*ningrat* 或 *dinata* 之類的後置詞。這方面的例子有 Sarwono *Kusumaatmadja*、Mochtar *Kusumaadmadja*、Abas *Kartadinata* 及 Koentjaraningrat。他如男孩們所用的 Sukarno、Suroto、Suhadi 及女孩們的 Sriyati、Lestari、Kartini，亦皆屬貴族成員使用之名字。而國內與國際事件往往也都可以構成這個階級的重要命名來源，它很可能是以乳名（infant name）的形式出現，如 Merdekawati、Irianto、Christianto、Sukarnoputri 與 Mandala Putra。此外，足以彰顯社會地位的職業，也是貴族階級於命名上的另一項來源，譬如 Darma 或 Jaksa 即律師與法官們所用之名，而 Usada 則屬醫生所冠用。

另一方面，農夫們（*tiyang tani*）就會為他們的男孩子取個諸如 Ponimin、Legiman、Legiyah 或 Leginem，以及女孩子方面 Poniyah 或 Poniyem 之類的名字／乳名。Legi 指的是爪哇人「五日一週」之傳統曆法裡的首日，而 Pon 則是指第三日。如前所述，馬來人也有將他們的孩子依七日一週裡的每日名稱加以命名者，如 Isnin（星期一）、Jumaat（星期五）、Khamis（星期四）及 Ahad（星期日），但它們若用在名字裡，都會個別成為一項正式的「本名」。

在峇里島，某些植基於十四世紀時曾一度風行的印度種姓階級制度之名銜，直到目前依然流傳。婆羅門階級之成員冠用 *Ida Bagus* 的名銜，剎帝利階級冠用 *Anak Agung Gede*（或 *I Gusti Ngurah*），而吠陀階級則用 *Gusti Ngurah* 一銜來彰顯他們本身的地位。以上各銜，在女性方面相應的是 *Ida Ayu*、*Anak Agung Istri* / *Anak Agung Ayu* 及 *Gusti Ayu*。至於 Pande、Pasek 和 Pulasari，主要則是首陀羅階級所冠用的職業名銜（Hobart et al. 1996: 76-82）。吠舍階級在這方面也有 *Ngakan*，而剎帝利成員則有 *Dewa* 和 *Desak*。舉例來說，Pande 就是專屬於首陀羅階級的武器製造師所冠用的名銜，而 Pasek 一銜，則近似於馬來西亞的宗教（伊斯蘭）導師 *Ustaz*。

第六章 案例說明

以下所列各表，含有經我們篩選後，馬來西亞、新加坡與印尼三地著名人物的名字。這些人物的名字之所以被擇取為例，主要是為利於我們接下來所要作的各類說明，而非出於他們名氣大小的考量。雖不敢說表中所列已經涵括了一切可能之案例，但相信大體而言，它已具有足夠的代表性。

我們於此共有兩項主要的任務。首先，就是要以鮮活的實例，展示姓名與頭銜的實際表現形式。其次，則是企圖從這裡再歸納出一些至今闕如的特定模式，以建構姓名稱謂上的大致法則。馬來西亞方面，我們的焦點將集中在馬來人與穆

斯林，同時也對其境內印度人的情形作一概述。不過當談到新加坡方面的情況時，我們會再對印度人的姓名稱謂作稍微詳盡一點的討論。另一方面，讀者也將發現，雖然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與汶萊三地的華裔人口依然使用著「姓前名後」的中式名字，但在印尼的「土生華人」(Peranakan Chinese)，卻已經表現出幾種命名上的自我風格。

現在，就讓我們先來看看馬來西亞方面的情形。

(一) 馬來西亞與汶萊方面之案例

從【表六】中所列諸名，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的六項主要特質。首先，那些本身已擁有一項榮銜或頭銜的人，會很樂意將其頭銜與名字結合。表中所列的這些名字，部分就於前面冠有 Tengku、Wan、Nik、Abang、Syed、Sheikh、Siti、Tun、Tan Sri、Datuk Seri、Datuk Patinggi、Datuk、Datin 與 Dr.等之頭銜。而擁有超過一項頭銜的人，則會傾向於將其所有頭銜都與名字相聯。當我們欲將頭銜自名字裡區辨出來時務必非常小心，因為有些字詞既是頭銜亦可作為個人名字使用（拼寫上則完全一致），如 *Ahmad*、*Awang*、*Mohammed* 或 *Wan* 等即是。與前述情形類似的是，*Datu* / *Datuk* 也可能僅是表示「先生」、「叔叔」、「祖父」之意，或作為一項高階官職的前置詞而已，如 *Datu Imam* 和 *Datu Bandaraya*（市長大人）。

其次，由一句片語或一句描述詞所構成的複名（大多為伊斯蘭名字），在稱謂時必須謹遵其原來的順序。舉例來說，*Abdul Kadir* 裡的 *Abdul*、(*Ali*) *Abu Hassan* 裡的 *Abu*、*Ahmad Azam* 裡的 *Ahmad* 或 *Mohamed Said* 裡的 *Mohamed*，其實皆與其後面的名字共同構成為一句片語。雖然有些人於日常生活裡，並不介意他人為求方便，只以複名裡的第二名如 *Mr. Kadir* 來作稱呼，但必須注意的是如此一來，該複名裡的真實含義就會蕩然無存。

關於與宗教方面相關的命名元素以及皇室成員所使用的後置詞，我們還要對其拼寫稍作說明。以 *Mohamad* 一詞來說，就存在幾種不太一樣的拼法。*Mohamad* 或 *Muhammad* 本身既可以是一個完整的本名，如 *Mahathir* 的父親 *Mohamad Iskandar*；但也可以是一項具宗教意涵的前置詞，如 *Muhammad* 的父親 *Muhammad Taib*。當該詞以簡寫的形式如 *Md.*、*Mhd.*、*Mohd.* 或 *Muhd.* 出現時，大多即意味著它是作為宗教意涵上的前置詞，而不是一個單純的本名。

使用 *putra* 作為名字的後置詞則並不十分普遍，因為它只侷限於具皇室血統者。而且事實上 *Tengku* 一銜，已足以說明這個人的皇室背景。

其三，並非所有的穆斯林都採用伊斯蘭名字，某些人仍然使用源自他們（馬來人）本身傳統生活習俗裡的名字。譬如 *Musa* 的父親就叫作 *Hitam*（即「黑色」之意）；而 *Johari* 其名，則表示此人乃誕生於柔佛（*Johor*）這個州屬。前述兩名都並非源出於伊斯蘭文化。

其四，當代大多數的馬來穆斯林，都已經自其名字裡剔去 bin 或 binte 的親子關係標示詞。然而這類標記如果獲得保留，其實會讓我們於馬來人命名結構的辨識上輕鬆許多。

其五，表列裡的大多數名字，皆僅由兩代聯名的結構所組成，難得的例外或許只有 Ali Abu Hassan Sulaiman。然而對許多重量級皇室成員來說，在其全名裡展示縱貫三代的親子關連，倒也不是件希奇的事。

其六，這些名字裡頭，有少數幾個內含 Abdullah 一詞。該詞既可以是一個獨立的命名元素，如 Abdullah (bin Ahmad) Badawi 裡的 Abdullah，但也可能作為一個人轉換信仰、皈依伊斯蘭後的標示詞。舉例來說，Syamsuddin bin Abdullah Lee 是一名已經皈依伊斯蘭信仰的華人，但他於名字裡仍保留其 Lee（李）的華人本姓。馬來西亞政府於 1983 年以前，曾允准所有宗教上的改宗者棄舊名另取新名，當時我們可經由一項後置名(bin) Abdullah 的出現，判斷一個人改宗伊斯蘭的事實。Syamsuddin bin Abdullah 這個名字的本意，即表示 Syamsuddin 乃阿拉的「兒子」、子民或奴隸 (Abdul-ul-Allah)。而某人之名若是以 Abdullah 始，那也可能意味著他從小就被一個馬來家庭收養並撫育成人。

在印度人的名字方面，馬來西亞的印裔人口，似乎仍頗老老實實地遵從著老祖宗的命名系統。錫克人已漸開始在其部族尾名 Singh 之後另添一個額外的名字，且除本名外，如今也更偏好被他人以其西方的或基督教的名字來作稱呼。而作為一項通則，我們則可以說一名南印度人——譬如一名淡米爾人，比較喜歡將其父之本名置放在本身名字之前。而在大多數印度人的名字案例裡，其父名往往只會以第一個字母 (initial) 的形式出現。當父名共有二字時，那位於最左側的就很可能是其出生地名，或其父（即當事人的祖父）之名。老一輩的南印度人，大多仍非常喜好在其名字裡使用親子關係標示詞（即 s/o 或在法律文件裡的 A/L，也就是 anak lelaki「誰家兒子」之意）。關於印度人姓名上的其他特質，我們將在進入新加坡案例的討論時再談。

至於汶萊方面，由於在命名規範上向來恪遵本身主要奉行之「本名—本名」及皇室體系傳統，因此我們將把焦點擺在與其頭銜及印尼方面之影響特別相關的幾個案例上。從【表七】裡我們當可看到，整體而言，除本區域通行的各項頭銜（如 Dato 和 Haji）外，汶萊閩人還擁有諸如 Paduka、Pengiran、Pehin 及 Orang Kaya 等的長串頭銜。他們多傾向於在名字裡，展示其上溯至三或四代的家系淵源。又，如前所述，Dayang (Dyg) 這個頭銜如今已演化成為一個類似「先生」或叔叔伯伯的尋常敬稱。而在【表七】裡那位擁有一個叫 Lubis 之宗族姓氏的先生，則是來自印尼的巴達人。

（二）新加坡方面之案例

在新加坡，其馬來人口於命名上可說是緊緊追隨馬來西亞方面之情形，也因

此在這方面相對顯得穩定。不過新加坡馬來人與馬來西亞的馬來人在姓名稱謂上仍有差別，其差異就在於前者並不擁有各式各樣的頭銜及勳綬。這項特質使他們的名字較易為外人判讀無誤，也因此似不必再為此多費唇舌。或許我們該提到的是，伊斯蘭皈依者在新加坡倒可以自由地選擇完全放棄舊名（包括原姓）、另取新名。表列諸名裡，就有兩個這一類的案例。其一是位印度裔的皈依者，取了個名叫 Abdul Aziz 的穆斯林名字（見【表八】）。他在與父名的相聯上，使用了馬來格式的 bin 而不是印度格式的 s/o，但保留其父之名 Rao。另一例則是有關一位女性的華裔皈依者，她在另取新名時，已完全捨棄不用原名裡的所有元素。在這類情況底下，除非我們對此人的相關背景還多少有些瞭解，否則即難於藉名字判斷其族裔。此外，這名女士還同時冠有自麥加朝聖歸來後的 Hajjah 頭銜。

新加坡的印度人群體當中，南印度人在命名上還是緊守著傳統的本名—本名系統。這個傳承裡的親子關係標示方式十分簡單，即表示「誰家兒子」的 s/o (son of) 及「誰家女兒」的 d/o (daughter of)。某些南印度人的名字裡雖未烙有這類標記，但卻將父名的第一個字母置放在其個人名字之前，所以還是不難加以辨識。然而如果父名不是以第一個字母的方式顯示，那我們就很難對究竟「誰父誰子」加以判讀了。舉例來說，像 Mootatamy Karthigesu 和 Sellapan Ramanathan Nathan 這一類的名字，如果父子雙方皆非新加坡社會裡眾所熟悉的人物，一般而言即會對外人構成困擾。在這方面，事先瞭解一些淡米爾名字裡常用的後置詞，或許是有助益的。這類常見的後置詞有：Vellu、Samy、Sivan、Rajan、Mugam、Muthu、Singam 和 Lingam，以及它們的各式變型。不過如今，某些南印度人已經完全轉向改採西式姓名。許多受過高等教育者也會為自己取個西方名字，但與此同時卻仍沿用部分印度名字，如 Steven Arul——這裡的 Arul，就是一個印度本名。這類變遷或不免混淆了其固有的本名—本名系統，以致讓人將 Arul 其名，誤視為一項家族姓氏。Arul 既非姓氏，因此 Steven Arul 仍應被稱呼為 darling Arul 與 Mr. Arul。

新加坡的錫克族社群，以往若不是常被喚作 Mr. Singh，就是 Ms. Kaur。不過如今，隨著他們開始於部族尾名之後添加名字——通常即所尊敬的人或所居留之地名，錫克人已藉此獲致更鮮明的個體性與自我認同。以 Gurmit Singh Menon 這個名字為例，Menon 就是個另添的命名元素。然而 Menon 或其他新添的類似名字同樣仍非姓氏，它毋寧更像只是個「認同上的標記」(identity marker)。在對電話簿裡的用戶名冊作一檢視後，我們發現只有六分之一或 17 % 的錫克族人，仍在使用其部族尾名。‘Singh’冠用者的逐漸凋零，無疑昭示著錫克傳統文化衰頹之未來。

對丈夫為印度人而妻子則是華人的混合婚姻家庭而言，他們的孩子可能即同時各被賦予一個印度名和中國名。在我們的案例裡，Getha Mei Kaur 這位錫克人之女，就在其印度名 Getha 後伴隨另一項中國名 (Mei)。而 Kaur 則一如錫克男性所使用的 Singh，不過只是個性別上的標示詞。

除南印度人與錫克人外，新加坡也還擁有相當可觀的北印度裔及斯里蘭卡裔人口。像 Gupta、Sharma、Sinha 與 Chaudhury 諸名，其實都與這些族群文化故園裡的老鄉們十分相近。至於其他常可以在新加坡碰見的家族姓氏，還有 Pereira 和 Nair。

新加坡政府每年確實也有在其國慶慶典當中，以各級榮銜及勳綬（如 PBM）獎勵那些傑出的公務人員。但這類獎賞卻從未伴隨任何可讓人如‘Dr.’般放置名前的頭銜。很多人相反地，都會將這類勳銜置於名後。然而某些特定職銜的冠用，倒似已在新加坡蔚為風潮（見【表八】）。舉例來說，軍銜方面從「上校」至「將軍」，以及專業職銜方面「教授」、「博士」與「醫生」等的冠用，不僅逐漸成為一種生活實踐，更已被視為約定俗成之社會禮儀。

東南亞早期的華人移民就和中國本土漢人一樣，於命名上奉行姓氏—本名之傳承。兩者間的主要差異，在於東南亞華人是本身所使用的方言，音譯其名字（Jones 1984: 40-41, Mak 1985: 208-212）。譬如「陳」（Chen）只是個非常普遍的中國姓氏，但經各類方言音譯後，卻可能出現如下的不同拼寫：Chan、Chin、Tan、Tang、Ting 及印尼華人荷語發音的 Tjan。新加坡政府近年來已認真嘗試利用漢語拼音系統將個人名字「標準化」，而直到目前為止，它已成功地透過發展「另名」（alias or aka）的方式，將漢語拼音譯出之新名與方言發音的原名並列。不過在某些案例裡，另名系統所涉及者其實僅本名的部分，換句話說並未將方言發音的原姓氏予以更易。對於那些本身已無法讀寫中國語文的華人來說，羅馬拼音的方言姓氏因是其自所尊敬的父親名字裡繼承下來的唯一部分，自然對此更加繫懷而不忍稍予更易。

（三）印尼方面之案例

如前所述，爪哇人不論在命名之系統與實踐上都極端複雜，有學者甚至就曾提到：「幾乎所有型態的命名系統，都可以在印尼境內找到」（Draine and Hall 1998: 86）。【表九】、【表十】及【表十二】裡所提到的案例，其實都僅侷限於少數人口數量上佔優勢的群體，即爪哇人、巽他人、峇里人、巴達人和「土生華人」。即便是在穆斯林本身的圈子內，我們無疑仍可以從中找到許多矛盾相異之案例，而 Hassan di-Tiro 正是其中的一個經典範例。在印尼，命名系統於規範及實踐上出現不一致乃常有之事，而讀者也只能期盼以下即將面對的，是已經過整理的一團混沌。

（1）土生華人

我們的討論，首先將從較不那麼混亂的一個面向——即土生華人的討論開始。印尼土生華人的名字並不好記，因他們往往就和一般爪哇人及巽他人一樣，擁有一個長串名字。

土生華人似乎並未於命名上顯示其群體的一致性。某些人採用「本名—姓氏」

系統，另些人則選擇「本名—本名」系統，而「純粹本名」系統方面（單名與雙名）也不無奉行者。這種情形自然與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汶萊三地的華人，形成強烈對比。在華裔穆斯林方面【表九】，Lau Bi Su 就只有一個名叫 Suleiman 的簡單名字，Lauw Chuan Tho 的印尼名則是個馬來—穆斯林式的「本名—本名」類型，而 Oey 與 Ong 兩人則選擇恢復其原名裡各元素的排列順序。此外也有土生華人直接取用爪哇人／巽他人的名字，一般即將它作為一個家族姓氏，並另取一個次名作為本名，故其全名即不啻融合了我們所討論的所有那三類命名系統。

James Riady (James Li) 和 Mohamad 'Bob' Hassan (The Kian Seng) 兩人，都是擇取一個印尼本土名字作為其法律上的家族姓氏，然後再另取一個西方的或基督教的本名。而 Tan Seng Eng (Bambang) 和 Tan Siong Kie (Hanafi) 則是偏好行之久遠的單名傳統。然而土生華人的姓名模式，還不僅止於此。Ong Kang So 的印尼名字 Onggo，就顯示其本身欲保留部分中文名字之努力，而這種作法，早年在泰國華人社會裡也十分常見。不過印尼土生華人的姓名模式縱然複雜，但若和以下即將論及的其他族群紛擾之命名形式相較，也不過是小巫見大巫罷了。

(2) 爪哇人、巽他人及其他相關群體

判讀印尼人的名字，首先就須注意所謂 Mr. (Mister) 的概念。許多印尼人都會將這個詞理解成荷蘭語意下的 Meester，即一名大學文學士學位的擁有者。在「本名—姓氏」系統底下，Mr. 一詞是擺放在姓氏之前；而於本名—本名系統之下則 Ms. Rosita 同時也會是 Datin Rosita。我們的田野調查工作已提醒過我們一點，即一般印尼大眾對於 Mr. 的概念，其實並不熟悉。他們並無法告訴你到底 Mr. 該冠用於本人名字裡的哪個部分。某些人也許會回答說「哪個部分都無所謂」，而這「哪個部分」甚至可以包括其出生排行、頭銜以及諸如 Andi、Ketut、Ida Bagus 和 I Gusti 等的性別標示詞。如果一個人擁有兩個本名（即「雙名」），那他們當中受過較高階教育者將會告訴你，雖然 Mr. 理當和其第一項本名相聯，西方人卻往往還是將它冠用於當事人的第二項本名。

倘若我們是以 Pak、Bung 或 Gus 等敬稱來取代 Mr. 的使用，那印尼人一般上就比較不會感到如此困惑。雖然他們嘴巴上仍可能告訴你冠用在名字裡的「哪個部分」都無所謂，但心底卻會明白，這些敬稱若是被套用在頭銜、出生排行與性別標記之前，其實並不甚妥當。他們對姓名稱謂之誤用所展現的寬容，並不必然意味著本身對此的接納。當然，公眾人物大多或許仍對此甘之如飴，因為遭誤用的名字部分一經「撥亂反正」，恐怕反從此不為人所知了。

【表十】裡所列的各項名字，一方面將有助於我們在命名規則與規範上的討論，另方面也盼能藉此釐出一些可適用於新情況的模式。

在印尼境內，最廣為人所用的命名系統，其實是「純粹本名」系統（單名或雙名）。爪哇人、巽他人和峇里人，都是這個體系的奉行者。這方面的單名實例有 Sukarno、Hatta、Wiranto、Suharto、(Tri) Sutrisono 及 Koentjaraningrat 等，而

這些名字本身也都不存在任何稱謂上的困擾。然而擁有雙名的那些爪哇人和巽他人，就仍不免要面對稱謂上不一致的些許麻煩。這當中，被人以左側之名來加以稱謂的有：Juwono (Sudarsono)、Megawati (Sukarnoputri) 和 Mulyna (Sukardi)。不過也有人偏好以附有其貴族地位標記的右側名為人所知，如 (Mochtar) Kusumaatmadja 和 (Abas) Kartadinata。*Kusuma* 在這裡是個前置的貴族標記，而 *dinata* 或如 Koentjaraningrat 這個名字裡的 *ningrat*，則是後置詞。

【表十】裡的少數單名冠有世襲頭銜，如 Raden (Hortono) 及 Raden Mas (Suryo) 等是。這類頭銜通常也都構成為一項命名元素，並可能會於稱謂的使用上取代 Mr.。事實上，它們也都比 Mr. 一詞更能說明冠用者的身份地位。

而同樣是在【表十】裡，某些馬來—穆斯林式的名字則顯示出與馬來人「本名—本名」系統的極度相似。這些名字包括：Abdurrahman (bin) Wahid、Amien (bin) Rais、Abdullah (bin) Shaffie、Hasballah (bin) Said、Marzuki (bin) Darusman、Syamsuddin (bin) Mahmud 及 Yunus (bin) Yosfiah。另有些人則偏好被人以其世襲性質的次名來加以稱呼，如 (Tengku Hassan & Sultan Maat) di-Tiro、(Hamengku) Buwono X 及 (Ali) Alatas。另外，高階官職也可能演變成為一項命名元素。官銜如 Tumenggung (Suryo) 及 Laksamana (Sukardi)，都相當於我們今日的「部長」職。所以倘若 'Mr. Prime Minister' 是一類可被接受的稱謂方式，那我們就沒有理由拒絕 'Mr. Laksamana'。除此之外，傳統上印尼人本就擁有自一些具有個人意義的事物裡衍生為名的充分自由，這方面的佳例有 (Hutomo) Mandala Putra、(Megawati) Sukarnoputri，以及就某一程度而言的 Tri (Sutrisno)。

最後，我們還要來談談有關宗族姓氏方面的一些案例。為便於說明，在此先列出兩項部族與三項宗族方面所使用的姓氏 (Proyek 1978)：(Anwar) Nasution、(Akbar) Tandjung、Pande & T. Mulya (Lubis)、Yopie (Batubara) 及 Andi (Ghalib, Mallarangent & Rahman Absar)。外國媒體在有關宗族姓氏的報導稱謂上，至今顯然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見；而印尼當地的新聞媒體(見【附錄一】)則普遍上稱呼 'Mr. Andi'，或是 Prosecutor Andi、Commissioner Andi、Banker Andi。至於其他各例裡的 Dr. Anwar Nasution、Mr. Akbar Tandjung、Dr. Pande Lubis、Dr. (Mulya) Lubis 及 Drs. Yopie，就已足以顯示媒體在報導稱謂上的不一致。

(3) 峇里人

峇里島民的社會組織結構，向來就被學者形容為極度的異質化、變化多端與令人困惑，並且混亂而無規則可循 (Hobart *et al.* 1996: 65)。即便僅就其命名系統一項，就足以讓人感到頭昏眼花。

峇里人並不擁有一個基於血緣或生理上的親密關係而來的姓氏，但他們確實擁有各類承襲自印度教文化、並將其社會分化得秩序井然的種姓階級頭銜。而峇里人命名系統裡最引人入勝的一個部分，就是一個人的出生排行、性別標記及 / 或種姓階級頭銜，都融合而為其名字之一環。峇里人大多都只擁有一個單名，而

部分由於其個人名字無分男女，性別標記因此遂有了用武之地。此外，與社會地位相關的頭銜在峇里島上也是林林總總，譬如據調查指出，僅僅是在兩個峇里人村落裡，就找得出不下於 32 項的冠用頭銜 (Geertz 1973: 360-411)，而且這當中，許多還是早自十四世紀就已一路沿襲至今。所以弔詭的是，當我們在這方面發現得愈多，往往卻反而愈陷於迷惘。【表十一】中所列，乃各項構成命名元素的屬性 (attribute) 摘要，這些表現形式，都稱得上相當的穩定整齊。至於當中某些變型，則來自於個人就這些元素所作的創意組合，或源於跨種姓階級婚姻之結果。而像這一類的情形，倒也非不常見。只要翻翻當地的電話號碼簿，我們就不難發現某些這類變型。

我們在【表十二】中所列的，就是 1999 年 11 月在峇里島，透過田野調查採集到的 42 項名字裡的其中 16 個。首先必須一提的是，觀察親子兩代間的峇里人名字，我們其實並無法透過父親的本名、誕生地名或親子關係標示詞，來瞭解兩者之間的任何淵源。而唯一勉強可以透露出其代間關連的，也只有那個具世襲性質的種姓階級頭銜。

其次，我們還要提醒讀者的是，這些隨屬性不同而異的命名元素，並非只是成為學者們於血緣關係研究上的理論興趣焦點 (Geertz 1973)，它同時也是活生生體現於日常實際生活裡的事物。舉例來說，超級市場裡的銷售助理、警察及保全人員，就都會佩掛有一個顯示其種姓階級、性別、出生排行以及本身單名的名牌。大多數的峇里人，尤其是那些經常出現於媒體上或公開宣示場合裡的公眾人物，往往都是以其全名示人。此外，那些為當地報章撰稿的峇里人作者，同樣也都是以全名示人。

第七章 討論與建議

本文前面所述，揭示了世人對於東南亞——尤其是島嶼東南亞地區的瞭解程度。它不僅同時呈現出亞洲人對於東南亞的瞭解程度，更無異說明了東南亞人自己對其鄰近之民認識上的貧乏。在一個當有關於我們鄰國的新聞，都要由數千英里外的新聞機構代為提供的時代裡，老實說我們的鄰人們也實在有些莫可奈何。盎格魯—薩克遜人的觀點為人所詬病的，就是它往往經由思想上的陶冶，吞沒了許多曾至他們的國度裡接受過教育、訓練甚至政治庇護者的心靈。對曾遭西方殖民統治過的地區人民來說，將眼前這種命名及稱謂上之紊亂歸咎於西方文化霸權的影響自然痛快，但這種理解事情的方法，卻如同只去責怪販毒者但卻對吸毒者不置一詞般的淺薄。此外，許多曾居留過西方世界的過客，也是心甘情願地將他們羅馬化的個人名字，依從盎格魯—薩克遜人的排列規範 (Abdillah 1997: ii)，如此一來往往又惡化了這方面原已混亂不堪之情形。眼下這本手冊作為背景說明，應有助於媒體因應它們在新聞報導與分析上所面臨的信賴危機。至於如何確

實因應，則有賴於每個人對以下說明、歸納的理解了。

本研究的一般性結論是，在新聞報導與命名方面的一團混沌當中，其實仍隱含著一些我們可以掌握的規律及模式。汶萊、馬來西亞、新加坡與菲律賓南部的馬來穆斯林，整體而言在命名的系統與實踐上都相當一致，因為他們都擁有本名—本名規範的悠久傳承。即便存在不一致處，相關的歧異意見也已經過整理，民答那莪島上的情形，即是一例。

媒體在關於馬來西亞各方人物的報導稱謂上，向來頗為精確一致，這或許該歸功於當地馬來人在族群血緣上的相對均質。而雖然國際知名人物如 Amien Rais 與 Abdurrahman Wahid 都被大多數的外國媒體「任意」加以稱呼，但在馬來西亞，其英文及馬來文報章卻仍能對前述二人作出正確稱謂，一如對 Anwar Ibrahim 和 Mahathir Mohammad 於國內外媒體所報導的。【附錄三】所列，為在處理文獻徵引與參考時如何排列著者名字的指南，從這裡我們即可窺見一定規律的存在。

截至目前為止，國外的新聞機構大多都能相當精確地來稱謂馬來西亞諸部長的名字。此外，撇開當地的中文報刊不論，馬來西亞的英文與馬來文報章也都曉得依據適當的「本名—本名」系統規範，來稱謂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印尼穆斯林人物的名字。除以上已提到者外，諸如 Hamzah Haz 和 Alwi Shihab 等人物的名字，也會出現於「本名—本名」系統之中。我們在相關的報導裡，就不曾見過 Mr. Haz 或 Dr. Shihab 的稱呼。

關於其他兩個主要族群——華人與印度人在命名系統方面之情形，我們更看到相當有條理的分歧。

我們的調查成果顯示，印尼人的命名系統正朝著逆傳統的趨勢演進，而於實踐上則表現出一種混亂之分歧及難以逾越的不一致性。撇開其文化源頭方面的情形不論，印尼人的命名系統與實踐，實在值得我們作進一步詳盡與實證之探討。目前關於印尼的文化、宗教及社會諸領域，人類學界方面已有數本卓越的研究著作問世，惟遺憾的是，這些著作卻都未能深入提供我們於命名稱謂上的一個實用指南。【附錄四】所列，就是另一個關於文獻徵引及參考時的著者名字指南，而附載其下的備註，則充分說明了印尼人姓名的不規則本質。

接下來我們所要討論的，則是在第一章裡就已先提到的一些引導性前提。這些前提如今回過頭來看，其實只是部分有效。首先，一國的鄰邦，並不必然就比遙遠的他邦更瞭解該國內部之情形。這意味著東南亞地區極度複雜的文化紛陳，或普遍上存在的一種文化無知。其次，談到東南亞人姓名稱謂上的紊亂矛盾，我們往往也會發現規模較大與建制較完善的新聞機構，相較於那些規模較小者，在這方面的表現也是絲毫未見高明。

至於另外兩項引導性前提，則是有關文化的相近性及與海外地區之關連，於人們命名系統轉換上所扮演的角色。這些前提於今視之，倒似符合事實。造成東

南亞穆斯林於姓名稱謂上紊亂不一的因素，或許可以歸納為以下的七個大項：

(1) 國際上以及鄰近的非穆斯林國度裡的大眾傳播媒體，對於這方面認識上的無知貧乏。本區域中文報刊裡的情形，就很能夠說明這一點。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及台灣三地的中文報刊報導裡，每當提及印尼人的名字時，往往就會以「本名—姓氏」的系統規範來加以處理。這些報社可能皆為同一家新聞機構的資料訂戶，並因此而在相關名字的報導上，逐漸形成一些約定俗成的譯名。

(2) 一個人基於本身的主觀意願，將其命名元素重新排列組合的結果。譬如為便於非穆斯林的理解，而將自己整個名字的排序顛倒。但有些時候，其穆斯林圈內的弟兄們或熟悉這方面情況的人，還是會曉得將這個名字又倒回原形來讀。此外，與個人偏好相關之議題，還有那些已高度分殊化的姓名文字拼寫。某些穆斯林的名字讀起來既相似亦表示同樣之意義，但在拼寫方面卻是十分相異。舉例來說，Ahmad、Husien、Muhammad 及 Othman 這些名字在東南亞諸社會裡，其實也都可以被分別拼寫成 Ahmed、Husin、Mohamad 及 Osman。類似的例子，於阿拉伯人的世居地裡可以找到更多。

(3) 個人於不同命名系統之間的轉換，尤其是從「本名—本名」系統至「本名—姓氏」系統的轉換。這往往意味著在此人的綿延家系裡，曾出過一位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先人。

(4) 年輕的一代基於時髦、趣味、實用之功能以及其他盤算，採行西方的或基督教的名字。如此一來，由於「非西方的」名字部分往往被置放在後頭，西方人大多即會據此將它作為姓氏對待。一位西方作者在其有關蘇哈托先生的那本著作裡，就曾坦言：「我總是傾向採用他們的最後一個名字……譬如 Wahid 和 Rais」(Loveard 1999)。

(5) 那些榮銜與經由頒授得來的頭銜，以及就某一程度言那些個人的暱稱與綽號，要辨識起來其實並不容易。它們於某些文化裡可能會全被納入作為名字的一部分，但在另一些文化裡，卻只能被局部採納。即便是在馬來人與印尼人本身的作者群裡，對於像‘Syed’這一類的世襲頭銜，是否該被允准作為圖書館目錄裡著者名字項目之一環，也都仍存有歧見。

(6) 宗族姓氏以及階級、出生排行和性別上的標示詞，同樣也都使命名結構變得複雜。一個更棘手的情況則是宗族姓氏與穆斯林名字的結合，會衍生出一種在稱謂上，我們對名字頭尾兩端究該如何取舍的難題。所以 Rahim Nasution 往往就同時成了 Mr. Rahim 與 Mr. Nasution。

(7) 國際上的新聞供給者與接受者之間存在的服務協議 (service agreement)，也可能會使後者無法依其自由裁量的權力，更動包含個人名字在內的新聞內容。

從以上種種稱謂及命名系統上的紊亂情勢出發，我們覺得以下步驟，或將有

助於辨識各命名元素之性質及其結構：

(1) 首先，讀者自身絕對有必要先汲取一些與命名系統相關的基礎知識。如此一來，至少可使自己明瞭究竟一項名字裡的哪個部分可以冠用 *darling*，另外哪個部分則套用 *Mr.*。此外擁有關於宗教頭銜與榮銜方面的基礎知識，也有助於我們從一大串的這類頭銜裡，區辨出一個人的本名。而一旦熟悉如何正確辨識諸如 *bin*、*anak* 與 *s/o* 這類的親子關係標示詞，以及像 *Singh* 這種常見的部族尾名後，那我們應付起前述三類主要的命名系統來，就會容易得多了。而若親子關係標記付之闕如，我們還可轉向檢視這些名字本身的素質 (*quality*)，以看看它們到底較像是個馬來—穆斯林式的名字，還是其他。

(2) 如果發現任何與名字的文化本源方面嚴重相異之案例，那最好的處理方法即直接面詢此人，其到底喜歡如何被人稱呼？有些人或許就採行了日本人的實踐方法，將本名與父名的前後順序顛倒過來。然而在不同的案例裡，也有人則索性就於此過程中將名字轉換至「本名—姓氏」系統。舉例來說，*A Dictionary of Muslim Names* (1999) 一書的作者 *Salahuddin Ahmed*，就稱其父為 *Ziauddin Ahmed*、其母為 *Zaheda Ahmed*，而其兄弟則是 *Mesbahuddin Ahmed*。他們全家顯然都已共享祖父之名，來作為本身的家族姓氏或姓氏。當然這裡頭也存在一種相當可能，即作者不過只為便於西方讀者的理解而保留其祖父之名，否則按其原名，應仍是「本名—本名」系統規範下的 *Salahuddin Ziauddin*。如果真是這樣，那作者的名字就應是 *Salahuddin* 而非當前書目檢索項目下的 *Ahmed*。不過當作者本人於書內的參考文獻裡引用到自己其他著作時，其抬頭所使用的仍是 *Ahmed*。由此我們當可判定，他極可能正值命名系統轉換的過程。

(3) 倘若私下面詢並不實際或者並不可能，我們仍可求助於此人所屬國籍的大使館，或相關機構和對該領域素有研究的專家學者，以及當地的本土語言報刊和新聞廣播。

(4) 如果查證的時間不足而對名字所從屬之系統又抱持著極大懷疑時，那在完全獲得求證以前，我們最好還是老老實實地將此人的全名完整報導出來。《亞洲華爾街日報》(*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在這方面就常如此處理。

(5) 當某人的名字確實非常「個人化」而新聞方面之供給者又予其以尊重時，那新聞供給者本身其實就有義務為其讀者提供一個註腳，以交代此人姓名上的正確結構。

現在，就讓我們回到當初關於 *Nawaz Sharif*、*Saddam Husain* 與 *Abdurrahman Wahid* 這些名字究該如何稱謂的討論。然而直到此刻，我們其實也只能對 *Abdurrahman Wahid* 之案例，提出確鑿無疑的肯定答覆。在考量過 *Abdurrahman Wahid* 個人的家系淵源、其伊斯蘭領袖之地位以及所擁有的馬來—穆斯林式名字後，我們已可以放心地稱呼他為 *President Abdurrahman*。惟不久之後，隨著所謂「瓦希德主義」(*Wahidism*) 一詞於世界各地的散佈流傳，這位印尼總統的名字，

恐仍不免會遭世人納入「本名—姓氏」系統的理解框架之中。事實上，Abdurrahman Wahid 其人在稱謂上從 Chairman Abdurrahman（「伊斯蘭聯盟」主席）蛻變而至 President Wahid 之過程，本身就是個大眾傳播研究裡的良好題材。

至於那位伊拉克總統的全名，其實是 Saddam Husain al-Takriti。倘若這是個「三代同堂」的名字，那此人無疑就該被喚作 President Saddam。但如果這僅是個兩代相聯的名字，並以 al-Takriti 作為姓氏，那他就也可能會是 President Husain。

巴基斯坦人在命名系統的變換上早有先例，也因此我們根本無法排除 Nawaz Sharif 其名已經轉換至「本名—姓氏」系統規範之可能。不過雖然 Nawaz Sharif 親兒子的名字已經轉換成 Hassan Sharif，但其家庭成員於此的姓名變換並不十分完整。Nawaz Sharif 的三個兄弟及其親生女兒於命名上依循的，就仍是傳統的「本名—本名」系統；其妻所冠是夫名而非夫「姓」。

由於經歷「本名—本名」至「本名—姓氏」系統的轉換，【表三】中所列諸名究該如何稱呼，答案其實已經呼之欲出。雖然我們對於埃及與約旦兩地命名上的蛻化進程仍不甚了了，但在伊朗、黎巴嫩及土耳其諸國，這方面之變遷早已進行相當一段時日。不過在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亞及沙烏地阿拉伯，傳統主義的思潮與作風，仍具主宰地位。

我們當前的探查工作，乃志在完成一本有關島嶼東南亞諸國人名的手冊。手冊針對的對象，主要是研究工作者、媒體通訊記者，以及就某一程度而言的外交服務人員。必須承認的是，關於本區域各國與各族群的優良參考材料並不缺乏（見〈參考文獻〉所示），其中不足而猶有待於我們探索者，乃在發掘已具固定模式的命名系統，並將那些依然紊亂的系統予以梳理組織。簡言之，馬來西亞境內馬來穆斯林的「本名—本名」系統最為穩定，其次則是南印度人的「本名—本名」系統。至於爪哇人和巽他人的單名系統，倒像是些「無添加物的產品」（no-frill product），這對我們的目標讀者來說，自然最樂。相較之下，峇里人的名字就東添西添的多了諸如種姓階級頭銜、性別標記與出生排行這類「添加物」，但仍有其一定的標準規範。此外，錫克人的名字比起巴達人和武吉斯人的名字來，也顯得較易辨識。至於印尼土生華人的名字、某些爪哇人和巽他人的雙名，以及那些正經歷著命名系統轉換過程之人名，對於稱謂者而言可就構成一個極大的麻煩了。

為瞭解構成各類模式的形形色色名字，以及為瞭解那些總是變動不居、難以安穩下來的命名系統，我們首先就須充實自己關於命名方面的一些基礎知識。希望這樣一本手冊，已能提供讀者理解這場「名字遊戲」規則的必要功力。

Table 1. How some people are addressed

Name in Full	Reported Names (and Sources):	Notes
Osama bin Laden	1. Mr Bin Laden (Newsweek) 2. Mr Osama (ST/Reuters)	Arab Rebel
Nawaz Sharif	1. Mr Sharif (Most) 2. Mr Nawaz (Local press)	Ex-Prime Minister of Pakistan
Yunus Yosfiah	1. Mr Yunus (AFP/Reuters) 2. Mr Yosfiah (LZ)	Indonesian Information Minister
Amien Rais	1. Dr Amien (J. Post/Jawa) 2. Mr Rais (LZ/FEER)	Speaker of PCA, Indonesia
Abdurrahman Wahid	1. Mr Abdurrahman (Jawa P/Utus) 2. Mr Wahid (LZ/FEER)	Indonesian President
Alwi Shihab	1. Dr Shihab (AW/FEER) 2. Dr Alwi (Utus/Jawa Post)	Foreign Minister, Indonesia
Marzuki Darusman	1. Mr Marzuki (AFR/Reuters) 2. Mr Darusman (LZ/TCS, 5)	Attorney General, Indonesia
Akbar Tandjung	1. Mr Akbar (ST) 2. Mr Tandjung (ST)	Speaker, Indonesian Parliament
Mohammed Ali Ghani	General Ghani (ST/AFP)	Iraqi General
Abdullah Ocalan	Mr Ocalan (ST/AFP)	Kurdish rebel leader
Muammar Gaddafi	Col. Gaddafi (ST)	President of Libya

Note: For the abbreviations and a complete list of referred media material, see Appendix 1.

Table 2. Traditional Arabic naming system

Name in Full	Given Name	Official Address
Saud ibn Mohammed ibn Mukrin	Saud	King Saud
Abd al-Aziz ibn Saud	Abd al-Aziz	King Abd al-Aziz
Sultan ibn Abdelaziz	Sultan	Prince Sultan
Tallal ibn Abd al-Aziz al-Saud	Tallal	King Tallal
Al-Waleed ibn Tallal ibn AbdulAziz alsaud	al-Waleed	Prince al-Waleed
Faisal ibn Abd al-Aziz al-Saud	Faisal	King Faisal II
Khalid ibn Abd al-Aziz	Khalid	King Khalid
Fahd ibn Abd al-Aziz	Fahd	King Fahd
Abdullah ibn Abd al-Aziz	Abdullah	Prince Abdullah
Faisal ibn Fahd	Faisal	Prince Faisal III
Abdallah ibn Fahd	Abdallah	Crown Prince

Table 3. 'Family' names of Arab leaders

Name in Full	Given Name	Reported Name
Ahmad Khatib (Kuwait)	Ahmad	King Khatib
Anwar al-Sadat (Egypt)	Anwar	President Sadat
Ayatollah Mohammed Khatami (Iran)	Mohammed	President Khatami
Hafiz al-Asad (Syria)	Hafiz	President Asad
Hunsni Mubarak (Egypt)	Hunsni	President Mubarak
Mohammed Ali Ghani (Iraq)	Mohammed Ali	General Ghani
Muammar Gaddafi (Libya)	Muammar	Col. Gaddafi
Sadam Husayn (Iraq)	Sadam	President Husain
Yasir Arafat (PLO)	Yasir	Mr Arafat

Table 4. Traditional & emerging naming systems in South Asia

Name in Full	Given Name	Reported Name
Atal Behari Vajayee (India)	Vajayee/ gn-gn	Mr A.B. Vajayee
Chandrika Bandaranaike Kumarathunga	Chandrika/gn-sn	Mrs Kumarathunga
Digvijay Singh (India)	Digvijay/gn	Mr Digvijay Singh
Indera Nehru Gandhi (India)	Indera/gn-sn	Mrs Gandhi
Jawarharlal Nehru (India)	Jawarharlal/gn-sn	Mr Nehru
K.R. Narayanan (India)	Narayanan/gn-gn	Mr K.R. Narayanan
Mahatma Gandhi (India)	Mahatma /gn-sn	Mr Gandhi
Mohammed Ali Jinnah (Pakistan)	Ali /gn-gn	Mr Jinnah
Motilal Nehru (father/Nehru) (India)	Motilal	n.a.
Nawaz Sharif (Pakistan)	Nawaz/ gn-gn	P.M. Sharif
Rajendra Prasad (India)	RajendraPrasad/gno	Mr Prasad
Rajiv Gandhi (India)	Rajiv/gn-sn	Mr Gandhi
Shaukat Aziz (Pakistan/ Minister)	Shaukat/gn-gn	Mr Shaukat
Subbas Chandra Bose (India)	Subbas/gn-sn	Mr Bose
Zulfikar Ali Bhutto (Pakistan)	Zulfikar/gn-gn	Mr Bhuttu

Table 5. Contemporary naming systems in the region

Naming System	Society (Ethnic Groups)
Gn-Gn (Given name-Given name)	Arabs, Malay Muslims and Tamils (Brunei, Malaysia, Singapore), Acehnese, Moros (Philippines)
Gn-Sn (Given name-Surname)	
1. Gn-Family Name	1. Moros (Philippines), Christian Ibans and Kadazans, Peranakan
2. Gn-Surname	2. Arabs, Chinese, Northern Indians, Sinhalese
3. Gn-Clan Name	3. Bataks, Bugis
Gno (Given Name Only)	
1. Mono/Duplex	1. Javanese, Sundanese, Balinese
2. Tribal Name	2. Sikhs

Table 6. Names and Addresses in Malaysia

Names without Titles	Own Name	Own Name with Titles & Lineage
<i>On Malay Muslims</i>		
Abdul Kadir Fadzir	Abdul Kadir	Datuk Abdul Kadir Sheikh Fadzir
Abdul Rahman	Abdul Rahman	Tengku Abd. Rahman Putra
Abdullah Ahmad Badawi	Abdullah	Datuk Seri Abdullah Ahmad Badawi
Abu Hassan Omar	Abu Hassan	Datuk Abu Hassan Omar
Ahmad Azam Abd. Rahman	Azam	Mr Ahmad Azam Abudal Rahman
Ali Abu Hassan Sulaiman	Ali	Tan Sri Ali Abu Hassan Sulaiman
Anwar Ibrahim	Anwar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Aziz Mat	Aziz	Datuk Nik Aziz Nik Mat
Azizah Wan Ismail	Azizah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Hamid Albar	Hamid	Datuk Syed Hamid Albar
Mahathir Mohamad	Mahathir	Datuk Seri Dr Mahathir Mohamad
Marina binte Mahathir	Marina	Ms Marina binte Mahathir
Mat Salleh Abdul Rahim	Salleh	Mr Mat Salleh Abdul Rahim
Mohamed Said Mohamed Ali	Said	Datuk Wira Mohamed Said Mohamed
Muhammad Muhd. Taib	Muhammad	Tan Sri Muhammad Muhammad Taib
Musa Hitam	Musa	Tan Sri Musa Hitam
Mustapha Ali	Mustapha	Datuk Wan Mustapha Wan Ali
Najib Razak	Najib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Rafidah binte Aziz	Rafidah	Datuk Seri Rafidah binte Aziz
Rais Yatim	Rais	Dr Rais Yatim
Razaleigh Hamzah	Razaleigh	Tengku Razaleigh Hamzah
Syamsuddin b. Abdullah Lee	Syamsuddin	Syamsuddin bin Abdullah Lee
Zaharah Sulaiman	Zaharah	Dr Siti Zaharah Sulaiman
<i>On East Malaysians</i>		
Abu Bakar Mustapha	Abu Bakar	Dtk Abang Abu Bakar Abang M'pha
Abu Taib Mahmud	Abu Taib	Datuk Patinggi Tan Sri Haji Dr Abu Taib Mahmud
Abdullah Fadzil Che Wan	Fadzil	Dr Abdullah Fadzil Che Wan
Johari Tun Openg	Johari	Datuk Abang Johari Tun Openg

<i>On Indians</i>		
Gobind Singh Deo (Sikh)	Gobin	Mr Gobin or Deo
Joe Selvaretnam	Joe	Mr Joe Selyaretnam
Kula Segaran	Kula Segaran	Mr M. Kula Segaran
Pawancheek Marican	Pawancheek (gn)	Mr Marican (sn)
SamyVellu	SamyVellu	Datuk S. Seri Samy Vellu

Table 7. Names and Addresses in Brunei

Names without Titles in Full	Own Name	Own Name with Titles & Lineage
Abd Majid Pekema Dewa	Abdul Majid	Dato Paduka Hj. Abd Majid bin Pehin Datu
		Pekema Dewa Dato Paduka Haji Abdullah
Abd Rahman Mat Jair	Abdul Rahman	Pengiran Abdul Rahman Pengiran Mat Jair
Abdul Hamid Bakal	Abdul Hamid	Pehin Dato Imam Abdul Hamid bin Bakal
Abu Bakar Apong	Abu Bakar	Pehin Dato Awang Abu Bakar
Amir bin Awang	Amir	Dato Prof. Dr Haji Amir bin Haji Awang
Azizah binte Askar	Azizah	Datin Paduka Hajjah Azizah bte Pehin Askar
Hassanal Bolkiah	Hassan	Sultan Hassanal Bolkiah
Hussain Mohd Yusuf	Hussain	YB Pehin Orang Kaya Digadong Seri Lela Dato
		Seri Paduka Hj. Awang Hussain Mohd Yusuf
Jefri Bolkiah	Jefri	Jefri Bolkiah
K.T. Fuad	Fuad	Dato Paduka K.T. Fuad
Leong Li Ming	Li Meng	Dayang Leong (sn)
Maimum Asqha Lubis	Maimum	Dr Hj. Maimum Asqha Lubis
Mordiah	Mordiah	Dayang Hajjah Mordiah
Nikman Otherman	Nikman	Pengiran Nikman bin Pengiran Otherman
Wijaya Ismail	Wijaya	Pengiran Indera Wijaya Pengiran Dr Hj Ismail
Yusri Matuslan	Yusri	Pengiran Yusri bin Matuslan

Table 8. Names and Addresses in Singapore

Names without Titles	Own Name	Own Name, Titles & Lineage
<i>On Malay Muslims</i>		
Yaacob Bujang	Yacob	Dr Yacoob Bujang
Abdullah Tarmugi	Abdullah	Mr Abdullah Tarmugi
Abdul Hamid Othman	Abdul Hamid	Dr Abdul Hamid Othman
Ahmad Mattar	Ahmad	Dr Ahmad Mattar
<i>On Converts</i>		
Abdul Aziz b. Abdullah Rao	Abdul Aziz	Mr Abdul Aziz bin Abdullah
Fatimah bte Abdullah	Fatimah	Hajjah Fatimah bte Abdullah
<i>On Names of Indians, Etc.</i>		
Anil Sharma	Anil (gn)	Mr Sharma (sn)
Devinadar Singh	Devindar	Mr Devindar Singh
Gurmit Singh Menon	Gurmit	Mr Gurmit Singh
Jennifer d/o Gopalan	Jennifer	Ms Jennifer d/o Gopalan
Rajiv Gupta	Rajeev (gn)	Mr Gupta (sn)
Mootatamy Karthigesu	Karthigesu	Mr M. Karthigesu
Muttiah Coomaraswamy	Muttiah (gn)	Mr Coomaraswamy (sn)
Chandra Das	Chandra Das	Mr S. Chandra Das
Jayakumar Shunmugam	Jayakumar	Prof S. Jayakumar
Sellapan Ramanathan Nathan	Nathan	Mr S.R. Nathan
Sinha Venitha	Venitha (gn)	Ms Sinha (sn)
Surest Kumar Suppiah	Suppiah	Mr S.K. Suppiah
Chaudhury Rajeev	Rajeev (gn)	Mr Chaudhury (sn)
<i>On Ethnic Chinese</i>		
Lee Kuan Yew	Kuan Yew	Mr Lee (sn)
Yeo Yong Boon, George	Yong Boon, George	Brig. Gen. Yeo (sn)
Hu Tsu Tau, Richard	Tsu Tau, Richard	Dr Hu (sn)
Mah Bow Tan	Boh Tan	Mr Mah (sn)
Tan Keng Yam, Tony	Keng Yam, Tony	Dr Tan (sn)
Teo Chee Hean	Chee Hean	Rdmr Teo (sn)

Table 9. Peranakan names and naming systems

Romanized Name	Indonesian Names	System	Notes
Go Ka Him	Dharmala Gondokusumo	Gn+fn	Gn=Given name
Gow Swie Kie	Dasuki Angkosubroto	Gn+fn	fn=Family name
Lau Bi Su	Suleiman	Muslim	
Lauw Chuan Tho	Hj. Junus Jahja	Muslim	
Li Wen Cheng	Mochtar Riady	Gn+fn	
Li Bai, James	James Riady	Gn+fn	
Liau Bung Key	Lemana Ali	Muslim	
Lie Mouk Min	Mikmin Ali	Muslim	
Liem Bian Kie	Jusuf Wanandi	Gn-fn	
Liem Fung Seng	Anthony Salim	Gn-fn	
Liem Oen Kian	Djuhar Sutanto	Gn-fn	
Liem Sioe Liong	Sudono Salim	Gn-fn	
Lim Cu Kong	Agus Mursalim	Gn-fn	
Lim Eng Hwai	Adil Nurimba	Gn-fn	
Lo Foeng Fong	Arief Riady	Gn-fn	
Ng Ke Chun	Keesi Masrin	Gn-fn	
Oei Kian Kok	Christianto Wibisono	Gn-fn	
Oey Tjeng Hin	Abdul Karim Oey	Muslim	
Ong Ka Huat	Ong Kaharuddin	Muslim	
Ong Kang So	Henry Onggo	Gn-sn	
Pho Jie Goan	Murdaya Widawimarta	Gn-sn	
Tan Kiem Liong	Hj. Mohammad Hassan	Muslim	
Tan Seng Eng	Bambang	Gn (mono)	
Tan Siong Kie	Hanafi	Gn (mono)	
Tan Tjoe Hien	Hendra Rahardja	Gn (duplx)	Duplx=duplex
The Kian Seng	Mohammad 'Bob' Hassan Hassan	Gn-gn	
Tjia Hong Tiong	Trisno Aryanto	Gn+fn	
Tjia Kian Liong	William Soerjadjaya	Gn+fn	
Yance Lim	Yani Haryanto	Gn+fn	
Yap Swie Kie	Soetopo Jananto	Gn+fn	
Yap Tek Ciang	Mulyono Hartono	Gn+fn	

Source: Suryadinata (1993: 14, 45-47),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some other names, see Suryadinata (1995).

Table 10. Addresses and names of Indonesians

Name in Full	Names in Foreign Press	Own Name	System
Abas Kartadinata	Mr Kartadinata	Abas	Mixed
Abdullah Shafie	Tengku Abdullah	Abdullah	Gn-gn
Abdurrahman Wahid	Mr Abdurrahman/Wahid	Abdurrahman	Gn-gn
Abdussamat Attahasyi	T'ku Abdussamat	Abdussamat	Gn-gn
Akbar Tandjung	Mr Tandjung	Akbar	Mixed
Ali Alatas	Mr Alatas	Ali or Alatas	Gn-sn
Amien Rais	Dr Rais	Amien	Gn-gn
Andi Ghalib	Mr Andi	Ghalib	Gn/mono
Andi Mallarangeng	Mr Mallarangeng	Mallarangen	Gn/mono
Anwar Nasution	Dr Nasution	Anwar	Mixed
Bambang Harymurti	Mr Bambang	Bambang	Gn/dupl
Bambang Subianto	Bambang Subianto	Bambang	Gn/dupl
Bambang Trihadmodjo	Mr Bambang	Bambang	Gn/dupl
Bambang Yuhdoyuno	Lt-G. Bambang	Bambang	Gn/dupl
Dewi Fortuna Anwar	Dr Dewi	Fortuna	Mixed
Farid Harianto	Mr Farid	Farid	Mixed
Hasan di Tiro, Tengku	Tengku di-Tiro	Hassan	Mixed
Hasballah Saad	Dr Hasballah Saad	Hasballah	Gn-gn
Hatta, Mohammed	Mr Hatta	Hatta	Gn/mono
Hartono, Raden	Mr Hartono	Hartono	Gn/mono
Hutomo Mandala putra	Mr Hutomo	Hutomo	Gn/mono
Juwono Sudarsono	Prof. Dr Sudarsono	Juwono	Gn/dupl
Koentjaraningrat	Prof. Koentjaraningrat	K'tjaraningrat	Gn/monoonoo
Laksamana Sukardi	Laksamana Sukardi	Laksamana*	Gn-gn
Maat di Tiro	Sultan Maat diTiro	Maat	Mixed
Marzuki Darusman	Mr Darusman	Marzuki	Gn-gn
Megawati Sukarnoputri	Ms Megawati	Megawati	Gn/dupl.
Mochtar Kusumaadmadja	Prof. Kusumaatmadja	Mochtar	Mixed
Mulyana Sukardi	Sukardi	Mulyana	Gn/dupl
Pande Lubis	Mr Pande Lubis	Pande	Mixed
Sukarno, Achmed	Bung Karno/President	Sukarno	Gn/mono
Suryo Tumenggung	Raden Mas Tumenggung	Suryo	Gn-gn
Syafaruddin, SH	Mr Syafaruddin	Syafaruddin	Gn-gn
Syamsuddin Mahmud	Govrnor Symsuddin	Syamsuddin	Gn-gn

Todung Mulya Lubis	Dr Lubis	Mulya	Mixed
Tri Sutrisno	Ms Sutrisno	Sutrisno	Gn/mono
Wiranto	General Wiranto	Wiranto	Gn/mono
Yopie Batubara	Drs Yopie	Yopie	Mixed
Yunus Yosfiah	Mr Yosfiah	Yunus	Gn-gn

*According to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Leo Suryadinata, his other brothers are also named after military titles.

Table 11. Attributes that form naming elements in Bali

Caste	Caste Titles Name	Related Titles	Gender Indicator	Birth Order
Brahmana	Ida	n.a.	Bagus (m), Ayu (f)	4*
Ksatria	Anak Agung (AA)	Dewa (Dewi), Dewa Aggung, Dewa Gede, Cokorda, I Gusti, Deask	Gede (m), Istri (f)	4
Waisya	Gusti	Gusi, Ngakan, etc	Ngurah (m), Ayu (f)	4
Sudra	Wayan or nil	Pande, Pasek, Pulasari, Sengguhu Bandesa	I (m), Ni (f)	4

*The four orders are: the first order, Wayan, putu, or Gede, etc; second order, Made, Kadek, etc; third order, Nyoman or Komang, etc; and the fourth order, Ketut, etc.

Source: Geertz (1973: 360-411), Hobart et al. (1996: 75-82), and field survey, 1999.

Table 12. An analysis of selected Balinese names

Name in Full	Caste Name as Family Name	Own Name	Nick Name	Father's Name
Anak Agung Alit Netra	Anak Agung	Alit Netra	Palit	Anak Agung Gede Agung
Anak Agung Gede Tirtayasa	Anak Agung	Tirtayasa	Brontot	Anak Agung Gede Sroja
Dewa Made Putra	Dewa	Dewa Made Putra	Benpe	Dewa Made Sumpang
Gusti Ayu Putri Ulyani	Gusti	G.A.P. Ulyani	Ulil	Gusti Ngurah Rai
I Gusti Ngurah Budi Laksana	Gusti Ngurah	Budi Laksana	Zero	Gusti Ngurah Arka
I Kadek Karyana	(No)	Karyana	Moleh	I Wayan Ateng
I Ketut Sri Dewi Ratnawati	(No)	Sri Dewi* Ratnawati	Menol	I Ketut Bawa
I Ketut Subrata	(No)	Subrata	Lenyu	I Wayan Legot
I Made Mertanadi	(No)	Mertanadi	Lindung	I Wayan Gede
I Wayan Ekaputra	(No)	Eka	Jentot	I Nengah
Ida Bagus Ketut Wahyunada	Ida Bagus	Wahyunada	Malen	Ida Bagus Made Sudra
Ida Bagus Putu Wahardika	Ida Bagus	Wahardika	Dona	Ida Bagus Nyoman Bajra
Ni Komang Ariani	(No)	Ariani	Gepeng	I Ketut Beluk
Ni Komang Mariani	(No)	Mariani	Sleneg	I Wayan Dira
Ni Made Pusdikarini	(No)	Rini	Chimeng	I Wayan Mantra
Pande Nyoman Suartana	Pande	Suartana	Molin	Pande Nyoman Rata

*Ladies like “Sri Dewi” or simply “Dewi” to prefix their names for femininity and nobility.

Source: Field survey data, 1999.

References

Abdillah Masykuri

- 1997 *Responses of Indonesian Muslim Intellectuals to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1966-1993)*. Hamburg: Abera Verlag.

Abdullah Ali

- 1997 *Malaysian Protocal and Correct Forms of Address*, 2nd ed. Kuala Lumpur: Times Books.

Ahmed Salahuddin (Salahuddin Ahmed)

- 1999 *A Dictionary of Muslim Names*. London: Hurst.

Al-Jafari, Fatima Suzan

- 1977 *Muslim Names*. Brentwood, Md: American Trust Publication.

Brown, D.E.

- 1970 *The Structure and History of a Bornean Malay Sultanate*. Monograph of the Brunei Museum Journal, No. 2. Begawan: Brunei Museum.

Chaplin, A.H. and D. Anderson, eds.

- 1967 *Names of Persons: National Usages for Entry in Catalogues*. Sevenoaks, Kent: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IFLA).

Draine, C. and B. Hall

- 1998 *Culture Shock!* Singapore: Times Books.

Edding, Norbi H.

- 1980 *Directory of Muslim Filipino Names*. Manila: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Fan, Yumei

- 1991 "The Hui zu (*The Chinese Muslims*)". Pp. 659-672, in Zhang Lianfang, ed. *Zhongguo ren de xingming (The Names of the Chinese)*. Beij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Co.

Gandhi Maneka

- 1994 *The Penguin Book of Hindu Names*. London: Penguin Books.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s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Gullick, J.M.

1987 *Malay Societ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Beginning of Chang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bart, Angela, U. Ramseyer and A. Leemann

1996 *The People of Bali*. Oxford: Blackwell.

Horton, AVM

1996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1860-1996)*. Two volumes. Bourdesley, Worcestershire: AVM Horton.

Hussin Mutalib

1993 *Islam in Malaysia*.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Ingraham, Holly

1997 *People's Names*.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IFLA)

1980 *Supplement to Names of Persons: National Usages for Entry in Catalogues*, 3rd ed. London: IFLA.

Jones, Russell

1984 *Chinese Names*. Kuala Lumpur: Pelanuk.

Koentjaraningrat

1985 *Javanese Cultu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aw, Yock Fang

1995 *Standard Malay Made Simple*. Singapore: Times Books.

Lee, Kam Hing

1995 *The Sultan of Aceh: Relations with the British, 1760-1824*.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veard, Keity

1999 *Suharto: Indonesia's Last Sultan*. Singapore: Horizon Press.

Mak, Lau-Fong

- 1985 Fangyenqun rentong (*Dialect Group Identity*). Taipei: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Ethnology.

Miftah Faridl

- 1989 *Nama-Nama Indah Dalam Muslim*. Kuala Lumpur: Thinkers' Library.

Nagata, Judith

- 1979 *Malaysia Mosaic*.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4 *The Reflowering of Malaysian Islam*.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Noor Aini Syed Anmir

- 1995 *Malaysian Customs and Etiquette: A Practical Handbook*. Kuala Lumpur: Times Books.

Perpustakaan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1989 *Daftar Nama Pengarang-Pengarang Melayu*. Kuala Lumpur: Perpustakaan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 1980 *Senarai Gelaran Melayu*. Kuala Lumpur: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1997 *Failkuasa Pengarang etnik Sabah dan Sarawak*. Kuala Lumpur: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Proyek Pengembangan Perpustakaan, ed.

- 1978 *Daftar Nama-Nama Pengarang Indonesia*. Jakarta: Pusat Pembinaan Perpustakaan, Dep. P. & K.

Roff, W.

- 1967 *The Malay Nationalism*.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ny, A. Kohar

- 1969 *Indonesian Names: Preliminary Guide to Bibliographic Listing*. Washington D.C: South Asia Section, Congress of Library.

Salhah, Wan and Fatimah Zahrin, eds.

- 1992 *Daftar Nama Pengarang Melayu Malaysi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Schimmel, Annemarie

1989 *Islamic Names*.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ress.

Shanson, T.L.

1997 *International Guide to Forms of Address*. London: MacMillan.

Sharifi Naser

1959 *Cataloging of Persian Works Including Rules for Transliteration, Entry and Description*.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Sung, Chek Mei (Sung Je-mei), ed.

1981 *Yindunxiya renwu zhi (Who's Who in Indonesia)*, Vol. I.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uryadinata, Leo

1993 *Inni huaren: wenhua yu shehui (Indonesian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5 *Prominent Indonesian Chinese: Biographical Sketches*. Singapore: ISEAS.

Sutanto Atmosumarto

1994 *Colloquial Indonesian*. London: Routledge.

Tan, Raelene

1996 *Indian and Malay Etiquette*. Singapore: Landmark Books.

Tung, V.W.Y.

1989 *Gelaran dan Peraturan Melakukan Tataadab*. Kuala Lumpur: Pelanduk.

Yang, Hsi-mei

1966 "Geneological linkage naming system and interpretative of the posthumous names of the Shang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21 (1966): 17-40.

Yusuf Puteh, Abang

1996 *The Malay Culture of Sarawak*. Kuching: Shobra Publications.

Zafa A. Malik

1985 *Muslim Names and Their Meaning*. Kuala Lumpur: Pelanduk.

Zainal Abidin Zahid, Raja

1957 *Malay Personal Names*.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Academic Exercise.

Zhang, Lianfang

1987 *Waiguo ren de xingming (The Names of the Foreigners)*. Beij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Co.

Appendices

Appendix 1: List of referred mass media material

Newspapers: Asahi Shinbun, Asia Wall Street Journal, Bali Post, Berita Harian (Malaysia), Berita Harian (Singapore), Borneo Post (BnP), Business Times (BT, Singapore), Jakarta Post (J.Post), Jawa Pos (Jawa P.), Bali Post, Kompas, Lianhe Bao, Lianhe Zaobao (LZ), Nanyang Siang Pau (NYSP), New Straits Times (NST), Sin Chew Jit Poh, Straits Times (ST), Taipei Times, Utusan Malaysia, Waspada, Ziyou Shibao, Zhongguo Shibao.

News Agencies: Antara, Asia News Network (ANN), Agence France-Presse (AFP), Bernama, Bloomberg, Reuters (Rtrs).

News magazines: Asiaweek, Economis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ER), Newsweek, Time.

Names on Chiefs of State, etc: 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pubs.html

TV Stations: CNBC, CNN, TCS (Singapore), RTM (Malaysia), and Taiwan TV stations.

Appendix 2: Conflicting reports on Indonesian names and addresses

Name	Reported As	Source 1	Source 2	Notes
Abdurrahman Wahid	Mr Abdurrahman	ST 18.7/7.10	JP/ANN July 99	PKB member
Abdurrahman Wahid	Mr Wahid	LZ 6.99/Tcs 8	Feer 27.3.97	LZ 9.10.99
Adam Damiri	Mj. General Damiri	ST/AFP/Rtrs 14.8.99		Rear Admiral malik
Akbar Tandjung	Mr Akbar	ST 7.10.99		Golkar chairmn
Akbar Tandjung	Mr Tandjung	AFP 14.8.99		Speaker parl
Ali Alatas	Mr Alatas	Almost all		Fmr Minister
Amien Rais	Dr Amien	JP 15.7.99	LZ 13.1.98	Ntl Mandate
Amien Rais	Rais	LZ 9.10 .99	Feer 27.3.97	Muhamadiyah
Anas Ahmad	Organizer Ahmad	ST/JP		Student leader
Andi Ghalib	Mr Ghalib	JP/ANN 10.7	Blmbg 10.7	
Andi Ghalib	Mr Andi	ST/ 23.7.99		Attorney G.
Andi Mallarangent	Mr Mallarangent	AFP/Rtrs	21.7.99	KPU (elect'n)
Anwar Nasution	Dr Nasution	ST/16.7.99		Governor c/bank
Bambang Harymurti	Mr Bambang	ST/ 8.10.99		Tempo chief ed
Bambang Subianto	Bambang Subianto	ST/JP/AFP/	ANN	Finance mnr
Bambang Trihadmodjo	Mr Bambang	ST/ 30.6.99		Son /Suharto
Bambang Yuhdoyuno	Lt-G. Bambang	ST/ 15.7.99		
Dewi Fortuna Anwar	Dr Dewi	ST/ 15.7.99		BJH sp adviser
Harun Al Rashyid	Mr Al Rashyid	JP/AFP/ANN	10.7.99	elect com.
Hasan di Tiro	Tengku di-Tiro	Feer 29.7.99		Aceh exile
Hasballah Saad	Hasballah Saad	AFP/Rtrs		Aceh activist
Laksamana Sukardi	Laksamana Sukardi	BT 14.10.99	Title/name	Minister
Maat di Tiro	Sultan Maat diTiro	Feer 29.7.99	Dad/Hasan	Sultan aceh
Marzuki	Mr Marzuki	ST/AFP/Rtrs		Golkar deputy
Marzuki	Mr Darusman	Tcs 5 /14.7.99	BH 14.7.99	
Pande Lubis	Mr Pande Lubis	ST/AFP/Rtrs	18.8.99	Bank Bali
Raden Hartono	Mr Hartono	ST 8.8.99		ICMI

Syamsuddin Mahmud	Govrnor Symsuddin	Feer 29.7.99		Governor Aceh
T. Mulya Lubis	Dr Lubis	ST 16.7.99		Activist (HRgt)
Tanri Abeng	Mr Tanri	ST 21.7.99		Fmr Minister enter
Yunus Yosfiah	Mr Yunus	ST/AFP/Rtrs	14.7.99	Minister
Yunus Yosfiah	Mr Yosfiah	LZ 14.7.99		

Appendix 3. Citation guide for bibliographic entry of Malay/Indian names

Name Cited	Title/Clan Name /Surname	Notes
Abdul Ghani, Sheikh	Sheikh	In Index
Abdul Majid bin Zainuddin, Haji	Haji (religious)	
Abdul Rahman al-Ahmadi		
Abdullah Al-Qari bin Haji Salleh Abdelaziz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Munshi	Munshi (office)	
Alatas, Syed Hussein	Syed	Also: Syed Alattas
Ashaari Muhammad Ustaz	Ustaz	
al-Atas, Syed Mhammed Naquib	Syed	Sequence* by 'Atas'
Chelliah, D.D.	(Indian)	
Hajar, Wan	(Wan is a name)	In Index
Harun Nasution	Nasution (clan)	See Appendix 4.
al-Hudhaibi, Muhammad		Sequence by 'Hudhaibi
Husin Ali, Syed	Syed	Also Syed Husin
Hussin Mutalib		
Ibrahim Engku Ismail, Engku	Engku	
Islmail R. al-Faruqi		
Maharum, Tunku	Tunku	In Index
Mahdi, Raja	Raja	In Index
Mahmud bin Mat, Datuk	Datuk	
Mohamed Salleh bin Perang	Mohd. (Islamic)	In Index
Mohamed Taib, Sheikh	Sheikh	In Index
Musaffar Chandra	(Indian)	Chandrasekaram Pillay
Nik Ahmad bin Haji Nik Hassan	Nik (Royal)	
Obaid ul Haq	(Pakistanis)	
Raja Bot bin Raja Jumaat	Raja (Royal)	
Sandhu, K.S.	(Indian)	Kernal Singh Sandhu
Shamsul, A.B.		Shamsul Amri Baharuddin
Singh, Bilver	(Sikh)	
Sundaram, Jomo K.	(Indian)	Jomo Kwame Sund'am Sundaram
Taufiq Abdullah		
Wan Mohamed Amin bin Said	Wan (Royal)	

Zainal Abidin bin Ahmad	Abidin (Religious)	
-------------------------	--------------------	--

*Sequencerefers to alphabetical sequencing, e.g. ‘al’ (like the English article ‘the’) is normally not used for sequencing.

Source: J. M. Gullick (1987, 390-417), Hussin (1993:164-173).

Appendix 4. Guide for bibliographic entry of Indonesian names

Name Cited	Title /Surname	Notes
Abdurrachman Surjomihardjo		
Adam Malik		
Ahmad Dalan		In Index
Bachtiar Rifai, T.		
Gunawan Wiradi		
Ibrahim Suchari, S.		
Junus Salam		
Koentjaraningrat		
Nasution Harun	Clan name	
Nojo Warongko, A.		
Soedjito Sosrodihardjo		
Sri Mulyono	Sri	
Suryadinata, Leo		
Teuku Jacob	Teuku	
Soejono, I.		
Soerjaningrat, Soewardi		

Source: Koentjaraningrat (1985: 473-500).

A Note on Indonesian Name Entry

With reference to the Departmen Pendidikan dan Kebudayaan's (Perpustakaan Nasional Indonesia) Katalog Disertasi series (up to 1985) and Bibliografi National Indonesia (Bni) Series (up to 1997), name entry for Indonesian authors follows the Anglo American system. This means it takes in the name that appears last, or at the rightmost position. In other words, when there is more than one name elements for a writer, the one that appears rightmost will enter as the name for citation as well as indexing, regardless if that name element is the writer's surname. The main advantage of this method is it saves a lot of time in identifying the surname or the right name element. The price for it is that it tends to mix up the name elements for many. To compensate for the mix up, the system provides a cross reference list for most of the Indonesian names (excepting the mono names and Chinese Peranakan names). The list shows first the leftmost name element, without implying the status of it, be it a surname or family name.

In one entry, the name Bambang Supeno appears first as "Supeno, Bambang". On the cross reference list under Bambang Superno one reads "lihat (see) Supeno, Bambang". For a Balinese name "I Wayan Yasu", the first entry is by "Yasu"; the other two name elements (I, Wayan) appear in the cross reference list with also the instruction "lihat...".

This system of cataloging has done slight injustice to Muslim names, for it tak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o given names. For example, the name Syaikh Abdul Aziz bin Abdullah bin Baz is entered as "Abdullah bin Baz". An equally unjustified situation is to truncate "Abdul Kadir" (likewise all other similar compound names) into Kadir, Abdul.

In Daftar Nama-Nama Pengarang Indonesia (Proyek 1978), all clan names such as Lubis and Nasution are taken as the entry names, i.e., placed at the leftmost.

Appendix 5. Names of selected Indonesian ministers

Names Without Titles	Where born	Own Name with Titles
Abdurrahman Wahid	Jawa	President Kyai Haji Addurrahman
Achmad Sujudi	Bondowoso	Dr A. Sujudi
Agum Gumelar	Jawa Barat	Lt Jenderal Agum
Agung (Anak Agung Gede)	Bali	Dr Anak Agung Gede Agung
Al Hilah Hamdi	Cilacap	Ir al-Hilal
Alexander Soony Keraf	Flores Timur	Dr A.S. Keraf
Ali Rahman	Tlgbawang	Dr Ali
Alwi (Abdurrahman) Shihab	Sulawesi S.	Dr Alwi
Bambang Sudibyo	Temanggung	Dr Bambang
Basri Hassannuddin	-	Mr Basri
Bomer Pasaribu	Tapanuli S.	Dr Bomer
Hasballah M. Saad	Aceh	Dr Hasballah
Hidayat Jaelani	Jabar	Drs Hj Hidayat
Hikam AS (Muhammad Hikam)	Jatim	Dr AS Hakim
Juwono Sudarsono	Ciamis, Jahar	Prof. Dr Juwono
Khofifah Indar Parawansa	Surabaya	Dra Khofifah
Kwik Kian Gie	Jateng	Drs Kwik
Lak'na Muda Freddy Numberi	Serui	Mr LM Numberi
Laksamana Sukardi	-	Ir (Sukardi)
M. Ryass Rasyid	Sulawesi S.	Prof. Dr M. Ryass
Mahadi Sinambela	Sumut	Mr Mahadi
Marzuki Daarusman	Bogor	Mr Marzuki
Megawati Sukarnoputri	Bali	President Wakil Megawati
Mohamad Prakosa	Yogyakarta	Dr Ir M. Prakosa
Muhammad Tochah Hassan	Tuban	Drs K.H. Tolchah
Nur Mahmudi Isma'il	Kediri	Dr Ir Nur Mahmudi
Nur Zakasih	Tangerang	Drs Nur Zakasih
Rozik Boediro Soetjipto	Jateng	Dr Ir Rozik
Sarwono Kusumaatmadja	Jakarta	Ir (Sarwono)
Surjadi Soedirja	Kalarta	Letjen Surjadi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Jateng	Letjen (Susilo)
Widodo AS	Jawa Tengah	Laksamana Widodo
Wiranto	Yoyakarta	Jenderal Wiranto

Yahya Muhaimin	Jateng	Dr A. Yahya
Yusril Ihza Mahendra	Sumatera S.	Prof. Dr. Yusril
Yusuf Kalla	Sulsel	Drs (Yusuf)

Notes: 1. Titles are meant to replace 'Mr.' in many cases; adding it in is redundant.

2. K.H.=Kyia Haji, Lak'na= Laksamana.

3. Address within a bracket needs verification.

4. For all official address on documents, the full name and all titles should be shown.

Source: Kompas 27.10. 1999.

Appendix 6. Names of selected ministers and heads in Brunei Darussalam

Names without Titles	Titles	Own Name with Titles
Abdul Aziz Umar	Pehin, Dato	Pehin Dato Abdul Aziz
Abdul Rahman Mohd. Taib	Pehin, Dato	Pehin Dato Abdul Rahman
Bahrin Abas	Pengiran	Pengiran Bahrin
Hassanal Bolkiah II	Sultan, Haji, Sir	Sultan Hassanal Bolkiah
Hussain Mohd. Yusof	Pehin, Dato	Pehin Dato Hussain
Ibnu Apong	Mejar Jeneral Pengiran	Mj Jeneral Pengiran Ibnu
Isa Ibrahim	Pehin, Dato	Pehin Dato Isa
Ismail Damit	Pengiran, Dr	Pengiran Dr Ismail
Jefri Bolkian	Prince	Mr Jefri Bolkiah
Johar Noordin	Dato, Dr	Dato Dr Johar
Mohamed Bolkiah	Prince	Mr Mohamed Bolkiah
Mohammad Zain Serudin	Pehin, Dato	Pehin Dato Mohd. Zain
Zakaria Sulaiman	Pehin, Dato	Pehin Dato Zakaria

Appendix 7. Names of selected Malaysian ministers

Names without Titles	Titles	Own Name with Titles Address
Abang Abu Bakar bin Mustapha	Abang	Abang Abu Bakar
Abdul Kadir Sheikh Fadzir	Datuk	Datuk Abdul Kadir
Abdullah bin Ahmad Badawi	Datuk Seri	Datuk Seri Abdullah
Bernard Dompok	Tan Sri	Tan Sri Dompok
Daim Zainuddin	Tun	Tun Daim
Effendi Norwawi	Datuk	Datuk Effendi
Hamid bin Syed Jaafar Albar	Datuk, Syed	Datuk Syed Hamid
Leo Moggie Anak Irok	Datuk Amar	Datuk Moggie
Ling Liong Sik (Lin Liang-sih)	Datuk Seri	Datuk Seri Ling
Mahathir bin Mohamad	Datuk Seri	Datuk Seri Mahathir
Md.Tajol Rosli bin Md.Ghazali	Datuk, Mohamed	Datuk Mohamed Tajol
Megat Junid bin Megat Ayob	Megat	Megat Junie
Rafidah binti Adul Aziz	Datuk Seri	Datuk Seri Rafidah
S. Samy Vellu	Datuk Seri	Datuk Seri Samy Vellu
Zaharah binti Sulaiman	Datuk, Siti, PhD	Datuk Dr Siti Zaharah

The Search for Asian National Histories*

王賡武

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諮詢委員

I am delighted that IAHA has come to this beautiful part of Malaysia and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ongratulate Professor Ahmat Adam and his colleagues for making all this possible. We all know how difficult it is to organise a conference of this size and quality, and how much more difficult it has been for the committee during a period of financial crisis.

Some words about IAHA might be appropriate here. The idea of IAHA is based on a broad definition of the region of southeastern Asia, that is, the arc from Japan to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There has been an understanding that the major focus will be on the maritime world stretching out in every direction from archipelagic Southeast Asia. The membership is, of course, not exclusive to this maritime world, but most IAHA conferences have been held in cities not far from the sea, often on islands, and significantly with a preponderance of papers about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This time, at Kota Kinabalu, we are the closest that IAHA has ever been to the sea, and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a more lovely setting for our meeting.

In 1960, a meeting in Manila was called in the name of IAHA and was followed in 1962 by a second meeting in Taipei. Also in 1960, a Southeast Asian historians conference met in Singapore and this was followed four years later by the meeting in Hong Kong in 1964. At that point, both groups agreed that the two should come together under the banner of IAHA, and that the Hong Kong meeting be considered the third meeting. It was then decided to hold the fourth meeting in 1968 in Kuala

* 本文為專題演講講稿，全文宣讀於 2000 年 7 月 27-31 日在馬來西亞沙巴舉行的「第十六屆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研討會」(The 16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Lumpur, to be hos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Has this been justified? Yes, it has provided many historians in Asia an opportunity to meet regularly with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display the results of their research. If they have not been successful and valuable, these conferences would not have been held every two or three years for forty years. Of the 16 meetings, I have only attended nine of them. Frankly, not all meetings have been equally wide-ranging and unforgettable. But the overall picture is most satisfying and encouraging, and a sense of a rich and varied Asian history that has much in common has clearly emerged.

The 20th century and Asian history

The theme of this conference is The 20th Centu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100 years of Asian history. The theme is a very broad and challenging one and seems to link history-writing with developments of the century. Does it imply that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is period was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actual events of history? If we look closely at most examples of history-writing in the region,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avoid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writing was often directly affected by changing conditions. My subject today, "The search for Asian national histories", was chosen with that understanding in mind. Nations can no longer act alone. They cannot isolate themselves from global changes, nor can their national histories ignore what is happening elsewhere in their neighbourhood, their region, not even the world. It is in this larger context that national histories should be measured. Their quality and value to their countries and to their readers will increasingly depend on how they hav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national histories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s produced this century. Thus, I shall begin with and the impact of the century's developments on history-writing, especially in Asia. It will be obvious that, with nation-states as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e century's stories, national historie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history as what happened; history as what has been written about the past; and the evolving methods and theories necessary to the writing of modern history.

The most important is, of course, history as what happened. This is so complex today that no one can know it all. Thus, only the knowable events encompassing people, place and time are grasped and, where history-writing is concerned, only their impact on how countries expect their historians to respond to these and other events further in the past that need reexamination. This would influence the direction of the historians' research,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ast. I shall not to try the

impossible and summarise the story of the last century. Instead, focusing on some larger global trends, I shall offer comments on the most striking ten features of the 20th century. Through that, I shall look at some examples of their impact on historians and the writing of national histories.

1. The most violent century.

The most striking example is that this has been the most violent century in human history, at one level among nation-states, with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viding more and more destructive weaponry, and, at another level,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s. At the level of countries, we can start with the histories of the two world wars, including the war in the Pacific and what that did to Southeast Asia, for a start. As always, there remains the tradition that the victors dominate the history-writing but, unlike in the past, it has to be said that there have been more histories about those who have been defeated as well. More than has ever been seen before, there are also histories on those who were to blame and on those who were victims. Here popular and professional histories often part ways, with popular writings more interested in heroic and tragic occurrences and the details of war and strategy, while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remain more traditional in focusing on failures in statecraft and diplomacy. What is interesting is why historians in some countries are more active and moralistic on war themes and war crimes, and why those in others are more silent and perhaps even defensive. The issues of collaboration and guilt are intertwined with the desire of many who want to forget. The reasons why this is so have added a dimension to modern history-writing.

At another level, we have seen new kinds of violence arising out of racial differences, with illusions of racial superiority, or simply brutal practices of “ethnic cleansing”. What is more, these not only occurred in conditions of war but was violence done to people within the borders of nation-states. These were kinds of wars within countries, fought on ethnic, class, caste and religious lines. The documentation of such occurrences is growing alarmingly and few historians have yet had the chance to tell the full stories.

2. The century with the most freedom.

Ironically, the century offering more people the benefits of liberty has come almost as if in reaction to the century of increased violence. There are certainly more people making greater efforts to seek freedoms like the freedom from tyranny, that from lawlessness, also from hunger, and perhaps even from fear itself. Clearly, this is a controversial matter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have had different experiences,

especially in matters concerning hunger. Historians in post-colonial countries have given more emphasis to political freedom and liberation from foreign rule, while those without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would have stressed other freedoms, most notably those surrounding personal liberties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We need to consider how these different emphases shaped the work of historians, especially on questions of political freedom in the periods before colonial rule, and of the relative freedom of historians to practise their profession,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writing of new national histories. But, except among some Indian and Chinese historians, there has not been as many studies on subjects like poverty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3. The century of improved workers and women's rights.

I refer here to the remarkable liberation of labour from victimisation and drudgery, the freeing of more women from various degrees of bondage, and most children from illiteracy and premature deaths. This has made for new societies which emphasise the health and age of their population, and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their welfare and education. These new developments have clearly led modern historians to ask different questions of their sources of earlier periods, to write history on themes unheard of in the past, for example, on social history pertaining to gender and the working people, o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But, with the hectic efforts of most new countries to become prosperou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with the increasing emphasis on the bottom line as a matter of national importance, this trend has been slow to develop in Asia. This is changing, but it is perhaps understandable that most historians have not given these themes higher priority until recently.

4. The century of democracy.

The result of this is more controversial, but we do see the largest number of citizens so far living under democratic systems of one kind or another. And there are strenuous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define and implement newly conceived ideas about political and legal rights for all. The impact here on Indian historians have perhaps been the most obvious, whether writing on colonial rule or anti-colonial movements. This is so even when they are writing on pre-colonial institutions that foreshadowed the end of feudal rulers and their political systems, and the undermining of aristocracies and oligarchies. This kind of history-writing is perhaps strongest when writing on the role of class in the political histories in the region. The challenge for historians elsewhere in Asia, however, is yet to com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historians will have to examine the efforts by governments to deny or delay democratic rights to their citizens as well as question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countries that have taken the democratic road.

5. The half-century (the second half) of Asian economic recovery.

After a century of decline, I am referring here to something relative, that is, relative to past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to modern Western economic progress. The recovery has been led by Japan, but impressive performances have also been found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generally. Much has been written about the great agrarian and maritime empires in Asia and how they had been prosperous and progressive in the past and how they declined and were systematically undermined by the new global economies of the West, especially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previous emphasis was on the destructive effects of imperialism. With improved economic performances of certain countries in Asia, historians have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resilience, the adaptability, the ingenuity of various classes of Asian peoples throughout the periods of radical change. Much of this is too recent for historians to make an impact, but the voluminous quantitative data now available should lead to much higher standards of economic history being written in the decades to come.

6. The half-century (also second half) of unfulfilled hopes.

By most standard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we are certainly conscious of the problems of other regions, notably the relative lack of economic growth of Africa, issues of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stability of Latin America. The comparisons made between Asia and the other regions of the less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worlds have influenced historians to ask new kinds of questions about the cultural roots of various Asian countries and sub-regions. In some cases, whether justifiable or not, this has led to claims of cultural and even racial superiority of the peopl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Asia. Is this justified? Are we in Asia catching the European disease? How historians will rewrite history in response is still unclear, but there are some examples of revisionism which will need close scrutiny.

7. The half-century of US dominance.

We are all aware of the growing dominance of the US at the expense of Europe, especially in their performances and ambitions in Asia. This is a global phenomenon which began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but became very obviou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has impacted on all countries in Asia. But the expansion of US interests in the Pacific is specially relevant to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n recent decades, and the impact on historians is unmistakable, for example, in the neglect of South Asian history among the scholars of most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the dominance of the US in the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has influenced history-writing in the whole region. Often refreshing and always stimulating, this influence needs critical attention to ensure that the new concepts and methodologies are appropriate. The most positive effect is the way this has aroused some historians to reexamine their earlier frameworks and discard those which have outlived their usefulness.

8. The century also saw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This was related to, and something of a corollary of, of the previous development. The key point is the pervasive influence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legacy of that influence even after Soviet communism ran out of steam. This has obviously affected the writing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but it has influenced other realms of history-writing as well, for example, the history of ideologies like that of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socialism and liberalism, the different stag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nationalism, notably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Soviet “Stalinist” and Chinese “Maoist” ideas on historiography for several decades. The idea that there may be no alternatives to the future dominance of the capitalistic world economy has aroused debate and resistance, notably in the “end of history” and “clash of civilizations” debates, and these have begun to influence those who are popularising globalised history-writing. It is interesting how often people like Francis Fukuyama and Samuel Huntington have been invited to explain themselves in Asia. What historians in Asia can actually contribute to this larger trend is yet to be seen, but at least many have joined in the debate if not actually offered new interpretations of Asia's place in the new world history.

9. It has also been a century of migrations, especially emigrations over long distances.

This has led to the reexamination of older ideas of racial and ethnic identity, notably the rejection of certain concepts of race, in the context of an unprecedented intermingling of cross-cultural migrant populations. There has been a great gap in attitudes in Asia between maritime peoples living in port cities and coastal kingdoms and earthbound peoples in large continental states and empires. For the latter agrarian states, their approach towards the idea of nation tended to be through cultural assimilation over long periods of settlement as the basis of unity and solidarity, and this influenced the histories they produced and are still producing. For the former, the maritime peoples, the practice of *merantau* and free movement across seas and oceans supported traditions of migration, resulting in some of the many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With maritime mobility, the sense of the past is more open, less grounded. With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nation-states, the new nations have mostly chosen to follow the assimilationist model and sought to achieve this norm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nationalist historians have been urged to rewrite their histories to fit this framework. More recently, these histories are being challenged by postmodern writings that question some of their assumptions about the permanence of nation-states as well as the narrow and anachronistic ways they have been reinterpreting the past. The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relevance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transnationalism for Asian nations illustrate the problems here which historians cannot afford to neglect.

10. Last and not least, the century has seen a growing awareness of how humans have been destroying the environment. It is too early to say how Asian historians will respond to this new phenomenon, but there are signs that they cannot be unaffected by this and may have to reconsider some of the premises underly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ies they have been writing. It may also have some effect on the narrow nationalist and regional approaches that have been popular in recent historiography.

The historians' response

In this outline, it is clear how much the events in any historian's life time can influence the way historians write and interpret the past. Does this then mean that history-writing is a dubious academic discipline? This is a question we should ask ourselves from time to time. The fact that almost all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still have history departments is no guarantee of the subject's immortality, though it suggests that the discipline has proved its worth.

Let me now turn more directly to the changing perspectives of the historians in Asia who have lived through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entury, that is, to what has been and is being written during this period, whether written afresh from new sources or revisionist history written to correct past interpretations. Apart from those in Japan and China, most of the historian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received some formal history training in Western languages, notably colonial history in school and then aspects of Western expansion into Asia in modern times. This was the tradition of using documents largely centred on, and drawn from, official archives, thus with an inbuilt bias towards administrative,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history. If the documents

were meticulously and critically studied, this was thought to have been the most accurate way to depict what actually happened in the past. It called upon “scientific” skills of detection and investigation and was regarded as maximally objective. Its most important feature, however, was its keen sense of linear time as the basis for causal explanations of any historical event.

In addition to this formal training in school and university, many others received an education in local traditi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were familiar with traditions of chronology and biography with much dependence on bureaucratic sources and the tendency to be moralistic and didactic. This would have provided some corrective to western imperial history. Other corrective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writings about the past were in local languages. These were usually dismissed as histories by Western historians but careful classical and philological research have shown them to be rich in anecdotes, human narrative,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founding myths. With the stimulus offered by the newer methods of anthropology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 new ways were found eventually to use these rich works to give new inspira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past.

The plural society found in most countries in Asia, the work being done in museums was also important: fields like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ethnography, sources in oral evidence and folk stories, the skills of linguists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ists we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Southeast Asia. These produced data which made up for the paucity of written records for the region. Historians in Japan and China were quick to employ Western methodologies to recast their countries’ own long histories. It was quite remarkable how they adapted their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without losing their ability to represent their new national histories with conviction. Chinese historians readily learnt from the examples of their Japanese colleagues and were willing to rewrite parts of their history in modern terms. They appreciated that Western ideas about history were being utilised and some produced excellent studies thereafter. The brilliant work of Wang Guowei, the younger Guo Moruo, and many others who had studied in Japan, are still respected in China today.

Others were influenced more directly by the work of historians in Europe and the US. In particular, I should mention those who wrote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historians like Gu Jiegang, Zhang Xinlang, Feng Chengjun, and the brilliant studies of Chen Yuan and Chen Yinke. They encouraged a new generation of historians who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Southeast Asia, men like Xu Yunqiao, Yao Nan and Zhang Liqian who studied the Malay world, Thailand and other parts of maritime Southeast Asia and wrote their studies in Chinese for readers in China. These were early example of the coming together of divergent historical

traditions to extend history-writing beyond conventional boundaries and make their work more rounded.

There were other important landmarks. Most of you will recall their immediate impact on the field in the region and elsewhere in Asia. Let me mention a few of them. During the 1950s, an awareness of the future of post-colonial history-writing in Asia led the way to two projects: the SOAS London conference that produced the three volumes on South Asia, China and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ornell volume on Indonesian historiography edited by Soedjatmoko. They were soon followed by the convergence of interest in Manila and Singapore and the two conferences of 1960 that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our regular IAHA meetings thereafter. It is instructive to reread the three SOAS volumes and the Soedjatmoko volume today, although we have indeed come a long way from them both. There was already an awareness of the efforts to correct the inbuilt biases of Western history-writing on Asia, though there was as yet no hint of the frontal attacks that were later launched by Edward Said. Indeed, throughout the 1960s and 1970s, great progress was made to correct that bias. Let me give a few notable and well respected examples,

a. Economic history, that of tin and rubber, that of trade and shipping, roads and railways, and that of labour, including early efforts to organise them into trade unions. This captured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region as it was being locked into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e increasing use of statistical data was already remarkable in the works of historians like Wong Lin Ken, Michael Stenton, and John Drabble.

b. Social-cultural history, of ethnicity and plural societies, of class and class differentiations, of education, of arts and the media. There was a new interest in folklore and literary works, in the local and in the regional. Also, there was a greater consciousness of the underlying power of the peasantry, of their poverty and the inevitable urbanisation of more and more of their next generation.

c. In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was the pressure to build the modern nation-state. Thus there was a steady growth of revisionist history and the advent of nationalist history. I shall say more about this later.

d. Not least, the prevailing ideological debates among communists, socialists, capitalists, and other ideologies, led to the ris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an extension of cultural history. This also met the need to stress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modern nation-building. This was particularly true of the historians in China and Japan as well parts of India, and did play a part in the early post-independence histories written in Southeast Asia, albeit still a small one and is a field yet to be developed.

I shall be brief abou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writing during this century, that is, the conscious efforts to improve our ability to represent and understand the past. This is history at a more abstract level, history-writing in the context of new developments in other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methodologies. There has not been much new theory coming out of the writing of Asian history. The striking contributions of Clifford Geertz and Ben Anderson underlined the fact that the former is an anthropologist and the latter a political scientist. Initially, the most vigorous work was found among Chinese and Japanese historians who responded to the challenge of many kinds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notably the nationalist and Marxist interpretations.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some of the notable Chinese contributions. There have also been several Japanese historians, like Naito Konan and Maruyama Masao, who had made an impact outside the region. More recently, the *Annales* tradition and the penet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have reached every part of history-writing on Southeast Asia, as seen in the work of Sartono Kartodirdjo, Taufik Abdullah, Anthony Reid, Khoo Kay Kim and Cheah Boon Kheng, just to mention a few. In short, a progression from classical philology and chronicler approaches; from didactic history to social philosophy and ideology; from liberal and nationalist to the social scientific perspective. In brief, essentially adapting Western trends to the reexamination of traditional source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this has been particularly strong in India and major advances in Indian history-writing have begun to have an impact on historiography elsewhere. I believe the work of Ranajit Guha and Partha Chatterjee have opened the way to more imaginative explorations of the Asian past than had been done before. But, given that more rigorous research has been done during the past few decades, we should expect new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ory and method out of the best research being done. But it is not the historian's job to seek theory for theory's sake.

National and nationalist histories

Let me turn now to the search for national histories in this wider context of 20th century of history and a century of history-writing. Clearly the impetus is there for research that will help in producing new national histories. As I suggested earlier, national histories are relatively new to Asia and more of them will be written, with or without historians. I need hardly say that I would like to see such histories written by scholarly historians than by propagandists and politicians. For some time to come, I expect national histories to remain important in Asia and to constitute the major tasks

of historical writings in Southeast Asia. They are still largely concentrated in the areas of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history, and aspects of military history, and also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with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offshoots. And there will always be interest in the writing of biographies. I also note the input of fields like antiquities, oral history materials, preparation of reference works, and other dimensions of data collecting. In addition, conferences, debates and exhibitions are held regularly, often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citizenry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better appreciation of accurate national history. There is, of course, also the writing of text-books and history teaching for schools, which deserve special mention. I shall touch on this topic a little more later.

These approaches remain at the core of historiography in Asia and can be expected to remain so in the future. The important feature is that many of these histories are now influenced by wider perspectives, notably interdisciplinary ones. The writings are richer and probe more deeply into the responses of ordinary people than in the earlier histories. In this way, there is bound to be a growing tension between national and nationalist histories, one that might lead to some resistance against such dominant trends in history-writing. But, as I have suggested earlier, as long as the nation-state remain the basis for most power relationships in the world, there is no escape from national history. If that is recognised, many historians will have to face up to the responsibility of ensuring that reliable national histories be written.

What is significant is that, over time, there have usually been moves away from nationalist histories to national histories. Hopefully, this shift will be completed, and there will only be efforts to write better and more rounded national histories. Let me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ational and nationalist histories:

Nationalist histories imply “nationalizing” history, thus forcing history to serve political ends that may be compared with nationalising industries and businesses. And we know the results of most of those - inefficiency and wastage, including many cases of downright bankruptcy. These nationalist histories are mostly found in countries that are newly independent and anxious to achieve unity and a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s quickly as possible. Driven by emotional reactions to a feudal or colonial past, the historians reflect immediate national goals to want to push ideas of collective loyalty and to achieve conformity to a single national purpose through the acceptance of a common history. If there is relativ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omogeneity in their countries, the task may be low key and not greatly controversial. But where there is no ready-made sense of unity, historians may be asked to use certain events in the past to highlight specific political goals. When this is done skilfully with a firm control of

accurate and reliable sources, powerful and even persuasive works of history could be produced, writings that could unite disparate communities in the new nation and thus shape the desired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But this is rare. More often, the work is done poorly, with political ends uppermost among those asked to write such histories. There is often a weak grasp of the data and little sensitivity to variou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the result could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even create disunity and total alienation.

Thus nationalist histories are potentially political weapons in the hands of governments and politicians in opposition. Instead of advancing the art of history, they could actually be writings that discredit historians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These histories may have been the products of an unavoidable beginning in self-discovery, but mistaking such writings to be the goals of history-writing would do no good to the important role history can play in a nation's development.

In contrast, successful national histories do get written, but they usually come from later stages in nation-building. There have indeed been good histories written in older nation-states, notably in the West where the nation-states were first developed and therefore have long histories and much experience in handling their pasts. Their success has often been due precisely to the fact that their historians have been preparing such histories over time, perhaps after many failures. In short, where there is wide agreement about the place of history in supporting national pride, there is also ready acceptance of the idea that every nation needs many kinds of history-writing in order to capture adequately the spirit of nationhood.

Clearly, there is still a gap between nationalist 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any parts of Asia. This is largely because the nation-state is still relatively new to the region and many countries are concerned to be nationalist so that they can overcome the politically divisive elements in their societies. In short, they are engaged in the onerous tasks of nation-building and believe they still need strong nationalist images, including trying to impose common understandings of their pasts, in order to speed up those tasks. Historians are therefore under pressure to come up with books that are directly helpful to political and community leaders who want to nail down what they want to see in the national etho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s long as the nation-state remains the universal basis for countries to be organised in the world, some historians will have the duty to write national histories. How they do so, and at the same time achieve high standards of historiography, will var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But, after several decades of post-war and post-colonial growth and nation-building policies, som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have got past their

nationalistic phase. Their histories do not now have to reflect the emotional nationalism that characterised the early years of independence, but should be able to move on to a new phase of weighing and assessing the nation-building achievements of the past four or five decades.

This takes me back to the writing of textbooks and the teachers who teach from them. I was pleased to see from the IAHA programme that there are history teaching panels and several other papers which touch on this issue. This is a subject that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from historians. It raises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the role of historians in society, the need for everyone to understand the past, when people should begin to learn about that past and how much to learn about it. The issue of preparing educational textbooks forces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to demonstrate that what they know is important, especially what to remember in order to counter efforts to forget that which is inconvenient and embarrassing to people who seek power and excessive wealth.

Here I must admit to a sympathy for history scholars who do not want to be involved in textbook writing for I have personally shied away from it myself. But I am very conscious of the challenge historians and history departments face today around the region, especially in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which did not have a strong indigenous history-writing tradition. If historians can educate the young to learn about and value the past, they would not only reaffirm the value of their discipline, but also convince their people how essential the profession really is. The subject cannot be avoided by the profession. Some must come forward to tackle the issue head on. If IAHA and similar meetings can include regular sessions on how this necessary work can best be done, I believe they will be making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keeping this subject alive i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at should certainly benefit all nations wherever they are. This matter is all the more urgent in the fact of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that is occurring when the young hav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On the one hand, the internet will fill the gap if there are no credible text books for them to read. On the other, this is a “great leap forward” beyond the orthodox audio-visual aids of slides and films. It is also another opportunity for historians to reach out to the young with imaginativ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Perhaps the next IAHA meeting could take up the issues which this new medium offers.

I do not wish to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national histories are all important. There is a great variety of history to be written besides that. In the midst of all the arguments about what kinds of history to encourage or discourage in various parts of Asia, we find many new trends which are likely to become even more striking in the

future. I shall be content to offer a few examples here.

There have been some new efforts to move away from national histories to regional approaches, notably among Japanese and some Chinese historians. This is a trend that had begun with regional studies by western historians, for example, D.G.E. Hall, Brian Harrison,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David Steinberg and his colleagues, Milton Osborne, and others. It is interesting that these regional histories had first appeared even before any significant nationalist histories had been written. Within the region, historians have been more hesitant to write such histories, partly because they were concentrating on their own histories, partly because they were not convinced enough that the region is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as a unit of study. With the continuing success of ASEAN, there may be different perceptions in future about ASEAN history, but events in the larger region of the Asia-Pacific may keep the idea of regional history fairly open and undefined.

There is now some attraction in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ies, arising out of the growing interest in world and global histories. This is still new. The wider perspective may appeal to younger historians writing mostl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but these approaches have yet to reach most people within the region. The area where these writings may be influential is in the study of migrations and diasporic communities and all their activities. But for most historians of Asia still struggling to write good national histories, there is no urgent demand for this outreach.

I am also reminded that various kinds of revisionist histories continue to be written. The most important have been nationalistic corrections to earlier Eurocentric writings, but there is less of that now. There have lately been critical appraisals of all Marxist histories - not just anti-communist, but also works which challenge the underpinnings of the kinds of economic history written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in Japan and China, but also can be found in India and some of the countries of Southeast Asia. Of course, revisionism underpins all history-writing to a larger or lesser extent. One may even describe it as a healthy antidote against developing the sense of complacency in any historical tradition, a check on any attempt to insist that only one received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is acceptable. I am happy to say that, in every IAHA meeting I have attended, I have found this willingness to offer revisionist views to be present.

In addition, gender considerations are beginning to appear in recent history-writing, certainly as a kind of revisionism if not as full-fledged gender histories. These are still early days for this area of history, but it is receiving more attention in some

parts of the region, notably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history (although indifferent ways on the mainland, and in Taiwan and in Hong Kong). And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special issues of notable journals that have been devoted to gender questions. In traditional Asia, historical sources for gender issues are less obvious, but many scholars using Chinese documents have demonstrated how rich they can be if read with care. For Southeast Asia, I believe we can do the same with modern sources, including colonial documents and oral evidence.

I must mention environmental history, even though this is only just beginning in Asia. I have little doubt that this is a genre that will flourish in the 21st century. Already, the reexamination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sources in Japan, India and China has revealed there had been a deeper appre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matters among our ancestors than earlier historians had realised. Indeed, the challenge to discern and outline these concerns in premodern Asia have taxed the imagination and sensitivity of some historians already, and I know many others who are also determined to dig deeper in early materials, not least among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that supplement what has been recorded in writing.

Each IAHA meeting has included papers that reflect the impact of the century on history-writing in Asia. They have sought to push at the limits of the conventional boundaries of history in response to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But most still recognise that the new approaches cannot replace the basic work that is peculiar to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The narrative structures are still needed and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 The search for, and scrutiny of, reliable sources must precede the desire for new interpretations. There is always the duty to keep each other honest through open debates, through exchanges of views across all borders. And there is no escape from the changes in the world as they influence the way the past is studied. The changes help determine which parts of that past are important for the times. These in turn will sharpen efforts to induce people to read what historians write, thus reaffirming the ability of historians to be valuabl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if not also active citizens of the world.

印度尼西亞新秩序後期暴動的當代史： 研究構想與暴動事件分類的提出

楊聰榮

澳洲國立大學亞洲太平洋歷史學部博士候選人

問題的發生：從暴動看華人與社會國家的關係

在 1998 年 5 月，印度尼西亞社會動盪不安，亞洲金融危機讓印度尼西亞三十年來快速成長的經濟體系為之崩潰，學生強烈要求政治改革，終於將在位三十二年的總統蘇哈托拉下台，這是印度尼西亞開國以來第一次沒有發生流血政變的政權轉移，和原先外界專家估計會發生像天安門軍事鎮壓流血事件的結果大異其趣。由於蘇哈托是自動下台，將政權交給甫任副總統的哈比比，外界對蘇哈托下台反應良好，人稱另一次亞洲「人民力量」的革命成就。有關在當時首都雅加達所發生的暴亂，被認為是這次革命中的插曲，是在 4 名大學生在被警方開槍打死之後引發，因而在當時輿論多半以為暴動有理，同時暴動的發生又促成了蘇哈托的下台，解決了三十多年的寡頭政治，暴動被視為新舊時代交替中無可避免的動盪。

然而在 5 月之後的一兩個月內，陸續傳出來關於暴動的消息令人對於暴動的本質產生懷疑，暴動在首都雅加達發生造成將近約 2000 人喪生，其中多數是無辜的民眾。而在這個前所有的掠奪大暴亂中，有更嚴重的犯罪事件，即針對華裔婦女施加強暴的罪行，主要是在暴亂最嚴重的 5 月 12 日到 5 月 14 日之間，在雅加達的部分區域，暴徒結夥搜尋華裔婦女，然後集體輪暴，並且常常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或是在其家人面前，刻意要公開羞辱，事後陸續清查，在雅加達約有超過 160 件，其中一些受害者已自殺。除了首都以外，類似的案例在中爪哇及北蘇門答臘都有傳出。消息傳出，舉世震驚。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華裔婦女受到性侵害的報導，是在事件發生過了一個月以後的時間以後才陸續傳出來，而且不是由正常的新聞管道傳出，首先是由一名受害婦女在網路上披露個人經歷，才引起注意，後來在網路上討論，受害的案件累積起來，才知道並非祇是個別性偶發狀況，之後經證實了事件的嚴重性，最後才得到一般性媒體報導。事件被披露以後，各界反應強烈。外界對於

印度尼西亞所發生的暴動事件表示震驚，並且對無辜的受害人表示深切地同情。

除了外界有強烈的反應之外，在印度尼西亞國內也有強烈的反應。帶有強烈的伊斯蘭色彩，甫上任的總統哈比比，向來被認為立場對華人比較不利，然而在上台之後，一再表明將致力消除印尼境內對華人的歧視做法。¹而在 1998 年 7 月 15 日人權委員會報告公布後，即五月暴動結束了兩個月後，首次公開評論暴徒大規模強姦華裔婦女的罪行。他形容一連串的強暴，是「印尼歷史上最慘無人道的事件」。這是一國的總統所能表達的最強烈的字眼。

這個事件使得這個原先被認為是學生爭取民主的「五月革命」蒙上了陰影，原先以「人民力量」來稱讚這次運動的外國媒體，也改以保留而審慎的態度來報導，這使得五月暴動的意義與評價大逆轉。到目前為止，五月暴動的真相仍是像謎一般，難以有個清楚確定的解釋。幸好有人道主義團體「人道志願者」在第一時間調查受害情況，公布了三次調查報告，使世人對於五月暴動至少有個理解的依據。

印度尼西亞官方剛開始的確設立的獨立委員會來進行調查工作，這個獨立委員會也確實收集資訊及從事調查，最後出了一份調查報告，然而由於不同勢力在這個委員會中角力，最後的調查報告是一再修改之後才公布，據信是刪去了對於軍方涉入案件的懷疑，但至少基本的立場尚可維持住。然而官方同時卻有一連串否認五月暴動中有特別針對華裔婦女強暴案件的言論，十足混淆視聽。

首先是 1998 年 8 月中旬，印尼警察總長魯斯曼哈(Roesmanhadi)表示警方未能發現任何確實的證據，並暗示可能是由民間團體散佈不實謠言所致，這項說法即使受到人權團體強烈的抗議，但是在官方逐漸形成陰謀論的說法，即有人利用這事件以打擊印度尼西亞。接著 8 月 24 日最高情報官員莫托吉(Moetojib)表示，情報部調查人員並沒有查到任何確實的證據，有關性暴力的報導可能是杜撰的。8 月 26 日國會發言人加富爾(Abdul Gafur)告訴來訪的美國國會代表，強暴的報導受到特定勢力的扭曲。8 月 27 日新聞部長尤努士(Yunus Yosfiah)證實，印尼武裝部隊總司令威蘭托(Wiranto)提交報告，沒有發現有強暴的案件。一時之間，彷彿一個月前總統的譴責和婦女部長的痛心疾首全被丟到腦後。

何以事件會這樣逆轉？這要從兩方面來看，一個是外在的壓力，一個是國內政局的發展。就外在的壓力而言，事件的發展反應了印度尼西亞的政治風格以及爪哇人搬弄言辭的作風，就政治風格而言，印度尼西亞的民族自尊性很強，並不習慣外界一而再，再而三的指責壓力，總想找機會化解。發生在亞齊及東帝汶的暴力，至少可以責怪特種部隊執行過當所致。然而華裔婦女強暴案

¹ Hadi Satyagraha "Nondiskriminasi: Tantangan Dan Peluang Bung Rudy", Suara Pembaruan, 13 July, 1998.

件中，當國際輿論將矛頭指向印尼的種族歧視時，印尼官方普遍有不知如何回應的尷尬，總統哈比比一再發言失當，反應了這種尷尬。而以爪哇人為主體的印尼政壇，也充斥著爪哇人話說喜歡拐彎扭角，玩弄言辭的習性，先前的說法是警方找不到確實證據，後來的說法多半是部分引述這項說法，然後加上不同的闡示，最後政壇上迷漫陰謀論的說法，因此連婦女部長艾拉薇雅(Tuty Alawiyah)也趕緊附和，表示她之前所得的消息，也是未經證實的，以免池魚之殃。

另一方面，印尼國內政治的發展使得官方寧可玩這種誤導群眾的把戲。由於現在印尼政府是過渡政權，總統哈比比本身是在前總統蘇哈托下臺前匆匆被指為接班人，他的政權合法性尚待檢驗，自然不會去碰觸衝擊民意的議題。而在印尼反華人的議題上，一再指稱穆斯林團體涉及其中，使得少數激進的穆斯林團體反彈，例如在網路上流傳很廣的薇薇安(Vivian)的故事，²其中提到暴徒在犯案是口呼伊斯蘭真神阿拉，也令這些穆斯林團體感到憤怒，因此他們一再訴諸輿論，認為這是國際反伊斯蘭的陰謀，甚至發起反華人宣言，並且指稱這些以天主教徒為主體的人道團體的行為是叛國。在這種氣氛之下，官方的言論可以說是討好這股勢力，以免付出過大的政治代價，加上目前一些宣稱是五月暴動華婦強暴的照片被認定是假的，³於是官方順水推波，一再用不同說法，否認外界指認的事實。

後來甚至傳出官方利用台灣婦女團體代表團訪問印尼時沒有見到受害人一事來做文章，進一步推論是沒有發現受害的證據。這個消息透過印尼國家通訊社的報導，在印尼廣泛報導，台灣方面雖然婦女團體發表嚴重抗議聲明，卻無法得到印尼報章同等的重視，最後祇有一則更正啟事。最後的結果，對於五月暴動的事實真相不能釐清，也對於五月暴動中的組織性暴行缺乏解釋。一般報章報導普遍懷疑是軍方涉入其中，而將主謀指向特種部隊司令普拉博沃。普拉博沃在哈比比下台後，前往約旦避風頭，一年之後開始表示他是受人誣陷，否認其涉及五月暴動的傳言。⁴印尼新政府選出來以後，為了致力未來的發展，對這個事件也採取了拖延的做法，並沒有打算進一步追究的意圖。這樣的發展，使得五月暴動的背後陰謀，無法有清楚的證實。到目前為止，印尼沒有人因為涉及五月暴動而被起訴或判刑，這個事件恐怕是如此不了了之了。

儘管如此，在現階段沒有辦法進一步釐清事件真相，卻仍須設法及時進行研究，以免因為曠時久遠而讓事件被遺忘，使得未來更難以進行探究，因此在此提出一個研究構想，做為現階段可以進行的研究取向。

在這個研究之中，並不將焦點放在五月暴動本身，而將暴動放在比較長的歷史脈絡來理解。在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印度尼西亞傳出了一連串暴動，這些

² 參考附錄：Vivian 證詞。

³ 蘇東牧〈嚴防假的性暴力圖片 傷害援救活動公信力〉，中國時報，1998 年 8 月 2 日。

⁴ 〈伯拉波沃·蘇比安托要求平反〉，指南日報，1999 年 10 月 16 日。

暴動經常佔據了國際新聞的版面，暴動的種類和性質都有相當大的差異，一段時間給外界的印象是社會動盪，社會充斥暴力，內部集團不協調。這種情況和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印度尼西亞給外界的印象顯然有所不同。印度尼西亞一度被認為是能夠整合不同文化族裔的模範，並以其富於對差異性的容忍精神見長，尤其是在宗教方面，而對外來事務富於彈性也經常為人所稱道，在威權體制的統治下社會相對來說比較安定。為什麼九十年代的印度尼西亞和以往有這樣的差別呢？在這一連串的報導中，最突出的是這些暴動都以印度尼西亞華裔公民為直接或間接的受害者，至少就華文媒體和國際媒體的報導而言，這方面是報導的重點。本研究試圖追問，為什麼九十年代的印度尼西亞會爆發這些暴動？這些暴動的性質是什麼？這些暴動和華裔有什麼關係？為什麼部分暴動將華裔當成攻擊對象？應該如何來理解這種現象？

這些暴動事件應該放在同一個時代脈絡來理解，而非將暴動當成孤立的單一事件來看待，因此應該將這一時期的暴動進行通盤的理解，這個時代脈絡的特質與印尼蘇哈托總統所領導的政權息息相關，這裡稱為印尼新秩序後期。為了要方便未來的研究，這裡將提出一個研究構想的範圍，並且將這個範圍所涉及的大小不同性質的暴動事件，依時間的先後順序以及不同時段發生暴動直接引發原因的性質做出歸類，歸類的過程即涉及對暴動事件的理解，而歸類的結果也有助於未來以概念思惟方式來討論暴動事件。

由於這類事件並非國際政治新聞焦點所在，一般的報章雜誌很少持續性的報導，經常是在暴動剛開始發生時給予比較大篇幅的報導，而此時對於事件的瞭解與查證通常很有限，祇能夠根據外電新聞記者及時主觀的意測。等到事件有進一步發展或明朗化的時候，卻見不到後續報導，或許是國際新聞的版面有了新的焦點，或許是在目前的國際政治新聞的生態中，事件的後續發展得不到主編的青睞，所以一般讀者經常對印度尼西亞的暴動事件的印象通常是零星，也缺乏整體的理解。本研究構想即試圖在一個比較大的架構下，做一個全面性的理解。

兩種簡單歸因的謬誤

如何來理解在印度尼西亞一再發生針對華人的暴亂？如果對暴動有比較好的理解，也可協助來理解華人在印度尼西亞的社會關係與地位，甚至進一步理解印尼的國家與社會的運作關係。然而有兩種不同的論述觀點經常阻礙了客觀的理解，第一類主要是存在許多印度尼西亞華人研究，有強烈的華人中心主義的問題，研究探討問題祇從華人社群的角度來看，忽略了和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使我們不容易從中掌握印度尼西亞的整體情況；第二類則主要存在於印度尼西亞研究中，則受到印度尼西亞政府政策的影響，假裝印度尼西亞不存在族

群問題，或是認為族群應以國家整合為最高目標，族群問題祇是次要的問題，或是祇考慮經濟層面的問題，刻意忽略經濟問題背後潛藏的族群問題。這兩種常見的論述方式都有偏廢之處，但是由來已久，因此要研究如暴動這一類的現象，就發生既有的研究不足以解釋的問題。

就學術研究的內在理路而言，我們可以將這些問題加以歸納，一般而言，在相關的研究中，存在著兩種利用簡單的歸因邏輯的論述，經常阻礙了我們對印度尼西亞族群關係的現實有清楚地理解。第一種稱之為「排華論述」，第二種稱之為「唯經濟論述」。在這裡將先做一個概略討論。

「排華論述」將所有的暴動簡單的歸因為「當地人排華」，這種論述普遍存在海外華人史，東南亞華人史或是印度尼西亞華人史等專門的研究之中，也普遍存在一般華文報章雜誌在報導印度尼西亞華人的相關報導。在東南亞華人史研究上，許多情況都以「排華暴動」為標題，來描述早年華人與東南亞的殖民主，或是華人與新興國家的衝突或矛盾，至今每有暴動發生，如果有華人涉及其中，一概以排華論之，造成這種論述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早期東南亞華人的血淚辛酸的歷史，以後形成如果華人有什麼風吹草動，一概以排華論之。

以「排華」來描述針對華人或是對華人不利的的事件，可能會把許多規模不同，性質有別，成因不一的事件全部混為一談，同時也使人們沒有進一步深究事件背後的原因。以印度尼西亞九十年代所發生的 SARA 暴動為例，其性質即和在四十年代印度尼西亞獨立革命戰爭時期所發生的暴動有很大的差異，但是許多媒體報導時，卻表示「排華暴動是印度尼西亞華人幾百年來一直存在的惡夢」，彷彿一句排華就代表了一切的必要的解釋。

如果我們深入分析這些九十年代發生的暴動，就會發現其實華人與原住民的關係十分錯綜複雜，許多暴動受害者的第一手報導都指出，施暴的暴徒和出面拯救的都是原住民，印度尼西亞的族群關係並不像其他有持續性種族暴動的地區，族群之間有強烈的種族仇恨，印度尼西亞的原住民與華裔的關係是深深涉入印度尼西亞本地的政治社會經濟關係中，如果不從這種關係來理解，無法清楚認識事件真相，排華論述有時反而模糊了事件的本質。

「唯經濟論述」則將所有的問題，歸因於華人擁有大量的財富，因此才會爆發族群暴動事件。這種邏輯假定了祇要明白華人擁有大量的財富的事實，對於不同性質的暴動就無須進一步的解釋，這其中隱含了暴動有理，華人有錢就是最好的理由。最常見的例子，是在外電報導中，祇要提到印度尼西亞和華人相關的族群問題，必不忘加上一句「華人祇佔百分之三，卻控制百分之七十的經濟」，這種論述也容易造成簡單的歸因，阻礙我們對問題的癥結作近一步的瞭解。

造成這種「唯經濟論述」當然和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結構有關，印度尼西亞有許多大財團，而其中許多大財團的領袖是華裔，然而他們被是華裔中的少數

人，卻經常被當成印尼華人的代表。同時如果將所有這些財團的經濟活動全都歸到華裔名下，卻是有問題。因為這些財團企業中多數的員工是印度尼西亞原住民。同時如果不看這些財團的高層人事結構，由於印度尼西亞本地的都市中產階級已經出現，經濟活動其實是不分原住民及華裔。

值得注意的事，印度尼西亞九十年代所發生的暴動，許多是發生在小城鎮，祇波及的對象經常是在這些小鎮開商店的華裔，這些華裔和前述的大財團及大企業沒有什麼關連。而且許多開小商店的華裔是世居於此的早期移民之後，和一些大財團的領袖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有相當大的不同。因此簡單地以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結構來論述這些暴動事件，是有很大偏差。我們若要理解問題，必須要設法對印度尼西亞有全方位的瞭解。

研究取向

印度尼西亞華人的研究可以放在海外華人史的脈絡裡來討論，因為華裔族群散居世界各地已經成為一個全球顯著的現象，如同印度裔、非洲裔和愛爾蘭裔等一般，成為研究移民和族群關係的重要焦點。其中東南亞是歷史上華人遷居的大本營，因為東南亞華人研究或是東南亞華人史也構成海外華人研究的重要的一環，而其中印度尼西亞的華裔人數眾多，是海外華人研究不可或缺的課題。

以海外華人的研究的角度來從事各地華人的研究有其正當性，如果從既有的海外華人研究來看，研究關心的重點是華人在當地的生活及適應情況來做討論，對於當地的情況，僅在有直接涉及到華人的層面上，例如移民法令或少數民族教育政策等等。這種研究很多是以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及紐西蘭以模式，這其中自有其道理，因為這些國家都視自己為移民構成的國家，到目前為止都保持吸收外來移民，因此移民事務是屬於社會建制的一部分，和移民相關的事務有比較清楚的範圍。而華裔移民祇是諸多外來移民的一環，適用於其他移民的討論，也適用於華裔移民的討論。同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開始有較大規模的華裔移民流入，華裔移民社群對自己族裔移入當地的歷史，還記憶猶新，易於追溯。和華裔移民相關的議題，也很有特定的範圍。

但是這種研究模式對於東南亞國家的適用性就有問題了，多數的東南亞國家並不是採用移民國家模式，而是採用民族國家模式。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追求民族解放國家獨立之後就不再大規模接受華裔移民，華裔社群主要是和當地社會互動，而非和中國互動，也沒有持續性的移民來做為橋樑。同時由於當地華裔移民社群存在當地的歷史已有數百年了，早已經成為當地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不能孤立地來看待華裔社群。要研究和東南亞華人相關連的課題，也應該放在東南亞研究的課題來討論，尤其是近代東南亞華人的歷史

研究，自從東南亞新興獨立國家誕生以後，我們很難不去掌握這些新興獨立國家的國情與性質而能對其中的華人問題有清楚的瞭解。

在本研究之中，是以東南亞研究的研究取向來討論的印度尼西亞華人問題。為了將討論的脈絡放在印度尼西亞研究之中，對印度尼西亞的族群暴動加以分析，以進一步來討論印度尼西亞和華人相關的族群問題，必須深入印度尼西亞的情況。為此在本研究中，參考了許多印度尼西亞本地的文獻，並且走訪印度尼西亞學術界的專家及知識分子，以求平衡當地人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因此在本文中，對於研究的主題，捨棄許多報章所採用的「排華暴動」這種先入為主的字眼，而以當地所稱的「SARA 暴動」為題，或是在西方文獻中所稱的「反華暴動」（anti-Chinese riots）。

然而本研究雖然將華人課題放在印度尼西亞研究中，卻無意將印度尼西亞研究孤立起來，雖然印度尼西亞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與文化特質，這些都有助於本研究的分析與理解，但是卻不應該以這些獨特性來解釋一切，印度尼西亞社會是人類社會的一環，從其他人類社會所推衍出來的社會科學的理論，如果適用於本研究主題的討論，也應該合宜提出來一起討論。

許多從事區域研究的研究者，因為長期鑽研一個地區，很容易陷入一種一切以當地的獨特情況視之的心態。例如「中國國情論」論者，很容易將研究主題以「中國國情不同」而拒絕和其他國家比較。出身當地的學者尤其容易犯上這類問題。無疑地，印度尼西亞研究也不例外，許多印度尼西亞的學者也容易認為印度尼西亞的問題與其他地方不同，難以相提並論。因此在考慮印度尼西亞的本地觀點時，除了探求本地學者的意見以外，如何將這些本地觀點放在全球的脈絡，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本地觀點最容易出現的問題，經常是不會去挑戰甚或提及當地社會的一些基本假定，或是以存在為合理，不去反省質疑既有的價值觀，反而以此為論述的根據。這是筆者在閱讀印度尼西亞本地的報導及評論時最常見到的情況，尤其是當今印度尼西亞的社會精英和知識分子仍有相當程度的排外情結，加上有意無意間都會透露出大國心態來，總是覺得外人不理解印度尼西亞，或是覺得印度尼西亞有自己的一套，不能拿其他地區的情況來相提並論。這是我們探求本地觀點時必須特別注意的。

然而現今的印度尼西亞實無法自外於全球觀點的衝擊，首先大批留學西方，接受西方社會科學訓練的印度尼西亞知識分子回到印度尼西亞，成為社會精英的骨幹及輿論的舵手，在現今印度尼西亞的報刊中，充滿了西方社會科學的語彙，許多甚至直接從英文原文改為印度尼西亞文的拼寫法，就堂而皇之的登上給普羅大眾閱讀的報刊上。

此外發生在九十年代的印度尼西亞的許多社會震盪，多半是和國際社會互動而來的，在印度尼西亞政策上實行親西方政策三十多年來之後，印度尼西亞

很難脫離外在的影響。最顯著的例子是發生於 1997 年 7 月以後的亞洲金融危機，印度尼西亞並非引起問題的國家，卻是受創最深的國家，同時一發生問題時，印度尼西亞立刻尋求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協助，從此對於印度尼西亞本地政局和國際社會的互動更為緊密。由要求經濟改革到引發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大起，終於導致長期無可震撼的蘇哈托總統下台。可以說我們很難不把印度尼西亞情勢的發展放在全球的脈絡來看。

在本研究中，全球觀點的討論建立在兩方面，一是社會科學理論與觀念的運用，一是注意事件的發展與各方面的互動，而非僅限於印度尼西亞一地。由於社會科學的觀念是建立在具體社會現象抽象化的過程上，即使理論來自其他社會的經驗，也適合用以討論印度尼西亞的情況，祇是必須加上本地的材料及本地的觀念的說明，也會設法和各地相類似的情況比較其異同。

在事件與外地的互動上面，外國媒體的報導和分析，雖然是反映了局外人的意見，和當地人的看法有相當的距離，卻是必要的參考材料。外電報導顯然有其很大的限制，如限於篇幅，報導不會深入，報導經常反應外國投資者所關心的焦點，對事件的其他重要面向容易忽略，同時對於同一事件並持續報導，也使對某些事件及問題的追蹤不易。然而除了這些問題之外，外電報導中經常會有許多訊息內容，是在印度尼西亞本地媒體中見不到的，例如事件在國際間的反應及各方的互動，因此，參考和比較不同性質的文獻，實屬必要。

研究範圍

在本研究，本文研究的範圍以九十年代在印度尼西亞發生的暴動，其中時間最集中的一段時間是由 1994 年 4 月棉蘭暴動到 1998 年 5 月蘇哈托下台為止，主要分析的事件也以這段時間為主，研究的對象以這段期間所發生的暴動事件，並且以當地人所稱的「SARA 暴動」為主要分析對象。

所謂的「SARA 暴動」在印度尼西亞的脈絡是指族群、宗教、種族及社會集體間的暴動，SARA 一詞是 Suku, Agama, Ras, 及 Antaragolongan 的縮寫，分別是指族群、宗教、種族及社會集體間的問題，範圍較一般其他地區的族群問題或種族問題的範圍要大，同「SARA」一詞清楚地點出了印度尼西亞這一類社會矛盾問題的性質，⁵故在本文中採取這個名詞。

由於事件發生都是當代的事件，所以缺乏有深度的專門研究論著可供參考，因此在本研究中所引用的材料以新聞報導的為主。以新聞報導為材料，並不表示筆者以為新聞報導的內容即是事件的真相，主要由於筆者研究的主題是

⁵ “Jangan Takut Bicara SARA”, Republika, 20 Nov. 1995. 該文鼓勵印尼民眾不要害怕討論 SARA 問題，反而應該公開來談，將問題的性質談清楚。

在於對這些 SARA 暴動事件的解釋，所以關於至於在這些事件中的細節，並非本文討論的重點。例如在西加里曼丹發生的 SARA 暴動時所爭議的問題，即到底是 300 人或是 3000 人傷亡，對新聞報導來說是個重要問題，但在本研究中，祇會列出暴動的基本性質，而不會去追究個別單一暴動的具體細節。

但是為了探求比較客觀的報導，在本研究中儘可能地參考中文、英文及印度尼西亞文的新聞報導，根據筆者觀察的心得，不同語文的新聞報導側重不一，但各有所長。其不同的性質將在以下討論，因此筆者以為三種語文都是必要參考的材料。為了更貼近當地人的關點，筆者也利用各種不同的管道來取得資料，以彌補書面資料不足之處。在 1996 年中到 1997 年中，是筆者三次進出印度尼西亞境內，探訪印度尼西亞對相關問題有研究的專家，尋求他們的理解和看法。

這些印度尼西亞文的資料主要取材於當地的報章刊物，許多是事件發生時候的報導與評論，這些文獻受限於當時的時空，有許多內容未必客觀，但是卻是反應當時印度尼西亞主流社會的某些共同的想法，同時所提供的訊息量很大，絕非重覆報導浮面消息的外國媒體所能比擬，然而這些資料也都有其限制及盲點，將在採用這些資料時儘可能指出來。

印度尼西亞新秩序後期暴動的當代史

印度尼西亞在蘇哈托總統在位時代被稱為新秩序(Orde Baru, New Order)時代，這是由於蘇哈托在六十年代上台時採用新秩序的口號，以區別第一任總統蘇卡諾時代的舊秩序。新秩序時代很長，如果由 1965 年蘇哈托開始全面掌控局面算起，到 1998 年下台為止，新秩序時代共有三十三年之久。一人當政三十多年的時間，在當代國際政治上是除了古巴的卡斯楚以外一大異數，對建國五十幾年的印度尼西亞而言，新秩序時代無疑是形塑了這個新國家的歷史最重要的風貌，因此研究新秩序時代的不同面向也將是瞭解印度尼西亞這個新興獨立國家的重要課題。

本文將以新秩序時代後期為範圍，將這段時期所發生的暴動加以分類，作時間順序的簡要敘述，做為未來進一步研究的參考。由於新秩序時期很長，為了研究上的方便加以適當分期有其必要，在此將新秩序時期分為三期，新秩序前期是從混亂到安定的時期，是從蘇哈托總統上台到七十年代末期，新秩序中期是穩定成長期，從七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而新秩序後期則是由安定到混亂的時期，是由九十年代初期到 1998 年蘇哈托下台為止。新秩序時代是便在 1998 年的五月暴動的風潮中結束，其實整個新秩序後期是印度尼西亞暴動發生頻仍的時期，因此不同型態的暴動是理解新秩序後期的印尼社會特質的事

件，可以說是暴動構成了新秩序時代後期的重要特徵，也是理解整個新秩序時期的印尼現代史中重要的一環。

筆者根據不同來源的資料將印度尼西亞的暴動事件加以整理歸納，整理的重點並不是在詳述事件，由於篇幅上的限制，對於各別的暴動事件僅能做簡要的性質說明。整理重點是在對於暴動的性質的歸類，以及給予不同類型的暴動適當的名稱，做為未來進一步討論研究的基礎，為此在本文中並不針對暴動事件的前因後果加以分析，祇是提供暴動事件的性質說明與分類的架構。如果並非特別重要將不一一指出消息來源。

根據筆者的歸類，九十年代中葉是印度尼西亞暴動頻仍的一個時代，以其時間順序及暴動的特性可以分成四波，第一波由 1994 年棉蘭工運暴動到 1996 年的七二七事件，這是社會矛盾凸顯而行政官僚反應不當所造成的，稱為「反公權力暴動」。第二波是自七二七事件之後到 1997 年國會改選之間的暴動，暴動的特色是以地方性的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衝突為主因的暴動，稱為「部族暴動」。第三波是在金融風暴之後，在 1998 年 1 月到 2 月之間，各地連續出現一連串以攻擊地方上的華人商店的暴動，稱為「新春暴動」，第四波是 1998 年發生在雅加達而造成蘇哈托下台的暴亂，稱為「五月暴動」。

第一波：反公權力暴動

從 1994 年棉蘭暴動到 1996 年的七二七事件，印度尼西亞開始了暴動頻仍的第一個階段，這個時期的暴動的特色是暴動的主要抗議議題是挑戰公權力，例如 1994 年棉蘭暴動是由勞工運動引發，而 1996 年的七二七事件是政治反對派人士抗議政府及軍方介入民主黨的內鬥。

相對而言，在此之前的一段時期，從 1980 年代末期到 1990 年代初期則顯得較為平靜，這是因為這段期間印度尼西亞經歷了高度經濟成長，而政治結構則因為權力集中制而顯得相對穩定，執政的專業集團因為集合政府官僚，軍方和大企業家的支持，顯得難以搖撼。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中葉，一個執政長達三十年的政權顯得僵化而蹣跚，無法有效地處理變局，僅僅靠公權力的高壓政策來應付異議份子。

棉蘭暴動

1994 年 4 月，棉蘭發生一次暴動，是由勞工運動的示威活動，轉而成為以華人店鋪與設施的反華暴動。數萬名工人在棉蘭進行大規模示威遊行，主要訴求是要求增加薪酬和加班費，同時爭取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並且抗議當局漠視工運領袖離奇死亡的事件。就示威活動原本的性質而言，是清楚的勞工運動，和華人並不直接相關，但是示威活動受到省長的漠視及印尼軍警的強力鎮壓，抗議不成轉而臨時起意的暴動。

棉蘭暴動受到矚目是暴動所釋放出來的能量，估計有一百五十家以上的商店被搗毀，絕大多數是華人擁有的，工廠十多家被破壞，汽車約五十輛遭焚毀，有一名華裔商人喪生，是棉蘭自蘇哈托執政以來最嚴重的動亂。

關於棉蘭暴動何以會轉成反華暴動，有不同的解釋。領導這次示威活動的工會領袖一再宣稱，他們並沒有打算把箭頭指向華人，而是有人混水摸魚，以此擴大事端，因而抹黑勞工運動。也有人表示由於工會的訴求是提高工資，和以華人為主的資方是對立的，因此在勞工運動受挫時，即以華人產業為洩憤的對象。然而不論那一種解釋，公權力對於勞工運動處理不當是明顯的，而實際上，祇要當局用心處理勞工訴求，暴動應可避免，然而當局不圖此，祇是以嚴厲措施對付示威者。

七二七事件

和棉蘭暴動一樣，七二七事件是和公權力發生直接衝突的暴動事件，同樣受到國際媒體的矚目，而且事件的性質有指標性作用，一直在後來論述印尼時事時經常被論及。和棉蘭暴動不同的是，七二七事件暴亂的規模要比棉蘭暴動大多了，被稱為自 1974 年因抗議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時引發的雅加達暴動以來最大規模的暴亂，同時七二七事件是由政治事件引發，其後續的影響也要深遠許多。

七二七事件就暴動事件而言指的是 1996 年 7 月 27 日開始一連幾天在首都雅加達發生的暴動，動亂的導火線是軍警攻擊民主黨部的中央大廈，與民主黨內支持梅嘉瓦蒂的民主黨員及其他支持群眾發生對抗，而其事件發生原因則涉及政府強行介入在野的民主黨內亂。暴亂發生以後，被軍警強力驅散的群眾流竄到其他地區，縱火焚燒或搗毀二十多座建築物，包括農業部及電信局大樓等，搗毀九家銀行，燒毀近百輛汽車。接下來一連幾天都有暴亂，也有暴徒劫掠華裔經營的店鋪，以及宣稱在市中心商業區安置炸彈的恐嚇電話。

七二七事件更重要的意義則還在這些暴亂之上，其主要的影響是在其政治上的意義。這是執政黨專業集團利用政府公權力來對付在民間聲譽日隆的梅嘉瓦蒂，公然介入民主黨內的內爭所引發的暴亂，受到各界矚目。雖然梅嘉瓦蒂因而從民主黨主席的職務拉下台來，一時失去了舞台，但是梅嘉瓦蒂卻成為對抗蘇哈托總統與執政黨統治的精神象徵，到民主黨部中央大樓支持的群眾，有獨立工會運動的領袖和激進的大學生民主運動團體，及其他民主運動團體，梅嘉瓦蒂搖身一變成為民主運動的領袖，證諸後來印尼政壇的發展，七二七事件實在是反對派集結的開端，在當代印尼歷史中將佔有一席之地。

其他暴動

我們不該將這一時期發生的暴動事件視為孤立的事件，同樣類型的事件在這一段時期前後一再發生，祇是許多示威活動沒有釀成暴動，而沒有引起海外媒體的爭相報導。如自 1993 年下半年開始，大學生上街頭抗議的事件層出不窮，總統和軍方過去高高在上的形象改變，成為抗議的對象，而抗議的議題，從勞工、宗教、言論自由、環保、人權、民主與貪污的問題都有。而同一時期的勞資糾紛與勞工罷工事件，在 1994 年上半年各地共有三百件之多。各種示威活動的出現，表明了要求變革的主張增強，民眾對政治的理解力也有所提高，開始起來爭取權利，而各種社會議題出現卻無法在既有的政治體制中得到解決，因此走上街頭的事件便頻頻出現。⁶

這段期間其實已經展開了暴動頻仍的時代，祇是多數國際媒體沒有報導這些暴動，在此簡述如下。

1994 年 12 月 1 日在萬隆發生暴動，主要是三輪車夫為主的街頭暴動，主因是因為謠傳有三輪車夫被警方巡邏車撞死，引起上千名三輪車夫及街頭小販集結抗議，發生暴動，市區的商店被破壞，汽車被搗毀，而這些多數是華裔所擁有，市區商店因而停業一段時間。

1995 年 9 月在東帝汶發生暴動，主要是司法部官員發表談話時，冒犯了東帝汶主要的宗教信仰天主教，首先是在首府帝力發生暴動，後來暴動播及其他幾個城市。

1995 年 10 月 31 日在西爪哇的普哇加達鎮（Purwakarta）發生暴動，該鎮華裔商人因為處罰一名 14 歲的伊斯蘭學校女學生偷竊行為，經過渲染之後，引發數百名青年學生持續幾天的騷亂，總共有十八間商店，兩間倉庫，三間住宅及九輛汽車被毀，當地幾間基督教堂的外部也遭破壞。

1995 年 10 月在東帝汶首府發生暴動，主要起因是年輕人分幫分派打群架械鬥，由主張東帝汶獨立與主張和印尼整合的兩派對打，警方介入，引起暴動，事件中有兩人死亡，警方拘捕了幾百名年輕人。

1995 年 11 月在蘇門答臘北部的波爾西亞（Porsea）發生暴動，示威的民眾放火燒毀建築物及汽車，以及當地的地方廣播電台，以抗議當地排放瓦斯的造紙廠。

1995 年 11 日西爪哇的帕沙魯安（Pasaruan）發生暴動，當地數以千計的居民抗議一家韓國人擁有的香料工廠污染水源，搗毀其辦公室。

1995 年 12 月在中爪哇的北加浪岸發生暴動，一名智障的華裔男子 Yoe Sing Yung 損壞可蘭經，而引發暴動，一連持續三天，當地華人商店被搗毀。

⁶ “Sara, Pemicu Konflik?”, *Republika*, 20 Nov, 1995.

1996 年 1 月在西爪哇的萬隆發生暴動，一群沒法進入音樂會的歌迷們發起暴動，搶奪商店以及將車輛翻倒。

1996 年 3 月在伊利安（Irian Jaya）的提米卡（Timika）及坦巴加普拉（Tembagapura）地區發生原住土著發起的暴動，據信是抗議美國一家採礦公司，自由港公司（Freeport），在當地開採金礦及銅礦。環保人士表示該公司的開採導致河川污染以及當地原住民的文化受到嚴重破壞。

1996 年 3 月在伊利安的阿倍普拉（Abepura）發生暴動，數以百計的年輕人到處破壞公共設施，這是抗議當局有關當地一名從事獨立運動者被捕而死在雅加達的監獄中的事件，暴動發生在當死者屍體運抵加也普拉（Jayapura）港口時。

1996 年 4 月在加里曼丹發生暴動，約有兩千人示威抗議，理由是當地駐軍對一名居民施暴，最後軍隊開槍射殺了一名抗議者。

1996 年 4 月在伊利安的提米卡（Timika）機場發生暴動，暴動是由軍方官員與當地居民口角所引起的，暴動造成十五人死亡及多人受傷。

以上都是從棉蘭暴動到七二七事件中所發生的較小規模的暴動，這些暴動並沒有引起外界注目，祇是在印尼本地的報章中出現。其中最引起國際注目的七二七事件，則是此種反公權力類型暴動的高峰。七二七事件發生以後，雖然局面很快的控制住，一般外國媒體所預測的政治大變局並未發生，但在七二七事件之後，引發了新一波一連串的暴動事件，印度尼西亞因此開始進入暴動頻仍的新階段。

第二波：部族暴動

七二七事件發生後，社會還在為了事件的評價及看法不同，爭辯不休，同時事件餘波盪漾，此時卻在不同地點，發生一連串大規模的暴動，這些暴動發生的原因都不相同，而且發生事件的原因有相當強的地域性，但是從 1996 年 10 月開始，卻間歇性地爆發這些大規模的暴動。

1996 年 10 月，詩都文羅(Situbondo)

東爪哇的詩都文羅在 1996 年 10 月發生暴動，這次暴動的起因是由於一樁涉及藐視宗教罪的法庭宣判，23 歲的 Saleh 被控侮辱教士，否定伊斯蘭正統派的信仰，被判五年，可易科罰金。當地的穆斯林團體認為宣刑太輕，因此發起暴亂，搗毀各種公共建築物，包括法院、學校、醫院等，然而最令外界震驚的事，市內所有基督教教堂在一夕之間被搗毀，共有 27 間教堂遭難，並且有一間華人佛教寺廟遭池魚之殃，這是近年來首次發生佛教寺廟成為暴動對象的事件，這和多年來印度尼西亞努力建立的宗教和平共處的形象大不相同，從此宗

教的殿堂便不再有神聖性，在往後的暴動中成為直接被攻擊的對象。這次暴亂的過程中有五人死亡，是燒死在教堂內，有許多報導顯示有參加暴動的穆斯林青年可能是經過有組織性的煽動，才能迅速從鄰近地區集結過來，同時當地軍警被認為並未積極努力及時阻止暴動，因此有許多不同的陰謀論在民間流傳。

1996 年 12 月，打橫市暴動(Tasimalaya)

被華人稱為打橫市的西瓜哇首府，在 1996 年 12 月 26 日發生暴動，打橫市是在雅加達東南方的一座市鎮，起因和華人並無關係，是一名被指為虐待學生的穆斯林老師，在警察局被拷打，引起穆斯林團體的抗議，警察局被包圍，最後引發大規模的暴動，引起數千名穆斯林動員的暴力事件，暴民攻擊商店，旅館，車行，工廠，教堂等，絕大多數目標都是華人產業。其中包括當地一間大型的購物商場 Matahari，這是眾人皆知的華人產業，整棟建築物被焚毀。衝突中有四人死亡，其中有一名年約五十的華裔婦女被燒死在她店中。

1996 年底 1997 年 1 月，桑高雷多暴動（或稱西加里曼丹暴動）

西加里曼丹省桑高雷多自 1996 年 12 月 30 日爆發種族動亂，數以千計的人被縱火搶劫事件，居民已紛紛逃離該地區。桑高雷多鎮以生產橡膠、椰子、辣椒與椰子油著稱，是個遠離主要城鎮的小鎮，卻發生了種族仇殺的事件，幾千名當地達亞克族原住民土著被動員，到處縱火焚燒了約六十戶民宅，並搶劫財物，暴動的受害者大多是馬都拉族。暴力衝突開頭係兩群青年為了一名達亞克族女子爭風吃醋而引起，這兩群青年一為達亞克族人，一為馬都拉島移民。幾千名居民已經逃離桑高雷多，政府實施整夜宵禁，並派遣數百名部隊到暴動地區。

1997 年 1 月，新加斯登克勒暴動(Rengasdengklok)

西瓜哇市鎮新加斯登克勒(Rengasdengklok)，離首都雅加達約六十公里，在 1997 年 1 月發生暴動，暴動的對象直接指向華人，這是有一名華裔女性 Tjio Kim Tjoan 抱怨清真寺的早朝的聲音太吵，引起大規模的暴動。這是在伊斯蘭教的齋戒月期間，穆斯林青年在清晨三點多敲鐘召喚教徒起床早禱進食，這名華裔女性抱怨之後，已經立即向當事人道歉，但是消息傳到上午時，卻另有穆斯林青年集結，對當地華人產業下手，計有 42 間華人商店，76 間華人住宅，2 間銀行，3 間工廠，3 間教堂及 2 間廟寺被毀。事後警方調查後，搜捕了 21 名參與暴亂的青年，分別被判 2 個月到 4 個月不等的刑罰，而這名被指為引發衝突的華裔女性卻以藐視宗教罪被判 3 年半。

1997 年 9 月，錫江暴動，或稱烏戎潘當(Ujung Pandang)暴動

在蘇拉威西首府的烏戎潘當市，在 1997 年 9 月因為一名發瘋的華裔青年殺死了一名參加查經班後回家的 9 歲穆斯林少女，引發了當地的針對華人的暴動，有 3 人被殺，62 間房屋全部燒毀，超過 1000 間的房屋被損壞，4 座教堂及廟宇被毀。

同一個時期還有另一種型態的暴力事件，那是在國會選舉期間，因為選舉所帶來的法律假期，以及因為選舉時期支持者互相攻擊所造成的，其中比較大的事件是 Banjarmasin 事件，發生在 1997 年五月，地點是加里曼丹（Kalimantan）的 Banjarmasin，主要是支持執政黨專業集團（Golkar）的群眾和支持建設團結黨的群眾互相衝突所致，暴動所造成的火災造成多達百人死亡。由於政治上各種反對勢力在集結，雖然還不到可以震撼執政黨的地步，但是新的政治競爭型態一直在發展中，這是為什麼有人認為政治是促成許多暴動的原因，有種陰謀論一直在印度尼西亞政壇上流傳，即針對華人的暴動是有官方的支持，至少是樂見事件的發展，因為這使得民眾更要求安定，而對軍方也有利益，因為他們在社會治安的重要性會被肯定。

第三波：新春暴動

在 1998 年 1 月及 2 月之間，印度尼西亞爆發了一連串暴動的報導，這些暴動是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後，此時印度尼西亞的國幣盧比亞已經貶低到原來的四分之一，金融危機已經深化到足以影響一般市井百姓的生活，因此這些暴動一般被認為和金融危機息息相關。暴動發生的規模不大，但次數很多，多數的外電新聞報導僅是在事件發生後做零星的報告，並沒有做全面性的報導，也沒有回顧這段期間所報導過的社會騷亂，因此很難有全面的圖像。

歸納起來主要發生暴動的地區有三個地區，分別在時間相近的三個時段，其他則是零星的發生在不同地區。這三個地區及發生暴動的時間分別如下，第一階段是發生在東爪哇，主要是在 Jember 及其周邊地區，時間是在 1998 年 1 月 12 日到 1 月 16 日，第二階段是發生在中爪哇及東爪哇，主要是 Rembang 及其周邊地區，時間主要集中在 1998 年 1 月 26 日到 1 月 30 日，第三階段是在西爪哇及中爪哇，主要是在 Cirebon 及其周邊地區，時間是在 1998 年 2 月 12 日到 14 日。

第一階段

1998 年 1 月 3 日東爪哇的 Tamanan 發生暴動，這是介於 Jember 和 Bondowoso 的城鎮。這是由當地的民間與軍警的衝突所造成，警察被民眾指為包庇惡勢力，並以警力保護從事不法的商業利益如賭博，色情業及盜伐森林。據報導在該地區的警民衝突已有幾個月時間，尤其是當地穆斯林團體與警方交

惡，也可能涉及選舉不公所留下來的後遺症。據報導有多處警察局被搗毀，並且有多家華人商店被破壞。

1998 年 1 月 12 日東爪哇的 Jember 及鄰近地區發生多起小型的偶發性暴動，暴民搶奪華人小商店，而且如同傳染病一樣在鄰近地區散播開來，一連持續了五天，並且在兩週的時間內都有報導零星暴動事件發生。一般被認為是首宗直接和金融危機所引起的民生物價暴漲相關的暴動。沒有人傷亡，雖然地處偏遠，事件多屬臨時性發生，警力不易立刻部署，但軍警亦被認為沒有認真阻止搶奪行動。

1998 年 1 月 13 日暴動發生在東爪哇的 Kalibaru，介於 Banyuwangi 以及 Jember 之間以及以西的地帶，暴動開始於抗議民生物質價格暴漲的摩托車隊青年，然後引發將近百起對華人商鋪搶奪貨品的事件，這些青年將貨物推到街上供人奪取，警方要求其他商家降回原價出售，以免被劫。

1998 年 1 月 14 日晚間 Jember 地區多家食品商店及倉庫被破壞，食物被搶奪一空。

1998 年 1 月 15 日 Jember 發生暴動，當地第二大的百貨公司被火災破壞，這是一個超過 700 位的職員的百貨公司，公司的老闆是華裔，但多數的員工是印度尼西亞原住民同胞。警察稍後否認這是一項破壞活動，並且認為這是電力系統出了問題而造成的過失。

1998 年 1 月 16 日發生多起暴動事件，首先是 Balung 發生暴動，這是在 Jember 的南方的小鎮，至少四間其他的商店被掠奪，暴動被認為和機車族有關，事件是發生在數以百計的乘機車者從城鎮的北方到達以後發生的。在 Jember，華裔零售商同意以舊的價格賣烹飪油及其他的基本食品，某些商店因為恐懼而關閉。靠近 Banyuwangi 的 Bagorejo，在傍晚時分有食物商店被掠奪，安全當局及時避免了更進一步地掠奪。警方事後逮捕了涉及 Jember 暴動的三十幾名滋事分子，全數是低收入的馬都拉人(Madurese)，同時多是住在偏遠地區。

第二階段

1998 年 1 月 26 日，靠近 Banyuwangi 的 Pakisaji 發生暴動，米廠被破壞，車輛毀損。

1998 年 1 月 26 日，中爪哇靠近 Rembang 的小鎮 Kragan 發生暴動，這是靠近北海岸的兩個鄰近小漁村 Karang Lincak 及 Karang Jarak 的數百名漁民，抗議煤油的價格上漲三倍，煤油是漁民晚上捕魚時點煤油燈的必需品，他們結集衝入 Kragan 將鎮上 15 家華人商店及 2 間教堂破壞。

1998 年 1 月 27 日在 Kragan 東邊的 Sarang 發生同樣由漁民發起的暴動，約一百多名漁民將鎮上 9 家華人商店摧毀，並搶奪貨物。

1998 年 1 月 28 日幾個地方同時發生暴動，Rembang 的商店及教堂被毀，Sluke 的商店被搶，Banjarjo 在晚上多家商店被搶奪，暴民似乎由外地來。

1998 年 1 月 29 日 Padangan 發生暴動，但警方及時阻止暴動，21 名被捕，其中有漁民，失業青年及中學生。

1998 年 1 月 28-30 日東爪哇的 Tuban 發生同樣搶奪商家的暴動，然後蔓延到東岸的城鎮，直到 Rembang 以東的地區，這些搶奪行動是發生在伊斯蘭的假日 Idul Fitri，許多人抱怨要用來做為祭品的食物漲得太高，警方表示，暴民主要是來自 Bulu，Tambakboyo，Jatirogo 及 Palang 等地區的農民，行動是有計劃性，事先曾有聚會決定了這項行動。

1998 年 2 月 2 日在東爪哇的靠近泗水(Surabaya)的帕蘇路安(Pasuruan)發生暴動，三小時內破壞了 10 間房屋及商店，主要抗議煤油價格上漲，警方迅速控制局面。

1998 年 2 月 3 日，靠近 Jember 的 Kasiyan 發生暴動，這是更小的鄉鎮，持刀青年破壞商店，並打算搶奪財物，但被當地青年制止。1998 年 2 月 5 日警方宣布逮捕了 152 名嫌犯，被控告搶奪財物罪。

1998 年 2 月 7 日東爪哇的 Bojonegoro 發生暴動，數十名學生攻擊當地最大的華人批發商 Langgeng 的倉庫，造成損害，這項行動早在三天前就有謠言相傳，當地警方試圖阻止，但未成功。暴動發生時間僅一個小時。

第三階段

1998 年 2 月 12 日，以井里汶(Cirebon)為核心，延伸在沿岸公路 200 公里，西至 Pamanukan 東到 Brebes 範圍內的城鎮發生多起暴動，持續了三天，起因是由計程車司機及工人因為對物價上漲感到憤怒，而發起暴動，仍是以搶奪華人商店為主，有些華人躲入警察局，沒有華人傷亡，但是暴徒有四人被射殺。井里汶(Cirebon)西邊的 Jatiwangi 有多家商店被焚毀，包括車行及工廠，都是華人產業，計有 23 家商店被毀及 30 間房屋受損，在 2 月 13 日有另外兩家商店被焚毀。

事後根據警方調查，暴動並非由本地人發動，而是由外界人士引發，有證人目擊有兩輛卡車在暴動之前載暴民進入，警方逮捕了一名來自萬隆一間大學的大學生，名為 Lubis，可能涉嫌叫唆暴亂。另外警方也逮捕了涉嫌參加暴動的民眾共四十餘人。

1998 年 2 月 12 日，井里汶(Cirebon)南邊的 Kuningan，則在主要市場被縱火而引發大火，有 100 間鋪頭被毀。

1998 年 2 月 13 日，在井里汶西部的 Pamanukan 發生暴動，起因是由在高速公路塞車的民眾和警察發生衝突，警察開槍打死了一名 28 歲的男子，引發更

大的衝突，因此 Pamanukan 的商店、教堂以及一家診所被焚毀。鄰近地區在其西部的 Ciasem 及 Sukamandi 也被波及，群眾聚集以抗議民生物質高漲而攻擊華人商家，計有 25 家華人擁有的商店受到攻擊，並有 12 輛汽車及 19 輛摩托車被縱火焚毀。警察逮捕 266 人並實施一夜宵禁。

1998 年 2 月 13 日，在爪哇島北岸介於井里汶和 Brebes 之間的小鎮 Losari 也發生暴動，暴動開始於市場，也是抗議物價上漲而造成，約有 500 名憤怒的民眾攻擊商店，並焚燒貨品，計有四十多家華人商店被毀。警方設法驅散群眾，反而使暴動的範圍延伸到鄰近地區如 Tanjung 及 Bulakamba。後來鎮暴警察(Brimob)用橡皮子彈開火及使用催淚瓦斯才控制局面，這是首次在這一波的暴動中使用，交通癱瘓，鎮暴部隊必須出動直昇機才能進出。計有超過 60 間商店被毀，許多車輛被燒，有兩名青年被散彈打死，分別是 22 歲青年 Tamin bin Darmawi 及 24 歲的 Amran，有六名十幾歲的青少年受傷，有 24 人被逮捕。

據報導，群眾將華人商店的民生必需品如肥皂，食用油，甚至電器產品，丟到大街上，然後焚毀，並且阻止圍觀群眾取走貨物，並且表示「我們不是賊」。群眾在週五中午的伊斯蘭教午禱時間散去，下午再次結集。

1998 年 2 月 13 日在西爪哇的 Sukra 區的村莊 Patrol Lor 發生反華人暴動，有商店被攻擊，村內一家教堂被毀。

1998 年 2 月 14 日在直葛(Tegal)南方的 Margasari 有暴動發生，該地 7 家商店被毀，貨物被丟到街上供人搶奪或被焚毀。而井里汶及其鄰近地區仍有零星的暴動傳出。

1998 年 2 月 15 日在西爪哇井里汶區的 Sindang Laut 發生暴動，六家華人擁有的商店被焚毀。

1998 年 2 月 15 日在西爪哇 Majalengka 區的 Kadipaten 發生暴動，搶奪華人商店，六間商店被焚毀，另外八間商店被破壞搶奪，據報道軍警採取消極措施，任由搶奪進行，祇逮捕了一名試圖縱火的疑犯。

1998 年 2 月 16 日，在中爪哇的 Purbalingga 北方 11 公里的 Bobotsari 爆發全區域性的暴動，數以千計的居民激動地闖入兩間購物中心，將物品掠奪一空，安全部隊迅速趕到，很快的控制局面，但是群眾的行動已經迅速產生效果，Purbalingga 全境的商店立刻關閉。

1998 年 2 月 16 日，在西爪哇的萬隆(Bandung)轄區的三個市鎮 Pangalengan, Cicalengka 及 Cimindi 發生暴動，華人商店及工廠被攻擊或焚毀，警方宣稱暴民是由卡車(angkot)由外地載入，每個人可以得到 5000 盾印尼幣，

警方逮捕了十二個嫌疑犯。後來一度謠傳將在萬隆市區內發生暴動，警方出動駐守各重要據點，沒有任何事故發生。⁷

其他地區

1998 年 1 月 2 日在伊利安的 Sentani 發生暴動，主要是由當地的島民反對外來的穆斯林移民。

1998 年 2 月 1 日，在中蘇拉威西靠近首府 Palu 的 Donggala 發生暴動，數百名青年攻擊 6 家華人商店並破壞公共設施，他們是號稱抗議物價上漲，警察原本逮捕了兩名青年，但在群眾壓力下釋放，後來出動 Palu 的軍方部隊才控制局面。

1998 年 2 月 2 日在南蘇拉威西的錫江或稱烏戎潘當(Ujung Pandang)發生暴動，數百名暴民破壞商店，華人及原住民的商店都有損害，警方後來對空鳴槍，制止了暴動。

1998 年 2 月 7 日在西參巴瓦島(Sumbawa)的比馬(Bima)，一百多名因物價上漲而到地方議會抗議的民眾在被拒絕接見後轉成暴動，他們將商店及車輛損毀，約有 60 商店被毀。多數是華人商店，市區中心的大型購物商場也被毀，警方對空鳴槍示警也無法控制場面。

1998 年 2 月 8 日，在弗羅倫斯島(Flores)上的恩德市(Ende)發生暴動，約有超過 1000 名的穆斯林島民攻擊華人商店，暴動持續兩天，燒毀 21 家商店，摧毀並強奪另外 71 家商店，他們是因為排隊買米時因物價上漲及糧食短缺感到憤怒而引發暴動，並派代表向地方政府要求降低物價，華人商家躲入軍營中，暴動經過外地軍隊調入才控制住局面，有 56 人被捕。市區因而癱瘓兩天，後來地方政府設法臨時供應平價米以平民怨，這是被認為該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暴亂事件。⁸

1998 年 2 月 11 日，在中部蘇拉威西(Central Sulawesi)的普路(Palu)市發生暴動，約有五百名示威者在市區集結，其中以大學生及中學生佔多數，要求降低民生物質的價格，在示威結束以後，而其餘未散去的群眾回到大學校園時和鎮暴部隊發生衝突，群眾開始向鎮暴部隊投擲石塊，警方開始對空鳴槍，並逮捕了 34 名示威者，其中 20 名是學生，警方據信是社會運動團體主導這次行動。

1998 年 2 月 13 日，在北蘇門答臘的先達(Padang Sidempuan)發生暴動，一連三天，從 2 月 13 日到 2 月 16 日，由摩托三輪車(becak)的司機帶頭攻擊商店，抗議油價上漲，後來轉成全面性抗議民生基本物質高漲的暴動，上千名民眾參與暴動，暴動後來轉變成為反華人暴動，50 家商店被毀，交通全面癱瘓。

⁷ “Perusakan Di Bandung, Majalengka Dan Pagaralam”, Suara Pembaruan, 17 Feb. 1998.

⁸ Keith B. Richburg “Protester Target Ethnic Chinese”, Washington Post, 10 Feb 1998. 該地區素來很少發生這一類的暴動事件。

蘇北省(North Sumatra)警方首長 Brig. Gen. M.A. Sambas 調查後認為，暴動是由抗議物價上漲的民眾臨時起意。

1998 年 2 月 14 日，東南蘇拉威西(Southeast Sulawesi)的堪達里(Kendari)發生暴動，兩百多名高中生及大學生在抗議物價上漲示威，學生亦派代表赴地方政府請願，要求降低物價，後來開始對商店投擲石頭，示威者攻擊華人商店，並且用石頭丟擲店主，學生後來和警方發生衝突，事後有 37 人被捕。據報導當地的學生和警方曾在數月之前因為群架發生衝突。

1998 年 2 月 14 日在龍目島(Lombok)上的 Praya 發生暴動，⁹暴動是在市場一群人在聽了一位江湖藝人解釋金融危機的原因後變後憤怒而引發暴動，他們直接和警方發生衝突，兩名暴徒被警察開槍打死，分別是 30 歲的 Sahrin 和 18 歲的 Fadli，11 名受傷，由於當天是中央龍目島傳統市場趕集日，許多外地村民在場，群眾試圖破壞商店，有 3 家商店及 1 家銀行被毀，都是華人產業。

1998 年 2 月 14 日在西巴布亞島的伊利亞的仙達尼鎮(Sentani)，發生暴動，對象是當地的華人商店，暴動迅速被平息。

1998 年 2 月 16 日在南蘇門答臘島(South Sumatra)位於首府巨港南方兩百公里的小鎮北加拉蘭(Pagaralam)發生暴動，上百名抗議民生物質過高的示威者集結，¹⁰最後轉成攻擊商店，向商家丟石塊並搶奪貨物，部分商家係屬華裔，暴動持續三個小時，軍警集結後恢復秩序，事後警方逮捕了三名嫌犯，被控以煽動暴動。

最後，這波 SARA 暴動終於傳到首都雅加達來，根據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 Economic Review)的 1998 年 2 月 19 日的報導，雅加達北部的班芝蘭(Pancoran)，是超過三百年的華埠，也受到襲擊，報導如下：在印度尼西亞主流報紙上看不到任何消息，但是在過去一個月持刀子的幫派已經洗劫了雅加達北方的華埠裡的三家餐廳，並且剝除所有用餐者的錢財及貴重物品。其中一次，受害人是來參加婚禮宴會。¹¹這一連串的暴動到最後使警方甚至不惜下達格殺令，根據國家通訊社安塔拉社的引述，警方發言人 Lt. Col. Soetrisno T. S. 表示，暴動是不合乎社會正義的，不應被容忍，要求警方如果現場目擊暴動，可以直接開槍。¹²

⁹ 龍目島也是歷來很少發生這一類暴亂的地方，過去祇有在六十年代因為受到雅加達反共清鄉運動的影響而發生過反華暴動。同時因為近年來開發成為觀光區，一般認為是比較不會被暴亂波及的地方，但這次卻發生暴動。見 Jenny Grant, "Riot Hits HK Tourists' Holiday Isl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6 Feb 1998.

¹⁰ 有報導認為暴動的主體是學生，見 "Sumatra Students Riot Over Price Hikes",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16 Feb, 1998.

¹¹ John McBeth "Indonesia Dangers Persist Further and Larger Riots Could Railroad Reforms",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19 Feb, 1998.

¹² "Fresh Riots Hit W Java and S Sumatra Towns", Jakarta Post, 17 Feb, 1998. 隨後 Soetrisno 表示警方仍會遵照法令規定的程序來使用槍械。

第四波：五月暴亂

五月暴動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動亂事件，動亂雖然在各大城市發生蔓延，但是以首都雅加達最嚴重。五月暴動的規模和嚴重

性是印度尼西亞三十多年來首見，使得世界各國的領事館在匆忙中撤僑，而雅加達則經歷了一場空前浩劫，群眾與鎮暴警察對抗，宵小趁機橫行，市中心區各地出現縱火，搗毀，搶劫等各種形式的暴亂。暴亂一週後，蘇哈托總統下台，結束了三十多年的一人獨治天下的局面。

關於這場暴動的性質、意義和具體情況，都有相當分歧的爭議，例如暴動到底是一場人民革命還是軍方奪權的陰謀，這一類的爭議相信會一直持續下去，很多具體發生的情況更是一直無法釐清，例如華裔婦女受到集體強暴的襲擊，竟然是在事件發生過了一個多月以後才逐漸由網路消息傳出，最後才得到大眾媒體的注意而加以報導。而事後的發展是，除了有民間團體進行調查，有比較詳細的調查報告出現以外，官方的調查雖然弄得煞有介事，最後竟然是不了了之，真相還在眾說紛紜的迷霧中。

印尼 1998 年五月爆發的騷亂，開始是在棉蘭由要求改革的學生引發的暴亂，暴亂中華人及華人商店再一次成為攻擊的對象，¹³後來擴散到雅加達，而後來發生軍警對學生開槍的事件，引發了雅加達前所未有的大暴亂，不僅有華人的財產被焚燒搶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騷亂中華人婦女被暴徒有組織地強姦。許多人指稱，事件是由部份軍方人士和印尼極端勢力幕後策動。雅加達人權與婦女研究組織經整理後的報告顯示，五月發生的全國騷亂中，全國各地總共發生多宗暴徒強姦或集體輪姦華裔婦女的慘案，其中以首都雅加達發生的最為嚴重，施暴地點集中在華人開設商舖的北區和西區，如班芝蘭、米特拉巴哈里（Mitra Bahari）和文登（Jangkarang），而東區接近機場一帶的華人住宅區也成為目標之一。

華裔婦女的強暴事件主要發生在 5 月 14 日到 5 月 16 日雅加達暴動最厲害的三天，當滋事者控制了這個擁有 1 千萬人口的城市時，在雅加達城內各地便發生多宗強姦案。就現在可以掌握的資訊，可以拼湊出大致的圖象，在 1998 年五月十三日下午，暴徒開始燒車及進行連串破壞行動，翌日，雅加達陷入無政府狀態，到晚上，暴亂更到達高峰。據目擊者和受害人透露，暴徒分成數組，每組四至七人，由卡車載到現場，他們先帶頭搶掠，然後趁其他人加入搶掠期間，再由接載他們的車輛送離作案地點，由於這些人被指認是穿軍靴，同時卡車上也被指出有軍用品，因此懷疑可能有軍方涉入。¹⁴

¹³ 在棉蘭的暴動中，抗議物價高漲，要求政府解決經濟危機是主要訴求，因而華人商店成為主要被攻擊的目標，見“Kerusuhan Di Medan, 22 Mobil Dibakar”, Suara Pembaruan Daily, 6 May 1998. 及“600 Kios Dibakar Di Lubuk Pakam”, Waspada, 6 May 1998.

¹⁴ 見山迪阿宛神父訪問錄“Wawancara dengan Romo SANDIAWAN SUMARDI”, Mingguan D&R,

根據從事調查最具公信力的「人道志願團」的依達奈達表示，強暴事件的發生在地點上有特定的集中性，在雅加達某些角落，同一時候發生的性騷擾事件，出現在同一條街道的所有女人被施暴和性騷擾的情況。據調查，在五月暴亂中，暴亂期間發生的強姦和性攻擊事件中，有 20 名婦女與孩童喪命，是遭強姦後被攻擊者引火活活燒死，或隨後因傷勢過重而不治身亡。被強暴的婦女被調查出來的有 168 件，幾乎全部都是華裔婦女。¹⁵除了雅加達之外，在索羅(Solo)、棉蘭(Medan)、巨港(Palembang)以及泗水(Surabaya)，都有被施暴或遭性攻擊事件傳出。

參與援救工作的人道團體表示，這次大規模強姦案可能是有組織策劃的，根據其所查訪的對象表示，事件的幕後有人主導，先聚集了社會上的流氓和失業人士，然後將他們全部送到爪哇東部一地進行集訓。暴徒事前接受過訓練，以執行縱火搶掠和強姦華人婦女的任務。有消息還指暴民每強姦一名華人婦女，就能得到報酬。這樣的消息對多數的印尼人來說並不意外，印尼惡名在外的民兵團幾乎都是用同樣的模式形成。然而這些民間調查的能力有限，無法進一步查證，同時調查有組織強姦暴行的多個印尼民間團體，都受到恐嚇，如果繼續調查將帶來人身安全威脅。有能力對民間團體做這種規模的監控，似乎祇有軍方的情報部。

此事件經過媒體的廣泛報導之後，終於讓印尼政府採取行動，成立專案小組來調查事件真相，蘇馬迪和其他人權活躍份子週一向「國家人權事務委員會」提呈有關這些強姦案的詳細報告，報告中表示，其中大多數案件是發生在雅加達北部和西部。然而，許多倖存者、他們的家人、目擊者、醫生、醫院人員以及自願工作者，卻在調查期間接到威脅信或恐嚇電話，命令他們不要向有關當局或公眾人士透露這些性攻擊事件，這些情況顯示這些性攻擊事件背後涉及有組織的犯罪行為。「國家人權事務委員會」在其聲明中，直接譴責印尼政府疏於保安，讓強姦和性攻擊罪案迅速擴大，要求政府針對其疏失，無法保護人民的安全，作出公開道歉，並嚴懲歹徒。然而至今尚未有任何具體的後續行動，沒有任何人因為此事而控罪，也沒有任何人得到政府正式的撫恤或道歉。

No.44, 20 June, 1998.

¹⁵ “Kerusuhan Mei, Sedikitnya ada 168 Perkosaan”, Republika, 20 July, 1998.

參考資料

Asiaweek

CNN

Detik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Gatra

Kompas

Republika

Waspada

Washinton Post

中國時報

星洲日報

聯合早報

亞洲週刊

附錄：Vivian 證詞

Vivian 證詞是印度尼西亞五月暴動受害華裔婦女事件最早披露消息，而且是在網路上披露，然後消息才漸漸傳開，因此是個重要的文件。原文為印尼文，特別收在本書附錄，以昭信實，由於這篇證詞本身有其重要性，在此將全文翻譯出來。其印度尼西亞文的文本，是由網際網路的新聞討論組 <alt.soc.indonesia.mature> 下載。

The Testimony of Vivian

The Original, Uncut Testimony of Vivian in the Indonesian Language

Source: Newsgroup alt.soc.indonesia.mature

Date: June 12, 1998

From: Peace

Hai para netter,

Kemarin saya mendapatkan kesempatan untuk bertemu dengan salah seorang saudara dari teman saya yang menjadi salah satu korban kerusuhan 14 Mei lalu. Ia tinggal di salah satu apartemen Pluit.

Nama: Vivian (samaran)

Umur: 18 tahun

Kelamin: Perempuan

Dia memiliki seorang adik perempuan dan seorang adik laki-laki. Dia tinggal sekeluarga di apartemen ini.

creepy

Sekitar pukul 9.15 pagi hari sekeliling apartemen sudah di kerumun i ratusan orang massa yang terlihat seram sekali. Mereka berteriak-teriak seperti kesetanan, "Bantai Cina", "Mari makan Babi", "Ayo Pesta". Kami sekeluarga tinggal di lantai 7. Saat itu, kami ditelepon oleh keluarga yang tinggal di lantai 3 bahwa massa sudah naik ke lantai 2, dan bahkan ada penghuni yang dikejar-kejar sampai ke atas. Saat itu kami langsung takut, tapi dalam ketakutan itu, kami sekeluarga berdoa dan pasrah kepada Tuhan. Setelah itu, kami bersiap pergi meninggalkan kamar, dan kami terus naik melalui tangga ke lantai atas, karena ke bawah sudah tidak mungkin. Kami naik sampai lantai 15 dan di sana kami diam di kamar salah seorang kenalan kami. Tidak lama kemudian, kami kaget karena dari lift keluar sejumlah orang tepat saat kami akan masuk, lalu kami cepat-cepat masuk dan kemudian mengunci pintu. Saat itu kami mendengar pintu kamar lain diketuk dengan keras dan terdengar banyak teriakan dari ibu-ibu dan anak2 gadis. Sementara kami merasakan amat mencekam di dalam kamar, lalu sadar bahwa kamar kami nantinya akan mendapat giliran, maka kami langsung berpecah dan sembunyi di sudut2 kamar. Dari dalam kami mendengar sayup-sayup anak2 gadis sekitar umur 10 sampai 12 tahun yang berteriak, "mami....mami.....", "mami.....sakit.....mami.....". Saat itu saya tidak tahu apa yang terjadi.

Setelah hampir setengah jam kami menunggu, keadaan mulai reda, dan suara mulai tidak terdengar, kami memberanikan diri untuk melihat. Dan setelah kami keluar, ternyata apa yang kami liat adalahtidak dapat disebutkan..... Kami melihat banyak orang bergelepak di lantai, banyak anak anak kecil dan anak2 gadis yang ikut bergelepak... Ya Tuhan....apa yang terjadi...., adik saya perempuan (Veny) berteriak-teriak histeris melihat itu semua, dan dia langsung memeluk papa saya. Melihat itu sayapun menangis..... Akhirnya, kami bersama dengan kenalan kami, dia suami istri baru menikah turun lewat tangga. Sampai di lantai 10, terdengar ada beberapa teriakan minta tolong..Karena teriakan itu jelas terdengar, kami tergerak untuk masuk ke lantai itu..Tapi saat belok dari persimpangan, kami terkejut karena banyak sekali orang-orang. Dan saya sempat melihat dengan mata kepala sendiri ada seorang gadis yang umurnya sekitar 20 tahunan sedang diperkosa oleh 4 orang..dia berusaha berontak tapi dipegangi. Melihat itu kami langsung lari sekuat-kuatnya....

Tapi malang...Veny keburu ditangkap oleh orang2 itu. Dan saya sekeluarga berusaha menyelamatkan dia, tapi mereka kira2 ada sekitar 60 orang. Akhirnya kami

sekeluarga, papa, mama, saya, Veny dan Doni juga kedua suami istri Om Dodi dan tante Vera diikat oleh mereka dengan menggunakan sobekan seprei. Mereka membawa kami ke sebuah kamar. Om Dodi saat itu sudah menanyakan kepada mereka apa yang mereka mau, tapi mereka tidak menjawab, tampang mereka sangat jahat dan kejam. Salah seorang dari mereka menarik Veny dengan kasar, dan menyeretnya ke sofa, saat itu saya tahu, bahwa Veny dalam bahaya, saya berusaha berteriak sekeras-kerasnya, dan salah seorang dari mereka menampar saya, kemudian papa saya yang juga berteriak dipukul dengan balok sampai pingsan, mama saya sudah keburu pingsan sejak melihat Veny ditarik oleh mereka.

Saat itu, saya hanya berdoa pada Tuhan, Tuhan jangan sampai malapetaka itu menimpa kami.... Om Dodi, yang saat itu terus membujuk mereka agar mau meninggalkan kami dengan imbalan uang tetap tidak berhasil. Dan.....akhirnya Veny diperkosa secara paksa oleh mereka. Saya yang tidak tahan melihat hal itu apalagi mendengar teriakan pilu Veny, langsung menangis dan menutup mata rapat2...Mereka yang memperkosa Veny kira2 ada 5 orang, dan setiap orang selalu memulainya dengan teriakan "Allahu akbar".... Mereka sadis....mereka kejam.....tampang mereka sangat bringas..... Tidak berapa lama ada sekitar 9 orang lagi masuk ke kamar itu, dan menarik saya dan saya sempat melihat tante Vera juga ditarik secara paksa. Saat itu saya langsung pingsan.....dan tidak tahu apa yang terjadi....

Saya terbangun kembali kira2 sore hari sekitar jam 5/6 sore, kepala saya pusing dan saya baru sadar bahwa tubuh saya ternyata tidak mengenakan baju lagi, dan saat itu saya menangis, saya merasa amat kecewa, saya ingat bahwa anggota keluarga saya masih di situ,, dan saya melihat dengan samar-samar papa memeluk mama saya dan Doni. Om Dodi saya lihat tergeletak di lantai, sedangkan tante Vera menangis di atas tubuhnya. Saya tidak kuat bangun..... Saya akhirnya lemas dan tertidur kembali.

Keesokan harinya saya telah ada di rumah sakit pluit. disamping saya ada mama dan papa. dengan masih merasa sakit di seluruh tubuh saya, saya bertanya, "ma...kenapa Vinny ma.....?" Tapi saya merasakan sakit sekali sewaktu mengucapkan kata2 itu. Pipi saya rasanya bengkak. Mama saya langsung menangis dan tidak dapat berbicara. Sementara papa tersenyum sambil menahan tangisan.

Setelah kurang lebih 4 hari saya dirawat, keadaan saya mulai pulih. Dan papa menceritakan kepada saya apa yang telah terjadi dengan pandangan yang pilu..... Saat saya pingsan itu, saya telah diperkosa oleh sekitar 7 orang, saat itu papa saya masih tidak bisa melihat dengan jelas, karena ia masih pusing akibat dipukul dengan balok. Mereka memperkosa saya dengan membalik-balikkan tubuh saya dan membenturkannya ke tembok. Dan, setelah itu papa bilang...."Vin, Veny udah

jalan.....". Saat itu saya bingung dan tidak tahu mengapa saya langsung menangis, dan mungkin tangisan itu terdengar sampai keluar kamar... "Kenapa pa?????", papa tidak menjawab....papa langsung menyuruh saya istirahat dan ia langsung keluar kamar. Saat itu saya menangis terus-terusan seakan hidup ini sudah tidak berarti lagi.

Setelah semuanya itu berakhir dan seminggu yang lalu saya pulang dari rumah sakit ke rumah saudara saya, saya baru diceritakan apa yang terjadi. Ternyata, saat Veny diperkosa, Veny berusaha terus melawan, oleh sebab itu ia berkali-kali ditampar oleh orang2 biadab itu, dan terakhir kali Veny melawan, ia meludahi salah seorang dari mereka. Merasa tidak senang, ia mengambil pisau (tidak tahu pisau apa) dan langsung melayangkan pisaunya itu ke perut Veny, dan secara biadab seperti binatang ia berkali-kali mengibaskan pisaunya ke perut Veny, sampai akhirnya Veny menghembuskan nafasnya yang terakhir dengan darah mengalir di sekujur tubuhnya.

Saat mendengar itu, saya langsung shock, dan papa bercerita lagi bahwa Om Dodipun mengalami hal yang sama, yang akhirnya menghembuskan nafasnya yang terakhir di saksikan tante Vera yang juga menjadi korban perkosaan.

Tuhan.....mengapa ini semua mesti terjadi??? Saat ini tante Vera ditemani oleh kakaknya tinggal di rumah orang tuanya, dan menurut kabar dari kakaknya, sampai hari ini dia masih shock dan sering melamun sendiri, bahkan seringkali tidak mau diajak makan. Dan, mama saya juga pasrah. Saya dan mama sampai saat ini, hampir tiap jam menangisi kejadian tersebut, dan saya tidak bisa lupa akan kejadian hari itu. Bagaimanapun juga mereka adalah manusia biadab yang tidak berkeprimanusiaan.

Saudara2 para netter, saat ia menceritakan kejadian ini, banyak yang tidak dapat diungkapkannya melalui kata2, dan sepanjang bercerita, airmatanya selalu mengalir tak tertahan. Dan mendengar cerita yang serupa dari beberapa teman saya yang lain, yang hampir selalu sama adalah teriakan "Allahu akbar" yang diucapkan oleh para penjahat itu. Apakah mereka menganggap perbuatan mereka itu jihad?

Hai para alim ulama, Agama Anda adalah agama mayoritas, tetapi orang2 yang baik dan memiliki cinta kasih terhadap sesama dalam agama Anda adalah minoritas. Bagaimana dengan Kristen, Budha dan Hindu, yang agamanya merupakan agama minoritas, tapi umat2 yang baik dan memiliki cinta kasih dalam agama itu adalah mayoritas. Sebagai saran saja bagi anda para ulama Muslim, kami menghormati agama anda sama dengan kami menghormati agama kami sendiri, agama anda adalah agama yang baik, tetapi para pengajarnya lah yang tidak mengajarkan cinta kasih, dengar saja di radio, FM 98,5 atau 95,4 kalau saya tidak salah. Di situ terdapat siaran langsung khotbah pengajian dari sebuah mesjid di jakarta, Anda tahu, yang diajarkan

oleh para pembicara di situ adalah, bahwa umat Islam harus bangkit, balas dendam, memusuhi Kristen, Memusuhi Cina, melawan Pemerintah.

Hai, engkau para ulama yang munafik, kalo Anda tetap tidak mengajarkan saling mengasihi dan saling mencintai dengan kasih antar sesama umat yang seagama maupun yang beragama lain, maka saya yakin agama Anda tetap jadi Mayoritas tetapi dengan kualitas umat yang semakin bobrok dan dengan umat yang semakin beringas.

INGATLAH! Anda yang mengajarkan, Andalah yang akan mendapatkan hukuman tertinggi dari Tuhan.

Semoga Anda bertobat!

Vivian 證詞

筆者所譯

(開頭為發信者說明)

親愛的網友：

昨天我有機會見到一位五月暴動中的受害者，是我一位朋友的親戚，在五月十四日受害，她住在 Pluit 的一棟公寓。

(基本資料)

姓名: Vivian (化名)

年齡: 18 歲

性別: 女性

她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和家人一起住在公寓。

(Vivian 自述) 大約早上九點十五分公寓被上百名群眾包圍，他們好像著魔一樣，他們高聲叫喊著，「宰了華人」，「把這些豬吃掉」，「大夥一起上」。我們家住在七樓，當時我們接到住在三樓的住戶的電話，告訴我們群眾

已經爬到二樓了，並且追趕住戶，一路往上爬。我們聽了很害怕，但在害怕之中，我們家人開始祈禱，把信心交托給上帝。然後我們收拾準備離開，從樓梯往上走，因為往下走已經是不可能了，我們計劃躲到十五樓的熟人家中，到了十五樓時我們嚇了一跳，正當我們要進入室內時看見幾個瘋漢從電梯中走出來，我們很快進去並且將門鎖起來，我們可以聽到強力的敲門聲，以及來自其他住家的婦女及女孩尖叫的聲音，場面很緊張，我們知道很快就會輪到我們，因此我們散開躲在角落裡，當我們躲起來時，還可以聽到一位約十歲或十二歲的小女孩尖叫，「媽媽、媽媽」，「媽媽、受傷了、媽媽」，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等了半個小時以後，似乎一切恢復平靜，再沒有聽到什麼聲音，我們鼓起勇氣走出來，當我們走到室外，我們看到很多人躺在地板上，包括小孩及年輕女孩，老天，發生什麼事，我的小妹（Veny）尖叫，然後抱住我們的父親而哭泣，看到這個場面我也哭了。最後我們和我們的熟朋友和一對新婚夫婦決定走下樓去，走到十樓時，我們聽到有人喊著需要幫助，由於叫聲很清楚，我們就設法去找聲音從那裡來，但是當我們轉入交叉口時，我們全給嚇住了，有很多瘋漢在那裡，我當場親眼目睹了四個男人圍著個女孩（約二十歲），正在強姦她，她拼命抵抗，但是因為被緊緊抓著而無能為力，看到這個可怕的情況，我們儘快往外跑…

很不幸，他們追過來，先是抓住了 Veny，我們設法要救她，但是他們人太多，我們寡不敵眾，他們約有 60 個男人，最後，我們全家，父親、母親、Veny、Doni 和我，以及那對夫婦 Uncle Dodi 及 Auntie Vera 全被抓住，並且用繩子綁起來，繩子是臨時從床單撕下來做成的，他們把我們抓到房間裡，Uncle Dodi 問他們到底想做什麼，他們不理他，他們臉上沒有一點慈悲。

其中一人很粗魯地把 Veny 拖到沙發上，我知道她有危險，於是大聲尖叫，但是被另一人打了巴掌，我父親也大聲叫喊，然後被人用一根木棒狠狠打了一記昏過去了，我母親則在她看到 Veny 被拖過去時就暈過去了。

此時我祇能向上帝禱告，「父神，請不要讓可怕的事發生在我們身上。」Uncle Dodi 嘗試要他們放人，表示可以給他們錢，但是無效，於是 Veny 就被他們強姦了，我實在無法忍受，Veny 淒厲地叫喊著，我祇能緊緊把眼睛閉著，他們有五個人，每個人開始他們殘暴的行動時，都喊著「阿拉真神」（"Allahu akbar"），他們實在野蠻，無法用言語來形容，臉上充滿凶惡，過了一會兒，九個男人過來把我拖過去，我也看見 Auntie Vera 也被強拖到一邊去，我昏過去而不省人事…

我醒過來時已經時下午五、六點時分，我感到暈眩，然後發現全身沒有穿衣服，我開始哭泣，我感到全身被蹂躪，我記起我的家人還在那裡，我彷彿看

到父親抓住母親和弟弟 Doni，而 Uncle Dodi 躺在地板上，Auntie Vera 扒在他身上哭泣，我無法站起來，我感到很虛弱而又昏睡過去。

一天以後，我發現自己躺在 Pluit 醫院，父母親在我旁邊。此時我還是全身感到痛楚，我問，「媽媽，Veny 她怎麼了？」，當我說話時，我覺得面頰痛極了，母親一聽到這話就哭起來而不說話，父親強忍住淚以微笑來安慰我。

在醫院躺了幾天，我慢慢恢復力氣，然後父親慢慢告訴我當天發生了什麼事，他的臉上充滿憂傷，他說當我昏迷過去以後，我被大約七個男人輪姦，當時我父親因為被木棒打昏頭腦，也是昏沈沈，看不清楚，但是看到他們把我身體當做玩具，甚至丟去撞。父親最後說，「Veny 已經過世了。」我感到很困惑，不明白為什麼，忍不住哭出來，直問父親為什麼，父親不說話...他要我好好休息，就先離開了，留下我祇能哭個不停，我感到我的人生再也沒有什麼意義。

折磨過去以後，我在一週前離開醫院，住在我一個親戚家裡，然後我才聽到有關當天 Veny 發生的事，當天 Veny 被強姦時不斷抵抗，而被那些野蠻人不斷毆打，最後她向其中一人吐口水，引起那人生氣，他拿出刀子在 Veny 肚子上捅一刀，後來又連續刺了好幾刀，Veny 就在全身血泊中斷氣了。

聽到這樣的消息，我嚇壞了，接著父親說到 Uncle Dodi 也是同樣的命運，當場死在 Auntie Vera 面前，她則在更早之前被輪姦。

父神，為什麼這些事會發生，此時 Auntie Vera 住在她父母親的家中，由親人陪伴著。她的親人說，她還在驚嚇狀態中，精神還沒有恢復過來，她甚至拒絕進食。這段期間母親給我最大的精神支柱，她每天伴著我，然而幾乎每個鐘頭我們想到這不幸就會哭，我絕對不會忘記當天發生的事，也永遠不會忘記那些野蠻而喪失人性的人。

觀摩第十六屆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 會議心得報告

林淑慧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行政助理

我參加第十六屆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簡稱 IAHA）的主要目的是觀摩此類大型國際學術會議的舉辦過程。過去雖然參與本計畫所籌辦之國際學術會議，但均屬於百人以下的規模，而且經費多半是院方或相關單位支持，形式多已固定。而 IAHA 則是自籌經費，參與的人數數百人，且來自於數十個不同的國家（參考附表），事前的聯絡與場地的規劃，需要周全的籌劃，以使會議能順利舉行。以下即以此次全程參與此會的經驗，作為往後籌辦會議的參考。

（一）

在 1999 年 9 月 14 日收到大會邀請函及大會主要議題，於是在 9 月 29 日諮詢委員會上將此訊息提供給與會者，並連同會議紀錄發給各分支計畫主持人，徵求參加者。於 11 月 24 日召開參加此會之第一次籌備議，提出發表論文之題目、時間、航班及住宿問題，確定初步之行程。所以在開會前一年到十個月通知前一屆參與者大會議程，同時將此訊息設專屬網頁，給予可能參與者足夠之訊息：包括會議時間、地點、主要議題、報名（及繳交摘要、全文規格）時間、使用語文，報名費（及專屬銀行帳號）、建議住宿旅館、會後旅遊地點等。讓參與者能了解大會舉行之概況，依時間表行事。

（二）

報名方式，在 2000 年 1 月 31 日以前報名，收費 600 馬幣；之後則為 750，隨從人員則為 200 馬幣。這種方式的確使本計畫為節省經費而提早報名。但也因

此有三位報名者不能如期參加。在退費方面，手冊上寫的是扣留 5%，而在 email 詢問時，則說恕難退費；而會場上，大會副秘書說扣留 25%；後來遇到總秘書，又說是 5%，目前還沒有收到退款支票，不知道最後的結果如何。這是必須改進。收費及退費應該在事前就周詳的考量，不該因時因地因人而異。

(三)

截稿日期為 5 月 15 日，後來延到 31 日。未能如期交稿者，自行攜帶 30 份到會場發放。會場發放書面資料，是無可厚非，但網路發達的今天，應該提供更多的服務，如收到的稿件，儘速上網。截稿日期，只限於代為印刷與否的根據，而隨時寄出論文，並放在網站上，加強知識流通的管道。

(四)

7 月 26 日開始註冊，27 日 8 點即將舉行開幕式；大會及住宿旅館曾不止一次要求我們提供抵達班機之時間，讓我以為會有專車接機，但進一步詢問時，卻無進一步消息，到達機場時，才接到「台北」來的電話轉告大會訊息：沒有接機。其實從機場到旅館，搭計程車應該都沒問題，只是這樣也就沒必要問參與者抵達之時間。否則徒增誤解。

(五)

大會期望參與者能提早一天辦理報到手續，而單一註冊地點設於會場，由於標示不明，接駁司機也沒弄清楚，又是一個非常大的飯店，對於一群初來乍到的人們，著實費了一番工夫才找到。所以如果能在每個指定旅館都設一註冊處；或住宿登記時，同時辦理報到手續，領取資料，乃至於會場之清楚標示等，對參與者是比較方便的。

(六)

由於 26 日晚間是絲綢灣遊樂區(Setura Harbour Resort)開幕典禮，邀請馬國首相馬哈迪蒞臨開幕，有隆重的晚宴、表演，並在 10 點 30 分施放煙火，整個氣氛很熱鬧。第二天首相也出席了 IAHA 的開幕典禮，並發表演說。商業活動加上政治活動，對於學術活動的提昇是否必要，值得思量。

(七)

開幕典禮在最後通告時訂於 9 點於沙巴大學校園禮堂舉行，並要求與會人士著正式服飾參加。而註冊時之通告將地點改為開會之麥哲倫飯店。像這樣改地點、時間，在之前之後都發生。比如，之前訂開會地點為 Pan Pacific Setura；之後改到麥哲倫飯店；之後 28 日晚餐時間在時間表上訂為 7 點 30 分，邀請卡上則

寫 7 點；31 日開會員大會宣布下屆主辦國及選舉會長副會長的時間，原訂為下午 4 點，而於 29 日下午貼出告示，改為早上 8 點，連帶整個開會時間也變動。這似乎都是該避免的。

(八)

開會地點設於五星級飯店，足夠的空間、服務人員及設備，是最大的優勢。無論在正式會議、影印資料、旅遊資訊、及至沖洗會場照片；或休息餐點及正餐方面，都能提供完善的服務。會場集中，全體與會者參與的大型會場（1000 人），六個分組報告的小型會場（50-60 人）集中於同一樓層，對發表者，聽眾及工作人員都很方便。但所費不貲。若以台北而言，國際會議廳或凱悅舉辦，那麼場地費非常高——50-60 人的場地全天（上、下午）租金 25000 元，六個場地，每天需 15 萬元；若以人頭計算，每人 1600 元（含茶點及午餐），250 人計，每天需要 40 萬。在中研院辦，可以省下場地費。而在院內舉辦，則分散各所，從文哲所要到民族所比較遠。如何取捨？需要審慎考量。而洗手間都維持相當乾淨，這是一定要做到的。

(九)

一般而言，大會進行的還算順暢，開始正式議程，每個時段有六個會場同時進行。每位論文發表者有 15 分鐘唸稿，三位共用 45 分，之後 1 小時開放討論。只是有些場次原發表論文者未到，有些場次原只有三位論文發表者，臨時增加一位，論文加印時發生錯誤，需要格外注意。

場內參加人數幾人到三、四十人不等。大會要求沒能及時交論文者，自行帶三十分論文，且大部分都有一專門發論文之工作人員，但仍出現第七個到場，已拿不到論文的情形。如何讓出席會場的人都能拿到論文，是件值得注意的事。

在個別的會場上，比較大的問題是論文份數及發送方法，三十份是蠻適當的份數，不足時可以再印，但要雙重核對，比較不會印錯篇。每個會場有專人發送，是費人力，但有效執行的話，是可以讓每個在場的人都拿到論文，也是值得的。

此外，開放報名者，是否可以有整套的論文集？已繳會費，大會是否有義務提供全套資料的服務？或分整套、分組及會後散篇，不同的收費，不同的服務；以價制量，可以有效使用資源，但手續較為繁複。例如在論文收費部分：

全套 200 篇（四個主題）：繳費 4000 元

單一主題（50 篇）：1000 元

會後散篇影印：每篇 30 元

報告者提供該主題所有論文，若參加其他場次，再加印論文即可。

而這個方法行得通的必要條件是確定 80% 議程及文章。怎樣掌握發表者與達到這麼高的準確度？必須好好研究。

同時以每一個國家為單位，贈送一套給發表論文者。如果帶不回去，可以海運寄至該國相關圖書館。

收集發表論文放在網頁上，由個人依喜好選取，也是節省資源的好方法。

(十)

在餐點方面，由於馬來西亞以伊斯蘭為國教，所以在餐點中，不見豬肉，多魚與雞肉，偶見牛肉。他日在台北舉行時，也需注意飲食問題。

晚餐多有官方盛情招待，第一天為副首相，第二天為觀光文化部，第三天為沙巴立法院，唯官員總是發表長篇演說，而表演節目又多雷同，使得用餐時間多超過三小時，個人覺得蠻疲倦，因為從早上 8 點開始開會，中間休息一會，到下午 5 點 45 分才全部結束。當然並不是每個人每一場都參加。但是用餐時間如果能在 60 到 90 分之間完成，應是較為理想。

餐飲方面，午餐採自助式，豐盛而費時，是否必要，可視經費及場地而定。晚餐由政府首長招待，冗長的演講，太過政治化，並不恰當。同樣的表演一而再而三…沒什麼趣味。也許可以在開幕夜，舉辦一場有本地特色的表演；在大會結束當晚有個簡單輕鬆的惜別酒會，互相聯誼。

第二天晚餐後(8:00-9:30)，簡單輕鬆的雞尾酒會（含區域色彩，請台北此方面較好的餐廳準備），安排東亞研究團體介紹該國此區域研究主要方向。第三天談東南亞，第四天談南亞，自由參加。或者在會議間的某時段。

(十一)

以住房而言，此次大會提供了五家旅館以供選擇，價格在 2000-700 元台幣不等，相隔不遠，其中有小巴士接駁，出入方便。相對的如果在中央研究院舉辦，活動中心有 70 間單人房（700 元），50 間雙人房（1100 元），之外較近的旅館，就是東區的凱悅 870 間、國聯 220 間，價格可磋商，通車時間約半小時。雖然沒有如此次方便，但台北市區的多樣性，又提供不同趣味。

(十二)

星期天主要的活動是大會帶大家參觀鄉間一個市集，但是代表演說、表演節目又花了大半時間，以致下午 1 點多才到沙巴大學餐廳吃飯，飯後匆匆離開，對

這個主辦機構只是驚鴻一瞥，只感覺得校園很大，但其他特色？只有回來上網再查，失去一個互相認識的機會，蠻可惜。之後參觀沙巴博物館也有同樣的問題，約 3 點 50 分到，而因租車時間只到 4 點鐘，在特別研商的情況下，要求大家在 4 點 15 分集合。於是只能走馬看花，準時到車上集合，但是很多人拖到 30 分鐘才上車，之後有位工作人員來更正參觀結束時間為 4 點 30 分，令人不快。這是應該避免。

他日在台北舉行時，參觀活動可以安排到朱銘博物館，順便到金山萬里北海岸一周，領略都市之外另一種台灣風情。或是故宮博物院、陽明山、士林夜市一日遊。

總之，亞洲歷史學家學會本身除了發表研究論文之後，提供一個全球亞洲研究學者學術訊息交流的重要場所，需要細心規劃及經營。如此對提昇國內亞洲研究及於國際學術領域之能見度有正面的意義。

附表 參加此次會議的國家與人數：

國家	人數	國家	人數
1. Australia	5	16. Nepal	2
2. Bangladesh	9	17. Netherlands	3
3. Belgium	2	18. New Zealand	1
4. Brunei Darussalam	3	19. Pakistan	3
5. China	6	20. Philippines	9
6. Czech Republic	1	21. Portugal	1
7. France	1	22. Russia	1
8. Germany	6	23. Singapore	7
9. India	10	24. South Africa	1
10. Indonesia	10	25. Sri Lanka	3
11. Italy	1	26. Sweden	1
12. Japan	12	27. Taiwan	13
13. Hong Kong	2	28. Thailand	5
14. Malaysia	135	29. United Kingdom	3
15. Myanmar	2	30. United States	4

資料來源：依大會“Programme and List of Participants”所做統計，總計 262 人，其中有 135 位馬來西亞人，127 位外國人。不過，實際人數會有些出入，其中有些人沒有來，而南韓有一位論文發表者沒有登錄。

◆英國・護爾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Centr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ull, U.K.)*

一、教學研究旨趣

英國護爾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創立於 1962 年，¹隸屬於該校社會科學院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目前該研究中心有十一位專任教師。他們的研究對象涵蓋東南亞十國，但現在以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汶萊、新加坡、越南、寮國、柬埔寨等國為研究重點；他們也對菲律賓、緬甸等兩個國家做研究，但較少。其次，該中心的研究領域主要是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其中又以文化人類學、人文地理、社會學、當代文化與社會、經濟學、現代政治史、各國政治與國際關係、區域安全與防衛等為首要議題。

除了這些專任教師以外，該校的相關領域中，還有三十餘位人員能夠支援該中心的教學研究工作，開出更多的課。例如，該校的亞太研究所 (Institute of Pacific Asia Studies) 就能與該中心共同開課。

該中心所開設、規劃的課程有一特色，就是鼓勵學生到東南亞（尤其是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的大學，實地去學習該國的語文，深入了解當地的生活與文化，並蒐集資料以便寫作學期報告與論文。

為了師生的教學研究之所需，該校圖書館中藏有（倫敦以外的）英國最豐富的東南亞研究相關資料，其中包括三萬冊藏書、兩百多種現行期刊、數千份檔案資料、當代資料庫，以及視聽資料庫等。另外，它還有一個博物館，蒐集東南亞（尤其是印尼）的相關文物。

二、既有成就

依照 1986 年的派克報告 (Peter Parker's Report) 所規劃的方向，該研究中心已定位為一個國家級的、東南亞的教學研究中心；長期以來，它也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它三十多年的努力，業已得到國家的肯定。²1997 年，它的角色與成就再

* 本文之完成，要感謝該中心秘書 Stella Ryan 小姐提供的資料。

¹ 該校的前身是成立於 1927 年的 University College Hull；當時該學院是倫敦大學在英格蘭東北部的分部，學生獲頒的也是倫敦大學的學位。1954 年該校獨立出來，成為約克郡 (Yorkshire) 的第三所大學，英格蘭的第十四所大學。今天約有一萬兩千名學生。

² 例如，1992 年英國的國家研究評鑑 (National Research Assessment) 對它有很好的評價；五分裡面給予四分（這已經是相當不錯的等級）。

度受到肯定。³

我們以它的出版品為線索，就可以知道這種成就並非浪得，而是基於經年累月的埋首耕耘。它的出版品很多。例如，它出版一系列研究論文 (Occasional Paper Series)、⁴書目與文獻系列 (Bibliography and Literature Series)、⁵新系列 (New Series, Monographs on South-East Asia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⁶特刊 (Special Issues) 等。以特刊為例，它在 1998 年就由國際知名的東南亞研究學者—Pierre-Yves Manguin 教授—編著、出版歐洲的東南亞考古學家協會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 1994 年的會議論文集。⁷

三、聯絡對象與方式：

聯絡人：Professor V.T. King

地址：Centr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ull
Cottingham Road, Hull HU6 7RX
England, U.K.

電話／傳真：44 (0) 1482 465758

電子郵件：S.Ryan@pol-as.hull.ac.uk (秘書)

網路：<http://www.hull.ac.uk/seas>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博士後研究學者嚴智宏提供)

³ 英國高等教育基金委員會 (The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對該校在這方面的成就給予肯定。見 <http://www.hull.ac.uk/prospectus/seas.html>。

⁴ 現在已出三十四本。

⁵ 現在已出十三本。

⁶ 現在已出四種。

⁷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94: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 Paris, 24th-28th October 1994*, two volumes, Hull: Centr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ull, 1998.

◆泰國・清邁大學

社會科學與永續發展區域中心◆

(Regional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CSD,
Chiang Mai University, Thailand)

一、宗旨

泰國清邁大學社會科學院於 1998 年創立了「社會科學與永續發展區域中心」。創立之目的，是為了要整合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領域的知識，以便對大陸東南亞（主要是上半部，亦即 the upper mainland Southeast Asia）做更正確而深入的理解。

這個中心在該大學二十餘年之久的教學研究基礎上，矢志要成為一個研究「永續發展」的地區中心。而且，它要把學界的訓練、研究，與業界的發展政策、實務聯結起來。

它鼓勵東南亞區域之專家學者、研究人員、政策制訂者之間的意見交換、經驗分享與資訊交流。因此，它與國內外許多研究機構、系所等已有相當可觀的聯結。在這個基礎上，它經常性地舉辦各種工作研討會（workshop）、專題討論、會議等。這些活動都與永續發展有關，或者與政治經濟、文化因素、及發展政策與問題相關。

二、課程

它為泰國及鄰近國家的學生、研究人員、非政府組織等開設一個研究所級的課程（見下文），重點放在永續發展的理論與概念上。同時，它也致力於提高研究能力，增進東南亞區域各機構在民族、性別、資源管理、跨國移民、健康衛生等相關議題上的研究合作。職是之故，該課程在研究的領域及議題上，以下列幾項為優先：女性與健康衛生、都會與跨國移民、對愛滋病的文化反應、民族和性別關係與資源管理、永續發展。

它所提供的研究所級課程（叫做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概況如下：

它為泰國及國際學生（特別是鄰近國家的學生）開設永續發展課程，授與碩士、博士學位。課程重點在於以科技整合的途徑，對不同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環境中的資源管理與永續發展、民族與性別關係等，做深入的研究。

其次，它提供批判性的概念做為工具，以便分析政治經濟變遷、地區體系與地區性的知識的永續發展，以及這些變遷對環境、移民、健康的衝擊。它很注重區域性的情境和觀點，以便了解這些議題在歷史的、社會的、空間上的關係，例如高地（highland）與健康問題有何關連？

它還為各領域或部門的研究人員、相關工作人員、政府官員或公務人員安排經常性的訓練營。訓練主題包括永續發展、女性與健康等。在方法上，它強調研究計畫的充實與發展、新的研究取徑、田野調查資料的分析等。

此外，它特別注重一件事，亦即高地的地區性領導者與青年的角色。它為他們提供訓練課程，以增強他們在資源管理、健康照護等方面的地區性知識與實務經驗。另一方面，它也讓他們接觸各種新的、不同的想法。為此，它們舉辦各種論壇、工作研討會，以便大家在高地永續發展、政策制訂、土地利用、傳統之外的農業、以社區為基礎的健康照護、參與性的資料蒐集之方法（participatory data gathering methods）、圖表製作等等議題上，能夠充分交換資訊、分享經驗。

三、聯絡對象與方式：

地址：Director

Regional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Chiang Mai University
Chiang Mai 50200, Thailand

電話：66 53 943 595

傳真：66 53 222 763

電子郵件：rcsd@soc.cmu.ac.th

網址：<http://www.soc.cmu.ac.th>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一、本所於 8/10~8/15，由李美賢老師與三位研究生高英凱、陳佩瑜、吳佩育等，獲邀參加葡萄牙里斯本所舉辦的「East Timor, Indonesia, and the Region」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本所研究生柳時和，於 7/20~8/20 赴越南河內經營管理大學，進行訪問研究。

三、本所研究生謝尚伯，於 8/20~9/10 赴新加坡國立大學，進行訪問研究。

四、本校於 9/20 日正式開學，本所這學期新開課的課程有：麥留芳教授的馬來回教世界、黃兆仁教授的東南亞經貿專題研究等等，將使本所研究生更開拓其國際視野。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一、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課程

授課教師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星期／節次
林若雱	東南亞各國比較政府	2	五 3 4
	國際組織與區域安全	2	三 3 4
	國際政治經濟學	2	四 6 7
龔宜君	東南亞國家發展專題	2	一 3 4
	東南亞台商專題研究	2	一 7 8
	社會科學方法論	2	三 6 7
林欽明	東南亞經濟成長與發展	2	三 8 9
	區域經濟整合	2	五 7 8
	低所得國家經濟成長與階級結構	2	四 3 4
梁廷基	馬來文(一)	3	二 2 3 4
洪鏐德	東南亞與台灣問題研究	2	三 1 2
林長寬	東南亞伊斯蘭專題	2	二 7 8

以上課程仍有部分可能異動

二、學術活動

1.本所與本校日本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與俄羅斯研究所擬於十月十九、廿日假本校淡水校園覺生 10 樓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Regional Secur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sia-Pacific” Two Millennium Conference.

2.本所研究生蘇裕盛同學暑期赴越南新順加工出口區台商會及新加坡工業區進行田野調查，同時赴我駐胡志明市代表處就台商經營情況進行訪談。

3.本所研究生張書銘同學暑期赴越南胡志明市，針對越南新娘仲介商進行訪談，同時赴台北駐胡志明市代表處訪問負責面談越南新娘之外交官員。

4.本所研究生章少棠同學暑期赴泰國朱拉隆功大學進行為期一個半月的學術交流。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辦公室報導

壹、徵求九十年新分支計畫

一、本計畫研究方向：

- (一) 東南亞的考古與歷史
- (二) 東南亞區域的語言、宗教及族群本土文化
- (三) 脫離殖民統治後東南亞區域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之發展
- (四) 東南亞華人與當地族群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二、申請辦法

- (一) 資格：本院編制內之研究人員
(可邀請院外學者協同研究)
- (二) 時間：即日起至八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截止，通過審查者，自九十年一月一日起執行。
- (三) 表格：可向本辦公室申請磁片或由本計畫網站下載。

貳、八十九年度博士後、博(碩)士獎助

為了培育年輕的東南亞研究人才，本計畫提供若干名博士後研究及博(碩)士論文獎助；八十九年度獲獎人名單已揭曉：

- 一、博士後研究學者一名
戚常卉(美國波士頓大學)
- 二、博士論文獎助兩名
1.吳鯤魯(台大政治所)

- 2.呂秋遠(台大政治所)

三、碩士論文獎助七名

- 1.蘇俊翔(政大外交所)
- 2.張喬博(暨南東南亞所)
- 3.李永傑(暨南東南亞所)
- 4.徐鴻馨(淡江東南亞所)
- 5.鄭安貴(淡江東南亞所)
- 6.李建柔(淡江東南亞所)
- 7.陳秋平(南華亞太所)

參、出版品

今年一至六月間出版「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PROSEA Research Paper Series)八篇論文，序號為28~35，作者與題目如下：

- No.28 Sven E. O. Hort and Stein Kuhnle: Growth and Welfare? A First Look at the Recent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Experience
- No.29 Lau-Fong Mak: Modeling Islam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Brunei and Singapore
- No.30 Craig J. Reynolds: Icons of Identity as Sites of Protest: Burma and Thailand Compared
- No.31 Mab Huang: Debating Asian Values: Saying Too Little or Saying Too Much?
- No.32 Yi-Huah Jiang: Asian Values and Communitarian Democracy
- No.33 David G. Marr: Concepts of Statecraft in Vietnam

No.34 Anthony Reid: Chinese and Malay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No.35 Lau-Fong Mak: The Rules of the Name Game In Insular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肆、會議

一、本計畫於2000年5月6日(星期六)主辦「馬來伊斯蘭政教運動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olitico-Islamic Movements in the Malay World)。

會中，有六位馬來西亞與印尼籍學者發表論文：Dr. Muhammad Kamal Hassan、Dr. Zambry Abd. Kadir、Dr. Ibrahim Abu Bakar、Dr. Nurcholish Madjid、Mr. H. Junus Jahya、Dr. Muhammad Imaddudin Abdulrahim。

會議召集人為江日新教授(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林長寬教授(政治大學宗教研究中心)、蔡源林教授(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本計畫今年度的訪問學人麥留芳教授全程參與規劃，並擔任一個場次的主持人與評論人。

二、本計畫協辦5月11-12日(星期四、五)在淡江大學舉辦的「2000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本計畫參加研討會的人員包括蕭新煌、蔡青龍、陳仲玉、麥留芳、許文堂、黃蘭翔、嚴智宏等諸位教授，及李毓中、邱炫元、鍾凌峰等諸位先生。

三、本計畫於5月24日(星期三)辦理「越南經濟改革與台越未來學術

合作的方向學術研究座談會」。主持人為蕭新煌教授(本計畫主持人)、葉明德教授(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所長)。主講人為阮輝貴教授(Nguyen Huy Quy, 越南國家社會科學與人文研究中心「中國研究」總編輯)、杜進森教授(Do Tien Sam, 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黎可朵教授(Le Khac Doa, 河內管理經營大學副校長)、杜桂諒博士(Do Que Luong, 河內管理經營大學副校長,「諮詢投資公司」副總裁,曾任「越南國家銀行」副執行長)、陳春染先生(Tran Xuan Nhiem, 前「越南駐台北辦事處」副主任)。

四、本計畫組團參加7月27日至31日(星期四至星期一)在馬來西亞沙巴(Sabah)舉行的「第十六屆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IAHA)研討會」,參加的人員及發表的論文題目如次:

蕭新煌教授: The Middle Classes of Southeast Asia in Formation: A Preliminary Analysis

陳仲玉教授: Chinese Fisherme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朱浚源教授: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ia: Zheng He and Melacca as a Case Study

蔡慧玉教授: Tonarigumi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s) in Wartime Taiwan, Indonesia, and Japan (1942-45)

麥留芳教授: Islamization: The Singapore Model

蔡源林教授: Religious Revivalism in a Macro-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aiwan and Malaysia

朱榮貴教授：Contemporary Religion in Vietnam: Ideology and Religious Freedom

黃登興教授：Development and Trade Pattern in Southeast Asia

許文堂教授：Taiwanese Investment in Vietnam since the “Doi Moi”

黃蘭翔教授：Improving Urban Blight and Rehousing Squatters in Densely Populated Southeast Asian Cities- The Case of Hanoi, Taipei and Surabaya

會後，大家於8月1日訪問砂勞越大學，與相關學術主管座談，下午參觀砂勞越博物館，遊覽古晉市。8月2日訪問砂勞越發展協會，並參觀砂勞越文化村。原訂8月3日返回台北，但因飛機機械故障，延至4日返抵台北。

伍、午餐研討會及專題演講

一、2000年5月3日（星期三）

蔡家煌先生（鴻毅旅行社董事長）：越南旅遊業的前景

二、2000年5月23日（星期二）

Professor Judith Nagata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York University, Canada)：Is Islam Compatible with Democracy?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Civil Society and Human Rights Movement in Post-1990 Malaysia

三、2000年7月3日（星期一）

Professor Stephen O'Harrow (Director,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awaii, Honolulu, USA): Chinese Research on Viet Nam as Seen from America: Potential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四、2000年7月5日（星期三）

陳維鈞博士（本計畫分支計畫主持人/本院史語所助研究員）：越南馬江流域 Lang-Cong 遺址發掘報告

陸、活動預告

在即將來臨的幾個月裡，本計畫將舉辦以下活動：

一、被殖民都市建築國際研討會

時間：2000年9月6-7日（星期三、四）

地點：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籌備處

附註：與本院台史所籌備處合辦

二、中國與越南關係研討會

時間：2000年9月15-16日（星期五、六）

地點：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附註：與本院近史所合辦

三、東亞與東南亞經濟發展的經驗與挑戰研討會

時間：2000年10月17-18日（星期二、三）

地點：中央研究院經濟所

附註：與本院經濟所合辦

四、國際資本、勞動與族群：台商在
東南亞研討會

時間：2000 年 12 月 8-9 日（星期
五、六）

地點：中央研究院經濟所



馬來伊斯蘭政教運動國際研討會 • 5 月 6 日



Judith Nagata 教授（左）專題演講・5月23日



越南經濟改革與台越未來學術合作的方向學術研究座談會・5月24日

主持人的話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東亞研究資訊服務計畫主持人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為因應國家、社會之需要並增進我國學術研究之條件，自民國八十七年一月起推動「東亞區域研究」計畫。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了初步的成果。因此，國家科學委員會乃委託「東亞研究資訊服務」計畫籌辦研究成果發表會。其主旨是提供東亞研究學者們以學術交流之機會，並鼓勵各分支計畫主持人發表其研究成果。因此，我們將於今年十一月份在本院舉辦「東亞區域研究成果發表會」。預計將有三十多個分支計畫參加此一發表會。

另外，由於「東亞研究資訊服務」計畫的目標是蒐集國內外東亞研究相關資訊，以達到資訊整合、交流與共享之目的，因此，我們蒐集資料的工作一直進行著。繼「韓國研究書目彙編」、「日本研究書目彙編」、和「東南亞、日本、韓國研究博碩士論文彙編」之後，「當代中國大陸研究書目彙編」的編輯工作已接近尾聲，可望於短期內出版，為東亞研究再添方便有用的書目資訊。

希望在更多的人力、物力共同投入的基礎上，東亞研究的成果能夠更進一步、更上層樓。

東亞區域研究成果發表研討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因應台灣既有學術之研究條件與國家、社會之需要，自民國 87 年 1 月起，推動「東亞區域研究」計畫。至目前也已有初步的成果，因此委託「東亞研究資訊服務」計畫籌辦此一研究成果發表會，主旨是鼓勵各計畫主持人發表其研究成果，並提供東亞研究學者學術交流之機會。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東亞研究資訊服務

時間：2000 年 11 月 3-4 日（星期五、星期六）

地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邀稿對象：接受國科會補助投入東亞地區研究計畫之主持人

連絡方式：

研討會召集人：蕭新煌教授

研討會協調人：嚴智宏博士

研討會聯絡人：陳明秀小姐、簡心怡小姐

地址：

115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中央研究院 東亞研究資訊服務

電話：02-2651-6862 傳真：02-2651-6863

E-mail: isear@gate.sinica.edu.tw

議程表*

11月3日(星期五)	
9:00-9:30	
開幕 國科會人文處處長王汎森致詞 蕭新煌／東亞研究資訊服務成果與網頁展示	
第一會場	第二會場
9:30-11:00	
文學、歷史、教育 王淑華／眾聲喧嘩裏的莎士比亞 黃寬重／中韓關係史研究的回歸與展望 楊思偉／亞洲儒家文化圈(地區)升學競爭問題之比較研究 詹卓穎／韓國教育問題之探討	東亞制度調適 郭承天／台灣、泰國和馬來西亞的新金融政治 劉雅靈／強制完成的經濟私有化：蘇南吳江經濟興衰的制度基礎 吳玲君／東協國家與 APEC：政策與挑戰 彭慧鸞／日本與韓國電信自由化的制度調適
11:15-12:30	
體育 王宗吉／日本、韓國、台灣職棒制度與職棒運動的偏差行為關係之跨文化比較 方進隆／東亞四國國民體適能促進策略 黃賢堅／東亞主要國家體育績優選手之培訓及輔導獎勵制度 黃國義／東亞主要國家體育運動行政組織與制度 蔡禎雄／日本、韓國、台灣職棒運動文化與職棒運動的偏差行為關係之跨文化比較	投資法律、貨幣危機與區域主義 陳櫻琴／東亞區域法律繼受與法律發展－獎勵投資在亞太各國的發展 黃柏農／貨幣危機之預測：預警制度的建立 蕭全政／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台灣的角色
14:00-15:30	
東亞經濟成長與產業結構變遷 朱雲鵬／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徐世勳／東協與紐澳成立自由貿易區之研究與我國的因應對策 李再長、曾雅芬／東亞諸國人力資源評估	中國大陸的糧食、能源與東亞匯率 田君美、王東英／中國大陸糧食問題研究 趙志凌／中國大陸能源安全策略之分析 陳元保／東亞地區匯率共整合性及其變化
15:45-17:15	
國際移民 姜蘭虹、宋郁玲／移民就業類型與適應－以澳洲臺灣移民為例 洪富峰／台灣與東南亞國際移民－台灣製造業投資馬來西亞製造業的區位與決策之研究 蔡攀龍、蔡青龍／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Substitute or Complements? 夏曉鵬／資本國際下的國際婚姻－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	中國大陸的外商、貿易與 WTO 的影響 陳麗瑛／中國大陸外商投資與東亞產業分工 劉碧珍／台灣廠商國內外出口行為之分析 謝文真／大陸加入 WTO 對東南亞各國之影響
11月4日(星期六)	
9:30-12:00	
台商現象的分析 陳添枝、陳厚銘、顧瑩華／網路關係與對外投資 徐木蘭、沈介文／越南台商公關策略之粗探性研究－兼與菲律賓台商之比較 蕭新煌、龔宜君、曾熾芬／東南亞台商的勞資關係 蔡敦浩／越南台商產業生態與國際化行為之研究 吳成豐／跨國台商全球企業倫理特性之探究：以印尼與越南兩國台商為實證對象	

* 尚有更動的可能性。

2000 年 9~12 月東亞研究相關會議時間表

九 月		
日 期	會議名稱	相關訊息
3~4	Britisch Association for Korean Studies Year 2000 Biennial Meeting	地 點：Sheffield, United Kingdom 主辦單位：The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聯絡地址：The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Arts Tower, Western Bank Sheffield, S10 2TN United Kingdom 電 話：44 114 222 8418 電子郵件：J.H.Grayson@Sheffield.ac.uk 相關網址：http://www.shef.ac.uk/~eas/
14~16	Fourth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Pacific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地 點：日本兵庫縣西宮市 主辦單位：Asian Pacific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PSA) 聯 絡 人：(1)Prof. Kenji Kosaka (2)Dr. Pauline Kent 聯絡地址：(1)APSA, 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 Nishinomiya-shi Japan 662-8501 (2)Secretary, Ryukoku University, Shiga, Otsu, Seta, Oecho Yokotani 1-5, Japan 520-2149 電子郵件：(1)kkosaka@kwansei.ac.jp (2)pauline@world.ryukoku.ac.jp
21	Lecture in the IIAS/NIOD Seminar Series 2000-2001 'Southeast Asia Across Borders'	地 點：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主辦單位：IIAS/NIOD 聯絡地址：Herengracht 380 1016 CJ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電 話：31 20 523 3800 傳 真：31 20 523 3888 電子郵件：info@oorlogsdoc.knaw.nl

26	IIAS Annual Lecture	地點：Lieden, The Netherlands 主辦單位：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聯絡地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P.O. Box 9515 2300 RA Leiden The Netherlands 電話：31 71 527 2227 傳真：31 71 257 4162 電子郵件： iias@rullet.leidenuniv.nl
27~29	Institutions, Livelihoods and the Environment Change and Response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地點：Copenhagen, Denmark 主辦單位：Nordic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聯絡人：Anne Schlanbusch 電子郵件： anne@nias.ku.dk
27~29	Indonesia-Portugal: Five Centuries of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地點：Jakarta, Indonesia 主辦單位：Portugues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utheast Asia (CEPESA) 聯絡地址：Portugues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utheast Asia Rua das Portas de Santo Antão 100, 1150-269 Lisboa, Portugal 電話：351 1 347 0301 傳真：351 1 347 0305 電子郵件： cepesa@mail.telepac.pt
十 月		
日期	會議名稱	相關訊息
6~8	Midwest Conference on Asian Affairs (MCAA)	地點：Bloomington, IN, USA 主辦單位：East Asian Studies Center Indiana University 聯絡地址：MCAA Conference Committee East Asian Studies Center Indiana University Memorial Hall West 207 Bloomington, IN 47405, USA 電話：1 812 855 3765 傳真：1 812 855 7762 電子郵件： easc@indiana.edu 相關網址： http://www.indiana.edu/~easc/
19~21	NYCAS 2000 Asian Discourses Before and After Western Colonization and in the Next Millenium	地點：Albany, NY, USA 主辦單位：The New York Conference on Asian Studies(NYCAS) 相關網址： http://academic.strosc.edu/nycas/

20~21	HSTCC 200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Bridging 1949: Historical Continuity in 20th Century China	地點：Fredericton, New Brunswick Canada 主辦單位：Historical Society for 20th Century China (HSTCC) 聯絡人：(1)Prof. Ka-che Yip (2)Prof. Larry N. Shyu 聯絡地址：(1)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 1000 Hilltop Circle Baltimore, MD 21250. USA (2)523 Montgomery Street Fredericton, N.B. E3B 2x6 Canada 電子郵件：(1)yip@umbc.edu (2)lshyu@sprint.ca 相關網址：http://www.lcsc.edu/hstcc/
27~29	29th Annual Mid-Atlantic Region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地點：Lehigh University, Bethlehem, PA USA 主辦單位：Mid-Atlantic Region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MAR/AAS) 聯絡人：David C. Prejsnar 聯絡地址：Dept. of History/Philosophy Community College of Philadelphia 1700 Spring Garden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30, USA 電話：1 215 751 8644 傳真：1 215 972 6304 電子郵件：dprejsnar@ccp.cc.pa.us 相關網址： http://omega.dickinson.edu/prorg/maraas/
十一月		
日期	會議名稱	相關訊息
11~13	AJLS 2000 Acts of Writing Langua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ies in Japanese Literature	地點：Missouri, USA 主辦單位：Association for Japanese Literature Studies(AJLS) Washington University 聯絡地址：AJLS 2000,c/o East Asian Studies Washington University, Campus Box 1123, One Brookings Drive St. Louis, MO 63130, USA 電話：1 314 935 4448 傳真：1 314 935 7462 電子郵件：ajls@artsci.wustl.edu 相關網址：http://artsci.wustl.edu/~ajls/

14	Asia Update: Economic Potentials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Asia: Prospects for EU-Asia Co-operation	地點：Berlin, Germany 主辦單位：IIAS/NIAS/IfA 聯絡人：Dr. Werner Draguhn 聯絡地址：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Rothenbaumchaussee 32 D-20148 Hamburg, Germany 電話：49 40 4430 0103 傳真：49 40 410 7945
十二月		
日期	會議名稱	相關訊息
9~12	Women and Crises in Indonesia: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past and present	地點：Leiden, The Netherlands 主辦單位：Werkgroep Indonesische Vrouwen Studies (WIVS) 聯絡人：Dr. Brigitte Holzner Dr. Ratna Saptari 聯絡地址：Werkgroep Indonesische Vrouwen Studies (WIVS) Projects Division TCZOOA, Nonnensteeg 1-3 2311 VJ Leiden, The Netherlands 電子郵件：brigaard@wxs.nl. rs-bw@wxs.nl
12~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Chao Phraya Delt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Dynamics and Challenges of Thailand's Rice Bowl	地點：Bangkok, Thailand 聯絡地址：Chao Phraya Conference: Secretariat Kasetsart University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10th floor Bangkok, 10900 Bangkok Thailand 電話：66 2 942 8175 傳真：66 2 942 8170 電子郵件：odoras@nontri.ku.ac.th 相關網址： http://std.cpc.ku.ac.th/delta/conf/home.htm

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 第十一期 2000.08

主 編 蕭新煌
執行編輯 嚴智宏
編 輯 簡心怡 林淑慧
發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電 話 (02) 27822191, 27822195, 26516862
傳 真 (02) 27822199, 26516863
網 址 <http://www.sinica.edu.tw/~proseaw3>
<http://www.sinica.edu.tw/~isear>
電子郵件 prosea@gate.sinica.edu.tw
isear@gate.sinica.edu.tw